**第三部 文革密码**

**序言 神曲**

一直想找贴切的词汇描述那段时间，恕我愚昧，一直找不到。许许多多的材料堆积在眼前，依然如雾里看花。那花朵犹如传说中尸香魔芋，那迷雾如同千年时光。然而实际情况是，它仅仅过去数十年光阴而已。我们身边成千上万的人都从那迷雾中走来。

它更像是一段传奇，奇人奇事层出不穷，那种无节制的狂欢，那种硕大伤口，都是那么的奇特而诡异、矛盾而绚丽。

传说或传奇都是不公平的，因为它真实存在。很多人身上还保留着那个时代的伤痕，那个时代也作为特殊的时代写入历史。也许因为它过于真实了，反而让人感觉到有点不对劲。

所以如此，归根到底就在于，文革过于不寻常。

有句俗话，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世界绝大多数事件都能在历史中寻找到模板。就算是一件新兴的历史事件，随后就会有类似的事件诞生。帝国啊、王朝啊就不提了，遍地都是，一大堆。比如资产阶级革命在英国开辟暴力先河之后，法国立刻跟上。比如当年的巴黎公社使用暴力之后，俄国很快接上。而文化大革命，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仿佛是一个孤立事件，如同一个孤独者矗立在人群之中，存在感是真实的，而真实的存在感之中散发着虚无。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大体上就两个字——乱和治——交替出现，往复循环。在乱和治交替出现的过程中，有一个过程：整体大治，到治中有乱，过度到乱中有治，再过度天下大乱，如此这般。

在中国历史上，有时候“乱”和“治”转变快了一点，比方说安禄山叛乱，就直接把盛唐推向低谷。王朝更替基本就是这样。这还是文明史上最为坚韧有力的中华文明，许多民族动乱一下子就没有了。比方说中西亚那些帝国文明，比方说希腊以及晚一点的罗马，比方说活跃在北方的草原文明，比方说早一点的亚特兰蒂斯文明，比方说远一点的玛雅文明，常常莫名其妙的就中断了。翻开历史书本，会发现一个个死去的文明就如感染瘟疫的牲口一般躺在故纸堆里。我们对它们了解不多，但是我知道它们没能经受得起乱和治的循环，因为它们都死去了。——这一切总有一个基调，乱或治，生或死。

文革过于不同寻常：乱和治并行，生与死共存。

比混乱程度，去史书里去扒，很少能扒到文革那种全民骚乱。伟大的汉帝国，被一次政变（王莽改制）给折腾没了。唐帝国被安禄山和史思明折腾得没了脾气。李自成起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都是帝国衰亡的导火索。尽管如此，也没有达到全民动乱的程度。文革不同，整个国家民族都在骚动。

诡异的是，如此大的骚动中，国家主题部分却是安稳如山，铁板一块。苏联在北方陈兵百万，终于没有向南跨出一步；美国在越南打得火热，终究没有无视中国警告越过十七度警戒线。更为诡异的是，还去爆炸核弹，把卫星送上天等等。

那年月，几乎所有人都在遭殃，昔日封疆大吏，隔一天就在一群年轻人面前“开喷气式飞机”。对于年轻人而言，去批斗市长什么的，显然比在教室里念书有趣。

从内部细节上看混乱程度，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国家将要崩溃。

从外在整体上看整齐程度，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国家前途无量。

事实上，这个国家既没有崩溃，也没有真正前途无量。混乱之后很快转向改革开放，取得壮观的经济效益。这个过程中却又搞出问题一大堆。到如今，贪污腐化问题开始侵入到共和国根基。惹得国人很是不爽。

要解释这一切非常有趣，也非常困难。如此巨大的题目，不同之人站在不同角度可以得到不同答案。即使同一个人以不同的切入点也能得到不同答案。甚至同一个人以同一个切入点也能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

那么究竟如何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归结为权谋斗争。对于这一切咱们最为熟悉。从历史上那无穷无尽的王朝更迭，到咱们办公室，甚至谈个对象都要先观察、推测、预算一番，权谋无处不在嘛。根据权谋斗争论者解释：刘少奇翅膀硬了，分走了毛泽东的光，毛泽东就要把刘少奇干掉，拿回自己的权力。或者说刘少奇想把毛泽东架空，自己去当老大。于是两人火拼，其他人站队。最后姜是老的辣，毛泽东其高一筹，干掉刘少奇。这么解释最为省事，也可以博得很多叫好声。因为这种事确实存在。确实是毛泽东拿下了刘少奇。然而这种解释有很多漏洞，最大的一个漏洞就是刘少奇去世之后文革怎么没有停止？权谋是有的，但并不是全部。如果仅仅是权谋，还有更好的办法：文革之初答应刘少奇告老还乡，另推一个人上去万事大吉嘛。甚至毛泽东重新出任国家主席也可以的。

也可以归结为一处闹剧，说毛泽东晚年糊涂了，头脑不清晰，听信江青那婆娘的一面之词。或者学教科书那般，说林彪野心太大，让很多老同志受苦了，有人复出生命代价，比方说刘少奇和贺龙都是冤枉的，被陷害的。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本着大无畏的革命情怀牺牲小我维持党和国家统一，最后终于在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志共同努力下拨乱反正。确实可以这么说，但有一点需要澄清：毛泽东虽然老，并不糊涂。毛泽东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清醒呢。特别是文革期间，更是前所未有的清醒。

或者说一次伟大的探索实践。这么说也能讲通。因为面对大饥荒之后形成的绝大漏洞，好像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如果查下去，所有人都有责任。从最上层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最下层的大队干部，都有责任嘛。如果把那一页翻过去，对历史没有交代。然而生活还要继续，国家还要建设。建设国家还要依靠那些人。那些人之前能弄出那么大的漏洞，如何能他们保证之后再不会捅篓子？如果是一个人犯错，换一个就行了。如果整个集团犯错，那只能法不责众。法虽然不责众，但是有必要教育一番。通过啥办法来教育干部呢，本来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也就是所谓小四清。结果小四清没搞成，就被刘少奇的大四清给搅合了。毛泽东干脆来个一次性解决问题，一个比大四清还大的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不是去杀，不是去罚，也不是去放过，去教育。谁来教育呢，就由广大人民群众来教育，具体来说就是工人学生农民等等去教育那些官员、专家、学者。

——这就是文革善意的出发点，也是广大老干部支持文革的原因。因为在老干部看来，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官僚化，脱离了那个虚无缥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反过来让人民群众教育干部。

问题是，千百年以来，特别是中国历史上，都是干部管群众。即使现在，仍然是干部管群众。欧美那一套，本质上还是干部管群众。理论上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公务员。本质上还是公务员处于管理者角色，要不然监督他们干吗？

反过来会怎么样？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不知道，因为那种事没发生过。在中国，就是文革中的样子。人无完人嘛。从基本的小集体——家庭——层次上讲，丈夫（或妻子）都不可能百分百的满足妻子（或丈夫），干部能百分百的满足群众？笑话！

市长能让全市人民都满意？连满足一个办公室都困难吧。干部只是干部而已，不是耶稣。即使在美国，把州长丢给占领华尔街那些人，看看会有啥结果？还不是鸡蛋臭袜子满天飞！某个刚刚失去工作的妇女过来扇一巴掌，或刚刚思恋的小伙子踹一脚也不是没可能。

这就是所谓实践带来的问题，也是一大批老干部从支持走向反对的原因。

还有其他一系列解释，什么人性啊、心理啊等等，可以分析出一大堆“成果”。

想来想去，还是用哪个比较通俗的词语评价吧，即悲剧。

文革是一场悲剧。

这悲剧也有多层含义：一部分人认为文革根本不应该发生，发生之后造成很大困难，耽误了很多人的大好前程和国家的发展机遇，所以悲剧；

另一部分人认为，文化革命是应该的，但方式不对，所以悲剧；

还有人认为，应该发生，方式对头，但没有进行彻底，所以悲剧。

进一步分析之前还是先描述事实吧。然而事实又太多，只能简化描述一下。在描述简化的事实之前，先看看几个案例，它们分别代表了文革的特征。就当管中窥豹吧。

**第一章 案例之一：林彪开的处女证明**

在新中国历史上，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号，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一个决议，即《五一六通知》。五月十八号，林彪发表了被称为《政变经》的演讲。它们都是文革标志性文件。五月十九号发生一件怪事。

五月十九号，每个参与会议的人手中都接到这样一个复印件，由林彪亲手写的，大致内容如下：(一)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等人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指林立果、林立衡)是我与叶群亲生的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

——看看这个内容，是不是很奇怪？

更奇怪的是，他要政治局通过决议，说明叶群在同林彪结婚前是处女！

那可是政治局，在召开扩大会议！并不是在谈论风月。很多老干部都不舒服，聂荣臻元帅当时就很气愤：“发这个做啥？收回!”

啥事嘛。叶群是不是处女，貌似是林彪家事，跟别人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林彪脑袋短路了？把“家丑外扬”！事实远非如此简单。林彪性格非常谨慎，平时作风也很低调，而且自尊心极强，一句话能说完的事绝不说两句，能不说的事绝对不说，极少透漏个人感情。亲手抖出来这事，一定是气急了、被逼急了。

一九六六年的林彪地位正在直线上升。在军内，军委第一副主席，朱德淡去，彭德怀被批，林彪成了整个军方形象代言人；在党内，政治局常委排第六，三个月之后上升为第二位；在政府内部，职位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而且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有谁能逼迫林彪这么做？没有人。是什么逼迫林彪？局势。

局势为何为呢，局势就是局势，何物都不是。看不见，摸不着，但确实存在。为了说明局势存在，还是从头说说这事吧。

从五十年代末，大概是庐山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一家经常收到一系列匿名信。信的内容大概就是林彪证明信中要否定的那些，说叶群和林彪结婚之前和很多人搞对象、生活作风有问题、孩子不是林彪亲生等等一系列侮辱性的言辞。接到这些信之后，叶群自然鼻子都气歪了，而林彪虽然喜怒不形于色，却也是肚子里冒烟。

整个匿名信事件持续好几年，直到六六年才算告破，所得结果让人大跌眼镜：竟然是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妇人严慰冰写的。

据说严慰冰所以写匿名信，是因为看叶群不爽。具体来说也就是一点陈芝麻烂西瓜：比方说年延安整风运动，在清查历史档案时，发现叶群有隐瞒历史、虚报党龄等问题，严慰冰了解到这些情况，曾向叶群所在单位马列学院党组织反映。这些情况“很严重”，但没有追究，因为叶群成了林彪老婆。又比如，叶群在军队里时不时发点脾气，像个女霸。严慰冰看着就不爽。据说直接引发严慰冰写匿名信的原因是，林彪和前妻张梅生有一个女儿，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念书，受到叶群的歧视和虐待，放假也不让她回北京。这些原因加在一起让严慰冰决定写匿名信骂叶群一家子。

严慰冰江苏无锡人，生于一九一八年，出身条件不错（地主家庭），接受过和不错的教育。她的文学造诣颇深，散文写的还行。末日开会，毛泽东问同志们：“听说王勃写《滕王阁序》时很年轻，到底是多大时写的？什么地方有这个证明？”众人答不上。陆定一吃中饭时跟严慰冰随便说说。严慰冰听了笑道：“一说是王勃十四岁时写了《滕王阁序》，有书为证。”证据来自古书《唐摭言》。可见严慰冰的文学素养。毛泽东得知后，赞赏曰：“如果在古代，你可以中女状元！”

如此才女，理当有很高的操守，怎么会用那种下三滥的手段去中伤别人呢？即使看叶群不算吧，也不能如此那般啊。事实上，严慰冰也不是那种品格低下之人。但是对林彪一家确实做了品格低下之事。

据说有严慰冰有精神病。她原本是好好的，但是在五二年三反五反运动时被错误批判，精神出了问题。这种可能性倒是有的。比方说延安整风运动，叶剑英夫人就精神出了问题。但是严慰冰如果精神出问题，那应该给很多人写信啊，怎么仅仅写信给林彪一家呢？而且寄信地址是王光美母亲所在的托儿所，有时署名为“王光”，让人联想到王光美。

陆定一本人对此也说不清怎么回事。因为在陆定一眼中，严慰冰也是正常的。

好吧，也许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病。

案子告破得很有戏剧性。

由于严慰冰是陆部长妇人，而且和林彪一家没啥瓜葛，所以公安机关无论如何也怀疑不到他身上。但是案子进展非常有趣。某日严慰冰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东西，钱包被扒了。她找经理反映，经理知道她是部长夫人，告诉她附近有一家供首长和家属购物的内部门市部，她可以到那里买东西。严慰冰就到那地方购物，进门时和一个女人撞上了。能内部购物的都不是一般人。那人气势汹汹地质问：“你没长眼睛吗？”

严慰冰刚想道歉，一看竟然是老冤家叶群，冤家路窄，憋着火呢，“我没看见。”

双方如同武林仇家，你来我往见招拆招。吵到最后还是没完，估计是叶群太过盛气凌人，或者长期积怨太深。严慰冰依然怨气难消，就去找领导反映叶群以势欺人。

这时候问题来了，严慰冰讲的是无锡腔，那位领导是江西人，双方都听不太懂对方的话，只好借助于文字。严慰冰写了争吵的经过。那位领导人也不敢处理，就拿着这张纸去找林彪反映情况。林彪看字迹很眼熟，联想到那些匿名信。林彪把事情转告公安部。

公安部长是谢富治，虽然军人转业吧，对林彪的事当然不敢怠慢。公安部立即派一位局长到中央宣传部，调取严慰冰的档案，查对笔迹，确定匿名信是出自严慰冰的手笔。

这个过程有很多漏洞。首先，就算叶群气焰嚣张、欺负了严慰冰，最多个人恩怨，严慰冰找领导反映已经有点过了，那领导还去惊动林彪？林彪可是国家前几号的人物，而且身体极为不好，连报告都懒得看，会管这些琐事么。不论如何，案子总算破了，那些侮辱性的信件是严慰冰写的无疑。客观说严慰挺有娱乐精神的，讽刺挖苦像模像样，试举一例如下：

搂了一个骚婆子，

生了两个兔崽子。

封官进爵升三级，

终年四季怕光照。

五官不正双眉倒，

六神无主乱当朝。

七孔生烟抽鸦片，

拔(八)光了头上毛。

机关算尽九头鸟，

十殿阎罗把魂招。

——讽刺林彪的。不愧才女呵，写匿名信都是诗歌体的。只是水平很一般，酱油题。

按现在观点看，查出来又怎么样？无非个人诽谤呗，赔礼道歉、批评教育一番也就差不多了。大不了，劳教一番。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严慰冰的遭遇超过了应得的惩罚。

严慰冰住在中南海增福堂，环境很好。她在文化部上班，闲来无事写点诗歌啥的，生活还算清闲。很快这种清闲的生活没有了。和叶群冲突之后预感到不妙。不妙的预感中迎来一位文化部副部长，严慰冰的领导。

一般情况下，文化部副部长到中宣部长家，都会唠叨唠叨。那次比较例外，领导直接告诉严慰冰，中央组织部要找她谈话。严慰冰也想借此机谈谈叶群的事，就去找自行车（那年代生活节俭啊）去组织部。然而领导却说：“外面有车子，就是来接你去。”不仅不让骑自行车，连换衣服的时间都不给严慰冰留下。严慰冰很纳闷，也没有多想，直接拿件外套跟随领导出门了。严慰冰刚出院门看见一辆黑色伏尔加小轿车，接着迎来两位彪形大汉。二位大汉也不说话，一左一右直接把严慰冰加上那辆小轿车。然后小车就驶进了鉴于大门。直到十三年之后，也就是一九七九年才重新恢复自由。

整个过程没有任何程序，完全是诱捕，甚至可以说是绑架，战争年代诱捕特务也不过如此。要知道严慰冰不是特务，她是中央宣传部长的妇人，她本人也是国家公务员，没有涉及到任何国家机密。更为恶劣的是，严慰冰领导，文化部副部长亲自出马下套。还有任何规则可言么？没有。不仅仅是严慰冰，严慰冰的母亲，在抗战初期带着三个女儿，历尽艰难，行程万里，到达延安。这位对共产党作过贡献的革命老人，此时已经七十高龄，也被抓进南京老虎桥监狱，于六八年冬天死于狱中。严慰冰的三个妹妹也无一例外的进秦城监狱。陆定一的儿子也被抓进监狱六年，被打断两根肋骨。完全是株连！

这事还没完。仅仅是一个严慰冰还不足以如此阵势。矛头对着严慰冰背后的陆定一去的。确切说，也不是陆定一，而是陆定一身后的那个行政集团。

陆定一，无锡人，一九零六年生，二五年入党，一九九六年去世，享年九十岁。

陆定一之于中国共产党，如同舌头之于人的身体。陆定一家庭条件也不错，二十岁便从交通大学毕业（让现代高考独木桥上拥挤的学子们汗颜呐）。正准备大展宏图之际，陆定一同志面临人生最为重大的一次选择，毕业一年之后，也就是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清党。如果年轻才俊陆定一和大多数共产党人那样脱党，应该也有不错的前途。

然而陆定一选择了共产党。于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二十二岁的陆定一成为中共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从此以后，陆定一同志就一路宣传部长：宣传部长被拿下；复起，又是宣传部长。直到建国之后，成为中央宣传部长。

除了五二年到五四年那两年之外，陆定一一直干着宣传工作。可以说陆定一把自己的一生压在了共产党政策宣传上，从始至终，无怨无悔。

陆定一的第一任妻子叫唐义贞，比陆定一小三岁是一个奇女子。两人二九年结婚。顾顺章反叛之后，唐义贞和陆定一分开去苏区工作。之后陆定一在宣传部几经起落，二人又几经离合，生一男孩，叫陆小定。

长征之前，唐义贞再次怀孕，被迫留下。被留下唐义贞，还被莫名其妙开除党籍。三个月之后，唐义贞所在部队处境困难，决定往江西转移，去寻找陈毅的部队。队伍通过两山夹峙的一座独木桥时，有人为切断追兵，拆毁了这座桥，哪知反而暴露了去向。敌人迅速包抄过来，唐义贞预感形势危急，向身边宣传干事陈六嬷托付自己身后事：“你是本地人，可能突围出去。我送你一对银镯留作纪念。我若牺牲了，日后有人问起，就告诉他：我丈夫叫陆定一。前不久，我在圭田生下一个男孩，名叫小定，送给圭田乡的范其标、聪秀妹夫妇抚养。”一场殊死战斗之后，唐义贞等二十余人，因寡不敌众被俘，随后被枪毙，时年二十六岁。大概半个世纪之后，晚年的陆定一愈加思念失散的儿女，托人寻找，终于遂愿。建国之后那会干吗不找呢？理由很高尚：忙建设，没空。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是那一代人就是那样，很多事都是不可思议的。

一九八七年，八十岁高龄的陆定一见到外孙女一幕非常感人：按陆定一的要求，年轻的外孙女穿着红色旗袍出现时，陆定一眼睛定住了，随即老泪纵横，不能自持。女孩子的容貌、神气，太像她的外婆唐义贞了！相见的那一刹那，仿佛消失半个世纪的唐义贞再次来到八十岁的陆定一面前，时空折叠，人是人非，如何能分清呵。陆定一拥着年轻半个世纪的外孙女失声痛哭，其中感情，局外人已经难以理解，亦非笔墨能形容。在唐义贞墓前的石碑上，陆定一留下亲笔题词：“义贞知己，我的夫人。”短短八个字，生动朴实，足以天荒地老。

陆定一，至情至性之人也。

严慰冰是陆定一的第二任妻子。严慰冰干的那些事，陆定一本人会不会知情呢？基本可以排除。首先那是一件很蠢的事。陆定一能在高层混那么久，不会睁着眼干蠢事。其次，陆定一是刘少奇的支持者，即使干蠢事，绝不会让人把怀疑的矛头指向王光美的。再说王光美各方面比叶群优秀，说出去也没人信啊。

实际上陆定一也是通过彭真知道的。公安部检验了笔迹之后，鉴于情况复杂，上报中央。当时毛泽东在外地。北京主持工作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就让彭真找陆定一谈谈。由于事情过于不可思议。陆定一表示辞职。彭真建议他不用着急，先到医院“疗养”一段时间。

那是老传统了，某人遇到尴尬不便出面，就去医院“疗养”。所以政治运动一起来，医院往往住满老干部。陆定一感觉待在医院也不是办法。既然中央调查自己老婆，为了避嫌，去南方“调查”，实际上等候处理结果。陆定一刚刚离开，电话就被窃听了。陆定一给严慰冰买个“半钢”手表，后来也被说成是暗号（话只能说一半之意）。

当时的大背景：罗瑞卿刚刚被批判，跳楼自杀未遂。毛泽东和刘少奇完全对立，文革大潮渐渐升起。如何站队什么的，局势并不明朗。站队正确，接下来可以安稳一阵子；错了，意味着遭殃。

三月七号，陆定一到上海，张春桥（还没火起来）去车站迎接领导。陆定一看见张春桥就来火。张春桥和姚文元搞出来的那篇文章让陆定一工作很难搞。当场就把张春桥啰嗦一阵子。张春桥哼哼哈哈应付一番了事。当时张春桥还没有辉煌腾达，对领导不敢太嚣张。

陆定一是宣传部长，文化大革命在北京打不开局势，毛泽东不可能对他满意的。他对张春桥的那些话，在毛泽东那里就是一种表态——站在刘少奇那边。

四月二十八号，当严慰冰被诱捕时，陆定一在合肥调查，罪名是反革命分子。陆定一很吃惊，怎么和反革命扯上了？

出于对高层的了解，陆定一知道，问题大了。

五月六号，汪东兴打电话通知他回北京开会，他已经预感到自己要出事，但没想到出那么大的事。

**争斗**

陆定一回北京照常开会。但是陆定一就感受到气氛不对。向来宣传工作干得不错的陆部长人缘不错，所到之处都是说说笑笑，这一次不同，从下飞机就感受到了。没有人跟他说话，开会时更是没人理他，这是什么情况？——批斗会前兆！

五月十八号林彪在那篇杀气腾腾的讲话（后面篇章重点分析）中指名道姓骂陆定一：“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

五月十九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陆定一挨批。

当时陆定一发言，没说几句话，林彪就质问：你为什么要害我？我这人一直喜欢一点知识分子，对你陆定一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你为什么干这么坏的事，用意何在？

陆定一表示不知道林彪说什么。

严慰冰写的那些信，纵然是攻讦，说到底只是个人事情，不至于上升到政治高度，拿到政治局谈。但是从林彪角度看完全不一样，那完全是挑战一个男人和丈夫的尊严和底线。所以林彪出离愤怒了：“陆定一！你——”

“我，我怎么了！？”陆定一抬头就看见林彪那张气得变形的脸。

林彪气愤之极，缓过一口气，咬牙说：“你天天在想变天，天天在想变天！”——终究是私事，即使要说，也说不出口。

陆定一莫名其妙反问：“变天，变什么天？”

林彪怒气冲冲地说：“你讲，你跟你老婆严慰冰，勾结在一起，长期地用写匿名信等办法，恶毒地攻击和诬陷叶群同志和我，还有我的全家！你讲，你们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搞这个阴谋？你立刻向党讲清楚！”

现在大家终于明白，林彪写那个证明实际上是批判陆定一的依据。

“这个问题，我可以讲一讲。”他抬头望了林彪一眼：“因为事情的真实情况不是刚才说的这样。严慰冰写什么匿名信，我根本不知道，她既没有跟我商量过，谈不到什么‘勾结’嘛！我本人也从来没有发现她写了什么信，这个事情，组织上可以调查，完全可以查清楚。”

林彪猛然打断陆定一的话：“你狡辩！你自己老婆的事，你怎么会不知道？”（注，中间省略粗口若干字）。

林彪爆粗口，陆定一颇有讽刺意味地说：“那不一定，丈夫不知道老婆干的事，不是很多吗？”这句话一语双关又很富幽默感。严慰冰的迷信加上每人座位上放的“处女证明”，对林彪实在是一种讽刺，让有些人暗自发笑。搞宣传出身的，就是不一样啊。

纵横天下的林元帅何时受过这等奚落，因极度愤怒而满头大汗，嘴巴却使不上劲。几分钟后，林彪才猛跺双脚，抬起右手，直指向陆定一说：“我，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那架势，仿佛要手刃仇敌陆定一。

要比口才，林大元帅跟陆部长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上。所以林元帅说话看起来很吃力，而陆部长则轻描淡写、游刃有余。没办法，专业不同啊。要比搞辩论，陆定一大师级水平，而林彪只是一个小学生。正如战场上的林彪是大师级水平，而陆定一只是小学生一样。开会斗嘴，还是理论家比较管用。偏偏是当时林彪身边还没有理论家（陈伯达还没有投靠）。不过不要紧，比理论家更为管用的是康生同志。

林彪因气愤过度而瘫在椅子上十分无助时，康生出马了，一生大吼：“陆定一，你是个特务！”简单明了直接，且杀伤力十足，比林彪那费力啰嗦给力多了。

陆定一冷冷地说：“康生同志——”

康生立马打断：“谁是你同志？”反击相当犀利。

陆定一回敬：“好吧，就算不是。不过，我想提醒一下，现在不是一九四二年整风时候了，你还想搞延安‘抢救运动’的那一套吗？”大家都知道康生在延安整风中的表现，康生几乎把人全部得罪了。陆定一把大家思维引导那个时候，无疑是一招妙棋。

然而康生只有妙招：“好！你敢反对延安整风，整风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反对整风就是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果然又是那一套，结果会场出现“嗡嗡”声。毕竟大家对延安整风记忆犹新呐。

批斗会是开不下去了，康生同志只好拿出杀手锏，当场宣布：“陆定一，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从今天起，对你实行隔离审查，老老实实交代你的罪行去！”搞定！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秀才遇到流氓，还是政治流氓，那就更说不清了。能说会道的陆定一遇到政治老流氓康生还能干吗？倒霉呗。

从此只好，陆定一失去自由，十三年之后再度出山已是风烛残年。

事到如此，不禁又得问一句：为什么？林彪为何开那张“处女证明”？从整个事件过程看，那张证明似乎就为了当批判陆定一的依据的。还没起作用，仿佛留下了一个笑料，看起来非常幼稚。

然而林彪是幼稚之人么？一个幼稚的人不会二十多岁就当军团长，不会长时期掌控共军最精锐的部分，不会看着数十万对手在自己的陷阱中挣扎哀嚎而无动于衷。政治上的林彪，在某些方面表现幼稚。但林彪的谋略远胜那些夸夸其谈的理论家们。这张处女证明可不可以理解为政治幼稚的一种表现呢。如果硬要这么理解也不是不可以。

事实上林彪这个举动并非因为幼稚而家丑外扬，是一个杀招。

这个杀招并非完全冲陆定一去的。正如会议过程中表现的那样，这一招对精于辩论的陆定一没用，从道理上也不具备打倒陆定一的依据。毕竟那些信只是人身攻击。当然，那年代攻击领导就可能变成“反革命”。讲法律，当时林彪也谈不上陆定一的领导。毕竟林彪一直在军队内部，还没有成为接班人呢。

陆定一固然老资格，固然位高，固然人缘不错，但是放在文化大革命那种不讲法理的层次下，还是微不足道的。不少比陆定一资格更老、地位更高、功劳更大的人都被打翻在地。要拿下陆定一，甚至不需要理由。用政治流氓康生直接宣布陆定一隔离审查就完了。

在回顾一下整个事件过程，从严慰冰被捕到严家之人连坐入狱，基本没有任何程序可言，没有公安局，没有检察院，没有法院，只有监狱，只有审查。像陆定一这种高干，也只是宣布隔离审查，仍然没有任何程序可言。

整个逻辑是这样的：严慰冰骂了林彪一家，仿佛闯了弥天大祸，而非依法裁决。说白了就是林彪实力更强而已。对陆定一的处理而言也是一样，实力更强的林彪摆平了实力差的罗定一。但是宣传上不能说林彪恃强凌弱，只能说陆定一夫妇是恶人，而林彪夫妇是好人。严慰冰老婆攻击林彪一家，是恶人攻击好人。严慰冰遭受处罚，那是恶有恶报，正义得到伸张。陆定一因为是恶人的丈夫，也是恶人，所以也倒霉了。

一言蔽之：裁决这事的依据不是法律是非，而是道德上的善和恶。如果用法律来裁决，尽管严慰冰不对，但有个程度轻重，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有依据的。用道德来裁决，只有善和恶，可以轻也可以重，制度完全掌握在胜利者一方，也就是有实力的一番。

纵观整个文革，所以走到这一步，就是那些法律规则已经没用了，用道德标准来衡量。只要把你推入道德上的弱势，比方说叛徒、内奸、里通外国，只能成为刀俎上的鱼肉。

林彪开处女证明，看起来固然可笑，实际上从道德上洗清自己。也就是占领道德上的制高点。有了道德制高点，加上绝对实力，在那个用善恶观念代替法理尺度的时代，可以无往而不利。那个年代，伟大领袖就是完美无缺的。

——了解这一点，还会认为那个举动很可笑么？

正是在占领了道德高点，当陆定一老家被抄之后，叶群才能让红卫兵把所得之物全部给拉进京：陆家之前是地主，长辈曾挂过的几幅画轴，其中一幅上竟画了个有着顶戴花翎，身穿朝服的清代官员，——毒草，四旧；还有一部残缺不全的家谱，算是搞封建迷信；抄出一顶破陋不堪的青布小轿，说明陆定一曾是一个“反动官僚兼恶霸地主”。为了收集更多证据，又从县政府所存的旧档案中，找到几份陆家过去的地契，——剥削劳动人民血汗的铁证。最后，就连陆严两家好一点的锅碗瓢盆也充当“剥削”来的实物。

经过一番策划之后，把这些“罪证”拿出去展览。证据不够充实，叶群大显神通，从国库中拉来几十捆大面额人民币，外加十几个纯金元宝，配上一些来路不明的绫罗绸缎之后，就足够充分了。那个年代简朴的人们看到陆定一同志如此奢侈糜烂，简直罪恶滔天。对骄奢淫逸、穷凶极恶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和仇恨。

代表正义一方的叶群女士，除了消灭了陆定一和严慰冰，还把展览中的战利品瓜分一空。抄家得来的有用物品被象征性拍卖，一件皮大衣卖十元钱，一个清代出品的陶瓷花瓶标价五角。九一三之后，叶群的那些宝贝，大多通过这种方式“买”的。此后这种展览会很快被推广到全国，一批人就此发财。

这个案例中可以得出结论：文革定律之一是道德判定一切，道德高低取决于实力强弱。

既然说到陆定一，不妨多说一点。一九七九年，陆定一走出监狱。出狱之后的陆定一寻找到自己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还抱着外孙女失声痛哭，似乎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老人。陆定一的失声痛哭并非多愁善感，而是富有人情味的体现。因为多愁善感的老人不会干接下来的事。一辈子大风大浪都经历了，辉煌和磨难都有了，人也到了风烛残年。此时的陆定一还能干点啥？当官，退休，之后呢，还有反思，用心和灵魂在反思。

陆定一的反思相当广泛，而且实用，比方说关于历史和腐败问题。

关于对待历史问题：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宜粗不宜细——从大局出发，认清大是大非问题，而不要纠缠到具体的小事中，不要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应抛弃前嫌，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向前看；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宜细不宜粗——历史性的错误，分析得越透彻、越准确，吸取的教训才能越深刻，才能防止重犯这类的错误。

惩治党内腐败问题：光有党内“自律”不成，还要加上外力作用，即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党要坚强纪律性促使党员需要自律、觉悟、克服贪污腐败。同时借助人民监督和舆论监督。在自律的基础上，加上群众和舆论的监督，才能更上一层楼。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而不是自己说了算。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下，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是个普遍现象，要增加反腐的透明度、增加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奏效。这种监督利大于弊，不要怕别人讲话。对于群众的意见和不满，不要压制，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加强这两种监督，就必须首先要加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还有一些其他部分，有兴趣者可以自己看看。这是一个老革命风风雨雨数十年之后反思出来的金玉良言，并不高深，和广大老百姓想法差不多，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如果党员都有这样的觉悟，如果党能促使党员有这种觉悟，如果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促使党促使党员达到这种觉悟，国家何愁不能强大！民族何愁不能复兴！

陆定一的最终遗言：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总结：本案例讲了文革第一个特征：善恶观念代替理性。

**第二章 案例之二：孙维世之死**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号，北京五角楼牢房里，一个女人死了。十月十四号的北京城，已经是秋天，清早晚上需要穿上外套，六八年北京气候要比今天寒冷。那个女人死的时候穿的衣服很少，手上还带着冰冷的手铐。除了手上的手铐，据说她的脑袋里还有钉子（东林党硬汉杨涟也才如此待遇）。

——她是被折磨死的。

即使是六八年那种疯狂的岁月，如此蹂躏一个女人也是一种罪过。这个女人是谁呢？那就是孙维世，一代才女，号称红色公主。如果这一切还不够，就介绍一下她周围之人。

她的父亲是朱德和周恩来的挚友。

她的养父叫周恩来。

林彪曾经热烈追求过她。

她可以随意出入中南海，并且深受毛泽东喜爱。

看看吧，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彪都是顶天立地的人物。这几个人曾经干过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业。他们通力合作促使新中国诞生，让中华民族再一次重生，用自己强有力的手臂把各自的英明刻于史书之上。

一九六八年，朱德虽然淡去，依然德高望重；周恩来国务院总理，国家第三号人物；疾病缠身的林彪第二号人物；毛泽东已经成神。这些关系竟然没能让孙维世保全性命！

毫无疑问，这些现在看来能够遮天的人物都不想孙维世死掉，但孙维世还是死了，而且死得很惨。

——这就是当年文革的一个侧面：没有谁是安全的。

为了把这个侧面说得清楚一点，多说说孙维世这个人。

孙维世，生于一九二一年，和王光美同龄；性格：倔强，天真，任性。其父亲孙炳文是个热心汉子，行径和早年的贺龙类似。年轻时代的孙炳文因为过于热血被学校开除，后参加激进组织“铁血团”，参与密谋刺杀清摄政王载沣，试图推翻清政府。清政府灭亡之后，又反对并试图刺杀袁世凯。孙炳文这种血性而倔强的性格遗传都儿女身上。

一九一七年，孙炳文结识老乡朱德。二人一见如故，肝胆相照，相见恨晚。孙炳文佩服朱德的大气朴质，朱德欣赏孙炳文的阅历与豪情。随后二人携手在护法战争中成为莫逆之交，在滇军中干事业。接下来几年，二人几经沉浮，脱离滇军在北京相会，觉得跟着军阀混没啥前途，需要找一个政党当靠山。

他们认为共产党对外宣传不错，决定寻找共产党老大陈独秀，未果。记下了从北京到上海，找到原滇军将领金汉鼎一起去拜访了孙中山。孙中山当时正被陈炯明搞得很狼狈。孙中山表示先提供十万元作为军饷，要朱德和金汉鼎回到已移驻广西的滇军中去组织。金汉鼎答应了这个要求，之后官至国民党陆军上将，四九年倒向中共。孙炳文和朱德婉言谢绝了孙中山。随后朱德见了陈独秀。但陈独秀看不上朱德，拒绝朱德入党。

随后二人结伴欧洲，在法国见到年轻十岁的周恩来，方才如愿加入共产党，身份是秘密的，对外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朱德寻找共产党的路途中均有孙炳文相随。

三年之后，二人途经莫斯科回国。孙炳文刚回国就被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联名电邀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上校秘书兼黄埔军校教官、广东大学教授。孙炳文在黄埔军校干的很不错，和周恩来等人关系也很铁。此时的孙炳文，在黄埔军校地位比四川老乡聂荣臻地位还要高。如不死，前途当不可限量。

然而好景不长，两年之后，蒋介石清党，孙炳文在上海被俘，不屈，四天之后被腰斩于龙华，临刑前高呼“我今就义亦从容”，颇有谭嗣同的气概。听到孙炳文被杀，久经沙场见惯尸山血海的朱德禁不住痛哭失声。

朱德怀忍着悲痛给任锐写了这样一封信：“鉴闻浚明凶耗传来，（肝）脑皆裂，顿失知觉。死者已矣，我辈责任更加。德本日出发抚州，誓与此贼辈战，取得蒋逆头，以报浚（明）。（抵）上海经过情形如何及前后材料汇集成书，以示同志，而发其未竟之志。近来经济情形，是否可以暂维持，均祈示知。此间工作忙极。此祝努力节哀，留此身体，除此贼辈。”大意是我很难过，我要继承他的事业，为他报仇。此后朱老总南征北战，总是把孙炳文的儿子孙泱带在身边当秘书。然而朱德没想到的是，正因为这段经历，导致了孙泱在文革中丧命。

孙炳文死时，孙维世年仅六岁，尚不知愁为何物。

少年时代的孙维世活泼好动，喜欢和大她一岁的六姨任均一起玩耍。据任均回忆：“维世从小就喜欢学艺术明星的动作，一高兴，就叫我说：‘六姨，你看。’然后对着镜子摆姿势，比划来比划去的，学得可好了。我们俩学人家明星，把围巾围在肩上，在床上又唱又跳，蹦来蹦去地玩儿。每天晚上都特别开心，蹦半天才睡。”

初中时代，孙维世由三姨夫大哲学家冯友兰资助去北京念书。一九三五年，十四岁的孙维世和十五岁的六姨随地下党的妈妈任锐去上海。由于小时候对明星模仿多了，孙维世和任锐要去学表演，任锐就请地下党同志帮忙，把二人弄到天一影片公司“东方话剧社”学习。此后二人假装姐妹俩，隐姓埋名，做了“海漂”一族，偶尔在剧场客场一个小角色。天一公司地处徐家汇，常常能见到一些影星，拿到一签名面啥的。某日，一个叫蓝萍的女人拿着自己的签名照到处派发。蓝萍就是日后的江青。当时江青并不出名，在公司发自己的签名照，算是一种公关吧。若干年之后，凡是拿过那张照片的人都要提心吊胆过日子。这是孙维世第一次见到命中克星——江青。在和江青的交往中，孙维世尽显天真的一面。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十六岁的孙维世辗转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申请去延安，但没人认识她，只好一个人站在门口伤心痛哭。哭着哭着，哭来一个人，周恩来。一番沟通交谈之后，周恩来很讲情义，感念孙炳文的感情，认了孙维世为干女儿，一直带在身边，从武汉带到延安，从延安带到苏联。从那时起，孤儿孙维世来一个华丽大转身，变成天之骄女。孙维世喊周恩来为周爸爸，喊邓颖超为小超妈妈。文革起，孙维世宁死不愿意说周恩来坏话，也是和这段缘分有关。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佛说，种下善根方有善果。

周恩来夫妇没有孩子，视孙维世为掌上明珠。孙维世念书，疑难之处就由邓颖超借油灯之火亲自讲解，有时候周恩来指点一下。延安的孙维世再次和江青结下不解之缘。由于周恩来夫妇的关系，孙维世也经常到毛泽东家里去。毛泽东和江青当时很喜欢她。孙维世和江青曾经同时登台，在同一出话剧之中，江青在剧中扮演姨太太，孙维世扮演小姐。后来有人据此称江青为“姨太太”，喊孙维世为“大小姐”。当时的江青还是和颜悦色的，因为仅仅是延安窑洞里的一个家庭主妇，远没有呼风唤雨之能量，和未来的“红都女皇”相差甚远。

三九年，周恩来去苏联治病。孙维世也想跟去，但需要毛泽东批准。孙维世立刻飞身直奔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大笔一挥，准。当时的莫斯科有很多烈士遗骨，学习不同科目。孙维世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表演和导演。在那里，孙维世遇到另一个男人，林彪。

俗话说，女大当嫁。周恩来的掌上明珠从来不缺乏追求者。延安时代的孙维世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就有人提亲，被周恩来夫妇挡了。加上孙维世从小外向，受前卫思想熏陶，整天在大人物中间玩耍，对对象要求自然不一般。那个爱情还没有了流行的时代，孙维世表现得过于超前。婚恋中的孙维世是任性的，也注定是悲剧的。

红军时代，林彪已经战功赫赫。平型关大劫之后，林彪更是声名鹊起，顶起抗日名将之光环。悲剧的是，名将林彪竟然被友军误伤，只好离开战场到苏联养病。在苏联，林彪遇见孙维世，他那颗铁血的心跳出了一生中最欢快的节奏。

早在延安，林彪还是抗大校长时就见过孙维世，只不过那时候林彪和美女张梅刚刚结婚，生活比较满意。加上林彪性格和业务的关系，谨慎沉默，很少在意周围的事，没怎么留意孙维世。就算留意了，也不会说的。至于是否留意，已经没人知晓了。唯一知晓的是，在苏联林彪和张梅的感情出现问题。据说是因为性格不合。

林彪沉默寡言，喜静不喜动。而张梅活泼外向，喜动不喜静。当时林彪有伤在身，行动不是很方便。对于一个真正的将军而言，战争年代远离战场是一种怎样的折磨，常人是难以想象的。对普通人而言，为了油价上涨都难受不行。林彪是真心热爱战场。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对蒋介石大不敬。蒋介石给张学良的惩罚也就是养起来，不让上战场。张学良为此郁闷终身。张学良对战场的渴望远不及林彪。因为林彪是一个为打仗而生的人。所以林彪心中很受伤，很需要人来安慰。张梅偏偏不理解林彪，时不时想出去参加个聚会啥的。

其实孙维世的性格也不适合林彪。但林彪因为张梅的大大咧咧而心灰意冷时，却又爱上了同样性格外向的孙维世。只能说爱情是个不可捉摸的东西。当然，比起陕北土生土长的张梅，孙维世更漂亮、更有气质，修养更好，而且幽默。还有一个或许不便说出来的理由，背景更好。周恩来的干女儿嘛，相当于最高层那几个窑洞里的小公主。

林彪追求孙维世的手段很简单，就是闲了没事孙维世住的红色大楼去，和一帮留苏年轻人瞎唠嗑，讲讲战争史、散散步啥的。林彪相貌并不出众，估计说故事水平一般，幽默细胞都被战略战术消耗差不多了。但是林彪也有独特的优势，是名将，是英雄。对很多女孩子而言，这都是致命的诱惑。然而孙维世是个例外。当时的孙维世豆蔻年华，正在做白马王子之梦，身边不缺追求者，据说刘亚楼就是其中一位，还很勇猛，是公开追求的。虽然林彪英命在外，也有致命弱点，就是老婆还在身边，而且怀孕了。对一个出于幻想年龄段的娇娇女而言，这是不可以忍受的。

战场上，林彪风格沉稳机变，总是牵着对手鼻子走，静候对方落败。按照战场上水平，林大元帅应该是充分发挥自己男性魅力，静候孙维世芳心暗许。可惜这一套在情场上不怎么使用。林彪自己忍不住了，向孙维世敞开心扉，遭拒。

林彪回国时要求孙维世一起回国，遭拒。

林彪回国，和叶群结婚。后来孙维世回国途径东北，林彪还激动不已，惹得叶群闷头吃醋好几碗。忍不住又要提出假设，假设林彪和孙维世结婚会怎么样？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以孙维世人品，绝不会行后来叶群干那些事。也许林彪就不至于葬身异国。然而这样就会惹出另外一层关系。假如林彪和孙维世结婚，那么就会拉近林彪和周恩来的关系，当时政坛格局就会发生改变。

如果林彪和周恩来联合起来，毛泽东绝不会视而不见。也许林周两人都要在文革中被打倒。也许根本就不会有文革。因为文革没有林彪和周恩来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也许，太多的也许，谁知道呢。

高层将帅之中，林彪已经是最年轻的，如果连林彪都看不上，还能看上谁呢，没有了。当孙维世拒绝林彪之后，也就意味着不会找一个将军当老公了。十四年代，要从共军中找一个高大威猛，微温尔雅，且战绩彪悍的将军非常不容易。林彪是一个标尺。不嫁给林彪不要紧，林彪还是要找老婆的。林彪要找老婆很容易，要忘掉孙维世却很难。林彪忘不了孙维世，林彪老婆是要吃醋的。林彪的老婆吃醋，后果很严重的。

因为林彪，孙维世遇到了生命中林外一个克星，叶群。

正是江青和叶群克死了孙维世。

孙维世从苏联回国，取道东北，林彪既激动又兴奋，叶群则暗淡无光。晚饭桌上，孙维世流光溢彩，而叶群刚生过还在，更像黄脸婆。林彪闷不做声。如果孙维世同意，她还是可以嫁给林彪。其它元帅，都有好几个老婆。情况特殊嘛。叶剑英元帅，建国之后还娶了曾国藩的曾孙女为妻子呢。

正当孙维世准备去东北工作时，叶群用李立三的名义给周恩来发电报，让孙维世不要来东北了。如果孙维世真的去了东北，结局还真不好说。婚姻不是问题。孙维世和金山恋爱，金山也有老婆。据说，林彪从此对李立三恨之入骨。

孙维世也不是那种非要从某一个行业内找丈夫的那种女人。她看重的是爱情。但爱情往往不遂人愿，你看重它，它未必看重你。为了爱情，他非常任性的拒绝刘亚楼，拒绝林彪，拒绝了其他人。为了爱情，她又非常任性的嫁给另外一个别人看来不该爱的人，那便是后来的丈夫金山。

金山是孙维世一生的最爱，也是一生的最痛。

站在旁观者角度上比较，金山和林彪没有可比性，通俗话讲，给林彪提鞋都不配。如果不是孙维世，没有人把金山和林彪联系在一起。然而站在一个任性爱幻想的女人角度上看又是林外一回事。金山，苏州人，原名赵默，生于一九一一年，比林彪年轻四岁。金山原本生于富商之家，可惜父亲早死，家中大管家成了家庭新主人。十几岁便出门闯荡。

金山是那种放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能生存下去的人，因为他很能混。早年闯荡上海滩期间，竟然同时混入杜月笙门下和共产党内部。当年有这两层关系，即使在混乱的上海滩，相当于有了免死金牌。要知道，蒋介石对杜月笙都很客气。同时给共产党当特务，那是没人敢惹啊。无间道剧本里也没有这般牛人。而且凭借堂堂仪表和伶俐的口才混入话剧界，成为著名演员，放在现在就是成功典范，和刘德华的励志故事有一拼呵。

金山同志不仅懂得生存，更懂得获取女人欢心。据现在能考证到的资料，金山同志利用自己的混功，常常和据中女主角擦出爱情的火花，火花又常常熄灭，生性风流。最牛叉时，据说同时追求话剧界“四大名旦”。最后和四大名旦之一的张瑞芳结婚。

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岁的孙维世遇见三十八岁的金山时，金山的老婆就是张瑞芳。当时孙维世的绰号红都公主，新中国第一号待嫁女。孙维世是导演兼演员，金山是主演。金山再一次发挥自身优势，故伎重演，利用演戏的机会赢得孙维世的芳心。说真的，孙维世虽然有种种优点，有时任性骄傲，眼高于顶。但女人终究要嫁人的，挑来挑去等到二十八岁，放在今天都是剩女了。这样一个老姑娘，遇到金山这种风流老戏骨，能顶住才是怪事。

下面的情节就比较俗套了：金山和孙维世相爱，然后结婚，张瑞芳黯然离婚。演艺圈内永远就是那些事，从来不新鲜。对于这段婚姻，周恩来肯定不赞同的。周恩来什么人啊，一生守在邓颖超身边，不离不弃。

周恩来目光如炬，一眼就看透了金山：能演戏，终究是花花公子一个。这种人如果能托付，母猪都能上树。想和这种人结婚，就等老了，没劲风流时再嫁给他，年轻时还是考虑考虑，玩玩就算了。孙维世虽然很能玩，却继承了周恩来的品格和婚姻观念。

二人结婚那天，周恩来没有出面，只送了一件礼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然而这件礼物没管用。第二年，金山同志去朝鲜慰劳志愿军，本性复发，和金日成一个女秘书搞上了。这事放现在没啥，但是在战争年代就不一样了。朝不保夕的情况下，间谍横行，女秘书可以私下里搞关系的话，也可以私下里泄密。所以金日成直接把那女秘书给毙了，虽然残忍了点，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金山同志因为是中国人，金日成没动。如果是普通人，估计直接枪毙了。要知道，毛岸英都死在了朝鲜。

考虑到孙维世丈夫，直接押解回国。

按正常情况下，回国后的金山不死也得落好几层皮。然而金山没有落皮，仅仅因为他是孙维世的丈夫。确切地说，不因为他是孙维世的丈夫，而是因为孙维世没有离开她。

当时开批斗会，大家让孙维世表态。孙维世如果划清界限，金山必死无疑。然而孙维世却说：“金山犯了不可原谅的罪行，我相信：这是他最后一次了！”傻也好，痴也罢，反正就那回事了。此后金山下放去劳改，孙维世如影相随。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孙维世一边是自由出入中南海的“红都公主”，另一边又是被世人鄙视的劳改犯的老婆。

据孙维世六姨任均回忆：“维世那次来，只住了一个晚上。说话间，我看她不似平日高高兴兴的样子，就问她，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儿？她就跟我说金山在朝鲜犯错误的事，我很吃惊，说那怎么办？维世说想跟金山离婚，还说总理气得说应该枪毙金山。我问她你们要是离了婚，金山怎么办？他愿意吗？维世说，我要是跟他离婚，他就得死，他不愿意跟我离婚。维世那天情绪很低，告诉我说，人家开会批判金山，要求她坐在后面听，还叫她表态，弄得她非常难受。从小到大，维世总是那种开朗和倔强的样子，我没有见她这样发过愁。此刻，我面前的维世真可怜。”

患难之中不相弃，孙维世非常了不起。这个举动很难说完全出于爱情。如果仅仅是爱情，以孙维世刚烈的性格应该离婚了，哪怕还有残存的爱。应该是出于对生命的珍惜吧。毕竟一个大活人，毕竟一年夫妻百年恩。就这事上，不能不佩服林彪的眼光，孙维世的确是一个值得爱的女人。如果她是林夫人，呵呵，省略号一串。

**天真**

如果说爱情中的孙维世是任性的，那么人事关系中的孙维世则是天真的。孙维世虽然早年丧父，生活漂泊，但基本上没有接触过复杂的人事关系。碰见周恩来之前，她一直在念书。碰见周恩来之后，就成了高层中的活宝贝。大家都宠着她，溺着她。出现在她眼中的生活，大概就是神圣革命，而没有革命背后的种种谋略。因为周恩来已经像一个真正的父亲一样，把一切疑难艰辛一肩挑下。这事从江青那里最为明显。

江青和孙维世相反，可以说历尽波折，啥事都经历过。去延安之后，江青虽然贵为一把手妇人，仍然是一个家庭主妇，文化大革命才咸鱼翻身。在江青翻身过程中，需要更大的政治能量。江青的背后虽然是毛泽东。但身为领袖，不可能直接出来给江青摇旗。江青的身份是毛泽东代理人。要增加自身威望，必须借助其他人，谁呢，就是毛泽东的铁杆战友。当时中央大人物之中，无条件支持毛泽东的，只有林彪一人。所以林彪妇人叶群和江青自然而然走到一起。林彪自称毛泽东学生，叶群则跟着江青混。

林彪之外，另一个无条件支持（至少表面上）毛泽东，且能量巨大的就是周恩来了。周恩来妇人邓颖超女士是个老革命，资格很老，威望很高，而且和江青没啥往来，断然不会像叶群那样自称为江青“学生”。江青要和周恩来扯上关系，孙维世成了一个绝佳的拉拢目标，理由很多：孙维世是小字辈，跟着江青后面合情合理；孙维世和江青早就认识，二人在延安曾经同台演出；孙维世可以自由出入中南海，弄够轻而易举的面见各个大人物，容易探听到各种情报等等。有了这些便利条件，想不被江青盯上都困难。

建国之后，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翻译小组组长就是孙维世，其和毛泽东有过不少合影，收集不少毛泽东亲笔字等等。回国之后江青一再追问毛泽东在苏联的活动。在孙维世结婚那天，江青还在追问。孙维世则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江青此举动机有过很多猜测，我认为很简单：跟孙维世套近乎，找共同话题嘛。周恩来是第三号人物，江青去套近乎可以理解。因为江青除了跟孙维世套近乎，还跟二号人物妇人王光美套近乎，也就是聊一聊衣服怎么穿、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行踪啥的。江青那个人很能折腾，总是表现很骄傲的样子，有时候歇斯底里的感觉，处理人际关系不在行，即使拉关系也表现得很怪。没办法，江青那个人行为举止一贯很怪，“亲切交谈”之类的技术根本就没有掌握过。而且眼高于顶，能进入她法眼的也就最高层那几个人，一开始周恩来和刘少奇，后来林彪。

那么毛泽东为何如此“厚爱”孙维世呢。把这些问题扯到男女关系上，爱恨情仇上，无疑更有煽动性。然而我相信，在血与火的时代，爱恨情仇从来不能主导时代大幕。原因很简单，毛泽东不仅仅“厚爱”孙维世，同样“厚爱”过林彪的一对儿女，同样“厚爱”刘少奇的儿女。这些在回忆录中都很清楚。因为毛泽东和这些孩子的父亲是“战友”。所以把孙维世的事往男女关系上扯，只因为孙维世是个漂亮有才且有故事的女人而已。如果毛泽东要爱，没人挡得住。毛泽东要恨，也没人挡得住。只有在政治上，毛泽东才会表现得如此曲折迂回。

当毛泽东要从整顿文化界，当江青上蹿下跳表演时，孙维世就成了一个天然的拉拢对象。叶群固然好，然而只能当一个敲边鼓的，毕竟专业不对口。孙维世不同了，本身就是戏剧界明星，专业就是搞戏剧的。加上孙本人巨大的活动能力，有了她的加入，江青将如虎添翼。所以才会出现这般情况：话剧《杜鹃山》上演后，江青找孙维世，希望她能参与此剧的改编，改变成样板戏。孙维世听后天真的睁着大眼睛看着江，天真地说：这个剧是青年剧院写的，我现在是实验话剧院的工作人员了，让我来做这件事情是不合适的。

当时的孙维世是大明星，可能觉得和江阿姨这种三十年前的上海过气小明星没啥共同语言。江很生气，后果不严重。因为那还是一九六三年，江青依然没有杀人的能力。所以说孙维世很天真。年过半百的江阿姨日子越来越红火，并非本人戏剧才华如何了得，而是背后那个人。不久，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不能让人“洋人、死人、帝王将相”统治文艺舞台。毛泽东指示，政策由周恩来落实。周恩来亲自指导了大型歌舞剧《东方红》。

江青笑了，好你个小样孙维世，看你这次如何拒绝江阿姨，还是逃不出江阿姨手心。在周恩来的座谈会上，江青跑过来坐在孙维世旁边，说了一大堆话，低声说：你导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呀？这回该到我那儿去了吧。

弦外音：还是乖乖地跟着江阿姨混吧，有前途的。

没想到天真的孙维世同志依然不买账，天真地以为江阿姨不会有大作为。天真地跑到大庆油田演戏去了。在大庆油田，孙维世再次火了一把。通过自身经历，一九六六年初，孙维世创作的话剧《初升的太阳》在首都公演。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观后给予很高的评价，此剧迅速在京城传开，演了一遍又一遍，风头出尽。以文艺界领袖自居的江青同志自然不能坐视。虽然江青已经羽翼渐丰，但孙维世如同一块肥肉，有背景有关系有才华，网罗过来百利无一害啊。

于是江青决定再给孙维世一次机会，让人通知孙维世，说有重要的工作与她商量。天真的孙维世没怎么在意。之后江青亲自登门拜访，满面笑容地对孙维世说：“看了《初升的太阳》，这是一部很成功的话剧，受到了首都许多观众的欢迎，有个想法，想将这部话剧改编成现代京剧，这需要两个人很好的合作。”面对亲自登门的江阿姨，孙维世依然天真卖萌，没有立刻答应。江阿姨也没有苦苦相逼，让孙维世再考虑考虑，过几天再来找她。此时孙维世再次天真地说：“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我考虑将这个话剧改成现代京剧不太适合”等等。其他人也有拒绝江青的，好歹说的委婉一点。可以想象江青当时的愤恨。

好你个孙维世，竟然不把我放在眼里，你等着！

江青曾对孙维世说：“我说主席妇人，你是总理女儿，我们联合起来力量大，可以对付那些想要对付我们的人。”江青说的是实话，也是心里话。天真的孙维世却不明白政治上的艰险，也不想去明白，她只是凭借自身的好恶去处事。她不喜欢江阿姨，就是不喜欢江阿姨，所以三番五次拒绝不合作，也不懂得虚与委蛇。江青不是一个喜欢掏心窝子的人。她既然这样和孙维世掏心窝子，其实是给孙维世划线，要么朋友要么敌人。

玩政治的就是这样，掏了心窝，非友即敌。

要怪也只能怪江青不够老练，在把握不足的情况下掏心窝子，把双方的路全封死了。要怪也只能怪孙维世过于天真，把世事想得过于简单。

**悲催的结局**

孙维世天真地以为只要走自己的路，就身正不怕影儿斜。孙维世本人是很正，根正苗红，可惜她的影子并不正。她的影子就是金山。要揭金山老底太容易了，好比用道德戒尺去衡量娱乐圈，生活腐化、道德堕落、勾搭妇女、引诱儿童，那是要啥有啥。为啥要修理金山，除了他是孙维世的丈夫之外，还因为他是上海滩旧明星。江青也是就明星，而且不太明。

通过第一个案例，林彪写处女证明已经讲述，文革的标准不是法理，而是道德标志。林彪不惜以家丑外扬的方式洗清道德上的痕迹，江青也不例外。

那个时代的影星和现在可不一样，影帝影后啥的都免谈，也就是装饰逗乐的，也就是说“身份不好”，属于旧社会大毒草。大毒草可以消灭也可以改造。鉴于江青同志也曾位列毒草之中，要洗白自身，就要用强力除草剂除掉别的毒草，这样就没人知道江青也是毒草了。比如说王莹女士为代表的一帮人，关的关，整的整，疯的疯，死的死。即使金山同志不是孙维世的丈夫，依然在劫难逃。

孙维世最后一次拒绝江青，文革进入高潮。一年之后，也就是一九六七年年底，孙维世在家中听到了敲门声。随后一群“公安人员”冲进来，说有要事找金山商量。金山曾干过特务，没有慌张，临走之前像平时一样对镜子臭美一下，然后转过身来朝孙维世一笑说：“我跟他们出去一下，你在家里不要着急，不会有事的。”这是金山最后一次对孙维世笑，也是二人最后一次见面。说实话，之前的金山虽然风流成性，经过劳改之后已经体验到新时代新国家的力量，安分十几年，也算是浪子回头吧。

但是文化大革命是要算账的。而金山身上的旧账、坏账、烂账实在太多。当然不能说抓金山是因为他是明星，得有一个有分量的罪名“特嫌”。有了这个罪名，周围的人就和特务扯上关系，下一步如何操作就看心情了。

拒绝江青之后，孙维世的日子可以说举步维艰。所以享受如此待遇，无非她有一个养父叫周恩来。文革之初的周恩来处于人生最艰难时期。刘少奇和邓小平倒下之后，另一个可能倒下的就是周恩来。文革初期，政府陷于瘫痪。但当时大家热血淹没了脑细胞，处处煽风点火，对副作用还没认识到。所以周恩来“处处灭火”的现实作用还没有展现出来。第一波高潮过去之后，周恩来地位就稳住了。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其他人都意识到：革命之外，活还是要周恩来干。

有人贴周恩来大字报，有人以极其卑劣肮脏的言辞追问孙维世和周恩来的关系。然而人际关系中的孙维世固然天真，爱情中的孙维世固然任性，但是涉及到大是大非原则上，孙维世又体现出刚强和倔强。不论如何询问，终将一无所获。

因为她是特务的家属身份，享受如下待遇：剃光头。

对于一个爱美的女人，对于一个骄傲任性的女人，这是多么大的羞辱！

据孙维世六姨任均回忆：“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维世敲开了我的家门。她戴着帽子，帽檐压得很低，大围巾在脖子上围得很高。我的孩子们平时都叫她兰姐，这次，她只是对问候她的表弟妹点头笑笑而已，就进到我屋里。掩上门，她把帽子掀开一点儿让我看。我大吃一惊：她的头发已经被剃光了。给女人剃光头，是文革初期的一种革命暴力方式。看到她的样子，我心疼极了。维世是个多漂亮的人呀！怎么能被弄成这个样子？维世告诉我：‘六姨，金山已经被抓起来了。’我说：‘啊？那你可千万当心。你就一个人怎么办呀？他们会不会抓你？’她说：‘六姨放心，我没事儿！’我说：‘江青可别不放过你。还有那个叶群。’她说：‘她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她江青能抓我什么呀？我没有任何把柄让她抓！’维世愤愤地说：‘他们让我说总理的情况，想从我这儿搞总理。总理我有什么可说的？我能说什么？我又不会胡编乱咬！我看不出总理有问题！’她非常自信，相信自己没有能被人家整的问题。维世说：‘搞总理，就是想把主席身边的人都打倒，她们好为所欲为！’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是‘清君侧’。”

天真，任性，倔强，都包含在中间了。

然而天真的孙维世还是太托大了，江阿姨要抓人是有办法的，何况她还有战略盟友叶群同志。江青虽然上蹿下跳叫嚣厉害，但实际杀伤力不如叶群大。江青背后的大腿虽然更粗壮，对江青却有所限制，该让江青知道的让知道，不该知道的就不让知道。林彪长期泡病号。叶群是林彪对外代理人，现实中的事情都是叶群操办。四大金刚啥的都要听叶群话。

当江青对叶群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抓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抓。”孙维世的结局就能预测了。

叶群本不是省油灯。对于孙维世和林彪的关系那是相当介意。和严慰冰那种神经质的猜测不同。林彪和孙维世早期关系是实实在在的。林彪早期对孙维世的感情也是实实在在的。

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孙维世再次听到敲门声。

这一次，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再也没有另外一个人对她笑一笑，让她不用担心。

逮捕的方式也很有特色：一群人冲进屋来，什么话也不说，拉着她就朝外面走。

孙维世被投入一个秘密监狱。一个连周恩来都找不到的监狱。

在中共高层中，周恩来党政军特中都有深深的根系，当年的中共特科就是周恩来亲手创造、亲自领导的。建国之后，周恩来更是负责各方面的工作，但——硬是找不到孙维世关在哪，直到她被折磨至死被火化方才知晓。

抓捕孙维世的是现役空军。共军是林家的后花园。林彪不可能干那事。指使者只能是叶群。叶群的背后是江青。

常言道，自古红颜多薄命。在那个搏命时代的红颜更加薄命。狱中的孙维世惨遭折磨，但是她完全承受了下来，维护了最终的尊严和骨气。

——她可以屈服，但是没有。她可以懦弱，也没有。

——如果她屈服或者懦弱，也没有人怪她，因为每个人都有责任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即使她屈服懦弱，写点黑材料，周恩来也不不见得怎么样，也不会怪罪她，因为他知道她是被迫的。

——她选择用自己的生命证明自己凌然不可欺。

那些折磨过她的卑微的生灵，以卑微的方式被遗忘在卑微的时光之河，孙维世依然耀眼。当她用娇弱的身躯面对那些冷酷没人性的折磨时，她的天真，他的任性都已不再重要，世界将记得：她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不愧孙炳文的女儿，不愧周恩来的栽培，不愧红都公主之称号，不愧华夏女儿之英灵。

评，孙维世是一株生错地方的玫瑰。

同情孙维世之余，再来看看周边错综复杂的关系。孙维世的逮捕令是周恩来签发的。同时签发的逮捕名单上还有周恩来的弟弟和王光美的哥哥。周恩来为啥要这么做呢，局势逼的，正如林彪写处女证明一样，都是为局势所迫。

江青找到啥证据呢，也没啥证据，就是请李立三老婆看过戏。那年代中苏关系紧张，“苏联特务”这顶帽子非常流行，凡是跟苏联有关系的都能和特务扯上。李立三妇人李莎是苏联人，就成了苏修特务。李立三已经完蛋了，李莎还在。恰好孙维世也在苏联呆过，并且给李莎赠送过戏票。

根据莫须有的逻辑：和特务有关系的人也可能是特务，孙维世和李莎有关系，所以也可能是特务，就算还没能证明孙维世是特务，可以先假设为特务，然后再慢慢证明，一直证明到最后。江青同志就根据这点弄出材料证明：孙维世是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

江青把资料放在周恩来面前，还美其名曰为总理着想，免得被狼咬了。

现代人可能觉得周恩来批准逮捕令太残酷了，是为了自我保护。也太小看周恩来了。周恩来那种人，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孙维世生存或灭亡。要整周恩来，借口比刘少奇还多。周恩来本人亲自跟蒋介石，跟苏联打交道多了去了，还多次反对过毛泽东，甚至逼过毛泽东下岗。那年代，特务遍地都是，家家都有。比方说罗荣桓的妻弟就是特务。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信任程度绝不低于林彪。就算孙维世真是特务，也不能就扳倒周恩来。

尽管如此，孙维世的事依然足够让周恩来闹心的。敲打敲打周恩来而已。周恩来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签发了逮捕令。

根据周恩来的策略，是想把几个人放在监狱里保护起来，免得被抓走批斗。正如他保护其他人一样。后来邓颖超曾跟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谈过这事：“当时想，放在里面也许比在外面更安全。而且你们（指江青她们）说是特务，抓了起来，你们得给个交代。”

然而周恩来没想到，江青和叶群会把孙维世关到一个连周恩来都找不到的地方。所以说周恩来失算。他提供的保护伞质量不过关。

不少人很纳闷，以周恩来的英明神武，怎么就弄不过江青叶群那两个娘们呢。不是周恩来奈何不了江青和叶群两娘们，而是奈何不了娘们背后的男人。

这个局势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没有人可以反抗。江青拉孙维世，实际上是毛泽东拉周恩来就这么简单。正如江青拉拢叶群，实际上是毛泽东拉拢林彪。孙维世不听话，自然要敲打敲打。但是毛泽东本人只负责大方向，细节问题是不过问的。一贯以来都是这样，这就是他的用人策略。战争期间放权给元帅大将，建国期间放权给刘邓周以及封疆大吏，文革还是放权，放弃给林彪和江青身边那帮人。

纵观毛泽东一生：战略问题毛泽东，细节问题其他人。某人被打倒了，毛泽东也许会知道。至于入狱以及入狱后的事，那就是细节问题了。他没精力管那么多。就算毛泽东可以给孙维世提供保护伞，中间隔好多道墙呢，够不着。

另外一个可以提供保护伞的人是林彪。林彪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这一档事。一九六八年的林彪差不多病入膏肓，整天苦思冥想、顺便划两个火柴玩玩，每天听报告听不了多久，已经没有精力再去管那些琐碎了，有点精神头就翻医书给自己开药方去了。而且叶群是林彪的过滤器，不会把孙维世的消息透露给林彪的。也可能林彪知道，但也无能为力。因为他既不能和江青闹翻，也离不开叶群这个能干的“贤内助”。就算某一时刻林彪心动了，转念也可能会想，连她爹周恩来都不管，我干嘛去闲操心。

毕竟三十年过去了，林彪已经从那个三十岁将军转变成六十岁的政治家。

当时国家几个最有权势的人物都不想孙维世死的情况下，孙维世惨死了，死在江青和叶群手上。江青为何要让孙维世去死。原因很简单，孙维世之死对江青好处多多：解恨，竟敢长期不买江阿姨的账；立威，从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除去一颗知道自己毒草身份的毒草；给周恩来下一个诅咒：养了一个以反革命为己任的女儿，为攻击周恩来铺路。

叶群和江青两个鼠目寸光的女人走了一招臭棋：在周恩来心中埋下一颗仇恨的种子。谁也无法评价，孙维世之死对周恩来日后的正在选择有何种程度的影响。但是可以肯定：它影响了周恩来的选择。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前后。而在九月十二号晚上，周恩来和叶群通过电话。通话之后，林家仓皇而走。周恩来和叶群说过什么？说话的时候想到过惨死的孙维世么？

世事就是这么诡异。很多人对权力顶礼膜拜，以为权力可以无所不能，事实不是那样。任何人的权力都是有界限的。如果世人能认识到这一点，改革或者改制都会简单很多。

这个世界需要的不是对权力的崇拜，而是首先对权力的认识，然后才是监督限制。

评：孙维世之死，意味着文革第二条定律：没有谁是安全的。

**第三章 案例之三：批判朱德（上）**

孙维世入狱之前，除了有一个特嫌丈夫，还有一个特务哥哥，叫孙泱。孙泱是孙炳文长子，曾和孙炳文一起被捕入狱，孙炳文死后，孙泱出狱。朱德感念挚友，就把孙泱带在身边当秘书。据任均回忆，孙泱从小非常淘气，长大后却是温文尔雅，开朗乐观，很讨女孩子喜欢。由于孙泱在朱德身边时间较长，对朱德比较了解，就参与编写《朱德传》一书。那本书和现在的《朱德传》差不多。毕竟朱德的人品事实摆在那里，正常情况下内容大差不差。

然而当时的环境却不正常。不正常环境里总有很多不正常的人，张春桥同志就是那个不正常群体中的一个光辉代表。

张春桥同志在文革中到处淘宝，有一天看到这本《朱德传》，好啊，淘到宝贝了。张春桥曰，哪个臭不要脸的把朱德这个大军阀写成开国元帅的？嗯？开国元帅是毛泽东，朱德什么都没有做，就落得这么多好处。当时“朱德的扁担”已经变成“林彪的扁担”。“气愤”之极的张春桥下令追查此事。编写组的几位作者惨了。人家本来就是“臭知识分子”，本想参与编写朱老总的传记捞点政治资本，这下反而捅了马蜂窝。怎么办？算了，知识分子的骨气脸面先丢一边，检讨吧，说自己不小心写了本“大毒草”，并开始对这本书进行批判，说这本书如何狗屎，借此表示要“重新做人”。那意思就是说，张大老板，给条活路吧，就当俺们这些知识分子是个屁，给放了。张春桥同志笑了，让你们这些平时嘴上说得天花乱坠，事到临头还不是下跪求饶？不收拾你们这群软骨头，世界就没有宁日。然而软骨头中间也有硬骨头。那硬骨头就是孙泱。孙泱不肯认错，他认为自己就是历史的当事人，最有发言权，这本书没有写错，他为朱德元帅立传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张春桥动用大学的造反派对孙泱进行批斗，年轻时代就进过监狱的孙泱和其父孙炳文一样，不肯低头。不肯低头的孙泱还是成了“特务”，并且以特务的身份“畏罪自杀”，实则他杀。

不少人对孙泱的选择不以为然。孙泱就是傻啊，干吗不装孙子保命呢。孙泱并不是傻瓜，傻瓜不可能在战场上活下来。看看那些装孙子的人，转过头就要攻击自己写下的《朱德传》，就要攻击朱德，就要攻击不肯装孙子的孙泱。不肯装孙子的孙泱要付出代价，装了孙子的那些人也得付出代价。不装孙子的孙泱复出了生命代价，装孙子付出的代价则是人格和尊严。以现在价值观来判断，很多人认为生命比尊严更重要。没了生命就没有一切。

然而还有一点必须澄清：一个只会装孙子的集体会软骨病的。软骨头的人汇集在一起去搞倒有骨气之人，等到全部是软骨头的人之后，生命的意义也就没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生命的动物多了去了，阿猫阿狗都有生命，只有人类才有尊严。不想如阿猫阿狗那般活着，就应该去维护自身尊严。如此，才能获得像个人。

朱德曾经想托周恩来保护孙泱。朱德一辈子极少托人办事，此次托周恩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不能看着孙泱就这样挂了。四十年之前的朱德还没有啥能量，因此不能保护挚友孙炳文。四十年之后的朱德已经鼎鼎大名的共和国首席元帅，再不保护战友的后代显得说不过去。可惜周恩来也无能为力，于是说出了那就无奈的名言：“有些人，我不保，日子还好过点；我越保，处境越差。”是啊，周恩来不是不想保孙泱，可是他连视如己出的孙维世都保不住，连弟弟周恩寿都保不住啊。

其实查《朱德传》就是冲朱德去的。斗孙泱，也是冲朱德去的。此时的朱德年事已高，逐渐淡出，可以说人畜无害。为啥要冲朱德去呢？这就是选择这个案例的原因：批判朱德，实际上是为了展示文革力度。让我们来看看伟大的朱老总伟大的一生吧。

**红军之父**

十大元帅各有各的特征。排名第二位的彭德怀刚韧性无匹，重剑无形，为红军之狮。排名第三的林彪稳中长机锋，迅捷锋利，为红军之鹰。排名第一的朱德，红军之父。

一九一七年，二十二岁的孙炳文见到二十一岁的朱德，给予朱德一个最为精准的评价：“大雅绝俗，无阴粗之难近。”又曰：“非与玉阶习者，而不知其口德之高洁也。”讲的就是朱德的大度和纯朴。后来毛泽东称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铁。”

朱德的德行就是这般：大度无形，纯朴无华，意志坚强。唯有如此，方能扮演红军之父的角色。

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一号，朱德生于四川仪陇县一个佃户之家。中共第一代领导班子中，朱德年龄最长，甚至比对面的蒋介石还年长一岁。

朱德出生时，朱家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等老少十一口。朱德父母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六男二女。朱德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爸爸朱世林，一生面朝换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未出过远门，每天除了干活就是干活。朱德的妈妈身材高大健壮，但性情柔和，生养一大堆孩子，从不发脾气、不打人、不骂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品质。想一想嘛，那么多孩子，不同年龄段不同需求。朱德妈妈相当于幼儿园到中学老师一肩挑。别的不说，光吃饭问题就烦得不行。在这种情况下，她竟然不烦躁，不发脾气，不骂人，多么难得啊。日后朱德在军内面对各个派系山头嗷嗷叫，能够淡而处之，不能不说来自他母亲的影响。

一个勤劳宽厚的母亲不仅仅可以影响孩子的性格，还可以通过自身对家庭的组织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朱德家庭虽然不怎么样，兄弟姐妹纵多，但是在母亲精心安排下，朱德依然受到很好的教育，二十二岁那年，朱德加入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成为蔡锷将军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参加云南辛亥起义，反对袁世凯的战争，反对北洋军阀战争。

一路下来，朱德从一个宽厚朴实的农民兄弟变成滇军军官，并且立下战功，成为成功人士，人生前景相当广阔。如果这么一直过下去，不见得飞黄腾达，至少吃穿不愁，还可以娶几个漂亮老婆（朱德老婆也不少哈）。

然而朱德同志想要的，不仅仅是衣食住行而已。他觉得世界需要改变。如何改变世界呢，他也不知道，但他发现共产主义思想不错。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九二二年，三十六岁的朱德去寻找刚刚诞生的共产党，从北京找到上海，从中国找到欧洲，终于如愿以偿。

当时国共两党是交叉的，很多人有双重党员身份。比方说陈独秀、毛泽东都是以共产党身份加入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强大，共产党弱小。

朱德以国民党身份加入共产党，非常稀少。

这期间，朱德见过伟大的孙中山。孙中山出钱让朱德回云南搞革命，朱德拒绝了，只为寻找共产党。朱德找到赫赫有名的陈独秀，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陈独秀看不上旧军阀的朱德，拒绝。于是朱德去欧洲见了周恩来，方才如愿。

根据公认观点，共军起于南昌起义。朱德参加南昌起义。但南昌起义之中的朱德并不耀眼。他没有叶挺的老资格，没有周恩来的高地位，没有贺龙的传奇和实力，没有刘伯承的名将头衔，所以一开始只是第九军副军长，随后才转正的，而且手头人不多。如果非得说一个特点，那就是年龄大一点吧，一九二七年代朱德已经四十一岁，比大多数参与者年龄大。

古人说，四十不惑。四十一岁的朱德已经看透了这世界和人生。南昌起义之后，正是这个资格不太老，职位不太高，名声不太响亮的朱德成了红军之父，偶然么？当然不是。

南昌起义失败，八月三号撤离南昌南下，八月份的江西酷热难当，没有水和食物，没有合理的休整，又有敌人四面环伺机进攻，队伍飞速减员。一支没有根据地依托，没有后勤补给的孤军，如同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子，无人疼爱。接下来还是战斗、减员、战斗减员，队伍经过宜黄、广昌、会场等地之后，减员严重。队伍转移期间，朱德的职务是第九军军长和先遣队司令，一路上负责开路之余，还搞宣传，筹集粮食等等。

会昌恶战之后，那支衣衫褴褛的队伍继续东进，进入闽北武夷山，已经九月份。他们的目标是继续东进，进攻潮汕，据说（注意这个词）在那里可以得到共产国际的物质援助。在三河坝那个地方，决定分兵行动：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怕承等率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从粤闽边境的大埔乘船，经韩江顺流而下，直奔潮汕；朱德率领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约四千人留守三河坝，防敌军从梅县抄袭主力部队进军潮汕的后路，打狙击，苦活、累活。也就是说原本的先遣队变成掩护部队。

正是这个转变，造就了朱德一生中的转折点。

三河坝位于广东大埔县的南端，三江口之上。汀江从北面向南飞流，梅江从西南奔腾而来，两河交会后向南汇入韩江。三河坝对岸有一座八十多米高的山，叫笔枝尾山，形如鱼尾，山势险要，松林茂密，群峰叠嶂，一山镇三江之势，进可攻退可守，乃兵家必争之地。朱德把四千人布置在笔枝尾山，准备打阻击。

当年参加三河坝战斗的第七十五团团长廖运周回忆：“第二天午后，朱德在河滩竹林旁边，召集全师官兵讲话。他和士兵一样，背着小斗笠，穿着短裤和草鞋，给人一种非常温厚和朴实的感觉。朱德同志动员我们：要坚守三河坝，牵制敌人兵力，为向海陆丰进军的我军创造有利条件。（当时我军已占领了潮汕）同时他指出：我军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革命的军队必须与农民结合，才能取得革命胜利。他号召我们要发扬会昌歼敌的精神，保持铁军的荣誉，战胜来犯敌人。”

通过这段回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一个非常简朴的中年人，鼓励一群农民子弟兵，用非常简朴的言语说咱们要加油、要努力干出一番事业。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辞，没有夸夸其谈的内容，只有朴实、是坚硬。

朱德不仅仅说非常简朴的言语，还用非常简朴的行动帮助大家如何防守阵地，如何打击渡水之敌。在朱德的教导下，士兵懂得了一些古老的战争招数，比如说“渡半而击”，就是等敌人过河一半，进退不能的时候开打。

战斗从十月十三号拂晓开始，打到下午三点，优势敌人已经对部队进行半包围。此时朱德手下这批人，还是从国军中分离出来的，素质远不如后期中共军队。尽管如此，朱德依然指挥他们顽强狙击敌人三天三夜，到弹尽粮绝的地步，队伍减员一半，再打下去很可能被包饺子。幸运的是，此时狙击任务已经完成，撤退。

朱德和周士第准备带着剩下的两千人去追赶主力部队，去共产国际那里找吃的。恰恰在这时，朱德迎来一生中最大的考验。他的勇敢，他的胸怀，他的气质，他的魅力集中爆发。

当朱德他们在三河坝打狙击时，悲剧出现：潮汕的主力部队失败，而朱德他们不知道。

周士第后来回忆：“三河坝战斗进行的时候，我们还不知潮汕已经丢失（部分队伍向南转移，策划了广州起义），起义军主力已经失败。我们当时认为守住这个地区对主力作战有利，因此坚持与兵力超过我们许多倍的敌人作战。激战三天三夜后，东文部、笔枝尾山都被敌人占领，我们已处于绝对优势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中，于是就决定退出战斗，拟经百侯圩、饶平到潮汕与主力军会合。”当晚，他们抵达饶平以北的茂芝。第二天清晨，他们遇见第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着二百多人（粟裕就在这支队伍内）从潮汕退下来，告诉他们不要去潮汕了，主力队伍失败了。这个消息如同一盆天大的冷水，浇到大伙头上。

前有敌人，后有追兵，孤军残兵，缺乏粮食和弹药，形势极为凶险。更要命的是官兵思想不稳定，既然主力部队都没了，咱们还能怎么办？队伍解散？隐姓埋名回家种田或者到工厂当工人去？或者干脆学习蔡廷锴同志重新回国军中算了？从南下开始，许多人逃走了。个别逃走没出路又回到队伍中（如林彪同志）。

大家把目光转向了年龄最大，级别最高，宽厚和蔼的朱德。怎么办，老大，你拿个意见吧。如果此时朱德大手一挥说散了，队伍中的林彪粟裕等人大概从此流浪去了。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由朱德说了算。

这一刻虽然足够光荣，但是要服众是不容易的。因为南昌起义时，朱德职位不高，也没带几个人加入。现在身边一两千人，都是别人的兵。比方说二十五师，是原来叶挺独立团扩编的。中间不少兵油子。怎么办呢，朱德拿出她母亲勤俭持家的本事，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个会。朱德在会上介绍了一下情况：大意是主力部队没指望了，现在咱们要靠自己。

如此一番之后，朱德亮出自己的态度：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

从此之后，朱德成为这支队伍的主心骨。

南昌起义时，贺龙地位级别比朱德高，刘伯承级别比朱德高、名声比朱德响，叶剑英和聂荣臻等人都是黄埔教官，名声显赫，为什么最后十大元帅却是朱德排名第一？原因就在这里。就在南昌起义失败之后，那些地位高、名气大的领导都转移了，朱德留在队伍中，把火种带了出来。那支残缺不堪的队伍中，就有很多共和国闪亮的将星，比方说林彪和粟裕。

大会开得并不顺利。经过一系列摆事实、讲道理、抱怨、甚至绝望之后，朱德把大家的意见归纳总结为四条：第一，我们和上级的联系已断，要尽快取得联系，以便取得指示。第二，我们要保存这支军队，作为革命种子，要找到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第三，现在敌强我弱，我军又是孤立无援，所存弹药不多，行动上要隐蔽，沿边界避敌穿插行进。第四，继续对全军做政治思想工作，发挥党团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扭转对革命失却信心的混乱思想，安定军心，防止一些失败主义者拖枪逃跑。会议否决了少数同志关于解散队伍的提议，形成一个决议：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

好了，就这么办吧，反正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但是这个协议只限于军官。

此后半年时间里，朱德和陈毅带着千余人在福建、江西、湖南山地里和对手绕圈圈，行程数千里。如果说日后红军长征是伟大壮举，那么彼时朱德队伍就是红军长征的提前预演，小长征。和日后万里长征一样，过程极为艰苦。

队伍本就是疲惫的残兵，再加上敌人一路上骚扰堵截，继续减员。官兵们不堪重负，相继逃跑。不仅仅是大兵离队，开小车；团长营长也离队，开大车。

队伍解体就在顷刻之间。

朱德和陈毅前后对部队进行三次整顿。在最危险的时刻，朱德做了一个最大胆、最危险、最实际的办法：开大会和大兵们交心。要知道战场之上，在危险的关头，老大总是能躲则躲，因为这个时候不但敌人可能穿出来，身边大兵也可能对你打黑枪。没有谁能保证一支濒临溃散的队伍不出叛徒。比方说项英同志就是死在叛徒之手。

大兵们的思维很简单：咱跟你打仗，就是拿命换一点馒头米饭，你倒好，带着我们打仗，打了那么久，人死了那么多，饭都没得吃，怎么也说不过去嘛。不少同志的兄弟都挂了，肚子又饿，心中来火，往朱德身上开枪也不是没可能。所以说朱德此举相当危险。但除此之外，除非放弃队伍逃跑，已经别无选择。

朱德不愿意放弃队伍，也不愿意逃走，就用最朴实的语调对大兵们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那么朱德的信念在哪里呢？朱德说：“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五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这大概是朱德一生中说的最精彩，最为重要的一段话。说真的，在当时情况下，大家都饿得肚子哇哇乱叫了，哪有心思想那些。但是朱德那番话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粟裕回忆：“朱德同志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

陈毅把朱德的讲话总结为两条纲领：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革命必须自愿。

——在朱德决定在最危急的关头和大兵交心的那一刻，红军之父诞生了。

这番话，让大兵们摇摇欲坠的心神重新归位。个别走了，大多数留下来。留下来的都是真心干的。不论环境多艰苦，有了信念和信心，才有机会战而胜之。灰心和绝望，除了加速灭亡之外别无任何效用。但是面对艰难时事，个人能保持信心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还能鼓舞别人的信心，是领袖级人物才能达到的境界。

朱德不但说，还身体力行。不论行军还是打仗，朱德一直和士兵们一起，一样穿灰色土布军装，一样吃大锅饭。行军时，他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上扛着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着伤员、病号。见人就谈革命、谈革命前途，如同革命领袖一般能说会道。

遇见艰难，总是挺身而出。比如说石经岭隘口，朱德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抢占了反动民团据守的隘口，带领部队进入赣南山区。粟裕回忆：“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经过这次石经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还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

过说还不行，还要做，还要谋划队伍的出路。

队伍整编之后，遇到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就是吃喝拉撒的问题。都年底了，大兵身上穿的还是南昌起义时的单衣，粮食不够吃，钱不够用，陷入了绝境。怎么办呢，朱德从报纸上看到国军十六军距离不远。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学堂同学，两人关系不错，有八拜之交。二人共同加入同盟会，又一起在滇军中讨生活。联系到毛泽东在长征期间从报纸上看见陕北红军前往落脚，不得不说，报纸是好东西啊。

朱德和陈毅商量，决定和范石生联系。经过一番沟通之后，朱德取得这样待遇：朱德可以来去自由，想走就走，不想走，就把自己的队伍以国军十六军一零四团为番号隐蔽在国军中好吃好睡。看来人缘好就是好哇，联系到南昌南下时，同窗好友杨如轩给朱德让道，不禁让人想到：好人好报这事在军队也适用的。

不禁要问，蒋介石干吗去了？忙呢，忙着和汪精卫争夺国民党正统。

最终，纸包不住火，蒋介石忙完宁汉战争之后，很快知晓南昌起义残部隐蔽在国军之中，很生气，但也没辙，因为石焕生并不受蒋介石控制。蒋介石给石焕生密电，让石焕生解决朱德。石焕生则非常讲义气，让朱德走了。

朱德也没有闲着，一方面派毛泽覃去井冈山联系毛泽东，另一方面去湘南搞暴动。然而在湘南并不成功，一些行为过于极端，把革命招牌给坏了，最后带队去井冈山，见到了一生的战友，毛泽东，从此拉开热血大幕。

**两双大手**

朱毛相会有很多偶然原因。

朱德恰好在和地下党接头时得到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消息。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派何长工去找南昌起义的残部。何长工下山先到长沙，然后前往湘南。但白色恐怖严重，过不去。何长工只好折回长沙去武汉，在汉口坐上美国轮船到了香港。经广州到韶关，已经是二七年底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何长工去澡堂洗澡，听两个军官聊天，说这里驻扎的一四零团是参加南昌暴动的队伍，团长王楷就是朱德。何长工立刻赶快马上收拾东西，化装成华侨商人，去找朱德。这样，朱德、毛泽东就取得了联系。

但更多的还是必然性。经过数千里小长征，已经疲惫不堪的朱德意识到根据地的重要性。一支军队要想生存下去，必须有自己的根据地。这一点，南昌暴动时就没有考虑到。不管是周恩来，贺龙，或者叶挺，都是想趁国民党内部不统一，干了再说。毛泽东的秋收起义比南昌起义晚几天，却率先到达井冈山，搞武装割据，维持生存权利。朱德对此比较欣赏。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号，朱德的大手和毛泽东的大手握在一起，从此风云变天。此后将近半个世纪时间内，朱毛组合风靡神州中华大地，携手前行间，天翻地覆。

近代史上有过很多双人组合，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和杨秀清，辛亥革命前后的孙中山和黄兴，甚至蒋介石和何应钦，都是很不错的组合。但是最成功的还是朱德和毛泽东。

一九二八年的朱德四十二岁，虽然是共产党员，实际已经从军二十年，历经辛亥革命、护法战争、军阀混战，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战争数十次，军事经验极其丰富，已经是个优秀的统帅。而且作风朴实，绝不动摇。眼光也不错，调教粟裕，提拔林彪。

一九二八年的毛泽东三十五岁，书生出身但学历不高，搞过宣传但没有名堂，搞过政治但不被信任和重用；但是没有关系，他有俾睨天下的气魄，并且拥有实现那种气魄的雄才和大略。他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大手强改变历史节奏。

一九二八年的朱德虽然有种种优点，但是他还需要一个足以安定天下之人给出心的出路。他曾就学于旧学堂，问道于欧洲，绝没找到那出路。他求教过孙中山，请教过陈独秀，均没有得到争取答案。

一九二八年的毛泽东虽然用他独特的气质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但是缺乏切实可行的人才。而毛泽东本人参军没几天，带兵也没几天，空有一套理论而没有实践。参加秋收起义的将星并不多。十大元帅里面只有罗荣桓元帅一个，还是搞政治的。十大将军里面只有谭政一个，也是搞政治的。真正以打仗见长的反而是黄永胜上将，还是跟着林彪之后才闪耀的。

一九二八年朱德队伍，可谓将星闪耀。元帅就有朱德、林彪、陈毅三位，大将有粟裕、黄克诚两位。加上之前转移的骨干，如刘伯承；受伤掉队的，如许光达，更多。

朱毛会师于井冈山，如同肢体和大脑结合在一起，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合。对于毛泽东而言，思想终于不再是空洞的。对朱德等军人来说，终于不用对着就军事思想和“洋”军事思想迷茫无助。他们终于找到自己的路。所谓马列主义终于不再是理论空壳，终于成为五千年巨人脚下的合脚的鞋子。

两双大手相握，从此历史许多人命运就此改变，从此世界的颜色改变，从此历史之后的流动方式发生改变。

**伟大的争吵**

历史喜欢把伟大的战友描述为亲密无间，仿佛相敬如宾的模范夫妻一般，一生其乐融融。事实往往是另外一个样子，即伟大的战友之间常常争论不休。有时候，伟大的战友之间必须争吵。就算是孙中山和黄兴，也经常吵吵嚷嚷。因为战争毕竟不是过日子，战争的男人如果想要存活、胜利，必须强悍。强悍，是所有伟大战士的基本素质。

伟大的统帅也是一样，必须强悍。因为伟大的统帅不是因为他是朱德和毛泽东而伟大，而是因为他干了那些事。所有伟大统帅必须做出伟大选择。选择，往往伴随着分歧。即使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毛泽东和朱德，也不可能立场完全一致。

分歧总是伴随着争吵。所以毛泽东和朱德之间也有争吵是正常的。两个伟大的男人，为了伟大的事业而争论，争吵也是伟大的。所以称之为伟大的争吵。

大致过程是这样的。朱德带去井冈山的大兵是国民党正规军。国民党军队和后来的共产党军队差别很大。国民党军队和其他军队一样，司令、军长、师长这类“长官”很重要，后来共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来说就是政委权力很大，有时候大过司令，比方说后来的项英就把新四军军长叶挺架空了，饶漱石政委让陈毅军长十分难过。

这个转变起源于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定下——党指挥枪——的政策。

朱德和他带去的那些人对这种政策没有任何印象。没有印象不要紧，要把手中权力减小可实实在在的。朱德是个心胸广之人，就算不计较个人利益，对毛泽东也未必放心。在当时的朱德看来，毕竟毛泽东没有经受过战争考验，却相当强势，把权力给他也不放心啊。等到后期，毛泽东展现了气吞山河的魄力之后，朱德也愿意慢慢淡去。在两人刚刚接触时，就让老诚稳重的朱德服从毛泽东的领导不太现实。

退一步，就算朱德愿意服从，其他人也未必愿意。

正因如此，朱德和毛泽东的早期关系也是波澜起伏。主要是朱总司令的实力比较强大，而毛代表的力量相对弱小。但是在性格上，朱司令比较宽厚，毛代表较为强势。朱司令虽然有行军作战的经验，但政治水平一般。毛代表虽然作战经验不多，但指挥作战的水平不差，要不然林彪那种怪异的天才也不会从朱司令身旁走开，投入毛代表门下。而且毛代表还要按照自己顶下的原则——党指挥枪——去改造朱司令的军队。争吵诞生了。

上层这些分歧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大兵问题。朱德的大兵来自很多地方，到了井冈山才发现，原来条件如此艰苦，南瓜汤都不能保证供应，打仗还可能随时掉脑袋，还不如回老家种地呢，于是以湘南农民为基础的二十九团就闹着要回家，说咱们要回家，打仗也回家乡打，顺便看看老婆孩子种种地啥的，不亦乐乎？

大兵的这种反应，又加深了朱德和毛泽东的分歧。争论终于爆发了。先是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大意是请中央派两个高明的同志来苏区，最好是刘伯承（当时名气大）过来管军事，恽代英（名气大且资格老）来管党。毛泽东这是虚晃一枪，因为刘伯承当时还在苏联学习呢。恽代英在中央搞宣传。这两个人都不太可能去苏区。然而毛泽东这一枪招来另一个煞星。

既然要求人，中央也不能不给，就刘安恭吧，看起来比较合适。

刘安恭，四川人，一八九九年生，二二年入党。参加南昌起义，和刘伯承一起去苏联学习，但比刘伯承早一年回国，正在待业呢。刘安恭在一九二六年和朱德合作过，又有过一起参加南昌起义的经历，可以说和朱德是同一条战线的。他的到来，加剧了争论。这么说倒不是说刘安恭人品差，帮助老乡兼战友对付毛泽东，而是另有原因。

刘安恭此番从苏联回到国内，雄心勃勃，准备来前线干一番事业。当时处于创业阶段，很容易做出一些选择性的贡献，即只要把苏联按照模板抄袭就行了。按照苏联模板，就应该有军委。于是仿造苏联设立临时军委，自任主席。从苏联回国的同志大多有这样的毛病，想要与众不同。比方说刘伯承，回国之后要打运动战。刘安恭也一样，要设军委。军委就是一个军事管理机构，看起来似乎必不可少。但当时情况不一样。如果有足够大的地盘，足够多的军队，设立一个军委是必须的。问题是当时没有固定地盘，只有那么一点人。今天在福建，明天又跑到江西去了。网络没有，电话没有，写信都没有邮递员，军委在后面怎么指挥？所以毛泽东坚决认为应该由前委指挥作战。因为前委就在前线啊，跟着队伍跑，要怎么打，怎么转移，派人通知一声就行了。这么一来，相当于前委包办了军委工作，加上毛泽东性格强势，前委很有家长制做派。

身为中央特派员的刘安恭要改变这个情况。就和毛泽东争论起来。朱德本来就和毛泽东有类似的分歧。此时又认为，既然党指挥军，就应该听中央的，刘安恭是中央的人，应该支持刘安恭。毛泽东的支持者中，最坚定的是林彪。林彪是在前线打仗的，当然愿意接受前委的指挥。要不然以后盖个章都要跑回后方，仗就没法打了。

开会时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刘安恭：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要恢复正式军委；林彪：地方工作不多，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并批评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反对设立军委。各不相让。

两边在争吵，让下面很难办。大家认为刘安恭有道理，林彪也有道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多数人都不赞同刘安恭的临时军委。这厮仗着自己喝点洋墨水，回国就想骑在咱们头上，没门。

二九年六月八号的前委扩大会议上，连以上干部都来了。刘安恭和林彪再次针锋相对。刘安恭慷慨陈词：“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林彪再次重申了反对设立军委的意见。朱德为缓和会场紧张的气氛，耐心解释工作。

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他将自己的意见写出来放在会议桌上，理由很简单：“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毛泽东此举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刘安恭的做法不满，接下来投票，前委以三十六票对五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自然免去，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随后在这个职位上光荣牺牲，晋升为革命烈士。毛泽东虽然暂时获胜，然而此事没完。从长远角度看，军委是必须的。朱德的立场和刘安恭一致。刘安恭指出的那些问题确实存在。不少人厌倦了毛泽东的霸道和强势。

两周之后，也就是六月二十二号，红四军在福建龙岩这个地方召开第七届党代表会议。大会和两周前的情况差不多，吵得特别厉害。各方面态度还是一样，但局势发生了逆转：人家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已经没有了，目标就集中到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上面，说老毛你要把自己的那一摊子事说清楚咯。

经过陈毅同志和稀泥似的慷慨陈词，大会再次选举，结果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也没有了。而陈毅莫名其妙的成了前委书记。陈毅之前当过前委书记，但是搞不定。这次再次当选，依然搞不定，脑袋很大。而且从此背上排挤毛泽东的恶名。出现这个结果，只能说明：一，大家累了，不想再吵了，都走吧；二，政治平衡，并非军事需要。

不管台前人如何叫嚣，争论的根本还是朱德和毛泽东看法不一致。

刘安恭只是一个外来户，虽然参加过南昌起义，职位不高，而且随后去苏联了。来到苏区相当于空降兵，独门独户，想找茬手里也没家伙。朱德主张接受中央策略，好像没错。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央自己都是东躲西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如何能给出正确主张？

还是刘安恭说得对：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命令。

这个问题一直存在，随着中央对苏区干预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突出。一九二九年，仅仅是一个中央代表刘安恭就闹成这样。接下来，中央进驻苏区之后，冲突更猛烈了。但是以当时毛泽东的力量，可以搞定一个刘安恭，还没法和整个中央对抗。所以毛泽东起起伏伏，多次下岗。要不是拜蒋介石强力干预，第五次反围剿惨败，毛泽东恐怕很难复起。这个问题一直持续，持续到遵义会议，持续到延安整风结束，毛泽东成为最高领袖，再也没有人干预他自创原则为止。日后的文化大革命，又因为没人能干预他，而损失巨大。

这就是毛泽东最特别的地方——总是能根据实际需要自创原则，并且非常有效。

按照中央那一套，共军早就玩完了。既然中央搞不定，那就自创原则呗，只要能够扭转不利局势，只要有用。事实证明确实非常有用。比方说三湾改编，毛泽东创立“党指挥枪”；比方说毛泽东自创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比方说长征途中，毛泽东自创放弃西进而北上等等。没有毛泽东自创原则，队伍差不多可以散了。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有利的一面和有害的一面。这种随心所欲的自主性在战争年代非常有效，在和平建设时往往是一种伤害。同样一个毛泽东，同样自创原则，自创大跃进原则，自创文革，就带来巨大的伤害。

作为毛泽东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朱德承受了、也必须承受毛泽东自创原则带来的荣耀和痛苦。荣耀，战争的胜利；痛苦，战争之后的政治运动。从带着千把人上山到红军中山路，到八路军总司令，到解放军总司令。这一系列的变迁中的荣耀只属于朱德一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再也不会有另外一个男人能够享此等尊荣了。

没有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更加困难重重。没有毛泽东，朱德也不会有后来的地位。朱和毛，军和党，一体的。一体之中的朱和毛共同探索了游击战基本原则，比如十六字诀：二人通力合作，创游击战精髓，十六字诀：敌进我退：保存实力，待机转移攻势；敌退我进：打击其士气，积小胜为大胜；敌驻我扰：以疲惫敌人，造成对我有利之形势；敌疲我打：应即集中兵力，主动进攻，以歼灭敌人。

关于十六字诀，现在又惹起争论，有人说是朱德最先提出，有人说是朱德最先提出。争论这个毫无意义。因为朱德和毛泽东是一体的。朱德战争经验丰富，毛泽东政治理论水平高。这个十六字诀，很可能是毛泽东根据朱德的军事实践总结出来。即使朱德先提出来，也不影响毛泽东的天才。即使毛泽东总结，也不影响朱德军事地位。

**伟大的合作**

龙岩会议之后，毛泽东离开前委，陈毅重新成为前委书记，去搞不定前委局势。没了毛泽东，朱德也是寸步难行。有经过一番折腾，毛泽东又回到前委书记的位置上。朱德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不可或缺。朱德本就是心地宽厚之人，从那个时候开始，朱德对毛泽东越来越认可，越来越包容。以二九年为基点，转变如下：

两年后的宁都会议上，中央高层要对毛泽东动手时，朱德能做到中立已经很不容易。

六年后的遵义会议上，当博古凯丰等人和张闻天毛泽东等人激烈过招时，朱德的表现是这样的：听着听着，一向慈祥谦和的朱德再也听不下去了，大拳砸在桌子上，猛地站起来，目光冷烈如电：“我说几句。是，我们大多数将领没有喝过洋墨水。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谁对谁错，历史是最终的证人！李德同志总揽战局以来，红军节节失利、全局溃败。湘江一战，数万战友血染江涛！”朱德失声流泪，会场一片沉静。随后，朱德提议，“让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央领导中来！大家就此请发表各自的意见。我的话，讲完了。”

可谓声情并茂，霸气侧漏。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遇见命中克星张国焘。三个月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彭德怀红三军团的保护下悄然北上，逃离了张国焘魔掌之外，然后北上。朱德和张国焘同行，相当于与狼共舞。在与狼共舞途中，朱德依然支持毛泽东。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朱德的作用不仅仅是支持毛泽东和张国焘对抗那么简单。遵义会议上的朱德只是像政治家一样表态。博古等人并不能把朱德怎么样。南下途中，除了要面对来自张国焘的危险，还有整个红四军面临实实在在的危险。因为南下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这段历史应该很精彩，可惜模糊不清，但依然能找到如下片段：南下的张国焘从噶曲河折回阿坝，立刻大造反对南下的舆论，开始对朱德的围攻。想给朱德来个下马威，让朱德屈服。因为朱德是红军总司令，很重要。

批斗会上，很多人人跟着起哄，要朱德当众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根本不吃那一套，几十年了，啥没见过？就坐在那里，不鸟他们。张国焘坐不住了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朱德虽然脾气好，也被他们搞得很烦，表态一番，大意：南下是没有出路的。鬼子入侵，国人愤怒。北上打鬼子才有前途。

眼见朱德不配合，就有人起哄，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

朱德表示很淡定：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

张国焘以各种名义召开各种会议，主打宣传：“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他们给朱德起一些响亮的名字：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张国焘要另立中央，朱德坚决不同意。朱德和张国焘的较量是另外一种风格。当年党内斗争十分激烈，开会时常常是上下蹦跳，吵得脸红脖子粗。朱德不一样。

张国焘的追随者对朱德亮出言辞上的“坚船利炮”；朱德则安稳如山，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如同身在女儿国里面对诱惑却闭眼诵经的唐三藏同志。等对方斗完骂完，他又慢慢的摆事实讲道理，又如唐三藏那般宣扬“佛法”：南下没出路，要北上，不要南下，要北上等等。

对于朱德的表现，徐向前表示很佩服：“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他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矮一截子，拿朱老总没办法。朱总司令的地位和分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朱总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因而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这话有少量水分，基本靠谱。

张国焘的回忆录把很多人啰嗦一通，对朱德很客气：“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可以说他对朱德相当敬意。想要赢得张国焘的敬意，不容易啊。

朱德为啥这么干？是觉得张国焘霸道难合作？非也。毛泽东比张国焘还要霸气。朱德的家底都在中央军？这样未免小看朱德了，问题关键就在于他从军事统帅的角度看见南下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当时国民党是正统，共产党是造反派。唯有以抗日的名义北上，方能在道义上占领制高点。对于弱小的一方，又失去道义优势的话，结局只能是灭亡，跟战术无关，跟天才无关，甚至跟政治无关。当年石达开离天京出走就是范例。

张国焘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晚了，再北上，政治威信失尽，只能仰人鼻息了。最后觉得仰毛泽东鼻息没意思，跑去仰国民党鼻息去了，一世英名就此断送。朱德依然稳稳坐在总司令位置上，迎来人生巅峰。张国焘和朱德比，战略眼光还差一点儿。

正因如此，战争年代，也只有朱德可以和毛泽东匹敌。但战争之外就是另外一个模样。

**政治遭遇**

延安整风，朱德沉默不语。朱德之所以能够沉默不语，是因为他当时的分量很足，不至于整到他身上。分量很足的朱德所以沉默不语，没有出来说话，是因为他的政治敏感性不够。比方说在遵义会议之后回到家中，朱德对康克清说：“毛泽东同志最终复出了，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又可以参与指挥军队了。”“太好了！”康克清的声音提高了，随之又压低问：“那李德和博古呢？”朱德说：“会议取消了‘三人团’，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事实早就证明，他们两个指挥不了——要不是他们用死打硬拼的打法，第五次反围剿还不会损失那么大呢！”康克清问：“当初为什么让毛泽东同志离开部队呢？”朱德沉思一会，说：“这件事情很复杂，我也说不清，更不能给你说。”这段对白如实反映了朱德的心态和政治觉悟。延安整风好像和朱德无关。

此后的政治运动，朱德即使表态，总是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政治上，朱德从来只是表达观点，不搞动作。能长在政治涡流中生存，因为自身的威望和宽仁。在战争时代，朱德的这种性格有利于协调各个山头派系之间的争端。等到和平年代，政治为主时，却又不可避免的淡去。宽厚坚强的朱德愿意慢慢淡去。可是朱德又没有真正淡去。因为在长期历史形成过程中，他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是总司令，是共军之父，军界最为光辉的形象飘荡在共和国上空。当共和国发生悲剧之时，朱德那光辉的形象就不可避免的被触及。

庐山会议，时任人大委员长的朱德对彭德怀有袒护之意。彭德怀长期以来虽然是副职，八路军副总司令，解放军副司令啥的，对战场的实际指挥多于朱德。而且彭德怀性格比较霸道，有时候甚至刚愎自用，对朱司令也有顶撞。对于这样一个副手，没有宽大的胸襟是没办法和谐共处的。但朱德处理得很好。二人关系总体还算融洽交心的，也朱德的心胸真正容得下彭德怀的狂傲。正义如此，听到彭德怀去世消息，朱德老泪纵横。融洽归融洽。在庐山会议上，那种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仍然为彭德怀说话，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所以毛泽东果断讽刺朱德隔靴搔痒。不仅如此，庐山之后，朱德也做了检讨。这事再次证明了朱德的政治敏感性，或者说是大智若愚，不屑于摆弄吧。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朱德也是左右为难，三改稿子之后方才端出一盆稀泥。

还好，一九六二年，还有和稀泥的空间，等到一九六六年，这一点点空间也被压缩了。

和所有人一样，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朱德注定无法幸免。

在文革这样一幕大戏中，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四大天王各有不同角色。就核心毛泽东而言，他希望通过发动文革来解决一切问题。解决的问题是以刘少奇为首的整个行政系统。此时的周恩来和朱德就比较尴尬。朱德虽然挂着人大委员长的头衔，但余威依然在军界。让人尴尬的是，军界没有朱德的位置。

实权在毛泽东和林彪手中，要发动文革，必然动朱德。因为文革，前面虽然有个“文”，其实力度和方式胜过很多时代的武革。

唯有动朱德，才能显示文革的力度。

动朱德，又不能让朱德倒下，因为倒了朱德，会出现连锁反应。这便是文革特色之一。

所以才有批判朱德的那一幕。在讲述那一幕之前，先看看那一幕出现的原因，即为啥要动朱德，又不能让朱德倒了。要先看看朱德巅峰时代的模样。

**第四章 案例之三：批判朱德（下）**

**巅峰**

前面分析过，开国将帅的事业线是不同的。比方说彭德怀，事业线的顶峰在抗美援朝。比方说贺龙，事业线顶峰在红军时代。比方说聂荣臻，事业线的顶峰在领导科研团队。比方说叶剑英，事业线顶峰在文革之后。朱德的事业线顶峰在抗日战争。

当我们把目光焦距在朱德身上的时候，通常看到最为光鲜亮丽的部分是朱德寻找党，是朱德在南昌起义指挥独当一面，往后的形象便渐渐模糊了。以至于很多文艺作品中看见朱德的时候，就像一个宽厚的老爷爷，负责举手赞同表态。

不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举手的基础都是实力。当年张闻天只负责在党内举手，结果就没有举下去。没有实力，举手也不行。有实力，不举手也行，比方说张国焘就拿不举手的朱德没办法。军内竞争同样非常激励。单凭老资格是没办法一直坐在总司令位置上的。比资格老，朱德比不过贺龙或叶挺，他们是南昌起义中最大的两个股东。朱德能一直坐在那里，就因为实力。但是朱德的实力却换来了尴尬的结果。

朱德的尴尬在于——被政治家。他是一个军人，被迫成为政治家，却不搞政治家手腕。所以出于政治需要，朱德虽然是军方最大符号，却模糊不清。

在井冈山历次反围剿过程中，朱德作用不比毛泽东小。但是因为毛泽东隐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人便以为前几次胜利是因为毛泽东很神。加上后来的遵义会议毛泽东作用突出，更是加剧了人们这种看法。朱德宣传很少。

张国焘搞分裂，由于对手是毛泽东，最后败在毛泽东手下，后人又忽略了朱德在中间的作用。以至于大家认为毛泽东挫败了张国焘。朱德宣传很少。

如果这一切都不算特别尴尬。最大的尴尬则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初期，朱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后期宣传时回避了。是事实上，抗日战争中的朱德，特别是抗战初期的朱德，是最为耀眼的朱德，是符合十大元帅之首地位的朱德。当时的朱德夹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中间，夹在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举足轻重。当时的朱德，虽然身在共产党，却也同时指挥国军作战，同时为共军开辟生存空间。

抗日战场上的朱德没有指挥过百团大战那样大规模运动战，没有指挥过平型关那种政治高光性的战争，没有黄土岭狙击战那样搞死过日军高级军官，然而朱德的作用依然是最大的。因为朱德的作用是基础性的、全局性的。

西安事变让蒋介石意识到：要抗日了。其实蒋介石早有抗日意向，只是限于水平问题，“安内”总是不成功：一直没法搞定共产党和军阀。“攘外”也搞不下去了。

共产党和军阀只是折腾蒋介石，日本人真正想要蒋介石的命。如果说当年日本人吞噬东北，还是张家地盘，战刀没有砍到蒋介石身上。日本人拿下东北之后，补血充电，精神抖擞往华北去了，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

毕竟嘛，作为当时中国最高领袖，全国都在吵闹着抗日的情况下，再退的话，估计又得下野。西安事变更让蒋介石意识到：一直退下去，不止地位不保，生命还可能受到威胁。不仅如此，日本人步步紧逼，威胁长三角。那可是蒋介石生命线呵。太狠了。

三七年到三八年两年，经过残酷的淞沪会战、残忍的南京保卫战、惨烈的太原会战、血腥的徐州会战、惨然的武汉会战之后，蒋介石和他的国军一退再退。这个时期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丢失国土最严重的两年。但这个阶段的蒋介石是英勇无畏的，不惧牺牲的，是名副其实的领袖和英雄。这一系列的失利，使得蒋介石没有精力和共产党在政治上磨嘴皮子。

西安事变之后，两党开始谈判。由于国民党处于优势地位，谈判中处于“开价”地位，一开始国民党开价很低。然而华北危急，国民党提高了价码：允许共军改编为三个师。

接下来淞沪会战，国民党再次提价：同意在红军改编后设立统一的指挥机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并正式发表这项任命。淞沪会战中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九月十一号，太原会战期间，八路军升级为第十八集团军。

太远会战之后，即三八年二月十六号，朱德升为右翼兵团总司令。

一九三九年三月，朱德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从东路军开始，朱德不仅指挥八路军，而且指挥国军抗战。前面已经介绍过，朱德是以国民党身份加入共产党的，现在，朱德又以共产党的身份指挥国军。有这种威望和经历的，共军内部有且只有这一位。这段时间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蜜月期。

正是这个背景下，朱德率领八路军（习惯性称呼）东进，完成进军敌后的基础性部署。这个部署有多重要，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三个师从陕北开出时，不到五万人。抗战结束后，已经发展到上百万。这段时间内，后来的将帅皆直接听命于朱德，在朱德统帅下干活。所以说，抗日战争中，朱德才是共军最重要的统帅。

这段时期内，朱德不仅完成了八路军决定性的部署，而且以自身魅力赢得很多顶级人物的赞赏。比方说共军内部的贺龙元帅。南昌起义时领导朱德，如今被朱德领导，也没有怨言，因为他发现“朱德确实是一个帅才。”再比如国军牛人卫立煌，和朱德共事，对朱德叹服不已。卫立煌是谁？蒋介石五虎将中唯一名副其实的统帅，之前“剿共”最狠，抗日战争最卖力。太原会战中，也就是卫立煌指挥的忻口会战打得最好。

这期间国共合作很好，比方说忻口会战，卫立煌在正面打得很英勇，但是被日军飞机杀伤严重。此时陈锡联带着一队人马夜袭明阳堡，毁掉了日军二十多架飞机，大大缓解了正面国军的压力。比方说，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一二零师在雁门关干得都非常不错。特别是平型关战役，加分不少。国共合作，成果多多。十年前，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唉，啥时候第三次合作，台湾等着解决呢。

但是朱德的战功没有得到充分宣传。历史书上记得毛泽东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记得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中豪气干云，记得林彪在平型关杨威，记得刘伯承教科书般的伏击和狙击，很少讲述朱德的决定性贡献。原因为何？可以理解为为了宣传毛泽东而忽略了朱德。实际上这个理解站不住脚。作为毛泽东的合作者，朱德形象也应该光辉高大才是。

所以如此牵扯到另外一个人物，抗日战争领袖，蒋介石。

现在大家均认为蒋介石并不是一个一流的统帅，面对强大的日本人或弱势的共产党时均没办法。但是蒋介石一直一生都在打仗。蒋介石能在国民党内部崛起，就靠军事成绩。面对日本人之前，蒋介石战功赫赫，先后打败了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以及他们之间的排列组合。所以如此，只因为蒋介石虽然不是第一流的军事家，却是第一流的政治家，政治手腕一流。通过人际关系挖墙角，绝对是超一流，大师级。

蒋介石挖墙脚案例之一：蒋介石和冯玉祥战争，蒋介石成功策反冯玉祥嫡系，韩复渠和石友三，结果冯玉祥不战而败，通电下野。

蒋介石挖墙脚案例之二：蒋桂战争，蒋介石敏锐发现，李明瑞和杨腾辉和李宗仁有间隙，立刻送去重金。结果李明瑞和杨腾辉火线倒戈，李宗仁狼狈败走香港。

蒋介石通过政治手腕控制中央，挟中央以令军阀，对敌手政治人物打压，拉拢对方阵中军人，给钱给官位，百试百灵。这一招可以说是蒋介石在战场上的必杀技。然而这一招对中共就不灵了。蒋介石派遣黄公略的哥哥去游说，结果黄公略杀了哥哥。蒋介石派人拉拢贺龙，贺龙杀掉来使。彭德怀和徐向前，也不鸟他。

蒋介石很纳闷：娘希匹，难道共产党人都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对啊，周佛海张国焘这种老家伙还不是乖乖来投降了么？一定还有办法，还有办法。只要有机会，蒋介石就不会放过。蒋介石抓人际关系的水平堪比苍蝇叮鸡蛋缝隙。

国共合作合作，对蒋介石而已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拉拢共军高级将领的机会。蒋介石利用这个机会试图劝说彭德怀贺龙，试图勾引林彪。对共军内部威望地位最高的朱德，蒋介石绝对没有理由视而不见。蒋介石认为，挖朱德，条件更为有利：朱德曾经是国民党党员，在国军内混过很长一段时间，国军既没像对待贺龙那般去杀朱德全家，也没像对待彭德怀那样去刨祖坟。而且朱德远不像林彪那般离不开毛泽东。

蒋介石盘算着：能把朱德争取到，作用远胜于张国焘之流。

所以对待朱德和其他人不一样。韩复榘石友三之流本就是欲望满满的势利眼，给点钱给顶乌纱帽，马上乖乖来请安。李明瑞杨腾飞只是小角色，给点大洋就行了。朱德不同，战争经验（一直在打）、阅历（游离欧洲各国）、地位（当时共产党内第二重要的人物）、信念（从国民党加入共产党）一样都不缺。要想拉拢这样一个人，直接送钱许官肯定是行不通的。怎么办呢，蒋介石把他拉人艺术发挥到极致，即荣耀和尊严。

具体方式就是，对共产党打压同时，对朱德一再提升。

如果说八路军总司令或是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职称是朱德在共产党军内地位自然体现，那么东路军总指挥就是国民党任命了。如果说这个职位是虚的，那也就算了，卫立煌直接拨六个团给朱德。等到朱德继任，朱德指挥军队，除了共军之外，编制上还包括国军第六十一、九十一、九十四、一六九师和第十七、一一七师之各一部，实际指挥的国军达三个军、三个师、一个旅之多。即使国共合作，两党依然是在军队问题上讨价还价，唾沫星到处横飞，且有雨点那么大。蒋介石对共军一再打压，想办法限制共军发展，脑袋进水了才会把自己的军队交给朱德。如果说仅仅是为了抗战大局。当初任命朱德为东路军总指挥时，中共曾考虑用彭德怀代替朱德上任，国民党方面死活不同意。

蒋介石这么干的理由只有两个：一，赢得朱德的信任，二，融化共军。

非但如此，第二年，蒋介石又把朱德提拔为第二方战区副总指挥。这已经是蒋介石能做到的极致了。要知道当时国军也就五个战区。每个战区老大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军阀，如冯玉祥、李忠仁、阎锡山、任何一个在当时实力都在共军之上。比如说第二战区，总司令阎锡山，那是连蒋介石也动不了的人物。蒋介石的心头肉们，刘峙、陈诚他们也只是集团军司令。在蒋介石看来，他对朱德已经很够意思了。

共产党方面也是极为担心。因为共军很少，放在国军中间，很可能被溶解了。而且共军将领中间，很多人虽然精神崇高，却是没有经过物质考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彭德怀那般清教徒一样的生活。建国之后，就有不少干部经受不起腐化，迈入腐败的官僚群体么。所以毛泽东千方百计的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此时的朱德，处境相当微妙，即政治上非常危险。那时候，从莫斯科归来的王明却又不合时宜的提出跟着国民党走，就为以后的政治失败埋下伏笔。朱德的举动远比王明危险。王明只是嘴上说说，应该相信国民党。朱德却在行动上信任国民党，同时指挥那么多国军和共军并肩作战，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举动。

朱德虽然相信国军，共产党却不信任国民党，国民党也不相信共产党。在蒋介石眼中，毛泽东和共产党始终都是捣乱的，属于肉中刺类型，能利用，暂时利用，日后还是要找机会消灭的。在毛泽东眼中，蒋介石和国民党始终都是最大的障碍，能利用就利用，利用完之后还是要大打出手的。

当时的朱德心中没有想这些，他只是从军人的角度上认为，此时两军应该好好配合打仗，才能在日本人面前少吃点亏。所以前后好几次面见蒋介石，商讨共军改编以及作战事宜，看起来接触相当愉快。同时朱德又时顶住毛泽东向左意见。比方说，毛泽东不希望朱德担任东路军总指挥。为了大局，朱德还是去了。毛泽东不愉快，也没法。

能够让蒋介石和毛泽东如此纠结之人，共军内部，也只有朱德了。

朱德这么干需要超人的胆量和地位。没胆量，要退缩了。没地位，被换了。

战场上的朱德是一个奇迹。青年从军开始，数十年身经百战，无数次出生入死，有胜利追击、有败退逃亡，竟然从来没有受过一点点伤。护国战争时，有一次朱德跟几个手下到一间土房子里休息，一颗炮弹正好落在房子里，所有的人炸死了，朱德安然无恙。年轻的朱德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一下精神，继续战斗了。

抗战中，东线总指挥朱德在前沿使用电台指挥时，身边只有二百名八路军总部人员，仅相当于两个非战斗连的兵力。二月二十号，准备进攻临汾、潼关的日军先遣大队突然出现在朱德驻地古县，当时临汾空虚，第二战区没有作相应布置，同时日军又向陕北进逼。换成别人未必能镇住。朱德镇定自若，于二十四号就地使用身边的警卫阻击日军，并与阎锡山、卫立煌、毛泽东和各部沟通，一边指挥阻击战一边指挥全局。结果，日军苫米地旅团竟然被朱德阻滞了三天！当日军发现眼前竟然就是朱德时，高兴得哇哇乱叫，立即派出十几架轰炸机群准备把朱德炸个稀巴烂。奇迹出现了，一向严谨的日军竟然乐极出错，把山西临汾的“古”县弄成了河南灵宝的“故”县，轰炸机群飞到河南灵宝把故县给炸个底朝天。这样的奇迹，放在古代只能发生在帝王身上。同时验证朱德非凡的胆量。薄一波回忆：“他（朱德）没有官架子，任何人看到他，就觉得他慈爱可亲。但是，当危难到来的时候，他就表现出革命军人的真价值。他坚如磐石，定如山岳；他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危险，他为人之所不敢为，行人之所不敢行；他不怕反潮流，而总要尽自己的力量，以挽救危局。”

或许朱德相信能伤他的武器还没有制造出来吧。当时，司令部的阎锡山、卫立煌和在延安的毛泽东都坐不住了。特别是对共产党而言，朱德战死将在政治、军事上都是难以估量的损失。在那个全国大败退的时代，华北失守、山东失守、长三角失守、连阎锡山老巢太原都失守了，朱德指挥的东路军却是少有的亮点，不仅没有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崩溃，而且穿越日军的前锋和防线，进入华北、山东等地，开辟出一块又一块根据地。

开到敌后的不仅仅共军，也有一部分国军。朱德则拍着刘伯承肩膀反复叮嘱：善待友军，给以适当的支持和帮助；不要让自己人沾染友军不良嗜好，可谓有幸良苦啊。然而国军不是打游击战的料：官兵不具备游击思想，吃不了游击战的苦。如果蒋介石能把游击战这一块抓后，日后国共战争也不至于败得如此迅速。这些当时有助于国共团结的举动，到后来政治运动中，都可能成为被敲打的口实。

这期间，朱德和彭德怀归纳总结出运动战、游击战指挥的五条基本原则：“一，有计划的去进攻和进扰敌人，切忌被动应战。二，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包围袭击薄弱之敌而消灭之。三，避免无把握的战斗。万一被迫而应战，见无胜利把握时，果断向安全及便利于进行作战地带撤退。四，如遇敌人进攻，只以极小部与敌作有弹性的周旋，主力应隐蔽且迅速的转向敌侧后突然袭击。五，战斗胜利，应估计敌之援兵可能与否，自己部队应作战斗准备或转移适当地带，不要久驻一地。”

此后，朱德和彭德怀根据中央精神确立了根据地建设方针：“（一）必须改造旧政权，实行民主政治；（二）军队要实行战时的政治工作：（三）要武装民众，发展游击战争。”

——这些措施对根据地建设和战争起到决定性作用。

这就是朱德利用蒋介石的信任干出来的事业。正是这系列动作，导致了共军在敌后大大发展。等到鬼子投降之后，国共双方又因为这些地盘而上演了一部争霸天下的大戏。共产党就是靠这些根据地为本钱，以及游击战中锻炼出来的能力，成为了国共争霸的主角。其实国共双方的命运，从国军在敌后无法游击生存这事上就决定了。毕竟战争就是最残酷的生存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比的不是哪一方娇贵、名气大、手中家伙多，而是生存能力。

毕竟自古以来的丛林法则就是这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蒋介石一定没有想到，他溶解共军的招数非但没有凑效，反而暴露出自己的命门。不知道退守台湾之后，蒋介石是否思考过这个问题？他捧过朱德，拉拢过朱德，把拉拢艺术发挥到极点依然没有成功。他想过问题根源之所在么？

正是在那轰轰烈烈的抗战中，朱德以其超人的胆略和无与伦比的地位完成了自身使命。此时的朱德已经超越了党派，用自己的大气，灵活的游走在时代的丛林中，建立不世功勋。但是这个功勋没有充分宣传，主要因为，强力宣传会涉及到国军和蒋介石。国军和蒋介石一直与共军和毛泽东搞对立，彼此妖魔化。随着时间推移，朱德那宽口雄伟的身躯将越来越清晰。在当时中共高层内部，大家对此心知肚明。

战场，就是最残酷的丛林。林彪和粟裕这种人都是丛林里的王者，朱德和毛泽东一样，属于丛林的创作者。和毛泽东不同的是，毛泽东还创作者了政治丛林，朱德在战争丛林中游刃有余，政治丛林中却是门外汉。政治丛林里的王者桂冠属于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

解放战争开始，其他统帅的强势崛起，朱老总的戏份就减轻了，成了稳坐中军的人物。此时的中军营帐，只需要战略规划，离战术指挥已经很远了。战略规划，属于天纵英才的毛泽东。朱德的光芒在逐渐被毛泽东遮盖，却依然余威不减。建国初期，大家还在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喊一段时间就不喊了。朱德用万岁总司令变成国家副主席，变成人大委员长。等到文革到来那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停了，忙碌了一辈子的朱德成了一个闲人。

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伤筋动骨的运动，没有任何人可以置身事外的。所以朱德也是注定不能清闲。战场上的朱德是一个和光荣与胜利联系在一起的符号。不是到万不得已，没有人会动他。文化大革命恰好是一个万不得已的时代。

**怪异的一幕。**

一九六六年发生了很多事。《二月提纲》之后，又有《五一六通知》，又有林彪谈“政变”以及林彪开出的处女证明。

特别是五月四号到二十六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文革计调奠定，局势如惊雷一样，滚滚而来。每一个惊雷都炸了一批人，罗瑞卿拉开文革大幕之后，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分别遭殃。日后还有刘少奇、邓小平、贺龙、陶铸等人相继遭殃。

这些惊雷之中，有一个极为怪异，是冲朱德去的。他的遭遇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从高饶事件开始，朱德就不再是那个安然无恙的符号，稍微沾了点边，但是没触及到。

第一次庐山会议，毛泽东讽刺朱德隔靴搔痒，朱德被迫检讨，说明朱德地位已经下降。

一九六五年低，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时，朱德糊弄了两句，又被触及到。就因为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朱德不完全同意：顶峰就没有发展空间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文革大戏开唱，朱德彻底沦为被打击对象。连康生都敢对朱德说：“我看你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在朱德面前，康生不过是跳梁小丑，竟然如此嚣张。只能说那个时代太疯狂。康生嚣张的原因竟然是莫须有的理由：朱德想超过毛主席。康生建议朱德：学习林总。

最疯狂的一幕发生在五月二十三号。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目的：开会。会议性质：批判会。

批判会主持人：刘少奇。

参与者：周恩来，林彪，陈毅，薄一波，乌兰夫等人。

这次会议本来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他们正好可以凑一桌麻将。他们的地位：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第一个反党集团”，建国之后即“高饶反党集团”和“彭黄反党集团”之后的“第三个反党集团”。他们光荣的成了那时代时尚：赫鲁晓夫那样的人。

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刘少奇的主要助手；罗瑞卿，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表面偏向刘少奇；陆定一，宣传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敢于和中央文革唱反调，和刘少奇关系密切；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办公厅主任。批判这些人，主要是为了打通通往攻打刘少奇的大道。搞笑的是，主持人偏偏就是刘少奇。

不禁要问：刘少奇主持会议打倒自己人之际！刘少奇为啥这么干？答曰，这是政治。

任何好事或者坏事在政治上都会出现。

刘少奇这么干，说明他还没有被打倒，还有不被打倒的机会，他要抓住这个机会。批判彭真等人，不过是例行公事。但此次批判会触及到军方灵魂人物，伟大的朱德。批判彭真等人之后，刘少奇本人已经自身难保，也没有心思发言批斗了。批斗朱德的，多半是与会之人，批斗的身份和目的各不相同。

朱德首先做了自我检讨，大意：本人做错了事，对不起革命同志，感谢大家帮助云云。具体实例：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按道理说，朱德如此德高望重之人，检讨一下也就过关了。政治运动说到底也就是权力重新分配。此刻的朱德既不主政也不掌军，挂一个人大委员长的虚职而已。文革开始，人代会已经停开了。而且朱德已经老了，也折腾不动了。但是朱德检讨完毕，大家开火了。这就出现了现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一个片段。这个片段真伪难辨。但是通篇下来，还是偏真。说话风格、逻辑都让人联想到那个年代。朱德讲完，林彪第一个开火。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和朱德。庐山会议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首先把朱德和彭德怀联系在一起。这是批斗会的管用模式。当初就是竭力把彭德怀和高岗联系在一起，然后再罗织罪名。

不得不承认，通过几年的磨练，林彪批斗别人的水平比庐山会议时强很多。批判彭德怀那会，用词还比较土。这会就能先文绉绉几句，像不像三分样嘛。

林彪：“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

——前面刚拽文几句，土话又上来了。罗织罪名用文，指责罪名用土，直接。那个级别的人，光指责是不行的，还需要实际论证。

林彪：“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是彭德怀在前方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这是林彪的风格，说话和逻辑都是一致的。这个逻辑看起来非常怪异，不像精明的林彪应该说的话，实际上不然，这话是站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立场来说的。如果站在毛泽东为核心、以林彪为二号人物看，以道德为指挥大棒，那么这些就能理解了。

尽管如此，这些话在事实上依然是站不住脚的。彭德怀的问题就不说了，冤。要把朱德和彭德怀联系起来却是说不过去的。如果朱德和彭德怀真的组成一个军事联盟，即使毛泽东也得掂量掂量。其它部分勉强能说得过去。说南昌起义之后是无政府乱走也没错，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政府。但是要说是陈毅指挥去将冈山，那就搞笑了。估计陈毅自己都觉得过火。陈毅一介书生，当时的角色也就是朱德的助手而已。以林彪的性格，不应该如此颠倒黑白才是。但是既然在那个年代，“朱德的扁担”可以变成“林彪的扁担”在博物馆展览，林彪偷换一下概念也能理解，为了批判而批判么。当然还不止这些，还要把朱德引向现实问题。

那么此刻林彪为何要对付朱德呢。事实上，朱德和林彪的关系可以延伸到南昌起义说起。二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参加了南昌起义。但南昌起义是林彪心中的痛。因为在那次起义中，林彪并没有如之后历次战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且有很多难以忘却的伤疤。

当时朱德四十一岁，人生已过不惑的老军人；林彪刚刚二十，还是初出茅庐的黄埔小军官。在那场诞生了共军的暴动中，朱德是高级军官，林彪是低级军官。起义过程中，两人都没有发挥据定性作用。起义之后，两个人的个性和才华有着不同程度的施展。危难之时，不惑之年的老军人用尽全身解数，成为那支残兵的中流砥柱；初出茅庐的林彪显然看不见前途，中途开了小车又转回来。

林彪虽然开过小车，在三河坝中有过动摇，此前丢失过军饷。与此同时，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展示了军事天才的一面，耒阳一战中，林彪用一个连的兵力歼灭敌人的一个营，接着又是用一个连的兵力击溃敌人的一个团，最后，他还是用一个连的兵力打败一个师，创造了一个军事上的神话。对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而言，思想动摇难免，也不能要求更多了。

朱德发现小伙子不错，是个做大事的材料，井冈山会师之前，提拔林彪为营长。正如粟裕一样，朱德也是林彪的第一个伯乐。然而林彪注定为毛泽东而生的。到了井冈山之后，林彪投入毛泽东门下。一九二九年红四军七大，毛泽东作为少数派时，林彪就是少数之中一个最坚定的支持者。在那场争论中，林彪代表毛泽东和刘安恭大战数百回合，从此彻底赢得毛泽东的心。

井冈山之后，朱德虽然一直都是林彪领导。但真正指挥林彪的却是毛泽东。从红一军团长，到红一方面军司令，到一一五师师长，到东北野战军司令，到四野司令，林彪一直帮助毛泽东打理军内事务，正如刘少奇帮助毛泽东打理党内事务一样。

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再次复出，开始超越老领导朱德。庐山会议之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就帮助毛泽东指责过朱德曰：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整天嘻嘻哈哈的，实际不老实，想当领袖。等到文革开始，林彪要全面接班掌权时，唯一需要敲打的就是朱德了。因为军内威望高过林彪的就两个，朱德和彭德怀。彭德怀成了死老虎。朱德虽不掌权，威望还在。要想破除朱德的威望，必须继续敲打朱德，比如罗瑞卿事件中。

这一次来真的了。既然要批判，那就需要材料。有材料要批判。没有材料，制造材料也要批判。所以在林彪的批判言词中，有不少不合理的私货。这些私货在当时看，其实也不算啥，比起陈毅同志的大帽子，林彪那点私货还是能接受的。同样在这次批判会中。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现在把这几句话单独拿出来，非常不可思议，听起来像造谣，其实不然。陈毅和朱德的关系比林彪和朱德关系要亲密。南昌起义之后，朱德所以可以把队伍聚集起来，一个原因就是陈毅鼎力相助。当时陈毅还是一个热血书生，豪情满腹，在班超光辉思想指导下干起了投笔从戎的事。周恩来让他去当团指导员（相当于后来的政委），上任之时恰好碰到林彪的军饷给人骗了，帮着说了几句好话。林彪重新得到一份军饷，对陈毅感激不尽。所以上面林彪才说：陈毅指挥队伍上井冈山。

主力部队失败之后，大车小车乱开之际，只有陈毅坚定不移地站在朱德身边。某日，朱德带着剩下的队伍去了一座叫信丰的山区小城。那里比较闭塞，没有经过什么战乱，起义部队入城后，人们的生活仍然比较正常，商店、饭馆、钱庄、当铺都在营业。

士兵刚才山林里进城，饥肠辘辘哇，大家按照旧时习惯搞起了营生。几人到饭馆大吃大喝，吃完就走，饭馆掌柜要钱，有人用枪口对着掌控玩一把幽默：“跟它要吧，枪膛里啥都有，金银元宝、袁大头，样样都有啊，要多少拿多少！”。吃饱喝足之后，又有军人闯入当铺玩另一种幽默：把手榴弹往柜台上一放，故意把引线拉出来：“那个老板，称称这个有多重，当几个零钱花花呀！”当铺老板自然哆嗦着躲一边，毕竟是军人抢劫啊，谁敢拦截？

朱德听到这种情况自然很生气，心想，我老人家为了伟大理想干革命，可不是带着你这帮小子混黑社会的。当时陈毅是唯一一个团级政工级干部，朱德就派陈毅去处理。陈毅充分发挥自身口才和强力手腕，把大家教育一番，在把带头闹事的毙了，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抢来的东西给还回去。再动情跟大家说：“我的同志哥，我们的政策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城镇的工商业。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不是军阀的队伍，我们要有铁一般的纪律，有了这样的纪律，人民才会拥护我们，革命才能胜利。”——搞定。

朱德见陈毅动作如此干净利索，很欣慰，当即表示：“今后这支部队，由我和陈毅同志领导。”从此，朱德任司令，陈毅任指导员。这个格局持续到井冈山。井冈山之初，是朱德、毛泽东、陈毅组成最初的三人团。直到那次陈毅不小心让毛泽东下岗失业，才淡出最高决策层。长征之后，陈毅和朱德天各一方，一南一北，相隔十年，无恩亦无怨。又过数十年，陈毅和朱德依然没有交集。但是就凭二人老战友的交情，陈毅也不应该去批判朱德吧？

其实这个问题在粟裕篇章里已经分析过了。陈毅批判粟裕，口气听起来也挺凶，实际上是陈毅的一种政治生存技巧而已。对朱德也一样。陈毅需要生存，就需要政治智慧。因为在朱德和毛泽东的争论中，陈毅让毛泽东下过岗。那是陈毅的政治包袱。陈毅一直背着。所以无论任何人的批斗会，陈毅都会发言，都会说狠话。

陈毅这些狠话没有任何作用。不管是粟裕或者朱德，还是其他什么人，是否挨批，挨批到什么程度，跟陈毅啥态度没有关系。但——陈毅的态度却可以保存自己。

了解了这一切就可以明白，陈毅的说的狠话无关痛痒，杀伤力远不如林彪讲的那些。因为陈毅不如林彪有实力。尽管如此，陈毅和林彪的发言，还是让朱德难看。因为在彭德怀、刘伯承、粟裕挨批之后，陈毅和林彪是当时四大野战军中仅有两个代表人物。这两个人向朱德发难，相当于往朱德已经不太光辉的身上泼了一瓢墨汁，打击了朱德的威望。

当然，批斗会不可能只有两个军人。最有意思的是乌兰夫和薄一波两个人。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要上纲上线，一点也不困难。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这个简直是搞笑了。就算兰花跟政治失意连在一起，也不至于和批判会联系在一起吧。经过这么一点，朱德将要爆发一般。不得不佩服政治语言博大精深。

乌兰夫，蒙古人，二五年入党，之后一直在内蒙活动。建国之后先后担任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等等一系列职务，文革受到迫害。从这些履历来看，文革之前，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中，他是偏向刘少奇的。薄一波就不用说了，一直是刘少奇左膀右臂。他们两个完全没必要批判朱德。

因为朱德威望越高，对刘少奇他们越有利。朱德威望高，意味着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难度加大。因为朱德并不是毛泽东的吹捧者。其实乌兰夫和薄一波也是没办法，形势所逼嘛。彭真等人的例子就在眼前，表现不好，下一个反革命肯定跑不了的。

最有趣的是周恩来发言。这些发言中，唯有周恩来的发言最有水平。现在已经公认，周恩来在文革中干了很多身不由己的事，说了很多言不由衷的话。庐山会议如此，文化大革命如此，批判除掉又是如此。

那次批斗会上，周恩来的一番话最有味道，最能反映那个时代背景。

周恩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九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批斗会也能反映一个人的处境和性格行为。

林彪的风格是，批判某人之前，先把某人和之前的死老虎联系起来。批判朱德，先把朱德和彭德怀连起来。因为林彪正红得发紫，地位蒸蒸日上。

周恩来的风格是，批评某人之前先自我批评，再把某人和自己联系起来。在通过自我批评把某人一起批判了。因为周恩来地位并不稳固。

周恩来：“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王明路线，你有份。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看看，开批斗会没有边际。林彪说陈毅指挥队伍去井冈山会师。周恩来把朱德和张国焘斗争归结于刘伯承和贺龙。思维惊人一致，有没有？

周恩来：“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夹叙夹议，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自我批评达到批评别人的目的。如此高水平者，除了周恩来之外，难找出第二个。

按照角色划分的话。最有理由批判朱德的是林彪。因为他需要上升，需要积累威望人气，方式之一就是通过破除朱德威望的办法来积累威望。

最没有理由批判朱德的就是周恩来。之前已经分析过，在共产党历史上，周恩来是一个合作者，不论谁是一把手，周恩来都能很好地与之合作，瞿秋白、李立三、博古、毛泽东，甚至蒋介石，周恩来都能合作愉快。即使后来刘少奇真正上台，周恩来依然可以扮演一个完美的合作者。周恩来不仅不当一把手，而且不把自己和一把手捆绑在一起，接班人之类的头衔从来不会轮到周恩来。相反，周恩来和一把手中间，总是隐隐约约的隔着个把人，比方说刘少奇，比方说林彪。这样，周恩来既可以放手干实事，又不至于成为招牌。由于周恩来的处事能力，任何一把手都离不开他。

周恩来没必要批朱德。因为朱德和他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毛泽东身边，和周恩来同一个量级的人物一共也就朱德和刘少奇两个，后来加上一个林彪。这几个人是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的缓冲区。在刘少奇即将被冲垮的情况下，再把批倒朱德，那么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的反冲地带没了。这样的处境反而对周恩来这样的合作者不利。好在后来林彪填补了刘少奇的空缺，要不然刘少奇到了之后，朱德淡去，周恩来成为毛泽东身后的二号人物，也将是文革洪流冲击的对象。有了林彪，周恩来就可以隐在正副统帅身后干实事，那是周恩来乐趣所在。那也正是最后林彪倒了周恩来还在的原因之一。

周恩来不愿意批判朱德，却不得不批。那么抛开政治选择不谈，个人关系如何呢。一九二二年，三十六岁的朱德和好友孙炳文在法国遇见二十四岁的周恩来时，两个人一辈子的友谊就开始了。南昌起义时，二人有过合作。

二人第一次对等合作是在第四次反围剿过程中，和前三次反围剿不禁相同的战争。前三次主要战术是诱敌深入，再寻找机会要上几口。第四次不一样，敌人力量大增，想要诱敌深入并不容易。红军也人数也增加了，不容易隐蔽。朱德改变了战术，采取直面敌人方式的运动战，在黄陂和东坡两个地方打了两个漂亮的伏击歼灭战，直接高调陈诚两个精锐师，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和前三次反围剿一样，第四次的主要指挥者是朱德，只是这一次朱德的主要合作者由毛泽东变成周恩来。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主要搞统战去了，朱德依然在军中。

评价一下二人地位，总体上相当。战争年代，朱德比周恩来重要。和平年代，周恩来重要性超过了朱德。要评价二人关系，还要把那件毛毯拿出来。西安事变前后，周恩来冒着严寒往返于延安与西安之间。当时延安物质贫乏。某日，朱德送别周恩来时，把自己身边唯一的一条毛毯送给周恩来御寒。

三七年三月份，周恩来由延安去西安途中，路上遭到土匪伏击。周恩来摆脱敌人。匪徒们没有抢到东西，气急败坏地在朱德送给周恩来的毛毯上戳了几个大窟窿。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德即将奔赴太行山抗日前线时，周恩来想到那里天气寒冷，又把这条烂毯子回赠给朱德。在太行山前线，朱德住在老乡家里。老百姓厚爱朱总司令，总想把火炕烧得更热些，结果毛毯又被烤一个大洞。朱德仍舍不得丢掉它，让康克清一针一针把烧破的地方给补缀起来，继续带在身边使用。朱德带着它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后来那条烂毯子成了朱德和周恩来二人自己的友谊之毯，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内。

——男人之间的故事也可以如此温馨呵。伟大的男人总是与众不同。通过光环往里面看一看，总是能看到可贵之处。

周恩来遗体告别的那天，朱德穿上军装，赶往医院。当他吃力地走进灵堂时，望着静卧在鲜花和翠柏丛中的周恩来，九十岁的朱德泣不成声。朱德并不是一个爱哭的男人，好友孙炳文遇害，他哭过。面对周恩来的遗体，朱德再次哭了。从欧洲相会，到南昌起义，到第四次反围剿，到开国大典，到文革……一幕幕，说也说不清。最后朱德缓缓举起右手，敬了人生中最后一个军礼。当战火和政治风波之后，咱们还是朋友。好吧，咱们并不遥远，你先走一步，我也不久于人世。半年之后，朱德过世。

了解这一切之后，自然而然得到如下结论：于情于理于利，周恩来都不应该批判朱德，确实批了朱德。这正字面上的矛盾，透过文字背后就会发现，周恩来实际上不是在批判朱德，而是通过自省的方式在说服、暗示朱德，表个态过关。因为长时间以来，周恩来和朱德都属于核心最高层，就那么几个人，周恩来经历过的事，朱德基本上也经历过。周恩来取代过毛泽东，朱德没有。也就是说，周恩来在用自身经历告诉朱德该怎么做。

面对这一系列批判，朱德是怎样的反应呢。心中堵得慌是肯定的。不管他朱老总如何肚大能容，都不可能淡而处之。朱德是这么辩解的。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听起来让人心碎。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没有发言，贺龙。从罗瑞卿开始，贺龙就不发言了。批判彭真，贺龙闭嘴。批判朱德，贺龙闭嘴。批判刘少奇，贺龙闭嘴。最后，贺龙自己倒了。

**隐晦的角落**

但是不用担心，朱德是不会被打倒的。现在这么说，有事后诸葛亮之嫌，就当马后炮吧。道理还是可以讲讲的。

朱德这个级别的人，除非像刘少奇那般走到毛泽东对面，否则都不会被打倒，代价太大了。可以这么简述一下，文化大革命枪口主要对刘少奇和行政系统。大家都在说刘少奇和毛泽东的矛盾。实际上，就毛泽东和刘少奇而言，二人还是几十年同志关系，见面还是客客气气的，相互祝福身体健康之类的。所以不可调和，只因为二人背后站着一个集体。刘少奇的背后就是整个行政系统。打倒刘少奇并不需要那么大力气，主要是刘少奇背后的行政系统，从上到下一扫光。这个代价大家现在都明白。

打倒刘少奇的借口，也无非就是被捕那段时间一些隐性东西。什么叛徒、内奸、工贼都是引申出来的。如果非要打倒朱德，也不是没有借口。因为朱德直接指挥过国军，而且被国军指挥过。借口多的是。比方说东线总指挥问题，就是听从了国民党的任命。和刘少奇不一样，朱德的基础在军界。而年事已高的朱德已经淡出军界，背后那个系统已经不存在了。军方系统已经站在毛泽东和林彪身后。但是如果非要把朱德打翻在地的话，就要牵扯很多人。

比方说按照林彪的批判，要清算南昌起义之后上井冈山之前那段无政府盲动。那么好吧，在那段时间里，朱德提拔了陈毅，提拔了林彪，提拔了粟裕，是不是也得一起清算？如果清算朱德在井冈山时代和博古李德合作，那么好吧，那时跟着朱德和博古李德合作的人多了，比方说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都是在朱德指挥下作战。如果清算抗战时期，那么好吧，元帅将军们都在。相当于把本来已经站在毛泽东和林彪身后的军方重新扯出乱子。按照之前批斗将帅的模式，刘伯承是教条主义，粟裕是告洋状、争权，彭德怀是里通外国，贺龙连批斗会都没有，黄克诚、罗瑞卿等人都是反党反革命。从来没有一个说是以站在为批斗理由。

朱德在军内是一个盘石一样的人物。有他在，军内象征就在。不同的山头和派系都会聚集在这个巨大的象征之下。打倒朱德，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这些真空需要有人填补。填补之人是否能服众且不说，会比朱德更为淡泊名利么？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朱德这个人虽然和彭德怀关系不错，为彭德怀说过话；和刘少奇周恩来关系都不错，然而朱德明白、而且谨记：最为重要的那个人还是毛泽东。

朱德和毛泽东有过不快，特别是井冈山时期。朱德的实力强于毛泽东。要问游击战的源头在哪里，很多人都会说是井冈山。其实不准确，可以延伸到南昌起义之后，朱德带领残部在江西、福建、湖南游荡的那段时间。正是那一年多的经历，南昌起义时代国民党正规军过度到机动性十足的早期红军。他们就是游击战最早实践者，原因很简单，不搞游击，一两千人早就完蛋了么。主力部队没搞游击，结果在福建潮汕失败了。朱德上井冈山之后，军队战法也就延续下来。前三次反围剿斗争，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天才军事思想成熟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朱德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二人关系一直磕磕绊绊，因为毛泽东性格很强势，他的天才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第四次反围剿，基本还是朱德指挥。周恩来虽然也在指挥，但人马是朱德的。周恩来只是中央一个外来户。

可以说井冈山时代，朱德作用至少不低于毛泽东。然而朱德也有缺陷，缺陷就是不能玩政治，注定无法成为领袖。任何时代，单纯的军事将领都无法成为领袖。比方说楚汉争霸。项羽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家，不能玩政治；刘邦虽然打仗不咋样，却是一流政治家。靠军事的项羽，无法让韩信陈平等人信服，所以他们跑到靠政治的刘邦那里。结果刘邦赢了。帝王领袖里面，武功当属李世民和朱元璋，此二人最终成为领袖，依靠的并非单纯的武功，更多的是政治。李世民能把李靖、屈突通、阿史那思摩、李绩等人安排稳妥，靠的不是军事，而是政治手腕。同理，朱元璋掌控徐达、常遇春、李文忠、蓝玉等人，也是政治手腕。朱德这样一个军事家，是没办法把军事政治同时收拾稳妥的，比方说林彪，本来是跟着朱德的，最后跑到毛泽东那里去了。比方说罗瑞卿，单独上山的才俊，就投入到毛泽东的怀抱而非朱德。

朱德无法成为领袖，那就要认可一个领袖。朱德对周恩来感觉良好，通过第四次反围剿，感觉更好了。如果周恩来成为领袖，朱德也没话说。如果不是李德瞎摆弄，朱德对博古也没意见。说白了，离开战场的朱德就是一个老农民。即使战场上，看起来也像农民爷爷。他会忠实地执行上级既定政策。比方说第四次反围剿中某次战斗，朱德因为周恩来和中央扯皮，白白等了二十天。比方说第五次反围剿，明知道中央战法不行，朱德也不敢、也不会、也没办法反抗。因为政治水太深了，他没办法测试深度，也没把办法疏导其暗流。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长征途中损失惨重，最痛苦的是谁？是毛泽东吗？他也在痛苦，但很大一部分是为自身生存和前途担忧。真正痛苦的人是朱德。因为井冈山根据地耗费了他无尽的心血。红军队伍，主要是朱德拉扯出来的。死去的那些人，多半是朱德辛勤栽培的。加上朱德本就心地宽厚，痛苦便会加倍。所以在遵义会议上，其他人搞斗争时，朱德才会悲愤到流眼泪。正是此时，朱德把心思锁定在毛泽东身上。朱德心中应该有这样一把算盘：周恩来虽然看起来更为和善，可是他没能保住瑞金中央根据地，其他人更是不足道。至于毛泽东，为人虽然霸道，有时候不近人情，至少能保住家底。没有家底，一切都免谈。

正是从遵义会议开始，朱德认可了毛泽东。此后的岁月里，朱毛变成毛朱，最后毛变成神，朱处境不佳。朱德对毛泽东看起来若即若离。实际上朱德对毛泽东始终是不离不弃。如果说朱德对毛泽东的忍让和迁就不足以表达他对毛泽东的感情，那么就看看最后时刻吧。生命最后时刻，周恩来去世之后，朱德不顾八十九岁高龄，不是选择养病，而是增加工作量，理由是为了同样身体不好的毛泽东分担工作。

那么毛泽东对朱德又如何呢，没有文字流露出来。虽然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讽刺过朱德隔靴搔痒。总体上来说，他对朱德还算尊崇的，特别是朱德甘愿逐渐淡去，和刘少奇逐渐浮上水面简直成了一个鲜明对比。正因如此，毛泽东最后没有动朱德。对比一下时不时检讨的周恩来，朱德待遇已经不错了。

既然如此，那么文革为何又把朱德拉出来批？答案很简单，文革全面展开之前，需要一个样板。不能一开始就把国家主席打成叛徒，政治需要一步步来。除了彭、陆、罗、扬这些人，还需要一个样板，通过这样的一个样板来展现文革的力度和决心。当时中央高层之中。刘少奇和邓小平是要打倒的对象，周恩来政治手腕高明，动他难度不比刘少奇小，而且还指望他担任刘少奇案件的组长你。要不是周恩来在，刘少奇的案子唯有毛泽东亲自负责了，江青肯定是压不住的，林彪都未必能摆平。因此，唯有朱德最为合适了。因为朱德资格老、威望高、实力弱。所以有了这场怪异的批斗会。

而这场批斗会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接下来，孙炳文之子孙泱因为担任过朱德秘书，被活活打死。贴朱德的大字报。冲击朱德的家。

而且捏造了一个骇人离奇的案子，号称“中国（马列）共产党案”。过程是这样的：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在办案人员的诱逼下提供了一份名单，诬供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等几十位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组织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说朱德是“伪中央书记”，陈毅是“伪中央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当总理的角色”，常委有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等九人，委员有王震、萧华、伍修权等十六人。并且成立了“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各系统都有他们的人”。还说朱德等签署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等等。

批判朱德，只是文革的一个步骤。

通过三个案例，分析了文革的三个基本特点：一，道德大棒高高飞舞；二，没有谁是安全的；三，力度是空前的。有了这个基本常识，就能进入正文了。

**第五章 女演员**

**从江青说起**

说起文革，江青是一个绕不过的名字。那么就从江青开始说起吧。

江青有三重身份，女人，玩政治的女人，影响历史的女人。

女人遍地都是，玩政治的女人不多，玩政治玩到历史留名的更寥寥无几。数千年以来，女人局限于家庭之中，多为生存忙碌，命运较好者也就是学点诗书礼仪之形、相夫教子之道。即便如今，能够快快乐乐生活的女人依然不多。能够涉足于政治的，多半是因为男人。因为男人在玩弄政治，男人通过玩弄政治而统治历史。女人能够玩弄政治的，基本上都是因为自家男人早死或早衰。

吕雉的男人叫刘邦。刘邦搞定了秦末乱世当了皇帝。刘邦又比吕雉死得早。刘邦死后，吕雉就用自己的老辣影响了汉初历史走向，萧何陈平之辈，也得低头装孙子。从吕雉之后，有过不少女人，或是贤淑，或是有才，或是美艳，或者风流，也没有折腾出太大动静。直到武则天出现。武则天的男人也是皇帝，而且比武则天死得早。武则天就利用女人罕见的手腕，把女人的故事推向极致，让天下男人下跪磕头。此后理学兴盛，女人遁入历史，值得说到的，似乎就是秦淮名妓。然而名妓和政治无关。

时间到了二十世纪，女权复兴。女人不仅仅走出了家庭，而且在此走向政治舞台。才貌双全的宋氏三姐妹成为亮丽的风景线。宋霭龄下嫁捞钱手腕了得的孔祥熙，和财富连接在一起。宋庆龄追随革命领袖孙中山，献身于理想。宋美龄则下嫁权谋大家蒋介石，伴随权势度过一生。当宋霭龄隐于幕后，暗中操控家族事宜，亲手触成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当宋庆龄为了孙中山的遗愿游走于各个党派之中，赢得广泛尊重。当宋美龄游说于美国，为国民党挣得美援。数十年间，宋氏三姐妹让多少豪杰失色！然而在整个二十世纪，至少有两个女人对时局的影响胜过她们三姐妹。

一个是慈禧，慈禧的男人很早就死了，她通过自己的谋略摆平了男人们。严格来讲，慈禧应该算十九世纪的女人。她仅仅在二十世纪生活八年。然而慈禧太重要了，她是封建王朝最后一个象征性人物。慈禧之死，意味着清王朝的死亡，也是整个封建王朝的死亡。慈禧之后，清帝国失去最后一根支柱，死亡已是不可避免。三年后的辛亥革命不过是为这个必然死亡的王朝举行一个死亡仪式而已。

另一个在政治影响上胜过宋氏三姐妹的，就是江青同志了。江青能在政治上胜过宋氏三姐妹，并非她本人强过比宋氏三姐妹多少，而是她的丈夫强过她们的丈夫。江青的倒台，同样具有象征意义，即中国政策大转变。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意味着中国开始融入世界。中国这场转变，在世界历史中也是意义非凡。

来个中国女性名气排行榜。整个二十世纪，江青的名字将名列前茅。即使把这个期限延长到整个中国历史女性排行，江青依然会榜上有名。

那么江青是个什么样的人？答曰，演员。演员当然一直在表演。江青是个与众不同的演员。戏台中的表演水平只是三流，她的主要舞台在生活中。她生活在男人世界里，依靠男人们给自己当背景。

江青，生于一九一四年（存疑），原名李云鹤，正如那个贫苦古代的时代一样，江青有一个贫苦孤独的童年。祖父李如海本是地主，有一百多亩地，到了父亲李德文当家时，仅剩下一个木匠铺。李德文有两个老婆，江青的妈妈是李德文小老婆。江青出生那年，李德文已经六十岁。按说老来得子应该珍惜。李德文脾气粗暴，手里没钱时就打老婆。

一九一九年元宵节，诸城淮河岸边，有钱人家早早地挂起花灯。李德文眼巴巴地看着人家财大气粗，而自己却穷困潦倒，一肚子火气。江青的妈妈失手摔破了一只碗。李德文抓起一把铁铲就打，先打背，后打手，打断了她的小手指。年幼的江青见状吓得大哭。李德文很烦，甩手就是一巴掌，打掉江青一颗牙齿。江妈妈再也无法忍受了，背起她离家出走。

江妈妈只是一个普通妇女，只有力气没有文化，出走之后，靠着给大户人家当佣人维持母女生活。江青曾回忆：“有一次，母亲把我放在亲戚家。母亲出去了，我靠在炕上等母亲。炕上没有东西吃。我一动也不动。屋里点了一盏小油灯。后来，我就靠在炕上睡着了。母亲回来看到我这样，就抱着我哭了，很凄凉。”如此童年，似乎过于残酷了一点，然而没有办法，时代就是那样。和同时代的宋家三朵骄花相比，江青只是一株顽强的野草。

野草不如娇花鲜艳夺目，但生命力却有过之。

江青的妈妈曾经在诸城姓张的地主家当过用人。张家有位二少爷叫张少卿，当时十五六岁。这位张家二少爷进过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上海大学特委支部书记，最后和王明联系上了，去苏联。在苏联，这位二少爷给自己取了一个时髦的名字。那名字音译过来就两个字，康生。此后，世人皆知康生，而不记得张少卿或张家二少爷为何人。正是这层关系，三十年代，江青在延安的一切才顺利过关。

江青念完小学便进入山东实验剧院学话剧。那一年，她十五岁。那是江青人生的转折点，让他有机会从春姑变成电影演员。那段时间生活相当充实，认识梁实秋，结实沈从文，学话剧，当演员，有滋有味的。这只是精神方面。物质方面的江青依然赤贫。作为一个十六七岁的大姑年，修说满足那日益觉醒的爱美之心，她甚至没有足够的衣服取暖。

一九三一年，十七岁的江青回到济南，剧社一个小角色，类似跑龙套的，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也没有一个安定的家。那是战乱年代，工作本就不好找，江青既没有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也没有家庭背景，怎么办呢？她自己也不知道。

某日，江青在《湖上修事》出场，引起一位富家公子的喝彩。他便是裴明伦。裴明伦家境不错，算个富二代；人长相也不错，是个帅哥；学历也还行，当时中学毕业，和现在大学毕业一样值钱。裴明伦大江青几岁，被江青迷倒了，壮胆给江青写了几封情书，成了江青一生中第一个求爱者。

性格方面，裴明伦宽厚斯文，是个可靠之人。和一般意义上喜欢玩票的富二代不同，裴明伦真心喜欢文艺，对待江青也是真心的。江青了解这一切之后，觉得裴明伦是个不错的选择。毕竟当时还是讲究门当户对的年代，毕竟当时演员的地位不高，常常食不果腹，毕竟江青当时在演艺界没有任何地位，想找一个年轻、有钱、又喜欢自个的伴并不容易。江青决定嫁给裴明伦，这样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比方说衣食住行等等。就这样，十七岁的江青坐着一台挂着大红花的轿子，在传统的唢呐声中嫁入“豪门”，成了裴妇人。

现实是残酷的：江青是给野性子，别指望她能适应裴家一系列家规。在江青看来，裴家因循守旧、生活单调乏味、婆婆古怪。和所有年轻女孩子一样，她要睡懒觉，不懂得如何与婆婆相处，总是和一些在裴家看来不三不四的朋友一起聚会等等，把生活当成舞台。站在裴家角度上看，如果是大小姐也就算了，勉强迁就，一个小戏子还这么着，丢人。

双方矛盾一大堆，麻烦一大堆。虽然有吃有住了，但是江青好歹也是见过世面的，也是接触过梁实秋、沈从文的新潮姑娘，个性相当要强，不愿当小媳妇。她需要更为广阔的空间里去消耗那多余的激情。两个月之后，江青离开了裴家，去了青岛。

此时江青，是一个敢于为了个性而放弃幸福生活的姑娘。

青岛当时是外国势力范围，生活花样远胜济南。江青通过老师的关系进入国立青岛大学（现山东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偶尔去中文系旁听一下。彼时彼处，江青认识了大她三岁的物理系学生黄敬。

**生活和舞台**

如果说斯文而略显保守的裴明伦无法满足江青那动荡不安的精神世界，黄敬可以说是完美的人选，可以说是裴明伦的加强版。

黄敬真名叫俞启威，绍兴俞氏家族的三少爷。俞家和曾国藩家有过姻亲，俞启威的爷爷当过鲁迅的老师。俞家很有钱，在很多大都市都有豪宅。俞启威的爸爸留学日本和德国，当过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的局长。俞家三公子俞启威更绝，身为官僚大族公子哥，放着吃喝玩乐的日子不过、满腔热血为穷人闹天下，而且在白色恐怖时代秘密加入共产党，与众不同的风流人物。认识江青时，黄敬任是个地下党。

江青和黄敬初相识时，二人差别非常大。黄敬出身名门世家，英俊潇洒。江青不过是个土包子，虽有姿色，但称不上绝色美人。能彼此吸引，是因为二人皆为不安分的主。江青的精神是动荡不安的，正是这动荡不安的精神支持她在乱世生存下来。黄敬的思想是激进的，不然不会当地下党。虽然现实诸多差异，精神相似性让二人走在一起：他们结合了，没有办理结婚证书，也没有举行婚礼，即同居。黄敬的激进言行引导了江青那骚动不安的思想。于是江青在十九岁那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需要冒被捕杀头危险的地下党。两个月后，黄敬被捕，江青逃往上海，和组织失去联系。

那个时代地下党被捕后果很严重的，要知道蒋介石正在全力剿共，很多有名的共产党人，如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等等都被咔嚓了。然而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金钱和武力能解决很多问题。俞家没有武力，却有足够多的金钱，很快就把三公子给捞出来了。

从精神和物质方面看，黄敬都是江青一个很好的归宿，然而二人没有结婚。原因很简单，俞家强烈反对。黄敬的姐姐因为要学演戏，他爸爸认为戏子有辱门厅，要断绝父女关系，指望俞家接受江青这样一个不入流的土戏子，那是难如登天。任凭黄敬磨破嘴皮子，他妈妈就是不让江青进门。于是黄敬和江青一起去了北平。俞家更狠，断绝了黄敬的生活费。这一招太狠了。江青在北平活不下去了，又回到上海。

屋漏偏逢连夜雨，回到上海的江青被捕了。

江青在监狱里蹲了一个多月，被保释出来。好在她是个小角色，也就无所谓了。政府可以忽视她那样的小角色，但是命运不会。一个年轻女人，孤身在上海滩闯荡，衣食住行就很成问题。这些问题在江青那里好像不是问题，她把名字从李云鹤改为蓝萍，决定成为明星！

首先她得到一个话剧主演的机会，就是她日后赖以得意的作品《娜啦》，改编自易普生的名剧《玩偶之家》。演出效果很不错，时间是一九三五年。并不是江青演技有多高。而剧中主角的个性和江青非常相似，因此她无须演技，只要本色演出就行，于是成了小明星。

二十一岁的江青有点飘飘然了，决定进军电影届，从小明星成为大明星，取代蝴蝶，红遍上海滩，哈哈哈。为了这个梦想，江青做足了功课。功课是什么呢，就是唐纳。

唐纳苏州人，和江青同年，典型的江南文人：眉清目秀，情感丰富细腻，性格优柔寡断。然而江青看重的不是这些，而是唐纳的身份，演员、编剧、影评人。唐纳写影评，文笔流畅，言词适中，评价中肯，各大报纸争相转载。因此唐纳在电影界也有不错的知名度，而他手中的那支笔既能捧人也能贬人。江青看中了那支笔。也就是说江青打算一边恋爱一边搞宣传，爱情事业双丰收。作为一个孤身闯荡上海滩的外地女艺人，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宣传方式了。

江青并不十分漂亮，甚至有一颗门牙还是黄色的。在大上海俊男靓女满把抓的地方，想要宣传谈何容易啊。但是她足够机灵，很快便收服了唐纳。

唐纳回忆“纵然在上海，像她那样大胆，也是例外。不要想象她是胆小怕生的中国女孩。

她不是你通常所见的羞答答的中国女孩。主动地和男人谈话，她毫不在乎。她的行径，一如男性。啊，她是勇敢的女性。”这也从侧门反应出江青的性格，敢作敢为。

关于两人相见、相识、相爱的过程，当年新闻如此描述：在电通影业公司，有一天，有人亲眼看见蓝苹挽了唐纳的手臂，肩并肩的出去，剩下来的睁大了眼珠对他们看。当天晚上，他俩没有回来。第二晚，也没有回来。直到第三天下午的六时许，才见唐纳与蓝苹，仍旧手挽手，肩并肩，满面春风的回来。他们一回到公司，就往经理室而去。到晚饭的时分，才和经理马先生回到膳厅。饭吃到一半，马先生立了起来，对大众报告了一个好消息，说是：“同事唐纳先生，与蓝苹女士因意见相投，互相了解，而将实行同居。”说完后，轰雷似的一声，都围住了二人，一半祝贺，一半要他们报告同居前的过程。

二人还有一个浪漫的婚礼。半年之后，江青唐纳等六人组成三对夫妻到六和塔在旅行中举行婚礼。唐纳如此设想：六和塔又名六合塔，矗立于钱塘江畔月轮山上。唐纳取其“六和”、“六合”之意。当时新闻界再次轰动，认为有趣。连上海法学院院长、著名大律师、大名鼎鼎的沈钧儒也觉得有趣，兴致勃勃跑过来当证婚人。

尽管如此，江青在电影界的地位并没改变。电影和话剧不一样。话剧成本小，一群热心人士把世界名著改编一下就能表演了。而电影是需要成本的，需要砸钱的。明显背后都有权贵支撑的，什么干爹啊之类的角色并不是现在才有的。谁愿意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三流外地菜鸟砸钱？有啥好处吗？唐纳手中有笔，心中有才，可是口袋里没钱，即使把自己赔进去帮助江青造势，依然是镜中花水中月。江青只懂得制造新闻，不懂得新闻背后的利益动机，所以即使制造出新闻依然于事无补。如果把场景转换一下，看一看文革时代的江青，不停批斗这个打倒那个，每天处于风口浪尖，却从来没有弄清楚背后的权力关系。到最后，靠山倒下之后，她依然是一无所有，成为刀俎上的鱼肉。

江青不明白这一点，以为新闻不够强悍，便继续制造新闻。

六和塔浪漫婚礼之后仅仅两个月，江青制造了更为轰动的新闻。三六年五月份，江青以回济南探母为名，一去不归。唐纳在上海心如火燎。六月二十三号，上海的唐纳接到江青写来的一封信。概括起来就是，我走了，不要怪我。虽然彼此相爱，虽然轰轰烈烈，虽然很浪漫，却没有前途了。就当我死了。

唐纳一看，脊梁骨发凉，立刻马上乘车去济南，脑袋里盘旋着江青日常用语：“爱我是痛苦的。”唐纳急匆匆到江青家，首次见到江青的妈妈和姐姐。“云鹤不在家。”“她上哪儿去了？”“她不在济南！”“不在济南？她在哪儿？”“她没说，俺不知道！”“不知道？她走了多少天了？”“十几天了！”唐纳告辞。第二天清早，再去江家敲门，依然不在。中午再去敲门，还是不在。晚上依然如故。

江青真的不在，她去北平看望黄敬了。黄敬去北京后，上了北大，又参与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混得风生水起。后来正是在黄敬的指引下，江青才去了延安。延安审干，除了康生帮忙，是黄敬证明江青很早就是共产党员。江青才安然过关的。解放后黄敬曾任天津市委书记，被毛泽东训斥一番之后，有些抑郁，五八年去世。

一九三五年的北平已是高危地带，日本步步紧逼，别说发展前途，连工作机会都没有。大批的知识分子学生正在南下，其中有两个女学生，就是薛明和叶群。只是此时的叶群和江青还在人生低潮，素不相识。

这边痴爱着江青的唐纳毫不知情，彻底绝望。他本是感情丰富性格软弱之人，遇到重大打击，感情便淹没理智。怎么办呢，没有活头了，那就不活了呗。他记起那部两人起演出的影片《都市风光》。在影片中，他饰男角追求江青饰演的女角，失恋后喝下一杯又一杯药酒自杀了。他决定人生如戏：药店买很多消毒用的酒精和红头火柴。

绝望之极的唐纳留下遗书：阿苹，我最亲爱的：想不到你竟走得这样突然，这样匆匆！这是开头部分，中间啰嗦了一大堆琐事，结尾如下：

——我本想努力找到你，但是沧海茫茫，我上哪儿去找？

——沦落异乡客邸，雨，老是在铅皮上滴着，现在只是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一个人。

现在谁是真正爱我的人？谁能再真正爱我像你一样？

——我死，对社会没有什么利益，可也没什么害处，我再能做些什么有益的事情呢？我死了，我相信只有使你更发奋，更奋力，因为可以常常使你遐想，常常使你追怀的人，现在，现在已经死了！

——没有什么别的遗憾，只是没有见到你最后的一面和那两个圆圆的笑窝！

应当佩服唐纳的才华，看这哀伤的文字，绝不次于《少年维特之烦恼》《茶花女》等名著之间虚构而出的生离死别。

然而唐纳先生没想到的是，戏和人生有很大的差别，即便是自杀，做不到位也无法成功。他喝了很多消毒酒精、吞了很多红头火柴，结果没死掉，被茶房送医院去了。一次不成功没关系，那就两次，两次不成功，那就三次。搞的大夫通宵守在床边。唐纳还是没死成。当然以后还有自杀的机会。因为他知道了黄敬的存在。人就是这么奇怪，本来想为某个人去死了，后来发现还有情敌，那就不死了。最关键的是江青在北平待不下去，只好南下回到唐纳身边，和他一起回上海。而她这么做的目的达到了。

江青要干啥呢，要新闻。这是江青刻意制造的新闻。她了解唐纳，知道唐纳在那种情况下会折腾出动静来。唐纳的表现可以说超出了江青的期望值。才子唐纳为情自杀的消息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这是现实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啊，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连篇累牍。甚至连大名鼎鼎的陶行知都惊动了，写诗勉励唐纳。

作为故事的女主角，江青的名字笼罩上海滩。江青回到上海之后，媒体争相采访。这正是江青想要的：提升知名度，积累人气，成为上海滩明星。

可惜，还是虚名。这些泡沫一样想虚名没能改变江青在电影界的处境。还是那句话，电影是个砸钱的买卖，有钱之人都是人精。没有切实的基础，没有人轻易愿意为虚名砸钱。江青好不容易演了一部电影《王老五》，送国民党电影审查机关。审查老爷硬是从中作梗，看到影片中有一段工头当汉奸的戏，非常不满，大义凌然曰“中国是没有汉奸的”！把片子删得七七八八，驴唇不对马嘴。

虽然江青电影事业没改有改变，但她却用实际行动导演了一场现实生活中的大戏。这场戏很精彩不是么？在那个男人玩弄女人如同换衣服一样方便的年代，江青能把男人玩弄股掌之间，也算不简单呵。而且这出戏还没有结尾的迹象。

江青和唐纳虽然和好了，实际已有裂痕。明星梦的破灭让江青那动荡不安的精神更为动荡不安。加上唐纳知道了黄敬的存在。两人本就不和谐的关系更加不和谐。苏州男人和山东女人，性格上本就相去甚远，再加上志趣不同，按照当事人回忆，那就是很热闹：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时不时吵到朋友家，偶尔还大打出手。

无奈之际，江青又想起老本行，话剧。要回话剧界，她需要一个人的帮助，就是章泯。章泯是话剧导演，在话剧界威望很高。进入延安之前，如果说有谁真正帮助过江青的话，就是章泯。江青主演的话剧《哪啦》就是章泯导演的。章泯和江青关系拉近之后，就和原来的妇人离婚了。章泯真正帮助江青，让她出演《大雷雨》。正是因为章泯真心提携，二十年后，江青成为文革旗手，上海滩“旧戏子”凡是能够得着的，均遭清算，比方说金山同志，就在监狱里享受了好一段时间。比方说和江青争演《赛金花》的王莹女士，虽然有才有貌，却成了美国特务，光荣进入秦城监狱。大活人入狱，七年之后身死魂灭。同时入狱的还有王莹丈夫谢和赓，若干年之后经周恩直接干预下出狱时，人已经痴傻了。

有例外么，有，只有章泯例外。

江青和章泯的关系惹得唐纳再一次上演自杀好戏。在这自杀连续剧第二季中，唐纳不再是喝酒精吞火柴，而是跳黄浦江。然而唐纳命大，再一次没死。唐纳这次自杀，导致舆论对江青大为不利。江青苦心经营的人气没了，明星梦也没了。

当时二人的关系，有江青写的《一封公开信》为证：

“他又来了，进门就骂我，我请他出去，他不出去，于是我叫阿妈上来，但是他竟把房门锁了，急得我那个善良的阿妈在外边哭，可是我呢？我却平静得很，我知道他很痛苦，让他骂骂出出气也是好的。可是天哪！他骂的是什么呢？我生平没受过的侮辱，他骂我玩弄男性，意志薄弱，利用男人抬高自己的地位。”

“我默默地让他骂，他骂够了走了。可是在我心里起誓了，让一让二不让三，他再来我就给他个厉害。我的让一让二，并不是怕他，而是可怜他，另方面是看重自己！”

“在一个夜里，他又来了，就这样我打了他，他也打了我，我们关着房门，阿妈和朋友都敲不开。我疯了，我从没有那样大声地嚷过，这一次他拿走了他写给我的所有的信，他又说登报脱离关系，但是他并没有登。”

“我的家里除了一把小水果刀和一把剪刀以外，别无武器，不要怕，来吧，我绝对不躲藏！讲到所谓的‘新闻政策’，我绝对不是像阮玲玉一样，为着‘人言可畏’而自杀，或是退缩，我一动都不动的在等着，在等着他们用斗大的铅字来骂我！”

——实事求是，符合逻辑，言辞犀利。文如此，人亦如此。

——江青的舞台并不是布局中的舞台，而是真实的人生。她在人生中的表演远比舞台上真实给力。所以说江青是个戏子，一个把人生当戏来演的戏子。至此，她的表演才来开一个序幕，高潮尚未到来。二胡年后，江青再次驾临上海，所有人都得匍匐称臣。前后场景转变之巨大，应该是江青也没想的吧。

此后抗战开始，唐纳和江青再无见面，直到八年之后抗战胜利，毛泽东和蒋介石重庆谈判，唐纳当时以记者身份在重庆。江青去重庆治牙，约唐纳见面，唐纳小心翼翼、胆战心惊的回绝之。此后唐纳另结新欢，移居国外，晚年在法国经营一家中餐馆，生活幸福。如果留在国内，文革之中应该享受特别待遇吧。

**在毛泽东身边**

从裴明伦到黄敬到唐纳到章泯，这些人都不错，要么富家子弟，要么才子，要么精英，放在任何时候在大众之中都是抢手货，然而他们这些人终于没能留住江青。裴明伦为了和十六岁的土包子恋爱，瞒住家人，最后用花轿把江青抬回家，可以说真心实意。黄敬为了江青，也和妈妈争执，从上海出走北京，一帮再帮，诚意可见。至于唐纳，一而再再而三的自杀，不用解释了吧。就连地位颇高的章泯，也因为江青放弃妻子。而江青不过是一个从破裂之家走出来的人。抛却政治问题被抹黑。这些故事至少可以证明一点：至少前期的江青，就算不是十分漂亮，应该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

她的魅力在哪里呢，应该说比较前卫大胆吧。放在现在不算啥，但是在那个女人依然裹小脚，依然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就显得很耀眼了。不是说那个年代的价值观有问题，而是那个年代中国积弱不振。热血有志之士对传统东西不怎么待见。江青以新女性的姿势出现时，就显得那么与众不同。比方说她第一次见到唐纳，便告诉他，她是革命党人。唐纳听了之后佩服不已。唐纳性格虽然随和，却也佩服革命党那种刚硬的作风，便对眼前女人好感倍增。正因如此，她才能让一个个优秀的男人变成生活的背景。所以说，任何人成功都不是偶然的，都有自身独特之处。

明星梦没有了，日本人来了，江青去了延安，遇见生命中最重要一个男人，毛泽东。最终在毛泽东身边，她成为一个明星，一个大大的明星，一个现实中大大的明星。

江青延安一行并不容易。那个时代和现代不一样，上海也不大，也就虹口、闸北、闵行、徐汇那一块，黄浦江东岸还是一片荒凉呢，放现在也就是一个中等城市规模。当时的延安更是巴掌大一小块地，比当今一个小集镇大不了多少。这样两个地方联系起来非常困难的，至少比现在困难很多。

至于交通那就不用说了，延安虽然有个破机场，只有非常牛叉的人物才有资格在上面降落的。火车，没有；轮船，没有；汽车，没有直达的。一个女人要克服这些并不容易。即使是现在，让一个上海女孩到延安一趟，估计也是娇气好一段时间。江青好歹也是个明星，好歹被众人捧过，小有知名度。

从上海到延安数千里路不说。当时兵荒马乱的，贼盗横行，弄不好被强盗绑了，撕票也不一定。当时大小军阀比现在黑帮还多，到处抓美女结婚，比现在各种二代强悍多了。一小女子要过这一段并不容易。

这还不是最为糟糕的。最糟糕的是从上海到延安要经历双重盘查，国民党要查，共产党也要查。当时国共合作，芥蒂却很深。往延安跑，国民党以为是共产党间谍，跑去送情报的。共产党以为是国民党间谍，跑去刺探偷窥的。要去延安需要组织关系，也就是介绍信之类的证明。经过一系列周折之后，江青终于从博古那里弄到证明信。

然而延安虽然号称革命圣地，却是生活苦寒之地。

上海和延安是两个世界。在上海可以住公寓，延安只能住民房或窑洞。上海有自来水，虽然质量有时出点问题，吃喝拉撒却也方便；延安只能在河里淘米洗菜。上海可以灯红酒绿，好吃好喝好睡；延安只能喝小米粥，吃小土豆，偶尔见点肉星。上海可以在黄浦江岸边吹吹风，延安只能吹来着黄土高坡的风。即使上厕所，上海有马桶，延安只能蹲苍蝇乱飞的粪坑……差别太大了。

那么江青为啥要去延安那地方。原因有性格上的，也有现实意义上的。江青就是那种动荡不安的性格。在日本人占领山东，紧逼上海之后，江青已经无处可去。依据她的性格，她需要一个立足之地。全国虽大，能容纳她的地方却不多，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去另一个极端之处吧，就延安了。延安还有一个现实的目标，黄敬也去了延安，而且小有名气。在江青交往的男人中，黄敬是唯一一个能从精神上影响江青的。但是不能说她为黄敬去延安。主要还是她那动荡不安的性格。黄敬的作用是证明江青曾经是党员，帮助他恢复了组织关系。

由于条件艰苦，不少人来了延安又走了，江青留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江青再一次改名，不再是蓝萍，而是江青。江青，取于唐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又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青，即江青，篮，即蓝萍。江青胜过蓝萍，那就再干一番事业。心若在，梦就在，不过是从心开始，从头再来。

虽然延安和大上海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没得比。但是江青很快就发现延安是个好地方。因为在这里她有了表演舞台。在上海，她只是一个三流明明星，挖空心思制造新闻，也只是博得他人一笑，这里不一样，她成了高技术人才，物以稀为贵。

当时的延安虽然人才济济，能玩枪的有很多，能玩舌头的也很多，还有很多人既可以玩枪也可以玩舌头，但是女人很少，有姿色的女人更少，有姿色有能演戏的就更少了。而江青就这样成为稀有之物，一下子身价大增。在上海，挤破头皮赢得一个小角色，还被人批来批去；延安不一样，随便演一演，就有中央首长来观看。那些人不仅观看，还会真心欣赏，还不挑刺，还会鼓掌叫好，还会亲切慰问演员，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很有成就感。这些人虽然衣着打扮上不如大上海的商贾公子哥，但一个个都是鼎鼎大名，其威势和魄力远非上海滩那些装逼的家伙能比。精神世界更是坚如磐石，让动荡不安的江青有了安定下来的感觉。

关于江青如何与毛泽东走到一起，很多版本。

传说中的版本：江青来到延安的第二天，便随着徐明清和王观澜去见毛泽东，然后彼此印象良好，良好变成亲密。——徐明清同志根本就不是和江青一起去延安的。而且江青在延安小旅馆里闷了很久。所以这是不靠谱的。

八卦版本：江青演《打渔杀家》里的萧桂英，演得很好，把桂英同志演得英俊潇洒，活活灵活现，据说毛泽东也去看了戏，很高兴，使劲鼓掌。江青同志感动之余灵机一动，第二天找康斯同志带领，去毛泽东那里请教文艺问题。另有八卦版本曰，不是《打渔杀家》，而是《被糟蹋的女人》进入视野的。又有八卦曰，是《锁在柜子里》。

不管是哪个版本，可以证明两件事：一，延安的江青相当活跃；二，毛泽东看过江青演戏。有当事人回忆为证。

又有秘史版本，而且比较详细。

《江青秘史》记载：出入中央党校的都是相当重要的人物。江青混入党校，是她取得政治资本的重要一步。下午大家到礼堂听报告。江青最早来到，找了一个前排位子。她想，一定要坐在显眼露面的地方，不管谁做报告；做报告者必是党中央领导人。

两点钟了，忽然响起热烈的掌声，全体起立。台上出现了毛泽东，几百双眼睛放出喜悦的光芒。江青也站起来鼓掌，对准台上招招手，拍拍手；再拍拍手，又招招手。她清楚地知道，这几下可以使毛泽东发现自己在前排。

听报告时，江青一时似乎在认真地听报告，一时又像是在思考报告的内容；有时急速记笔记，有时又似乎支颊，偏着头看台上的人。姿态变化无穷。

两个钟头的报告结束了。同学们有的兴奋得没有心思去玩，马上整理笔记；有的互相交换学习心得。晚上，全校分组讨论。一江青坐在那儿，不多发言；她的心早飞了，私心杂念，不能告人的隐情，一齐涌上心头。今天是和毛泽东第二次相见了，马上要来一个行动，否则心愿依然渺茫。学习小组会快结束时，她巧妙地作了十分钟发言，把会上同学们的发言加以归纳整理，作为自己的意见，加上漂亮的形容词重复一遍，言词动听，似乎有条有理。

晚上，等大家都睡觉了，她独自一人坐在灯下，提笔写道：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今天专心地聆听了你的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报告，你指明了光明的方向，使我鼓舞。

我是一个木工的女儿，从小受生活的折磨，在三顿吃不饱的苦难中又遭父亲酩酊大醉殴打成性的逆运；母亲受压，家破人亡，流落他乡；我被迫学京戏，登台谋生；后到上海加入左翼文联，于一九三三年入党，先后当电影和舞台明星。这是党给我的培养，是你的光辉思想哺育了我，才有今日。

我向往延安，追求真理，现在是党校十二班的学员。我因理论水平极低，革命斗争经验极少，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问题缺乏先进者的指教。

我请求，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百忙中接见我一次，这是我这个苦孩子一生的唯一的希望！我思想上有许多问题，如能得到你的当面教诲，我当获益不浅！其中一部分是今天听你的报告之后，有关目前形势的分析。在某一点上，我还不甚明白。

敬爱的毛主席，我想你会欢迎我，你是一位善于联系群众的伟大人物，我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只不过向你提出区区小小的要求。如果准见，我将于后日（星期日）下午三时来到你的居处。

啊！我写至此，全身热血奔腾！我将亲耳听到你的教导，的确：我已经见过你三次了，这幸福的第四次即将到来等等等等。

中央党校十二班学员

江青

一九三七年冬

第二天，江青亲自把信送进城，到毛泽东居处的门口，又转身赶回党校。

她不准备再追求别人了。她已经选定了奋斗的目标。

类似的秘史版本，还有好几个，大同小异，也不稀奇。只是开会的时间地方不太一样。当然，这事也可能发生好几遍。单看任何一个版本都不太可靠，都有漏洞。但是毛泽东和江青的接触也不外这些途径了。因为专业不一样嘛，毛泽东搞政治军事，江青演戏，能接触的方式大致也就这么多了。从这点上也能看出来，江青对于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有着百折不挠之决心，结局往往是乐观的。

**江青的魅力**

不论如何，江青成功了，她抓住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男人，这个男人比任何人都有魄力，思想行为超过所有人。——江青那动荡不安的精神终于平静了。如果是他的精神是一阵旋风，那么毛泽东就是大山。旋风进入大山，终究要安定下来。

下面又有一个新问题，毛泽东为何能看上江青呢。要知道江青那些破事，瞒别人可以，绝对瞒不了毛泽东，中央特务们的办事能力可不是盖的，连蒋介石都防不住。而且毛泽东当时的法定妻子贺子珍还在。

从性格上讲，毛泽东就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之人，凡是他想，必然去做；凡是他爱，必然去做；凡是他恨，必然去做。而且总是能做到。贺子珍虽然是他妻子，去了苏联，而且两个人关系并不和谐，感情也不是融洽。贺子珍是老革命老红军，性格好强，而且不会隐藏女人惯有的嫉妒心。比方说史沫特莱自一九三七年初去延安采访，带一位女翻译去采访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个不拘小节之人。换成一般情况无所谓。然而对方是女人，问题就大了。贺子珍见自己的老公和别的女人谈笑风生，自然十分不满，打翻好几碗纯正的老陈醋。

后来贺子珍去了苏联养病，毛泽东更无聊了。当时毛泽东四十四岁了，很多工作要做，干活干到很晚。好不容易下班，身边连个异性都没有。就在毛泽东感情空虚的时候，江青出现了。贺子珍身上有很多优点是江青没法比的。但江青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优势，那就是女人味。比起贺子珍的刚强和多疑，江青更有魅力。

如果说大上海的江青是一个风流女郎，延安的江青成了另外一个人。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曾经的艳丽的长发扎起之后多了几分朴实。艳妆不穿了，入乡随俗。尽管入了乡，并不俗，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表情活泼丰富。再配上不差的容貌，在延安如同野地里的玫瑰，已经非常非常显眼了。

在个人能力方面，虽然和蝴蝶、阮玲玉等人比起来，江青只是一个三流演员。但是那些一流二流演员都不在延安，三流的江青就变成一流的。特别是在老本行话剧这一块，在延安可是台柱型的人物呵。每次登台，都能让观看的大人物们鼓掌致意。——虽然文凭没有，但是才华在，让人刮目相看。而当时共产党中间，有的是大老粗。

此外，江青同志文化程度虽然不高，却可以写文章，写给唐纳的公开信文采就不错嘛。而且字写得不错，楷书写得尤其不错。——表示江青是一个用功的人，不是那种善于抱怨之辈。无论何时，用功远比抱怨重要。

另外，江青也有豪爽的一面：她很喜欢骑马，驯烈马，越烈的马越爱骑。当初贺龙给毛泽东送来一匹好马，江青就高兴得不行。骑马，增添了她的英武之气。骑马虽然英武，却不过火。英武过火，女人男性化，便失去可爱柔美，比方说秋瑾，英武得像个男人。爱骑马的江青就不爱打枪。虽然很爱打扑克，却也喜欢织毛线。织毛衣能增加女人味道。江青的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而且很会剪裁衣服，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战争年代物质紧缺，许多高级将领都要自己动手做衣服，比方说徐向前、比方说粟裕曾是自己给自己做衣服。江青这一手无疑让毛泽东心里暖暖的。

延安的江青能承受简朴的生活，能接近群众，常常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是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等。行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励，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调和一下情绪。相当于给一群大老爷们额外奖励。

如此这般只表明，当年的江青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女人，非常有女人味。一个人在政治上失败了，不见得其他方面就差劲。如果不折腾，生活中的江青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这从她想追求男人从无失手就能看出来。虽然她的理论知识不怎么样，但是在毛泽东身边需要的不是那些，而是女人味。任何一个男人都想要有女人味的女人，毛泽东也不例外。

**约法三章**

毛泽东和江青恋爱的消息传出去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毛泽东是中共实际意义上的领袖，代表新生向上；江青不过是上海滩绯闻满身的旧戏子，意味着腐朽落后，不仅和国民党高官有往来，而且被捕过，是否有过变节行为亦未可知。康生临死之前曾痛过关系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揭发：江青是叛徒。大概就是指上海被捕吧。江青和毛泽东搞关系，不用别人说，党内就反对声一大片。

当时的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毛泽东盟友，书生一个，为人处世原则性非常强，正常情况下都会对毛泽东的行为表示认同。张闻天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不能说张闻天就错了，但政治和生活终究不是一回事。比方说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项英同志，毛泽东的对头，依然在百忙之中写个材料，表明“此人不宜和主席结婚”。

但也有人支持，善于投机钻营拍马屁的康生最为积极。贺龙是另外一个支持者，大手一拍曰，堂堂一个大主席，娶一个女人有啥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毙了他！

毛泽东要做的事，基本没人能拦住。所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号，延安窑洞，两桌子酒菜，二十四岁的江青和四十五岁的毛泽东结婚了，于十年之前蒋介石和宋美龄大婚相比，土得掉渣。就连礼炮也是日本送来的——飞机扔下来的炸弹。

关于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一直有一个针对江青的传言：约法三章。

版本之一：一，不准参政；二，不准出头露面；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同志的生活。

版本之二：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二，她只能成为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务。

版本之三：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解除，只能

称“江青同志”，不能称“毛泽东夫人”；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过问党的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

几个版本就如同评书，都有漏洞，比方说版本之一里面第二条，不准抛头露面。啥意思？蹲监狱还能放风呢。政治局会规定实际意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么？版本之二第二条，当毛泽东的助受却不能干预政策的决定，瞎扯嘛。等毛泽东制定政策需要女人干预时，早就完蛋了。第三个版本第一条，不准再娶，要是江青死了呢？让毛泽东当光棍不成？政治局那些人才不会如此低能呢。

李银桥曾经否认过约法三章之事，他的理由：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么。虽然李银桥长期担任毛泽东侍卫长，但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他没有经历过。即使真的有约法三章，能跟毛泽东约法的，也就是政治局常委那几个人，不可能把那事透露给一个小侍卫的。

后来台湾公布的《约法三章》：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这个根据是王若飞的日记。王若飞，生于一八九六年，反对过袁世凯，参加过五四运动，留学过日本、欧洲，二二年入党；指导过工人运动，参加过战争，搞过土地改革，蹲过监狱。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两年后任中央秘书长，有可能接触到所谓约法之事。四六年，王若飞和叶挺、博古一道，坠机而亡。之后国民党攻克延安，得到王若飞日记，之后将约法三章之事公之于众，但至今未见原始记录，依然不能作为凭据。如果这是真的，江青也不能算违规，因为江青进入政治局，确实是二十年之后的事，之前她只是参与“文化”活动而已。

个人认为，所谓约法三章，更可能不存在。在当时情形来看，中央政治局那些人都是什么人，都是精英啊，精英中的精英，他们会在乎一个小小的江青玩花样？要知道江青的特长也就是演戏而已，玩政治？中央党校的纪律她都未必能搞清楚。在他们眼中，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最多就是给人落下一点点口实而已。即使有约法，最多也就是一种默契的君子协定，让江青不要过于活跃，出来影响共产党的形象。共产党纪律非常严格，形象问题非常重要，正因如此，为了占领道德制高点，江青同志狠狠的修理那些知道她底细的人，连孙维世和金山都不放过。

战争时代，江青是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把毛泽东照顾得很好。躲在毛泽东的窑洞里，见人微微一笑，点点头，一副听话懂事乖巧可人的小媳妇模样。此时的江青还没有、或者说没有机会表现出政治欲望。

就要像演一出戏，不了解舞台的新人肯定要小心翼翼了解情况、慢慢适应舞台的。成了毛泽东妇人的江青，就成了中共舞台上的一个新人，谨小慎微的进入角色。当时高层妇人中间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过井冈山、经过长征，任粥时夫人陈琼英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博古夫人刘群先去过苏联、经过长征，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只有后的叶群比她资历差。当时叶群也还是一个初来乍到的外人，精心挑选追求者，若干年后才等到林彪。

**第六章 江青的武器和对手**

从一九三八年，江青住进毛泽东延安窑洞开始，到六十年代登上舞台，前后二十多年的时间，江青基本上是个沉默的主妇。这期间，她生了一个孩子，去过不少地方观光、治病等等。江青倒台到现在，很多人认为，江青是个阴险的人，一条毒蛇，一直潜伏在毛泽东身边寻找机会，终于在二十年后找到机会，释放身上的毒液。应该说这种解释相当扯。

一九三八年之前的江青，也就是一个爱折腾的娱乐圈人士，除了精神更为动荡不安之外，和现在娱乐圈那些爱折腾的女人并无不同。然而等到六十年代，江青重新走上舞台之际，已经像个政客了，拉人、整人等本领已经像模像样，完成了从表演舞台到政治舞台的华丽转身。中间二十多年发生了什么？

其实什么也没发生，江青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只不过她的家庭有点特殊。在延安窑洞里居住的那些人，都是精英呵。特别是毛泽东的窑洞里，有资格进出往来的都是哪些人？要么是显赫的一方诸侯，要么百战将军，这些人的实力和谋略都是第一流的。在毛泽东的窑洞里，每一个人都是人杰，每一次会议都决定很多人的命运。每一次接触中，那谈笑之间，天下风云就决定了。把一个人放在监狱里关二十年，性格必然转变。因为环境影响人的性格嘛。同理，把一个人放在谋略圈子的核心放二十年，日日观察揣摩，就能学到很多手腕。

江青的政治本领哪里来的？学的。江青只是一个女人，意志并不坚强，本就容易受影响。在那种环境下，除了照顾毛泽东的生活起居，也就是拍拍戏之类的，正常女人逛街啊什么的正常娱乐，根本没份。因为整个延安连柴米油盐都无法供应。而且窑洞之外炮火连天。终日跟在毛泽东身边，接触到的就是运筹帷幄、纵横捭阖之类的谋略技术。毛泽东那份雄才大略是学不来的，但毛泽东雄才大略展现的手腕却可以学一点的，比葫芦画瓢呗，又不难。后来过程看，江青学毛泽东，也就学到一点皮毛。

就是这一点点皮毛，已经足够很多人吃不了兜子走。

进入北京之后，江青过起了贵妇人生活，衣食住行自不必说，所到之处皆有掌声，所干之事皆有人奉承。奉承她的人还都是学养深厚的理论家，如康生同志，不仅骂人不吐脏字，拍马屁时也可以于无声处见真功。那种生活状态下的江青，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外号，都红女皇。这个称呼虽然很架势，生活也就是吃喝拉撒睡，除此之外，闲来无事，看电影，从国外买点干货，接受技术含量颇高的马屁。因为当时大家在轰轰烈烈搞建设，江青学的那些谋略技术暂时尚无用武之地。就算闷得发慌，也没辙。

和所有爱折腾、不知天高地厚、任性傲慢的女人一样，江青从来没有真正的朋友，加上她本来就眼界颇高，又是第一妇人，随着毛泽东的地位巩固和提升，能看得上的人也就那么几个。比方说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比方说周恩来干女儿孙维世。然而她们表面上对江青客客气气的，实际上根本就不如刘少奇和周恩来对毛泽东那般俯首帖耳，让江青很惆怅。因为在江青看来，既然毛泽东在男人之中是领袖，那么领袖的老婆就应该是女人之中的领袖。

——历史是公平的，只要你愿意，总会等到表演机会。

前面说过，新中国第一个十年发生很多事，战争、剿匪、反右派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事件。江青都差不上嘴。即使是闹得天翻地覆的庐山会议，作为第一妇人的江青也就是拍几张照片而已。世道很快变了。大饥荒的到来，不仅仅打破了建国十年间坚持的建设主旋律，而且把中国政坛上能量最大的两个人——毛泽东和刘少奇——推向对立面。

从七千人大会前后分歧开始，到小四清运动，到大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政治风浪一浪高过一浪，一浪比一浪猛烈。这些风浪如同狂风一样席卷了所有人。身为第一妇人、过了二十多年不平静生活、本领就不安分的江青同志自然而然的卷入其中，且表现极为拉风。

**样板戏**

一般女人四五十岁之后，也是精神重新动荡之时，孩子大了，年龄也大了，爱情的魔力已经淡去，家庭的温馨也开始褪色。需要重新找点活干干，健身美容啊、做生意赚钱啊、拾起年轻时代的兴趣爱好啊等等。江青也不例外，过犹不及。因为她不需要洗衣做饭收拾房间，甚至连叠被子都不用自己干，而且她的丈夫也不是一般人，见个面都要先打招呼。

经过二十多年的耳濡目染，江青已经了解了政治舞台，正如了解表演舞台一般。她决定表演了。江青需要干点事，也就是捞点资本。有了资本才好炫耀。江青观察了身边那些人，那些在中央政治局出没之人，都是身经百战，要么战场，要么会场，或者兼而有之，都有自己的资本。江青明白，她需要资本。

如何表演呢，那就从本行开始吧。既然出身戏子，那就从戏开始吧。

戏和政治有某些相似之处。某种意义上讲，政治本身也是一种表演，一种高级表演。但是在现实中，戏和政治还是很难扯到一起，但是江青很幸运，生活在一个可以把戏和政治牵扯到一起的时代。

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每当国家强势，知识分子必然遭殃。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明代打屁股、康乾时代文字狱，莫不如此，只有盛唐时期还不错。新中国诞生之初，也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反右派。也不能怪中国知识分子命不好，因为从古至今，政治体制都是知识分子搞出来的。而且长时间以来，占据主导地位和话语权的，依然是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深层次的悲哀，非常值得分析，只是限于篇幅和题材，这里只能略过了。

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乌鸦横飞。笔下有千言（都是抄来的），口中巨浪狂翻（都是唾沫）；脑中又有面和水，而且常常摇头晃脑成为浆糊；以——语不惊人死不休——为座右铭。凡是强势的政治领袖，都想清除这种烦人的声音。清除的时候，无一例外的扩大化，伤害到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如果说当初反右派为了搞经济建设，那么在大饥荒之后，也就是经济建设失败之后，事情就是另一个样子了。七千人大会之后几年间，中央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所谓四清运动，毛泽东和刘少奇各显神通，闹得不可开交。

那么所谓文化界呢，自然也不会落下。唯有如此背景，戏和政治才能联系到一起，江青的机会来了。江青决定插手文化界。按照当时江青的身份，当演员已经不现实了。而且演员那点风光已经无法满足江青。因此她决定重新自我定位，幕后操盘。也就是说要当文化界的旗手。正如毛泽东操控政治那般。方法就是搞样板戏。

六十年代在北京的江青已经不是三十年代那个为了一个电影角色争得头部血流的戏子了，已经升华了，升华为政治戏子。二十多年学到东西终于有机会使用了。在政治上，她那点手段算不了啥，在文化界已经足够使用。

什么是样板戏呢，所谓样板戏，简单一点说，就是官方戏剧。官方之前没有规定啥戏剧，后来要发展社会主义教育意义的作品。戏剧的内容要求以工农兵为主题，反应社会主义特色的戏。按照那个标准，鬼啊怪啊（惊悚悬疑类的）不能演的、才子佳人（肥皂泡沫类）不能演、王侯将相（古装剧）不能演、外国戏剧也不能演。动作片、爱情片之类的当时还没有，按照这个标准，文艺节目统统下马了。

这样是不是太严格了一点？确实太严格了。当时国情是大饥荒刚刚过完，国家满目疮痍。在毛泽东看来，再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相当于吸食精神鸦片。中国是一个善于吸食精神鸦片的民族，每当困难时期，精神鸦片特别刺眼。比方说南朝靡靡之音，明末秦淮名妓，清末民国时代遍布天下的妓女。毛泽东决定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小四清）时，另一边就是要整顿一下文化界。这是由历史传统的，比方说延安整风时代，就整顿了文化界。只有这种情况下，江青才可能出来抓一戏剧，才有机会成为文化旗手。江青同志为了所谓革命事业，决定很抓样板戏，干点事给那些男人看看。

江青抓到的第一个样板戏叫《李慧娘》。这出戏本是江青诸城老乡孟超编写的：一个权奸霸占一个美女，美女爱上一个美男；权奸很生气，杀了美女，把美男关押了；地狱判官同情美女鬼，法外开恩，准美女鬼还阳解救美男；最后正义得到伸张。

孟超编写剧本时，康生同志以老乡兼内行人的身份指出：这出戏定要出鬼魂，说是不出鬼魂他就不看。上演时，康生拼命鼓掌曰：“孟超做了一件大好事！”

同时观看的还有孟超老朋友廖沫沙。当时有人质疑说，咱们社会主义新时代了，还摆弄这些老古董干嘛。廖沫沙就写了一篇文章，叫《有鬼无害论》。廖沫沙写到：我们对文学遗产所要继承的，当然不是它的迷信思想，而是它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我们要查问的，不是李慧娘是人是鬼，而是她代表谁和反抗谁。用一句孩子们看戏通常所要问的话：她是个好鬼，还是个坏鬼。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戏台上多出现几次，又有什么妨害呢？

这篇文章既没有惊世骇俗的观点，也没有批判啥，就是普通的一个评论。如果不是和政治挂钩，早淹没在历史尘埃里了。然而这篇文章写于一九六一年八月份。一年之后，也就是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又是一系列会议，彭德怀写下《八万言书》，引出来所谓翻案风。为了批判这股风气，长篇小说《刘志丹》成了反动派向党和国家进攻的新形势。江青一看机会来了，就选择《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为突破口，大加批判，捞取政治资本。

然而江青同志当时还没有什么能量，文化部、中宣部等部门客客气气的招待她喝茶，然后摊开手表示爱莫能助。江青表示惆怅，很没面子。还好她有个好老乡，康生同志。康生当时政治局补侯委员，在庐山活跃一把之后，七千人大会上嗅到了斗争风波。在政治斗争上面，康生是不会失败的。于是他看准时机，来个一把八十度华丽大专生，狠狠批评中宣部、文化部同志有眼不识“鬼戏泛滥”。于是相关部门出台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接下来的情况就太俗套了，相关人士该写检讨写检讨，该挨批斗挨批斗。

在康生同志配合之下，江青初尝胜利快感。她决定乘胜出击，扩大胜利果实。随着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分歧越来越大，政治风浪越来越高，江青的发挥空间越来越大。

只从江青重出江湖要干一番事业之后，文化界注定不太平。她的另一个战果叫《红灯记》。早在大饥荒之前，江青就看过沪剧《红灯记》，觉得很不错。那时候大家搞大跃进，没心思管文化界的事。等到六三年，江青渐渐活动开了，再次跑到上海去看《红灯记》，对林默涵（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宣传部副部长）说，这个剧不错，改编成京剧吧。沪剧观众范围仅限于长三角地区，京剧可以面向全国。林部长也觉得不错，就找一个叫阿甲的导演改变。阿甲干的很不错，很快就搞好了，还请周恩来看了。周恩来一看也觉得不错。就在这时候，要当旗手的江青出现了。

一九六三年的江青已经相当忙碌了，又是北京又是上海，又是开会又是批判的，整天忙得不已乐乎。尽管如此，江青依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指导”剧本重新修改，排练，把剧组上下折腾的不行。江青虽然演过话剧，在延安也是“一流”，但是到北京之后，在老京剧那里，“一流”的江青，重新回到“三流”行列。但是此时没人敢告诉她，她的水平依然是三流。所以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一流。这样一来，剧组难免有抵触。江青就去找周恩来，说剧组“不尊重”自己的意见等等，纠缠到五更。周恩来被她缠得不行，表示支持她。这样江青再一次“指导”。絮絮叨叨一大堆，比如某个角色某个声音应该怎么样、某一幕应该如何关门等等。因为编剧水平本来就很高了，江青挑不出来啥毛病。为了表达自己的存在感，只能鸡蛋里挑骨头。

如此折腾若非出自第一妇人之口，早就被赶大街上去了。江青非但没有被赶，她的意见还被当成“指示”加以落实。江青为啥这么干？她喜欢这个戏剧？她喜欢让人感到厌烦？或者说故意的？都不是！江青上过舞台，长期处于圈子正中央，礼节啥的那是了如指掌。啥话该说，啥时候该说啥话，火候绝对到位。

江青这么做的真正原因是想耍流氓：把戏据为己有，当自己的政治资本！

因为那时的江青是有追求的：当年那个三流演员，因为身份变更，要当文化界的领袖。

江青成功了。后来很多人都说《红灯记》是江青高出来的第一个样板戏。编导阿甲文革中没有死掉，八十年代末后复排《红灯记》，在北京公演，感慨：有的人把《红灯记》看作是江青搞的，其实这出戏的创作与江青没关系，是她剽窃了我们的创作成果。——然也。

接下来两个战果是《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方式大同小异。江青在抓这些“战果”之时，还会带点附加产品来展示个性。比方说《沙家浜》，本来改得好好的，江青同志非常热情，亲切接待了剧组同志，对大家致以亲切问候，对主要演员进行亲切谈话。

江青对一个叫赵燕侠的演员特亲热，亲自跑到后台跟人家唠嗑：“我认识你赵燕侠！我看了你所有的戏，认定你能演好现代戏。你是苦出身，我也是苦出身，因此我愿意来看看你等等。”翻译过来就是，我很喜欢你。赵燕侠自然受宠若惊。然而历史证明，江青看好的人，结局都不好。

为了表达对赵燕侠的特殊照顾。江青特地从上海沪剧中调来演员进行一对一辅导。但人家赵燕侠是搞京剧的，不可能完全按照沪剧来。如果完全按照沪剧来，那还是京剧吗？

赵燕侠曰：“我们要有京剧的特色，不必一招一式照搬沪剧。”江青一听这话，顿时表示很惆怅。好哇，赵燕侠，竟敢忤逆本人好意，等着吧你。

某日剧组彩排。江青照例让赵燕侠坐在身边。江青发现赵燕侠衣服穿得少，第二天派人给赵燕侠送去了两件毛衣：“首长说，借给你，如果不嫌她脏，你就穿。”赵燕侠听得云里雾里，借衣服而已嘛！但赵燕侠知道江青肯定不高兴。这一来更不敢穿了，就把毛衣叠好放在箱子里。过几天看戏时，江青扒开赵燕侠衣领子，发现赵未穿毛衣，对人发怒说：“赵燕侠嫌我肮脏！”立刻派人把毛衣要回来。

从此之后此后，赵燕侠的好日子到头了。先被点名批判，接着被赶下舞台，然而被教育（进牛棚），角色也没了。这件事再次证明了老祖宗那句话——女人心，海底针。连报复起来都那么别致。其实江青这么干也不难分析。肯定是剧组有人从专业角度对第一妇人不以为然。江青心中有气，决定考验一下剧中主角。真想知道，如果赵燕侠把毛衣穿在身上，江青会怎么样？也许会哈哈一笑，表示赵燕侠对自己很崇拜？其实这并不重要了，剧本已经写好，赵燕侠必然要离开。

如果说赵燕侠命途多舛，还有惹了江青不开心因素在里面，那么童祥苓就更无辜了。童祥苓主演《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绝对一绝，形象逼真，活灵活现。凭借这个角色，童祥苓一炮而红，热度堪比几十年后赵薇主演的小燕子。但红了两年，童祥苓突然从舞台上消失了。为啥会有这么诡异的事情呢，原来是想当年童祥苓的姐姐童芷苓曾经在戴笠生日唱过堂会。戴笠已经死了，但是戴笠的小跟班沈醉还在，沈醉吃饱了不饿写了本回忆录，回忆录记录了堂会的事。好了，童芷苓成了特别的特务——文化特务，住到牛棚里，自然很伤心。童祥苓就写信安慰姐姐。这封信最后落到造反派手里。当红演员童祥苓就这样成了“文化特务”的安慰者，写了八十多分检讨之后依然过不了关，也就没了演戏资格。

因为京剧版的《智取威虎山》很成功，要拍成电影。当年除了童祥苓又没人能演杨子荣。江青为了保证电影质量，再一次放童祥苓出山。演完电影版的《智取威虎山》之后，江青指示：“养养身体，不要再上舞台演戏了，搞点技术工作。”要是看人家不爽，直接关起来就算了，何必强迫人家更换专业？

为难赵燕侠也好，强迫童祥苓转专业也好，原因雷同。江青同志要戏剧成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必须让主演走开。不管怎么讲，江青树立了样板戏，有了政治资本。有了这些资本，她就往“旗手”宝座上迈进一大步。成为旗手之后，就能对付敌人了。

江青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她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弄几个样板戏出来，修理几个演员。江青出身寒微，乱世之中一步一步走过，最终走到领袖身边，非常不容易。她是个争强好胜之人，最终目的是在舞台上呼风唤雨，随心所欲的过日子。随着时间转变，舞台逐渐发生了变化，在青岛，舞台就是话剧，混的不爽，不能随心所欲，就去了上海；在上海，舞台就是电影，混的不爽，不能随心所欲，去了延安；在延安，舞台就是毛泽东的窑洞，仍然不能随心所欲；到了北京，舞台要面向全国，日子好多了，依然还不能随心所欲。因为北京最重要的影响是政治。她要想达到、或者说接近随心所欲之境界，必须登上政治舞台，去飞舞长袖。

她的最大资本就是丈夫毛泽东。毛泽东和江青法理上是夫妻关系。但毛泽东那样的男人有很多种身份，军事家、政治家、作家、诗人。任何一种身份都要浪费很多时间。开会、写稿子、和相关人士探讨诗词歌赋等等，而他本人又是个读书狂，真正和江青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延安还好点。到北京之后，江青相见毛泽东都要提前通报秘史。从一个女人的角度讲，这对江青非常不公平，对于女人而言，家庭往往是第一位的。对于江青而言，家庭中失去的，只能在事业上弥补。而当时恰好是大饥荒之后那个不正常的世界，政治运动反复不停，给了江青登上舞台的机会。

随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越来越大，毛泽东拿下刘少奇的决心越来越大，江青一步一步登上政治舞台。尽管如此，江青登台并不容易。她首先需要跨过一个人。如果不是政治涡流极端汹涌，如果不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不可调和，如果不是那个人一直坚定不移站在刘少奇身边，那个人是江青无论如何无法跨越的。他是谁呢，就是赫赫有名的彭真同志。

彭真，江青必须跨过的对手。

江青和彭真本来是八竿子够不到的。两人基本没交集，甚至不是一代人。当江青跟随妈妈一起讨生活时，彭真已经在五四影响下“爱国”去了。当江青在上海想当演员而不得、因为感情纠葛闹得满城风雨时，彭真正因为爱国而坐牢。当江青在延安毛泽东窑洞中，小妇人一样对着往来者微笑时，彭真就时常在毛泽东窑洞里进出。估计二人也没想到，若干年之后，二人会成为死敌。命运就如此诡异，原本互不相干的彭真和江青，在命运的安排下，以文化的名义，在政治风波中较量一番。

**历史上的彭真**

中共历史上，有几个人在第一代领导人中也是重要人物，建立功勋，参加过斗争，写过检讨。真正发挥能量，则是第二代领导的时候。除了邓小平之外，还有几个，比如陈云，比如彭真。陈云帮助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彭真则在法制建设上建立不朽的功绩。

现在回过头看文革之前的历史，总是非常惊讶于那个时代的政治运动。我们不明白，那个时代怎么会有那么多政治运动。运动怎么会一次比一次猛烈。要分析原因并不困难，最直白的说，就是缺少法律规范。

数千年以来，中国都是靠人治立于世间。翻开历史一看，全部都是圣人、贤人、明君、清官、忠臣、孝子等等。从上古时代的圣人，到中古时代明君，通篇都是道德如何如何高尚。谁都不能说道德不好，谁都不能说有得之人不好，问题是，道德是无法延续的。一个帝王非常贤德，并不能保证帝王的儿子非常贤德。所以整部历史就那么啰嗦一通，到头来还是人治、人治、人治……

中国人第二次智力爆炸的春秋时代，诞生了国人至今引以为豪的百家诸子。诸子之中，儒家讲自省自律、道家追求营造自身精神世界、墨家讲自我牺牲、法家讲法规建设。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条条框框。那些条文对领导过于纵容，对普通人又过于苛刻。然而即使是法家，涉及整个法制世界时，依然同意有个人（国王）高高在上，凌家于法律之上。秦始皇试图法家建国，遗憾的是用刑过于严厉，最终失败。继承者胡亥简直就是法律的畸形儿。

秦始皇之后，中国强势过，分裂过，欺负过别人，也被别人欺负过。然而有一种情况没有变，那就是——用人治理国家。人亡政息，王安石刚刚让位，他的改革就没了。张居正累到吐血，人走镂空，啥也没有。明孝宗朱佑樘拼了老命积攒人品，让明朝中兴，他的儿子朱厚照很快就让一切付之东流。这就是人治的缺点。

回顾中国的光辉历史，可以说法制是一个难以治愈的痛。欧洲能够复兴，得意于罗马法系的哺育。美国能够快速建立一个民主法制国家，得益于欧洲法制熏陶。而中国，一切都得重来。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打天下那会，没信思搞法制建设。好不容易熬到抗美援朝结束，熬到第一届全国人民大会召开，颁布第一部宪法和其它一些基本条文。

大家不禁要问，为啥不多弄一些法律出来？写法律条文不是包饺子，随便摆弄出来就可以了。要知道，法律是为了现实服务的。那些现实问题需要法律规则约束，需要实践过程的。也就是说，除了一些基本原则东西需要保证（宪法），其它法律法规需要一步步完善。

遗憾的是，之后经济建设出现大问题，导致大饥荒到来。因为大饥荒，又导致一系列政治运动，把原本就脆弱的法律基础砸个稀烂。大饥荒那么大的问题，表示之前法律措施有巨大的漏洞。既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以解决，那就这有政治运动了。

等到文革结束那会，虽然有一些法律法规，基本上等于零，一片空白。这个时候，彭真复出，主管政法系统，对法制建设做出卓越的贡献。彭真刚复出那会，就负责两个大案子，就是江青案和林彪案。这两个案子大概是文革之后最大的两个案子了。然而当时遇到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没有法律依据。人抓了，要审判，却没有法律！

怎么办？那就制定法律呗。历史给了彭真一个书写历史的机会。在彭真的主持下，很快起草了《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七部法律，不仅仅解决了两案审理问题，同时解决了到目前为止，大家打官司的问题。

彭真最大贡献，就是主持制定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就是一九八二年的宪法，也是迄今为止仍然具有法律效力、而且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一部法典。新中国历史上一共有过四部宪法，第一部宪法中的理念精神被打断了。七五年诞生的第二部宪法，文革味道过于浓厚。七八年诞生的第三部宪法又过于简单。第四部宪法是以第一部宪法为基础修改的，承传的还是新中国刚建立时的那种精神。

——主管司法的彭真永垂不朽。

按照事业线划分，彭真的事业线是两头高，中间低。中间低谷，就是文革那一会被打翻在地。被打翻在地那会，很大程度上是拜江青所赐。

**彭真**

彭真，山西人，生于一九零二年。

籍贯，农民。性格，坚韧。

和那个时代大多数革命者一样，彭真年幼家贫，小小年纪就得下地干活，果断反抗过恶霸地主的欺压。接受教育很晚，直到十二岁才有机会念点私塾，子曰诗云到十七岁，刚刚进入小学就遇到五四运动。十七岁的小学生彭真，就带着大伙宣传爱国思想。到了二十岁那年才进入中学。但有志不在学历高。中学生彭真想的不是日后就业问题，而是探索救国救民。就在那时，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成了马克思的忠实粉丝。

一九二三年，二十一岁的彭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参与创建了陕西省共产党组织。

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共产党开始搞文斗，即领导工人运动。工运过程中，彭真并不十分耀眼，但也是有声有色。大革命失败之后，彭真落入白区。白区工作，凶险异常。因为不仅仅有国民党当局要抓人，还会有叛徒出卖。如果被当局抓了，也就认了。被叛徒出卖，那绝对是双重打击。很不幸，彭真就是被叛徒给出卖了。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三号，二十七岁的彭真在天津被捕入狱，随后的六年里，彭真在天津和北平的监狱里辗转反侧。坐牢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性格坚韧的彭真硬是坐牢做出好来了。

从彭真经历来看，丝毫看不出特别之处，终日奔波，甚至连读书的时间都很少。那么他的那些理论知识、政法思想哪里来的？答曰，监狱里。

入狱之后，彭真没有去悲伤哭泣，而是组成党支部，提要求，搞斗争。身为政治犯，随时都有可能当烈士。然而彭真他们不去当考虑烈士问题，而是在没有成为烈士的时候努力自我完善。无论到哪里，彭真都对狱方提要求：要看书，要看报。毕竟嘛，政治犯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一日三餐之后就是文字最重要了。狱方不同意，他们就闹别扭，比方说绝食啊啥的。经过一番试探、交流、斗争，狱方点头：别闹了，答应。

当时北平那一带归张学良管。张学良相对开明一些：政治犯都喜欢闹事吗，关于闹事的书，比方说《水浒》、《三国演义》等书是禁书，绝对不可以看的，马克思主义这类的“洋书”没关系，可以看。对彭真而言，可谓天赐良机，有吃有住有时间有书看，再不研究理论等待何时。六年之后，彭真的理论造诣飞速上升。

如果拍成电影，镜头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因为理想蹲了监狱，在监狱中为了理想而无视死亡，抓住机会进行自我完善，那是相当励志啊。

——咱们那些“金牌”导演都干啥去了呢？你说！

抗日战争前夕，彭真在刘少奇的斡旋下出狱，随后成为刘少奇主要助手之一。彭真和刘少奇关系处境类似，经历类似，因此思考方式接近。但是在每一个阶段，刘少奇地位都要高于彭真一筹，从年龄到党龄到白区工作成绩到党内地位，刘少奇都是彭真的领导。但彭真用自己的才华帮助刘少奇不少。彭真也是刘少奇最为信任的人。刘少奇理论水平一流，彭真也不错。在刘少奇写《共产党人的修养》那本书时，彭真也写了一份纲领，在那份纲领里明确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要让马列主义中国化”。这个观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当时正在延安整风的前夜，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

原滋原味的马列主义，意味着王明和国际派继续占领理论制高点。

让马列主义中国化，意味着以毛泽东为首的本土派翻身当老大。

彭真一直在中国，闹革命蹲监狱都在中国，可以说是一边行走在刀刃上一边吸取理论思想，没有接受过纯粹的理论训练。因此他支持本土派是必然的。正因如此，延安整风时代，优秀的本土派理论家彭真同志大出风头，同时得罪了不少人。这正是日后彭真反复不停给人家“赔不是”的原因。

彭真是不完美的。他的缺点就是，虽然生在战争年代，但战争经验不足。

重庆谈判那会，暗地里抢夺东北。毛泽东和周恩来去重庆，刘少奇留守延安。当时东北一把手就是彭真。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彭真暴露了自身的缺陷——不是一个伟大的统帅。确切的说不能说彭真有缺陷，只能说当时东北局势而言，对统帅的军事素养要求的太高了。而彭真虽然生在乱世，很少战场考验。当红军将士在井冈山和长征途中百炼成钢时，彭真在坐牢，修炼马克思理论，错过了磨练战争技艺的最佳时机。凡是经过井冈山和长征的人，即使搞政工或参谋，战争本领都不低，比方说聂荣臻、比方说罗荣桓、比方说叶剑英、比方说邓小平都是久经考验。

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战场能人都在前线和鬼子周旋，而彭真在后方的中央党校工作。所以东北一把手彭真，并没有应付战争的经验。当时东北，表面上两党还在谈啊谈，实际上已经子弹上膛了。某种意义上讲，东北局势转变，就是由彭真让位林彪开始的。没有办法，林彪的特长就是打仗。而战场上的彭真并不高明，至少和林彪差很远，他的特点还没有充分发挥。他的特点是整合战争资源。

那么在整个战争期间，别人在打仗，彭真在干嘛呢？建设。

战争本是一场破坏，最大限度去打去砸。不打不砸就没法消灭敌人。打砸的同时需要成本，也就是所谓的资源。共产党那会控制的资源有限，但是在战场上却是纵横捭阖、应对自如。所以如此，只因为后方搞得好。后方哪些工作呢？就是土地改革、党政建设、金融建设。这些工作可是后勤保障啊。根据地别的没有，只有土地资源。土地政策搞不好，一切白搭。根据地物质不多。正因为物质不多，分配不好就会出乱子。想当年刘邦和朱元璋赢得天下分封功臣之时，分别取了搞后勤的萧何和李善长为第一，虽有抑武扬文考虑，却也表明后勤工作者的重要性。至于党政建设，那是未来国家政权的雏形。

所以在第二代搞改革开放时，彭真和陈云发挥重要作用是有历史渊源的。其实在建国之初，第一代领导集体时，他们也有过发挥空间，只是当时毛泽东刘少奇等重量级人物还在，彭真陈云等人的角色只是从旁协助，发挥空间小一点而已。

建国之初，彭真干过这些工作：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如果说这些头衔比较虚，那么好吧，他长期担任北京市委书记，且坚韧北京市市长。主政北京那会，彭真干了很多事，城市规划问题，比方说设计天安门广场什么的。那么彭真怎么就和热衷于当文化旗手的江青联系到一块了？答曰，宿命。

由于彭真要管北京那一块，需要干很多事。干事情，首先需要知识和人才。新中国非常缺乏知识和人才，需要自己培养。要培养人才就要造势。所以身为中央委员兼北京市首席公务员的彭真就要到高校去演讲鼓劲：同学们你们要好好干，祖国和人民需要你们，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为人民服务等等。这样一来二去，长此以往，彭真在科技界、文化界就很吃香。然而当时政治风波时不时来一阵。一阵政治风浪，就有人成为右派。文化界历来都是右派生产基地。一旦被打成右派，要么失去工作机会，要么就夹着尾巴胆战心惊中工作。这样一来，人才和知识分子就会减少、就会影响建设。没了人才和知识分子，彭真的工作也不好干。所以他就想把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区别开。

所以当江青试图搞文化运动时，彭真坚决反对。某种意义上讲，这不是江青和彭真的矛盾，而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只不过是通过彭真和江青表现出来而已。

在大饥荒总结大会，七千人大会之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蓬勃兴起，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等到一九六四年，二人矛盾已经大大扩张。那一年五六月份，毛泽东提议中央设立一个小组，代表中央管理文化界，负责领导文化方面的工作。找谁挂帅（负责）呢？很明显应该是彭真。因为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汇集各种人才。而彭真是北京第一公务员，对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非常熟悉。而且彭真是政治局的，级别也够。

好吧那就彭真为主帅了。有了主帅还要有副帅。副帅为陆定一，他是宣传部长，合适。再加上老狐狸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一共五个人。就是鼎鼎大名的中央文革小组前身，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类属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其他人是组员。五个人中，康生能揣摩毛泽东的意思，铁定唯毛泽东之意行事。彭真和陆定一倾向赞同刘少奇的主张。

这个机构一成立，命运就把彭真和江青联系在一起。江青大搞特高的样板戏，理论上也属于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管。

在小组没有成立之前，江青就和彭真杠上了，江青找人批判廖沫沙时已经杠上了。廖沫沙和吴晗一样，北京市委的人。主管市委的彭真认为不应该批判。因为彭真是北京地区的负责人，那个物质、技术、人才均匮乏的时代，江青想干点啥必须要彭真帮忙。江青搞样板戏，就离不开彭真。因为京剧那一块需要北京市委协调。

江青的主要战功之一，沪剧《芦荡火种》改编的《沙家浜》就是从北京市委，或者说彭真手上夺去的。《芦荡火种》原本改编为《地下联络员》的，都排练差不多了。正式上演前夕，江青来看了彩排，回去打电话给彭真，说这出戏排的怎样、怎样不行，不许上演。当时，预售票已经售出三场。毕竟是第一妇人，彭真决定给个面子，就把几个主要演员找到家里开会，说服他们给观众退票道歉。

然而江青的真正目的不是要点面子，是要把这个戏给抓到手。江青要去北京蹲点，把北京京剧团作为她搞京剧改革的“试验田”，又从上海沪剧团调到北京来给北京作观摩演出，还要北京市文化局给安排。这个太霸道了。要知道江青当时的身份虽然是第一妇人，但也仅仅是第一妇人而已。法理上讲，第一妇人受人尊重，当并没有法律力量。她这样把京剧团抓到手，相当于从彭真手里夺资源。

彭真不高兴，也没辙，再次让一步，就让北京市文化局给安排两场演示演示。两场太少了，填不了江青的胃口。江青认为很没面子。女人认为没面子的时候，后果往往很吵闹，特别是有权有势的女人。江青就到处吵，和演员吵（演员没有招惹她），和文化局吵，最后吵到彭真家里。据当事人张道一回忆：江青激言厉色、嗓门很大地嚷：“彭真，我告诉你！你北京市不给我安排，我让剧团到中南海去演，我请毛主席来看！”彭真很不高兴，说：“我让他们研究一下。”江青说：“就你们北京难办事！”江青走时彭真没送，对我说：“道一同志，你帮我送送。”我出门送她上车，她头也不回，看也不看我一眼。我当时觉得：江青真是盛气凌人，蛮不讲理，形同泼妇。

很明显，她再一次取得胜利。照例，取得胜利的江青需要进一步扩大战，再一次提出要求：一，把工人俱乐部作为江青的专用的剧场，禁止一切别的演出；二，为了把“试验田”搞好，江青指名把北京几个京剧团的尖子演员都调去搞“试验田”。那些演员还有其它戏在身，抽走后别的戏就没法演了。这一举动遭到演员、剧组、文化局的一致抗议。江青再一次去彭真家，找彭真吵架。彭真已经被逼到墙角，没有退路了。只好把江青给顶回去。江青没辙，只好气呼呼走了。抛开背景不谈，凭实力，不论是谋略还是手段，没有经过大阵仗的江青和久经考验的彭真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凭职位，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江青啥都不是。如果她不是毛泽东的妇人，和彭真讲话的资格都没有。毛泽东如果不是想要发动更高一级的政治运动，也不会把江青放出来败坏人品。

如果仅仅是和彭真交手也就算了。彭真大不了憋屈一点也就过去了。大风大浪都过了，忍一时风平浪静的度量彭真还是有的。然而江青的举动让很多人不爽。在京剧演员看来，把沪剧团调到北京给京剧团做示范，简直就是胡闹嘛。要知道剧种和军队不一样，调八路军给新四军做示范，或者反过来都有助于提高战斗力。两个剧种根本就是两种风格，两个体系，硬要融为一体，只能是四不像。演员肯定有情绪。再加上江青管太多，怨言是难免的。因为彭真负责时只管政治和组织，艺术上属于剧团自留地，归导演和演员自己协商。而江青要插手艺术，让艺术家们情何以堪？前面提到过的赵燕侠毛衣事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江青修理演员们，还有一个意图，就是要给彭真难看。因为他们之前都是在彭真的领导下工作。

江青为啥这么干呢？她就是要打破传统方程式，干点不一样的，主张将传统戏一律作为封建糟粕打倒在地。江青能搞出这些名堂，倒不是因为她本人有多么高明，对艺术见解多么深刻。就艺术方面而言，江青是一个合格的话剧演员，仅此而已。让她对艺术理论给出贡献，那绝对是难为她。说到底，她就是一个小学毕业生，小学毕业后的精力并没用在艺术追求上，也没有时间和心思去最求艺术。她的主张，实际上是把长期以来在毛泽东身边学到的政治斗争方式生搬硬套到艺术上而已。

对于江青在艺术上的高论，彭真当然不赞同，明确表示：“京戏姓京，不要改得四不像。”江青觉得很受伤。不仅如此，北京市委开始对她进行冷处理。市委书记彭真不理她。市委副书记刘仁不理她。一开始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全程陪第一妇人看戏。本来这是一个拉关系的好机会。但邓拓本人是个艺术家，并非善于搞逢迎拍马屁之人，看不惯江青那种气高止扬的作风，就“头疼”了，不陪了。江青表示感到很惆怅。

好吧，此处不留人，只有留人处。北京市委，你们等着。

江青去了上海。上海有一尊大神在等着她。

**第七章 思想家和棍子**

**一尊大神**

柯庆施，安徽人，生于一九零二年，和彭真同年。

职业：政治家。性格：沉稳有余。

绰号：毛泽东的好学生。

早年满腔热血，投入爱国斗争，学业中断，继续爱国，受到老一辈的赞赏，得到继续求学机会。一九二二年，年仅二十岁的柯庆施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党内老资格之一。柯庆施去苏联进修，和伟大的列宁握过手，倾听过他的列宁的教诲。正因如此，党内尊称为“柯老”。毛泽东就一直这么称呼他。

如果按照当年情况，柯庆施应该是国际派的。事实上他确实和王明关系不错。延安整风那会，国际派完蛋，柯庆施也跟着遭殃。柯庆施所以遭殃，是因为他没有揭露王明。他本是最有资格揭露王明的人之一。柯庆施因此成了康生盘子里的菜，老婆被逼投井。毛泽东出手相救，终于幸免于难。有感于毛泽东的救命之恩，此后以毛泽东的学生自居。

建国之后，柯庆施从南京市委书记到江苏省委书记，再到上海老大

华东本是饶漱石的天下。可惜饶漱石打错了算盘，身败名裂。此后陈毅短暂主持过华东一段时间。一九五四年，柯庆施从江苏调往上海，接替陈毅的工作。此后十年，柯庆施坐镇上海，为全国最重要的封疆大吏之一。

这位封疆大吏成了毛泽东最为忠实的追随者，开始对毛泽东进行吹捧曰：相信毛主席到迷信程度。此时林彪和康生还没有鼓吹个人崇拜。正因如此，柯庆施成为大跃进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拿着柯庆施的文章当面对反冒进的周恩来说：“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周恩来检讨。柯庆施也成了一时风云人物。大会结束后，大跃进的弄潮儿们，如李井泉、柯庆施成为政治局委员。街坊间甚至传闻：柯庆施将取代周恩来当总理。

新中国建立之后，有两个人运气最好。一个是当年主政东北的高岗，借日本人留下的工业基础和苏联人的援助，把东北搞得有声有色，以至于毛泽东让高岗进京和刘少奇与周恩来三足鼎立。另一个就是主政上海的柯庆施了。

大跃进的恶果席卷全国。柯庆施却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他的地盘是上海，属于全国需要重点照顾的地区。全国人民闹饥荒，还要咬牙往京沪地区调粮。如果不是调粮太多，四川饥荒也不会那么严重。所以尽管全国都在饥荒死人，北京和上海基本上没有饥荒死人。

这就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和伤害闹得最凶的根本原因。文革本质上是对大饥荒的清算。其它地方的官吏的心中都有阴影，都有那种来自大饥荒的罪恶感，北京和伤害没有。他们的主政者没有心理上的负担，可以肆无忌惮的争吵，瞎闹。尽管他们的安稳是建立在其它地方的饥荒之上。

可以说坐镇上海的柯庆施非常走运。庐山会议上张牙舞爪的李井泉等人大饥荒之后，到了七千人大会上已经灰溜溜、灰溜溜的；同样张牙舞爪的柯庆施在大饥荒之后依然得意洋洋。因为他的位置好，没有捅娄子。而且在大饥荒之中，上海的工业还有所发展。

七千人大会上，下至县委书记，上至周恩来、刘少奇、甚至毛泽东都在自我检讨的时候，柯庆施就不需要。真是太走运了。正因如此，柯庆施在上海地位越来越稳固。

和北京的彭真不一样，盘踞上海的柯庆施是紧紧跟着毛泽东的。所以等到江青去上海时，好吃好喝好玩不说，柯庆施贵为上海一把手，亲自陪同，要让给人，要资源给资源。

江青和柯庆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抗战初期，那时江青刚刚到延安，还没有成为毛泽东妇人，正千方百计恢复组织关系之后进入中央党校；那时柯庆施还没有成为毛泽东的学生，只是在中央党校内任职，算江青老师；那时候延安整风还没有开始，他们关系并不深。

从个人恩怨上讲，柯庆施最大的仇人是康生，但是柯庆施生前没有找到报复康生的机会。从个人感情上讲，如果有机会的话，很希望看见柯庆施报复康生的样子。同时柯庆施对对延安整风比较风光的刘少奇和彭真则怨恨颇深，而且得到了报复彭真和刘少奇的机会。所以当江青到上海搬兵，柯庆施心中乐开了花。

好吧彭真，你们北京不要的人，我们上海供着。

**礼物**

一九三七年，江青离开上海时心情很是不爽。唐纳自杀闹得满城风雨，使得她的人气跌倒低谷，加上中日战争爆发，明星梦碎，可以说灰溜溜的离开。而且一别就是十几年。人虽然离开了，心还在。和所有爱折腾的女人一样，她一直喜欢大上海的热闹和繁华。麦克阿瑟离开菲律宾时曾经豪情满怀：我会回来的。如果能预知未来，估计江青也会来这么一句。因为她确实回来了。

离开时，步履匆匆；归来时，风风光光。离开时，整个上海滩，没人愿意给她一个角色圆梦；归来时，所有角色都要仰望于她。那些曾经排挤过她的人，那些曾经鄙视过她的人，那些对她视而不见的人，你们都颤抖吧，你们将付出代价。

其实解放之后，江青回过上海。但那时她主要是治病，相对低调。六十年代，江青身份不同了，一次次往返在北京上海之间，行踪却极为隐蔽，仿佛身负特殊使命。并且有一个特殊的代号，叫女客人。隐蔽和低调不同。低调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没人鸟你，不低调也不行啊。隐蔽就不同了，虽然行踪不外泄，依然可以风光无限，可以高高在上。

江青隐居在上海时，就住在锦江饭店里。锦江饭店是当时上海最好的宾馆之一，内设总统套房，曾经下榻过上百个国家元首。二十多年之前，在上海滩小有名气的蓝萍也只能住公寓。现在她可以在锦江饭店常住，步行数百公尺就到淮海路。马路对面就是锦江俱乐部，内有弹子房、滚球房、阅览室、文娱室、温水游泳池、舞池、网球场，还有一个大花园，是权贵之人放松、休闲、娱乐、养生的好去处。江青对此很满意。

在锦江饭店内部，不仅仅设施周到，还有事业可干。江青的事业是要登上政治舞台。要想在政治舞台上长袖起舞，途径只有两条，一是太高自己，二是打击别人。所谓太高自己，就是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所谓打击别人，就是批判揭发。学到一些政治手腕的江青也遵循着两条路：通过样板戏捞取政治资本，抬高自己，这个前面已经解释过了；接下来就是要打击别人了，就要写批判文章。

以江青是身份，如果捞点政治资本，没有问题，毕竟大家不看僧面看佛面，面子还是要给的。比方说搞样板戏，彭真虽然不爽，也是一让再让。但是搞批判就不同了，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搞批判相当于砸人家的饭碗。不管你是谁，砸人家的饭碗人家就要跟你急。而且以江青的地位和性情，她要砸的还不是一个人的饭碗，还是很多人的饭碗，那很多人都不是平头老百姓，都是有靠山、有名气、甚至有权势之人；而且他们不是孤立的，彼此盘根错节。一不小心就砸出乱子来。当江青想在北京砸人家饭碗时，就被硬生生给顶了，很没面子。为了能做到精确打击，背后必须有人支持，必须精心策划、保密行动、突然袭击。

背后支持江青同志的，当然就是盘踞在上海的柯庆施同志。当江青需要沪剧团进京，给。当江青需要批判文章的行家，给。柯庆施给了江青很多礼物。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礼物是一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张春桥同志。

张春桥是什么人呢？按照历史定位，他是四人帮主要成员，政治犯。也就是说干了很多坏事，坑了很多人，事实上这个评价基本靠谱。

许多人又根据这个评价认为张春桥同志乃十恶不赦之人。

然而事情并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干坏事和坏人之间不见得就是等号。因为时事会转变，好事可能转变成坏事，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比方说现在看起来腐朽不堪的八股文，当年看起来绝对是好事。比方说现在被否定的大跃进和文革，当年可是一致肯定的。即使内心不赞同，也举手表决了。即使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赞同发动文化大革命。

张春桥是一样，抛开那些事的政治立场不谈，就会发现，其实他并非恶人。

张春桥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一个立场坚定之人。如果把前面加上一个修饰，那就是书生，或者理论家。张春桥是一个立场坚定的书生或者理论家。甚至可以说，张春桥是位思想家。日后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张春桥一言不发，全程沉默相对。因为他明白，说或不说，结果都是一样的。他忠于左派的理念。

张春桥并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中的一员。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就有一帮书生或者说理论家。他们看起来都是干干净净，斯斯文文，带着一副小眼睛，透过这层表皮就会发现他们非常此热血、坚定。骨子里都是一根筋，认为真理在手，倔。

他们的行事风格：左青龙右白虎真理在心间。认准的事一股脑走到黑。远的一点，像搞变法的戊戌六君子啊，明知断头流血还要断头流血。这倒不是对他们否定。而是对自己选择的负责。近的一点，如早起共产党人，明知革命是断头流血的事情，还要去搞，就是因为他们认定自己真理在手。那时候中国虽然贫穷落后，像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并不缺吃少穿。他们还是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只因为他们认定真理在手。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立场坚定的知识分子，陈独秀如此，瞿秋白如此，张闻天也是如此，他们都是一个类型的人，不管是左倾还是右倾，首先是立场坚定的书生。由于生存环境艰难，共产党内左倾事件远远多于右倾事件。比方说历次肃反，比方说历次整风事件，都有一帮立场坚定的书生。比方说清华高材生朱理治同志，去了陕北之后，凭借听说和感觉，就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抓起来，等候处决。

把历次左倾事件连起来，连成一条线：肃反→整风→大跃进→文革。

整个这条线就能发现，这一连串左倾事件中，理论鼓吹者都是书生或者说理论家。苏区肃反时代，主要理论者是国际派，代表人物王明身边的那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清一色的由中国出口苏联再传内销的，比方说那位姓夏的那位。延安整风，主义理论鼓吹者变成国际派演变成的本土派，代表人物刘少奇、彭真等人。等到大跃进的时候，那就多了，其中张春桥的伯乐，柯庆施就是其中一个。这一次，轮到张春桥出场。张春桥继承了左派光辉传统，去斗争、去批判、去取代之前的左派、如今的保守派们。

张春桥，左派承传者。

在这一条直线之内还有这样一个规律：历次运动中的左派，过一段时间就会变成保守派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比方说早期的国际派之后就成了保守派。新兴的左派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变成右派，比方说刘少奇和彭真，从当年积极进取的左派变得更为理性成熟。他们又要面对新兴的左派，那就是以江青和张春桥等人为代表的文革派。这个规律也符合兴衰代谢。但是如此从左到右的转变，左派取代右派的方式是斗争，毕竟是不正常的。

**简历**

张春桥，男，一九一七年生于山东巨野，六十四年后被判死缓，八十八年后死于癌症。他曾是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上海市第一书记这些世人难以企及的达官贵人，同时也曾是反革命集团首领、死刑犯这些世人难以企及的反面人物。可以说张春桥是建国之后最为复杂的人物之一。

职业：政治家，理论家，或者说思想家也可以。为了全面起见，应该再加两家：文学家和书法家。由此可以看出，张春桥是一个多才的人。当一个有才之人迈入才能之外的领域时，通常就会产生另外一个现象。比方说康生同志。论才能，在那个年代，罕有堪与匹敌者。然而看一个人，除了看他的成功和失败之外，还应该深入到他的性格中间，从性格之中理顺其兴衰纹路，考察人生之得失。

正因如此，张春桥和康生是不同的：张春桥有原则和节操，康生无原则、无节操。

性格：精明坚定。

这是一组矛盾的性格。一般而言，精明之人很难坚定，如同康生同志，整了那么多人之后，经历那么多人之后，依然在生前高高在上，因为精明过了头，临死之前出卖左派，所以只能是投机倒把之辈；立场坚定之人，缺乏精明手腕，比如说国际派那帮知识分子，如瞿秋白，坦然而死，没死之前却疲惫不堪（参照《多余的话》）。张春桥则是个例外，既精明又立场坚定。现在就来看看张春桥的精明，还有他的坚定。

张春桥这个人，如果要带着颜色去看，能找到很多缺点。

首先，他的出身不好，出生在官宦之家，祖辈是地主，父亲给国民党效命。共产党内，有这种身份的人不多，有一个身份，叫做官僚买办集团。一般而言，拥有这种身份之人，在建国之后历次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是难以幸免的。比方说陆定一同志，就被抄家好几遍。要么早死，如黄敬。张春桥因为身份独特，漏掉了。

年轻时代的张春桥干过龌龊事。一九三二年到三四年，张春桥在济南念中学，据说为国民党当局干过事，也就是所谓特务，而且导致几个激进的年轻人被捕丧命。这事成了张春桥人生污点之一。但不能就此认定张春桥就是叛徒。当年国民党属于正统，到处通缉共产党。当年张春桥年龄也就十六七岁，也就是为国民党当局提供一些情报而已。指望一个十六七岁出生在官宦世家的年轻人透视未来。认识大是大非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且张春桥当时不是共产党，谈不上叛徒之说，也不能认为所谓特务。

当时的张春桥身份是富二代、管二代，是少爷，有吃有穿有玩，认为世道还不错，没必要推翻。在当时的张少爷眼中，所谓革命党、进步人士，都是破坏自己幸福生活的破坏分子，应该举报。非但如此，张春桥还伙同其他认为世道还不错的人士办了份杂志、写文章拥护当局。因为他们认为革命分子都是搞破坏。

我们现在人能理解这些问题，但是在当年确实重大污点。

后来张春桥去了上海滩，靠笔杆子混日子。日子混得不怎么样，却落下一段公案。这段公案其实也没啥。就是一个年轻作家得到文坛领袖提携出名了，另一个年轻人看着不爽，说风凉话。说风凉话不要紧，问题是匿名的。就好比现在网络世界，为了便于骂人或泼脏水，一个人穿好几个马甲。不敢以真面目发言，不论任何时候都要被鄙视的。

年轻作家是萧军。文坛领袖是鲁迅。而这个说风凉话的年轻人就是当时混得不怎么样的文人张春桥。张春桥为啥要说风凉话呢，理念不同嘛。因为当时年轻的张春桥的思想还在拥护当局。而鲁迅和萧军都是当局的破坏者。所以张春桥自然很不爽。由于当时当局口碑不怎么样，鲁迅鼎鼎大名，所以张春桥选择了懦弱的姿态——用马甲骂人。

解放之后，鲁迅地位非常之高，萧军也被认为左派作家代言人。随着政治运动兴起，鲁迅也有被神化的趋向。那么站在鲁迅对立面的、本就理屈的张春桥当然就是反面角色。又因为张春桥在政治运动中崛起，自然惹得很多人不爽。文革之后，这事也成了张春桥的污点。

什么出身啊、早期有过不当行为啊，并不致命。张春桥真正致命的弱点在他老婆身上。

张春桥的夫人叫李淑芳，生于一九一六年，大张春桥一岁。两个人的成长经历非常有意思。李淑芳和张春桥一样，李淑芳出身于富贵人家；和张春桥不一样的是，出身富贵人家的李小姐思想比较激进，参加革命很早，张少爷早年思想的倾向于当局的。因为参加革命事业，危险系数比较大，用过很多笔名，好来最有名的一个叫文静。原名李淑芳反而不怎么为人知晓，就想很少有人知道江青的原名叫李云鹤一样。等到后来张春桥由保守派转变为革命者时，文静反而脱离了组织关系。抗战时代，文静去了根据地，在那里遇见了张春桥。

一九四三年，二十六岁的张春桥在晋察冀遇见了二十七岁的文静。在国难当头、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两个人出身相似、经历相似、年龄相仿、生活品味相当的年轻人相爱了，以一见钟情的方式。这本是一件好事。

然而命运老人接下来戏弄了他们一下：鬼子进村，文静被捕。

日本人都有双重性格：菊与刀，菊的一面和刀的一面。一面礼貌文明，另一面粗暴野蛮。当时的鬼子恰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强悍也蛮的雄性群体之一。一个年轻有素养的女人沦为那帮人的俘虏，只有两个选择：被蹂躏；老实合作，有不被蹂躏的可能。

按照爱国主义剧情，文静应学习赵一曼，宁死不屈。赵一曼固然伟大，并不是每一个女人都能承受那么多磨难。文静选择和鬼子合作，也就是当了叛徒。不仅仅当了叛徒，出卖了自己的过去，而且还进入了日军“宣传班”，担任班长，宣扬大东亚共荣圈，写材料骂自家同胞，背叛自己的未来。比起这些情节，叶群和江青那点老底已经非常健康了。

然而历史再度跟文静开了一个玩笑：尽管她出卖了自己的一切，最终却什么也没得到，因为鬼子投降了，她还得留在中国土地上当中国人，还得面对那些不管有意无意毕竟辱骂过、诅咒过、出卖过的同胞。她再一次感到孤胆，只能寄希望于曾经的丈夫张春桥。此前他们虽然有过十个月的恋情，却当了两年的敌人。

在文静问题上，张春桥第一次展现出性格中的另一面，坚定。

此前的张春桥，从给国民党当局当特务到上海滩文人生涯，更多表现为精明，甚至投机取巧。在和文静结合问题上。张春桥也是相当精明的。要知道当时根据地女性极为匮乏，像文静那种有知识有修养的女人就更匮乏了。张春桥当时地位不高，能和文静恋爱，套用一句俗话，那叫前世修来的福分。然而在文静叛变之后，形势逆转了。不论任何时候，叛徒总是不受待见的，就算是美女也比臭狗屎强不了多少。如果张春桥不理会文静，没有人会责怪他薄情寡义。如果他把文静交给组织，还能混一个大义灭亲的美名。然而张春桥重新接纳了文静。为啥这么做？可以解释为贪恋女人等等。更为靠谱的解释应该是，张春桥和文静相恋的那十个月里，文静给张春桥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为了那种美好的回忆延续下去，张春桥出手搭救文静，冒着前途歇菜的风险。不仅如此，二人还在两年之后结婚了。

如果是张春桥在对待感情上是坚定的。那么接下来在处理这件事上又是精明的。他平白无故的接纳了当了国家叛徒的老婆，却没有坦白情况，促使文静忏悔，赢得国人原谅；而是试图修改简历，蒙混过关。一九四五年，张春桥帮助文静填简历时，说她的组织问题正在解决中；等到四七年，两人结婚时，把文静的被捕叛变写成被捕出逃；又过两年，全国解放，已经不再提被捕的事了。文静这事绝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当时很多人都有过被捕的经历，甚至被捕变节的经历。这也是每一次运动，总是彻查某人过去的原因。要评价过往事件的功过是非，必须考虑这些细节。那年代毕竟不像现在这样，都是中国人。因为确实有人曾经是特务、曾经变节过，出卖过国家民族之后有隐藏起来。

尽管如此，文静的事依然成了张春桥一块心病。特别是他地位越来越高时，心病越来越重。在那个道德大棒飞舞的年代，张春桥面临着事业的抉择。所以他几次三番要离婚。并不是另结新欢，实在是情势所逼。对于精明的张春桥而言，还有比感情更重要的事么。有，当然有。是什么，后面再讲。在对待老婆这事上。看出了张春桥的精明和坚定。这两种性格贯穿他的一生。

**转变**

张春桥本是富家子弟，立场倾向于国民党当局，最后怎么变成共产党左派代表人物了？还是老话体了，局势使然——日本人来了。有权有钱的公子哥，原本衣食无忧，要吃糖有糖吃、喝蜜有蜜喝，时不时对着贫困交加的同胞炫富啥的。那时候当然要力挺国民党当局。因为虽然有成千上万的国人面对困境苦苦挣扎，他张家则很幸福。因此他要力挺当局。可是日本人的凶悍不仅仅敲碎了国民党当局的根基，同时也砸碎了许多权贵之人赖以生存、引以为豪的精神支柱。

所谓权贵，也就是在现有体制下多占点社会资源，并非高人一等。

所谓权贵心中那点自豪感，也就是对多占有一点社会资源的自我陶醉。

能认识到这些的权贵生活比较低调，人品也不错；认识不到这些的，通常就比较跋扈，自以为很了不起。要认识到这些的途径有两种：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的积累，年轻人通常缺乏人生经验和生活阅历，所以各种年轻的二代才比较让人厌烦；另一种方式就是外来因素强势介入。张春桥少爷越到的就是后一种。在鬼子的强势介入下，他发现他爷爷的财富，他爹爹的权利，乃至他终于的国民党当局都是浮云，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不堪一击。

和同样出身地主的康生不一样。那时候康生家已经破落了，所以很早就去干革命。和家大业大的黄敬也不一样，黄敬是理想主义者。张春桥的转变是被逼迫的。尽管被逼迫，张春桥的转变却是彻彻底底的，不留余地的，以至于到二十一世纪都没有转回来。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年轻的张春桥发现，原来人生要靠自己。那就靠自己吧。于是在一九三七年的时候，二十岁的张春桥成了中国共产党员——一个他曾经仇视过的组织的一员。接下来去了延安。仔细观察一下就能发现，日本进攻中国那一会，不少年轻人去了延安。张公子只是其中之一，其他人还有，比方说电影明星江青，比方说知识分子叶群，都是被鬼子赶到延安的。这些人大多出生在一九一零年到二零年之间，二十岁左右，五四浪潮时还不怎么董事，又没有赶上投身革命的黄金时期，建国之后的历次运动中才开始慢慢崭露头角，文革时风生水起，在五十岁左右时成为所谓少壮派。

以知识分子身份加入共产党的张春桥一直在搞宣传工作。四九年随解放军进入上海，此后一直在上海干新闻工作。那时候比张春桥级别高、资格老的同志太多太多，他想要辉煌腾达并不容易。不容易不代表不可能。张春桥就做到了。原因有两点：个人素质和客观局势。

个人素质：长久在敌后工作，练就沉稳性格；原本知识分子出身，专研理论方面的东西就简便，加上他从事宣传工作，有时间并且需要专研理论方面的东西；长期宣传工作，练就了一套说话写文章的本领。在上海新闻界的张春桥有如此优点：性格沉稳；办事干练；说话写文章滔滔不绝，而且怨言流传、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总之是人才一个。这样的人才，自然要受领导关注。关注他的领导就是柯庆施同志。光有柯庆施的赏识还不足以一飞冲天。

客观局势：反反冒进和反右派之后，知识分子开始沉默，极左派异常活跃。上海总老大柯庆施一篇《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得到毛泽东的赏识。之后，作为柯庆施跟班马仔的张春桥也写了跟进了一篇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然而张春桥依然没有辉煌腾达，但是已经具备了条件，以柯庆施心腹的身份等待机会。

等待中，大饥荒来了。等待中，上海避过了大饥荒。等待中，张春桥命中第二个贵人出现了。一九六四年，张春桥去了锦江饭店，见到急于走上政治舞台的江青。当时的江青虽然在北京碰了一鼻子灰，但是在上海却是宝贝。当时正处于大四清阶段，正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矛盾扩大之时。一切都是不可预知的。江青无疑是一条捷径，一条潜在的捷径。

通过江青，柯庆施既可以继续当毛泽东的好学生，也可以报复刘少奇和彭真。

通过江青，张春桥也隐约看到一条走向成功的阶梯。

当江青看见张春桥时心里直患嘀咕：这人能帮忙吗？不会帮倒忙吧。

其实张春桥和江青在上海有过见面，是在山东老乡《火炬》主笔崔万秋家中。崔万秋是个很复杂的人，除了当主编，还是半吊子作家，主业则是特务。催家当时宾客很多，还包括大特务沈醉等人。那时候江青还是不得志的电影明星蓝萍，张春桥还是不怎么得志的文人狄克。二人应该没有来往。因为二人在各自行业均不怎么得志。虽是老乡，却无法彼此帮助。而且各自心比天高，当时却是命比纸薄，看不见辉煌腾达的迹象。对两个雄心勃勃之人来讲，这样的关系比较鸡肋。所以常识中——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温情画面没有出现。因为温情是普通人专属养品。野心家需要的是看得见的利益。当时的江青正想一切办法从小明星变成大明星，去崔老乡那里，不过是希望崔万秋写点文章捧一捧自己。张春桥正换马甲骂人积累人气，去崔老乡那里，不过是结交一些人，打发一点时间而已。

十八年过去，江青已经成为第一妇人，张春桥也成了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柯庆施去见江青，把张春桥也带着。目的是让张春桥作为两个人之间的沟通桥梁。柯庆施虽然把江青看得很高，毕竟是上海地区一把手，也是中央政治局的，不能扮演跟屁虫的角色；而且他很忙，很多事情要处理，很多计谋需要算计，有人需要捧、有人需要打压；再则，也是一把年纪了，经不起上楼下楼反复折腾。

一开始江青对张春桥不是很感冒。此时的江青地位非常高了。低头抬头所见都是大人物。任何人见了她都得给三分笑脸。就算把她顶出北京的彭真，见面也得客客气气的，给足面子。不是她江青有多牛，而是江青背后的那个身影过于高大。张春桥只是一个秘书。秘书不要紧，看上去斯斯文文的，戴着个小眼睛，也不像有战斗力的样子，况且对京剧也不懂。

张春桥很快用事实证明：江青同志，你错了，本人战斗力超强。

张春桥之前没有研究过戏剧，但是他充分发扬了五十年之后大学生应对考试的绝学——临时抱佛脚——搞突击。张春桥就找来一大堆京剧方面的书籍，手里拿着馒头也在看，蹲在马桶上也在看，躺在被窝里也在看。短短时间内，张春桥同志凭借其过人的精明和才华，竟然成为一个“似是而非的京剧专家”。虽然和真正的京剧专家尚有距离，但是江青同志在京剧方面的造诣也不高，二人可谓半斤八两。半路出家的张春桥已经可以帮助江青修改样板戏了。在这种旗鼓相当的交流中张春桥展示了自己真正的专业技能：写批判文章，也就是挥舞政治大棒。江青自然欣喜不已：还是柯老的人管用啊！

江青的策略就是一边搞样板戏抬高自己，另一手就是写批判文章打压对手。搞样板戏之类的游戏，还在江青专业范畴之内，勉强能胜任。而且鉴于她的身份，搞出来的东西不管质量如何，总有人高度赞扬、拼命鼓掌。写批判文章就不一样了。那是向别人挥棍子，把别人搞臭，砸人家饭碗。而且根据江青从政治舞台上搬来的那些斗争经验，还要横扫一大批。

那一大批之中，包括学富五车的正牌教授，包括兼职混过文坛的职业官僚，还包括文痞、混混、二百五等等，喷起口水来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这就远远超出江青的能力范围。而且她的身份摆在那里，也不能直接上战场。因为她代表的不仅仅是江青一个，还有伟大领袖。无论如何，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绝对不能惹上半点尘埃。

怎么办呢，需要枪手。

于是第一妇人在北京寻找枪手。然而北京是彭真地盘。江青寻枪老半天一无所获，郁闷不行。不得已，只好再次去上海请求柯老帮忙。柯庆施本来就对刘少奇和彭真恨得牙痒痒，天赐良机自然要抓住，二话不说答应下来。当然他还是不能亲自出马，就把他交给自己的心腹、有才的张春桥去办。作为伯乐，柯庆施了解手中这匹千里马的实力。他认为张春桥有实力把一切搞定。身为千里马的张春桥也知道自己可以完成任务。但是——要转折一下。

之前张春桥凡是接到柯庆施的差事，都是面如止水，心中暗喜，因为意味着伯乐的信任啊。欣喜之余则是一声不响把事情给办了，办得合情合理，让柯庆施很放心。然而这一次，张春桥依然是面如止水，心中却是冷飕飕的。多年官场经验告诉他，这一次非同小可，牵扯面太广，牵扯人太多，很多人都是树大根深，弄不好是要遭殃、可能还要掉脑袋的。虽然是一次绝佳的机会。但机会同时也是陷阱。

怎么办呢，如何能够既抓住机会有避开陷阱呢，这是个问题。

纠结郁闷之时，张春桥精明的脑袋里再次灵光闪现，何不如此这般呢？

在张春桥的头脑里进行了如下计算：写这篇文章会得罪很多人，很可能没有好果子吃；如果不写，立马就没有好果子吃。所以文章一定要写。因为写文章辉煌腾达的概率很高。如何利益最大化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文章写出来，而不是出自自己的手笔。到时候，成功了自己可以风光，失败了也有替死鬼扛着，一箭双雕。

要办到这一点，关键就在于找一个能写文章的。张春桥手下恰好有一个人能胜任，此人有一个绰号，号称棍子，即战斗力超强，动辄横扫一大片的那种。

此人姓姚，明文元，号称姚棍子。

整个过程中江青相当于业主。柯庆施相当于承包商拿下项目，又把项目交出去。张春桥的角色相当于施工单位，张春桥有找来农民工姚文元负责干活。将来出了事，从上往下推，说这是临时工干的，已经被开除了。如果干成了，张春桥可以说姚文元是我的人，功劳是我的。在这事上，张春桥可以说把精明发挥到极致。

**政客姚文元**

姚文元，生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号，死于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三号。

职业，政客、文人。

如果从文革左派中挑出一个政治家，那个人必然是张春桥。如果以张春桥作为政治家的衡量标准，那么姚文元只能算政客。即使是政客，也不纯正，还有一部分属于文人。大家都称姚文元为棍子，却很少有人承认姚文元首先是个文人。

姚文元的妻子叫金英，死在一九九六年，葬在上海。当时姚文元刚刚出狱，葬礼非常低调。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低调下葬之人就是姚文元妻子。墓碑上只有子女留下名字。墓碑背面刻有一首词，《蝶恋花》：

遥送忠魂回大地

真理真情

把我心涛寄

碑影悠悠日月里

此生永系长相忆

碧草沉沉水寂寂

漫漫辛酸

谁解其中意

不改初衷常历历

年年化作同心祭

叠词用得很棒，意境也不错，一位老人晚年丧妻、晚景凄凉、郁郁不得志的心情跃然纸上，颇有瞿秋白《多余的话》中那种寂寥。单从文学绝度看，这绝对是一首好词，放在所有“蝶恋花”词牌下都堪称优秀。若干年之后，姚文元死。死后和妻子合葬。墓地前依然只有一个墓碑。墓碑上依然只有金英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曾经大名鼎鼎的姚文元也葬在其中。这是效仿武则天立无字碑么？

常常想，如果姚文元不去写那些批判檄文，静下心来好好创作，一辈子应该收获颇丰吧。

自古才子如红颜，自古红颜多命薄。就姚文元来讲，命运待他并不薄，只是可惜了那一身才华。身为才子的王洪文是薄命的，身为政客的王洪文一点都不薄命，而是搏命。

如果说张春桥历史老底不干净，后来能够平步青云是因为自身精明和运气，姚文元更有趣了。因为他的条件比张春桥更差。后来的四人帮中，按照当时条件，政治成分最好的是王洪文，其次江青，姚文元排最后一名。

姚文元的政治成分差，主要是因为他的父亲姚篷子。

姚篷子，浙江人，生于一八九一年，卒于一九六九年。姚篷子生于书香之家，又是个作家，并和鲁迅有交往。鲁迅还写诗赠予姚篷子，表示对他很看好。那是一个国难当头的时代，也是作家的黄金时代。以姚篷子的身世和身份，自然衣食无忧。然而那个时代的左翼知识分子相当热血，爱国骂政府的本事都一流，而且还敢于实践，即加入激进的共产党。比方说郭沫若等人，还跑去参加南昌起义了。

一九二七年，三十六岁的姚篷子玩了一把激进，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入党的，如果坚持下来，前途都是不可限量。

然而事情又出现了转折，国共分裂，国民党当局四处收捕共产党员。姚篷子东躲西藏，坚持了六年，终于还是在天津被逮住了。如果此时姚篷子能坚持几年，坚持到抗战到来，国共第二次合作出狱，那么姚文元的历史也将改写。然而四十多岁的姚篷子终于没有通过考验，入狱第二年，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成为白色恐怕时代共产党脱党大军中的一员，也就是所谓的叛徒。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恶劣的档案。要知道文革时，砸碎的文官系统，理由都是叛徒啊什么的。

解放之后的姚篷子赋闲在家，常常遭受遗传了他热血和激情的儿子鄙视的眼神，但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时不时冷眼以对的儿子，他老人家的日子将会相当难过的。比方说姚蓬子原本在银行里存了一笔钱。文革开始之后，停课闹革命，姚篷子老婆到银行取款时，营业员风闻姚蓬子是叛徒，即打电话举报。按照文革中的规矩，凡牛鬼蛇神的存款一律冻结。姚篷子的叛徒经历当然也在牛鬼蛇神之列，存款被冻结了。当时姚蓬子正生病，一家人没了开销。事情闹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家办公室”。看在姚文元的面上，市里下达了姚蓬子存款解冻的“指示”，姚蓬子总算不用挨饿。有这样一个叛徒经历老爹，姚文元心中有一个大大的疙瘩。

姚文元比老爹更热血。一九四八年全国解放前夕，年仅十七岁的姚文元加入中国共产党。年轻热血的姚文元还没来得及发挥，全国已经解放了。年轻的姚文元没有经过战场上的考验，不懂得隐忍，全凭一腔热血，手里提着棍子（一支笔）横扫四方，仿佛要弥补他老爹的遗憾。在他的棍子下，什么丁玲、老舍、巴金都是浮云，一干子全部打到。这样一通乱棍，在江湖上打出了名头，赢得姚棍子之美称。

姚文元的棍子有多猛烈，他在上海写文章，不仅仅赢得张春桥的关注，甚至得到远在北京中南海内毛泽东的表扬。要知道那是五十年代中期，大家还在搞建设。现在要横扫一大批，在张春桥看来，姚文元再合适不过了。

张春桥找到姚文元就忽悠了一遍，大意也就是老弟啊，现在有一票大买卖，虽然有点风险，但成功概率非常大；成功之后咱们就成为人上人，就看老弟你了。姚文元也不是傻瓜，迅速核算了一下成本，觉得干了之后，好处多多。至于风险，自古以来就是富贵险种求嘛。如果不干的话，老爹那点破事被揭批，很可能前途玩完，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好吧，干！

——当年老爹没有一条路（跟着共产党）走走到黑，留下终生遗憾。现在机会再次降临，一定要抓住，一定要在打到右派中好好表现，争取二次革命中立功。

于是，一篇重量级文章出炉了，就是传说中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号，它在上海《文汇报》上之后，闹得天翻地覆。

这篇文章也许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一篇历史批判篇章，因为它是一条强有力的棍子。也许当初康有为横扫天下的《新学伪经考》可以与之相比。历史喜欢记载棍子。它不仅仅拉开文革的大幕，在江、张、姚传奇的一生中，也是标志性事件。

一九六五年，江青五十一岁，正在走向政治前途的前夜；张春桥四十八岁，姚文元三十四岁，都是龙门之前的鲤鱼，即将跳跃。在此之前，三个人也有一点联系，此后便站在同一辆战车上。也就是说那篇文章是一个契机，一个促成江、张、姚走到一起的契机。从此，中国政坛上新的革命派形成。

把以江青和张春桥为首的极左派称为新革命派，或许有人觉得难以理解。需要把思绪的触角延伸一下。延伸一下就会发现，凡是灾难来临之时，左派就会登上历史舞台，革命也将随之而来。

清朝末年，华夏文明面临生死考验，国家积弱不堪，各路野兽跑过来捞点好处。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应运而生。孙中山一直坚持革命路线，然而他的路子很窄，因为他没有重新整合中国，甚至没有完全整合革命党人。军阀叛变从未间断。

蒋介石用务实的手段整合了孙中山留下的烂摊子。通过一系列拉拉扯扯，打打谈谈，搞出来一个形式上完整的国家。只可惜那个国家内部矛盾重重，阶级矛盾尖锐，公务员贪污腐败，贫富差距悬殊。革命党从孙中山到蒋介石，是一个从革命到保守的过程。保守无所谓，解决民生问题搞不定，那就必然出现新的革命派。共产党成了革命派代表。加上国外势力的强势介入，蒋介石终于付出惨痛代价。

在共产党内部也是一样。早期的共产党人均依附于共产国际，口号理论喊得震天响，却解决不了中国革命现实问题。直到以毛泽东为首的本土派崛起，问题才算解决。新中国建立之后，大家努力搞建设，原本不应该再出现新的革命派了。然而灾难又来了。灾难就是大饥荒。

大饥荒催生出新的革命派。革命对象则是之前的革命派，现在的当权派。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然而新的革命派和之前革命派的命运注定不一样。因为当年孙中山面临的是腐朽不堪的清帝国，毛泽东面对的国民党当局已经腐败到骨头里。另外他们都有新的思想。新革命派不一样，没有新思想不说，干工作的能力跟他们要打到的对手差很远。江青不过是依附在毛泽东那颗大树上的蚍蜉。至于张春桥，让他当总理能干出什么名堂？所以说，新革命派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没前途。没有前途的革命派，能给历史留下的，只有破坏。

不仅仅在中国，整个历史一样，极左派总会伴随灾难诞生。所谓极左派，说白了就是更为激进一点。如果不是现实世界有问题，这派人不会有太大市场。因为人嘛，如果日子还能过，宁愿吃过饭去打打牌、爬爬山、遛狗、逛街、约会等等，也不愿意去大喊大叫、喊打喊杀。那样很伤精神的。

现在以江青张春桥为首的极左派借助毛泽东对现实的不满登上历史的舞台，并试图成为舞台上的主演。序幕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几个人包着这样一篇檄文走上政治舞台。这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根粗大的棍子，又粗又大。

**第八章 棍子是如何炼成的**

俗话说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森林众多，棍子众多。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情形也差不多，也是森林覆盖，棍子众多。这些精神上的棍子质量和持有者脑袋挂钩，杀伤力和持有者脑细胞活跃程度、性格坚韧度成正比的，分为很多层次的。要想在精神上拥有一根通杀四方的棍子，很不容易的。有多么不容易呢，看一看就知道。

精神棍子，是从精神上攻击别人的。从质量上讲，最低档次的棍子就是泼妇骂街，家里丢了一只鸡或者说家庭生活不和谐，到处乱骂，用高音喇叭一般的声音配上污浊的词汇，活脱脱一个精神上的茅坑，臭味足以散发数百米。这种档次的精神攻击，虽然对环境污染相当严重，然而破坏力不大。一段时间之后便烟消云散，涛声依旧。

档次搞一点的，叫文痞。什么叫文痞呢，这些人是写文字的，确实在精神上和泼妇心有灵犀，写不出高水平的东西，只能把那些恶毒的言辞转化为肮脏的文字，高高兴兴的到处乱贴，用以彰显自身高明，借此寻找存在感。心中只有白开水的，直接叫骂。心中有几滴墨水的，写一点露骨下流的讽刺。这种人虽然可恨，也有可爱的一面，那就是当他们的矛头偶尔正确的对准某位贪官或者奸商的时候，那是相当的可爱。只是这种时间很少。

文痞也是分档次的。如果心中墨水多一点，那就是一个高级文痞。文痞所以是文痞，原因在于虽然有知识但缺乏独立的人格，有见识却缺乏品味。

所以说文痞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谩骂，另一个就是拍马屁。

所谓高级文痞就是马屁精。

所谓马屁精，就是那种并不表达自己观点，唯领导意念适从。既可以通过轻描淡写的方式把领导描述为幽谷里的百合，也可以浓墨重彩，把领导写成怒放的玫瑰。在需要展示平和形象时，领导犹如从诺亚方舟里飞出来的和平鸽；需要力量时，领导就是高飞的雄鹰，而不管领导本质是不是一只绵羊。一旦领导倒台，如果需要他们又可以把曾经的领导变成过街老鼠，或者说一只可恶的蟑螂。

换句话说，高级文痞总是把目光锁定在权位上。能看穿这一点的领导，要么就干点实实在在的事，留个好名声；实在能力有限，在位时会选择低调一点。而很多领导不一定能看出这一点，以为自己真的玉树临风英勇无敌，以为骄横一点腐败一点也无损自己光辉形象。等到明白时已经晚了。所以说马屁也是一种棍子，打断了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打出了群众队领导的不满，打出了领导走向覆灭的通道。

比文痞更高端的棍子则是另外一种，以意识形态为准绳。张春桥和姚文元就是如此。

从一种意识形态出发，全面扫荡其它形式的东西。由于长期宣传关系，后人往往认为张春桥和姚文元是那种墙头草，完全是误解。那样也太小看使用他们的毛泽东了。毛泽东看人，很少走眼。从二人简历看，张春桥是日本人进攻中国那会加入共产党的。姚文元则是在全国解放时入党的。张春桥通过战争考验，而姚文元可以算新中国第一代热血年轻人，一贯写批判文章的。二人所以称为棍子，只因为社会大潮转变。

要弄清楚《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要先弄清楚《海瑞罢官》是咋回事。事情还得从海瑞说起，海瑞是一个奇人。奇在哪里呢，就奇在为了遵循所谓道德和法律操守上。这些要从海瑞生活的时代来看：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发达，GP什么的全球第一；对外战事不断，辽东塞外的蒙古人不消停，对日战争更是从浙江福建一带延伸到朝鲜半岛。这些都是所谓的高光事件。与之对应的则是明帝国腐败遍地，无官不贪；奸商云集，贫富差距悬殊，而且官商勾结，掌控社会财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拜朱元璋所赐，明朝公务员薪水待遇极低，但是极低的薪水却是家有豪宅，出门有轿子，还能取好几个小老婆。闭着眼都知道明朝贪腐是一大奇观。就像现代某些官僚，工资连水电费都不够，却开豪车住豪宅，把后代送到欧美进修，不用调查也知道那些钱都是哪来的。在那个都贪都奸的时代，海瑞同志偏偏要遵纪守法——不拉关系，不走后门，不拍上司的马屁。就是凭借两百年前朱元璋规定的那些死工资过日子。面对物价飞涨，海瑞只能吃青菜豆腐啥的，只有逢年过节或者老母亲过生日才吃点肉，过着清教徒一样的生活，活脱脱廉臣楷模啊。

海瑞一辈子干过最有名的事就是骂皇帝，说精明多疑想成神的嘉靖不务正业、性生活不和谐等等。惹得嘉庆出离愤怒，愤怒到要让海瑞活着，生不如死的活着。好在海瑞命够硬，嘉庆死了，他还活着。这不是夸奖海瑞多么多么完美，据后来小道消息称，海瑞对待老婆和女儿并不如对待老妈那么好。当时没啥，和现代主流观点格格不入了。但是站在一心搞建设的执政者角度上来看，海瑞就是好，因为他敢说话、敢办事、干得罪人、不怕杀头坐牢，完全符合当年毛泽东对下属的标准。

当时刚刚反右派不久，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会议期间，举行舞会。毛泽东和一位大学女教授跳舞。毛泽东问她：“上海的工作情况如何。”女教授回答：“我是大学教授，不能讲。”话中有话。毛泽东很奇怪，再问“你不问政治？”女教授回答：“不是不问，而是不敢问。”言外之音更明显了。毛泽东又问“柯庆施怎么样？”女教授回答：“更不敢讲。”简直是变相告状了。毛泽东没办法，就问：“我怎么样？”女教授回答：“你英明伟大。”这一系列对答让毛泽东心里直打鼓。不仅仅是一个女教授问题，而是整个知识界问题。

在任何时候，知识界集体沉默都是不正常的现象。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有时候声音如乌鸦一般难听，但仍然要给糖吃，让他们继续叫。因为在乌鸦一样的叫声中已然有金玉良言。

执政者需要避过乌鸦的扰乱，辨别其中的金玉良言。

毛泽东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毛泽东号召大家学习海瑞同志，学习海瑞敢说话、敢办事、干得罪人、不怕杀头坐牢的精神。当时大饥荒刚刚有一点苗头，毛泽东嗅到一点危险，跃进不是那么完美。他以为下面的同志懈怠了，要他们端正态度，敢说话办事，搞好大跃进。领袖发话自然非同小可，接下来文化宣传一定要跟上。

胡乔木就找到明史专家吴晗，说为了伟大事业和伟大的毛主席，吴老你就跟进一下吧。吴晗一想也是好事，鼓励一下大家说话嘛，应该的。吴晗拿出自己的历史文学水平，接连写了两篇文章《海瑞骂皇帝》和《论海瑞》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大意就是海瑞同志如何如何值得学习等等、咱们应该相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学习海瑞等等。这还没完，对于一个顶级历史学家而言，对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写两篇小文章只是牛刀杀鸡，显然是不过瘾的，特别是这个历史学家又有文学创作才华的时候。况且吴晗本来就是一个激进派，该出头时就会出头。而且吴晗当时的职位是北京副市长，于公于私都要出力的。五十岁的吴晗在自身热情的作用之下，把文学和历史知识融合在一起，写下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出戏或许是新中国诞生的最为出名的戏剧。所以出名，并非因为其本身的艺术价值，而是涉及到政治，并由此引发的争议。为啥会引出如此之多的争议呢。因为它诞生的时间就不对。从时间上推算，它诞生于一九六零年。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六零年是新中国的灾难年，那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痛苦的年头。那个痛苦的年头怎么会跟一篇历史剧扯到一起去呢，因为一个人，老熟人，赫赫有名的膨大将军。

吴晗，浙江义乌人，一九零九年生，幼年受过良好教育，二十岁考上大学，受到文化界泰斗胡适赏识。一九三零年，经大学者顾颉刚引荐，去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随后在胡适亲自推荐下去清华大学念书，专攻明史。大学期间，吴晗数十篇文章，如《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略有名气。毕业后直接留在清华大学任教，专讲明史。抗日战争爆发，吴晗先到云南大学任教授，随后去了西南联大。正是这段时间对当局现状日益不满，写下许多历史杂文，讽刺国民党当局。

北平解放时，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务，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等职。虽然挂职北京副市长，主要从事文化工作。他先是主持标点《资治通鉴》。之后又主持挖掘明十三陵中定陵（目前唯一一个被挖掘的明皇陵）。

可以说在早期共产党之中，吴晗是少数顶级知识分子之一，其文化学术修养远胜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当然吴晗并不完美。比方说在北京古城问题上，他就以激进的姿态站在梁思成对立面。梁思成主张多保留一些古建筑，吴晗认为没必要。当事人回忆，两人争得面红耳赤，身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对梁思成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思成当场痛哭失声。梁思成哭，当然不是为他个人，而是因为那些东东的艺术价值远胜所谓的高楼大厦。但是没办法，当年高楼大厦是稀罕货，当年的国人过于激进，连吴晗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如此激进。

一九五七年，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年反右派，知识界沉默；那一年大跃进正在走向高潮。随后大跃进的强度越来越大。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和《论海瑞》两个篇章之后的三个月，庐山事件发生了，彭德怀因为说了真话而被批，再次大规模反右派。吴晗写作《海瑞罢官》的过程，恰好和大饥荒平行。之后又是七千人大会，又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分歧。接下来一系列政治问题就来了。

政治问题怎么和海瑞牵扯到一起呢。因为彭德怀的事和海瑞有几分相似。其实在生活作风上，彭德怀和海瑞确实有相似之处。第一代领导人多半艰苦朴素。彭德怀仍然是艰苦朴素的典型。统兵作战时，生活待遇和普通士兵一样。一九三九年，身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路过陈赓驻地。陈赓想“贿赂”一把领导，决定给彭德怀弄点好吃的，补补身子骨。这原本是个再正常不过的想法。然而身为黄埔三杰之一，足智多谋称著的陈赓却犯难了。因为陈赓知道彭德怀的脾气，反对搞特殊。如果有人对他搞特殊，不论何人，敢搞特殊的话，轻则批评教育，重则掀桌子骂人。陈赓很犯难，思考许久才想出对策。

陈赓首先找彭德怀说：“今天的午饭没有准备别的。这地方有一种鱖鱼，也叫桂花鱼，我叫战士下河捞了几条，请你尝尝本地的特产。”战士亲手抓的，没有消耗组织资源，彭德怀不反对：“好吧。”中午吃饭上菜，炊事员先上一盘馒头和一木桶米饭，再上一大盘香喷喷的清蒸鱖鱼。彭德怀边吃边说这鱼确实不错，做的味道也好。别说是当时条件艰苦的年代，即使今天，这种鱼也是美味啊。

陈赓也很高兴，决定继续实施请客计划。炊事员又端上来一大盘子肉丸子。彭德怀开始警惕了，念叨：“你不是说吃鱼，怎么又弄来了肉丸子？”陈赓心里一凉，心想还是领导精明啊。但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这丸子是鱼肉做的，不信你尝尝。”彭德怀夹了一个丸子放进嘴里，确实有些鱼味，便不再吭声，大口吃饭。

前两个菜都好说，这第三个菜是只鸡，炊事员不敢往外端，直看陈赓。陈赓一使眼色，鸡也端上来了。彭德怀放下筷子：“这鸡难道也是鱼做的？”事已至此，陈赓豁出去了，往彭总碗里盛了几勺鸡汤：“河边的鸡只吃蚯蚓、小鱼什么的，你补补身体好领着我们打日本鬼子等等等。”按道理说，饭吃都吃一半了，就吃完再批评教育也不迟啊。哪知彭德怀直接开说了，什么现在生活困难啊，一大堆，说完放下碗筷直接出去了。陈赓已经是军内老资格将军了，而且党龄比彭德怀还高，并且和彭德怀有很熟，又老战友了，是不是太过分了。非也！陈赓已经很知足了，并且喜滋滋的对部下宣布：“彭总今天对我的批评算是客气的喽！”

由此可见，彭德怀的生活作风真的和海瑞确有几分相似。用现在流行话说，就是不会来事，甘当又臭又硬的石头。而海瑞仅仅是骂皇帝不好好干活，彭德怀在庐山写那封信，分量远胜过海瑞那篇骂人的奏章。而且海瑞仅仅是一个道德君子，武不能安邦，文不能治国。彭德怀可是横刀立马一辈子啊。可以说彭德怀不是海瑞。如果硬说是，那也是海瑞的加强版。大家都能嗅到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如果说大饥荒之前，毛泽东鼓励大家说话是为了搞建设，吴晗写的东西顺应了时事。那么在大饥荒之后，他发现党内出了很大问题，即右派太多，在搞修正，国家危险了，吴晗写的东西变成了违逆潮流。吴晗对海瑞的颂扬变成了对时局的讽刺。连江青都能看出来。江青在一九六二年就要搞批判。

但那时候时机未到。因为一九六二年刚刚开完七千人大会，刚刚集中全党的力量扛下大饥荒。那个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虽然有分歧，但是还没有全面升级。毛泽东还想以教育的方式把全党统一团结在三面红旗之下，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小四清。那个时候，江青想批判《海瑞罢官》，想批判吴晗，进而批判北京市委，从而赢得政治资本的可能性无限趋近于零。但是三年之后，形式不一样了。江青终于得到了机会。

小四清搞了两年，也未见成效。行政系统非但没能再次回到既定政策上来，反而越走越远。六二年六三年，虽然理论上还是三面红旗，实践上已经偏离大跃进轨道，而且解散了一部分公共食堂，分了一部分地，当然饥荒也结束了。此时的刘少奇已经决定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对国家经济进行调整，顺势把小四清升级为大四清，赢得了整个行政系统的认可（详情参照刘少奇篇章）。毛泽东则认为国家出了修正主义，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次性解决问题，时间是一九六四年。也正是六四年夏天，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五人小组成立，主管文化领域的政治问题，组长是彭真。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把江青顶出北京。

江青只能去彭真老对头，盘踞上海的柯庆施那里。江青为啥老抓住吴晗不放呢。据说，毛泽东曾和吴晗煮酒论史，江青插话卖弄聪明时出了漏洞，吴晗纠正了江青的漏洞。从此江青恨上吴晗。许多人就此认为江青是公报私仇。其实不然。江青的目标部署吴晗，而是吴晗背后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

按道理说，这么大的事应该是盘踞在上海的柯庆施亲自操刀。很遗憾，柯庆施死了。柯庆施的死很突然，也闹得轰轰烈烈。他若不死，在文化大革命中必然是一个重量级人物，后期四人帮搞不好弄成五人帮，或者一个教父加四人帮。柯庆施虽然死了，柯庆施留个江青的礼物还在，也就是张春桥和姚文元。担子就落在这二位身上。当然这是一个重担。要拿几百年之前的一个死人横扫当今世界，谈何容易啊。

尽管海瑞和彭德怀在生活作风和脾性上都有相似点，毕竟是两个毫不相干之人，生活年代前后相差几百年呢。如何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呢？那是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事。考验棍子们功力的时间到了。

一开始，写文章的事在上海只有张春桥和姚文元知道。张春桥久经考验，姚文元一腔热血，但两个人都不太懂明史，也不了解海瑞其人。为了写好文章，二人查资料、找证据，发挥毕生的才华，通过牵强附会、生拉硬扯、移花接木、乾坤大挪移等一系列即使手段之后终于把文章给弄出来了。文章署名姚文元，远不是姚文元一个人的功劳。除张春桥之外，还有写作小组里的人才们。所谓写作小组，就是一帮知识分子组合在一起，专门制作棍子。很多当今社会精英当年都在写作小组里混过。据说余秋雨同志也能和文革写作小组扯上关系。他们如同战斗队一样躲在屋子里，干着攻击污蔑的伟大事业。

军人卷入政治是一种悲哀，文人也一样。现在只要想一想那些所谓著名专家、教授、学者当年在黑屋子里干的事，心理就堵得慌。很多人被誉为社会的良知，他们是像良知的样子吗？无语。当然，无语的事还有很多。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不长，却历时半年多，前后改稿近十次。可见文章问世之艰辛。可惜这样一部艰辛问世的作品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读起来也不能给人以美的感受，只能感受到一群有文化的流氓那赤裸裸的面孔。常言道，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这篇文章堪称文化流氓的巅峰之作。前不见古人，后难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寂寞而矗立。

文章大概有这样几层意思。

文章指出：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把海瑞写得太好了，和真实历史上的海瑞不一致。真实历史上的海瑞没有民主自由的思想。所以这出戏有造假嫌疑。

——想想这一层就觉得搞笑。海瑞那时代有阶级、自由、民主概念么？只是戏剧而已。用这种方法考证，《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与历史也不符。即使是伟大的《史记》和历史也不完全相符。

——这是艺术，不需要从政治角度去考证。但是作为棍子领域中顶级好手，姚文元偏要去考证。凡事都有目的，姚文元的目的就是把文学和政治扯到一起。

文章指出：既然是一个假海瑞，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形象宣扬了什么？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绝不可能是超阶级的，绝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

文章指出：《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申冤做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如此把政治观点套到文学上，就不用解释说明了吧。

不禁纳闷，姚文元及其同仁们历尽千辛万苦，熬死那么多脑细胞之后，脑袋上的头发有脱落不少之后，终于把一出戏剧和政治联系在一起。而且这是一项得罪人的工作。得罪的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接下来的目的呢？答案很简单：得罪更多的人。

要得罪更多的人，把文学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不够的，还要把政治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于是妙文再一次出现了。

文章指出：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么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看到这些词汇了吗，退田，即为单干；平冤狱，即为翻案；冤，即为黑暗。这正是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来的三大风，单干风，黑暗风，冤案风。

看到这里，不禁要佩服姚文元及其战友们的才华，能把一出戏剧引申出如此之多的内涵，而且对领袖的用词把握得极为到位，不容易啊。战斗力不是一般的强大！

既然牵扯到现实，那就要为了现实而战斗了。

文章指出：《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这一段可以视为战斗宣扬。十八般兵器蕴涵之中，杀气腾腾，波涛汹涌。但是听起来却是另外的样子：他们是错的，他们很险恶，他们破坏了大好环境，去要把脏水泼到我们身上；我们是对的，我们很无辜，很清白却要为他们的错误买单；他们挑起了战火，他们要进攻我们，我们要自卫，为了保卫自身利益。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到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批判功力。没有无聊的谩骂，没有肉麻的吹捧，字里行间充满杀机，杀意阵阵，让人不寒而栗。如同一流杀手散发出来的杀意。文章成功地把前后相差数百年的彭德怀和海瑞联在一起，巧妙地把文化和政治搅和在一过，锋芒所指，覆盖文艺界和政治界所有人物，不愧为文革大戏的开幕词。

——这是中国式逻辑的胜利，文坛棍子的胜利。

如果棍子水平到了这个境界，要骂人的话，绝对可以问候祖先十八代而不吐脏字，足够许多网路愤青惭愧到泪流满面。如果要拍马屁恭维领导，那绝对会于无声处听惊雷，不声不响之际把马屁拍的震天响。他们已经到了人间凶器的境界。现在他们坚定的站在一种意识形态上面，自以为代表真理和道德，精神力量提升到最高层，战斗力成倍增长。加上身后站着伟大领袖和伟大领袖的旗手，一时间所向无敌，隐隐有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气势。

江青看到文章之后自然非常欣慰。首先数年心愿——批判海瑞罢官——终于满足了：这篇文章太过强悍，足够攻击敌人、太高自己、舒服很多不明内情的人。江青笑了，仿佛看见彭真等人脸上长满苦瓜。但是很快，她又发现自己笑得太早了。因为那篇杀伤力十足的文章刊载在上海《文汇报》上，《文汇报》影响力毕竟有限。加上上海帮大神柯庆施去了马克思那里，张春桥还没有真正上位，文章有货无市，一时甚为尴尬。就算上海有报纸转载，其它地方（主要是华东六省，原柯庆施地盘）转载也有零星转载，毕竟只是星星之火，在形成燎原之势之前，没有几点光辉的。

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当年的媒体资源有限，都和政治绑在一起。大饥荒之后，政策往右转，地方行政系统都希望政策降一降温，不要过于激烈，对这种杀气腾腾的文章自然不太感兴趣。因为大跃进那几年，也是这么杀气腾腾干活的，结果捅出天大篓子。这也是当年行政系统偏向刘少奇的原因。北京和上海这种地方所以有力量继续折腾，就因为大饥荒没有波及到这些地区。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挨饿时，京沪一带还能保障基本供粮。说白了，也就是北京上海一带没有经历过挨饿的滋味。所以他们的行政长官还能吃饱了不饿搞论战。其它地区牛叉的人物，如显赫一时的李井泉、吴之圃、曾希圣等人都销声匿迹了。

这是一轮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之间的较量。出拳的是上海，狠狠地砸向北京。北京使用乌龟神功抵抗。当时《北京日报》的社长叫范瑾。范瑾原来是黄敬的妻子。黄敬英年早逝之后改嫁。此时她处在阵地最前沿，正考虑要不要转载姚文元的大作。这样重大的事，她是做不了主的，要请示北京大当家彭真。明知道砸向自己的拳头，还要挺起胸膛去接受，那是傻瓜。彭真不是傻瓜，指示曰，不必转载。

拳头本来是对准北京的，北京竟然关上了大门！几年辛苦，几个月的突击，就这样被彭真当了，江青很惆怅。联想到因为京剧的事被彭真顶出北京，亮相到彭真占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文化组长的位置，江青更惆怅了。但她已经没有办法。因为彭真是政治局常委，京城一把手。她只是领袖妇人而已。个人实力上她和彭真不在一个档次。

好在她是领袖妇人，好在这盘棋是领袖下的。她搞不定的事，将由领袖来搞定。她搞不定的人，将由领袖来搞定。那个时代，除了涉及到客观规律，没有领袖搞不定的人、搞不定的事。毛泽东找彭真聊聊天，再批评两句，谈笑之间事情就解决了。

彭真当时是要保吴晗的。为啥要保吴晗呢，因为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一旦被批判，势必牵扯到北京市委。吴晗的事本来属于文化范畴，如果牵扯到政治，相当于把文化和政治搅和在一起，结果将会有很多人遭殃。这事在二十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已经发生过一次。那一次彭真是左派，向当时已经日薄西山的国际派发动进攻，之后彭真的地位迅速升高。现在再来一次会怎么样？彭真本人已经是政治局常委，有主管北京，在他之上的也就那几个人。新左派全力冲击的话，势必要冲击到今日已经大权在握的彭真。抛开是非不谈，就从个人得失角度上看，彭真也得全力保吴晗。

然而很多事是分不清的。以官员的身份写戏剧，究竟搞政治还是搞文艺？既然吴晗写了《海瑞罢官》，凭啥就不能批评？副市长搞文艺就高人一等吗？高官写的东西就不能动吗？没这个道理。如果说一般人提这些问题，彭真完全可以不予理会，这些问题从领袖那里出来就不一样了。然后领袖再点一下北京市委是搞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彭真彻底撑不住了。

——好吧，转载。

——星星之火，终于燎原。大幕拉开了。

**第九章 较量**

毫无疑问，炸开了锅。

左派右派围绕文章争吵不休，许多重量级人物纷纷登场，各路专家不顾专家的面子，教授学者们也不再装斯文，一时间板砖、棍子、满天飞，口水汇集成海洋。

其实争吵早就开始了。看看一九六五年的报纸：一月份，《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柳宗元被贬“被”引申为彭德怀被贬。——批！二月份，《文艺报》则批判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文章的题目便是气势汹汹的质问语：《为谁写挽歌？》。三月份，《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编者毫不

含糊地说《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五月份，批《林家铺子》。如此等等。批《海瑞罢官》不过是高潮而已。其它批判文章没有引起如此大的风波，只因为批判力度不大，范围不广，双方都可以接受。

姚文元的文章不一样，那是要横扫一切的，特别是所谓的右派。所谓右派，也就是行政系统内部那些高级官员，也包括彭真在内。随着文章转载，批判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

所谓批判有几层含义：正常情况，摆事实讲道理；还有不正常情况，比方说私人恩怨，那是很多的，比如说张三看领导不爽，李四看同事不爽，需要打击报复一下，为了达到打击报复的目的，有时候捏造点证据、张开血盆大口喷喷人也是应该的。又比如说某个所谓文化人，渴望黄金屋和颜如玉而不得，积怨于心，愤愤不平，时间一长修行圆满，晋升愤青之行列。现在得到机会去喷人，指望口下留情是不现实的。

但不让那些人说话同样不现实，正如不让乌鸦叫嚷一样。因为当时整个社会还在搞运动，都是热的。大四清运动正在高峰。前面说过，大四清运动是一场刘少奇领导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属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高级阶段，目的是算大饥荒的账，从上往下算。

大四清本质是把大饥荒责任导向中下层。这样一个运动中，查这个查那个，本来就乱哄哄的，本来就口水一大片、棍子一大堆。这个情况已经持续两年了，还没有消停。毛泽东又摆出了更大一个阵势，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调度下，新左派诞生，一种自下而上的运动激将爆发。可以想象争吵是何等激烈。

两派都自称是革命派，打着毛泽东的旗帜。

左派，人数多，地位低；右派，人数少，地位高。

左派要求乱起来，要夺权，说你们右派老是欺负俺们老百姓，不行，你们要下岗；右派，为巩固手中权利，主张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这样闹下去也不是办法，毕竟光脚不怕穿鞋的。左派那些人本来就地位低下，能和右派高干们站在同一个擂台上比赛本来就是一种胜利。右派不一样，已经是高干了，闹出个三差两错，那真的是晚节不保，伤不起啊。

按照级别看，原本这是一场不对等的较量。左派那些人和右派相差甚远嘛。但是左派有一个决定性的筹码，领袖毛泽东。毛泽东支持左派。在毛泽东的身后，还有一大群人，他们是国家的根基，中国人民解放军。

为了避开来自左派的冲击，右派必须要发挥智慧。他们知道左派冲击一旦爆发，将是多么猛烈，那绝对是狂风暴雨似的，要毁灭一切的。因为他们本来也是狂热的左派，在赢得权力之后开始现实起来。从历史上看，权力是革命派最好的镇静剂。掌握权力就要干活，所有要干活的人，都要面对现实，即活该怎么干。所以左派一旦掌权，通常会往右转。让张春桥当国务院总理，估计不用多久就要现实起来。

双方争吵了几个月，依然没有消停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之势。曾经的左派，当时的右派人物之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长、主管文化的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同志坐不住了。于六六年二月三号召集大家开会，讨论一下该怎么办。参加会议的除了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之外，还有胡绳、王力等当时比较活跃的人才。又是一番争吵之后打成共识——弄出来一个纲领性文件，史称《二月提纲》。

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纲领，把斗争艺术和和稀泥技术融合起来，实现了无缝对接。

提纲第一部分开宗明义，就是承认由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口水仗是正义的；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学术领域里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充分肯定。

——彭真当时心中是否愿意如此肯定眼前的口水仗已经不得而知。但事实摆在眼前，否定的话后果很严重。首先从毛泽东那里就过不了。因为毛泽东是支持左派的，谁敢公然反对，毛泽东就会大手一挥，让他灰飞烟灭。第二点，左派数量众多，即使没有毛泽东支持，也必须争取，否则将把自己孤立起来，也是死路一条。最后一点，承认双方都有道理，相当于告诉那些兴风作浪的人，你们不要闹了，咱不追究责任。至于会不会秋后算账，那是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总而言之，是一盆稀泥，让大家不要再折腾了。如果精神无处发泄，继续折腾也可以，请注意折腾的方式。这就是提纲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主要内容讲，咱们是民主国家，是让人讲话的、让人辩论的，是民主的。但民主是要摆事实讲道理的，要坚持实事求是，要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以理服人，不要乱扣帽子，不要仗势欺人，不要搞武力斗争。

——说得直白点就是，追求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同时，咱们要懂文明讲礼貌。

说穿了，还是一盆稀泥。也就是让大家消消气。如果火气太大，也不要一次性发作，要细水长流，慢慢说。怎么慢下来呢，就是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说，搞辩论时要注意自身队伍。咱们要依靠坚定的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

——名义上依靠左派，同时号召左派搞团结、做研究。左派本来很团结，团结起来搞破坏，打到大部分知识分子。让他们团结大部分，相当于要求他们压缩斗争目标，少斗一点。而且号召他们搞学术。这就搞笑了。如果都回家搞学术了，那还叫左派吗？而且人家本来就社会地位低，有搞学术的条件吗？让人家消气回家却不直说，转了这么多弯弯。

那么什么样队伍是又红又专的队伍呢，还是第三部分内容。

这部分也没啥新观点，还是老一套。就是说，要形成大批的左派学术工作者的“互助组”、“合作社”，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军阀的道路。

——空中楼阁，难以实现。无法就是劝大家讲文明、不搞暴力。

说了老半天，浪费那么多口水之后，当前争论怎么办？大家谁也不服谁，怎么办。办法就是提纲第五部分。

这部分中，要求参战的各位选手先冷静冷静，然后好好想一想，写一点高水平的文章拿出来继续论战，不要现在这般争吵谩骂了。

最后，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组成。许立群为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通篇都在和稀泥。

提纲看起来可谓有理有据有节，看起来对左派也不错，还有那么一点点左倾，应该说很照顾左派那些思想家、理论家、愤青了。没看出斗争在哪里啊？斗争在哪里呢？

妙就秒在这里。如果和稀泥成功，斗争也就胜利了。因为左派主要来自下层。如果文明了，温顺了，回家做学问去了，那么下层还是下层，上层还是上层。也就是行政大权还在右派手中，各自的地位也就保住了。保住了地位，斗争也就胜利了。

不能不佩服政治艺术的深邃无边啊。

如果提纲通过了，左派回家了，文革也就没有了。胆敢不回家的，一律按照军阀流氓对待，并美其名曰为“学阀”，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问题是能通过吗？能否通过，要党内最高领导人点头的。四天之后，也就是二月七号，五人小组把提纲提交给中央政治局，刘少奇主持讨论修改一下，通过。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当时在武汉。第二天，也就是二月八号，彭真、康生、陆定一带着提纲特地去武汉请示。毛泽东当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只是说不要批判郭沫若和范文澜，他们以后还要在学术界工作。又过四天，二月十二号，政治局把提纲批发给全党，作为批判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下发。

《二月提纲》如同一票冷水泼向炽热的批判运动中。特别是上海的张春桥同志，在狂热的美梦里淋了一场大雨，从外凉到里。因为文件是以中央政治局名义下发的，上海市委也必须向下传达，对刚刚发动起来的批判运动极为不利，然而他也没有办法。当时的张春桥级别还是太低了，没啥能量。如果这雨一直下，那么迟早有一天，张春桥和姚文元要沦为——学阀——被批判的。然而张春桥同志，你不需要惆怅，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早在提纲问世之前，伟大领袖毛泽东已经表态支持说姚文元的文章写得好。与此同时，毛泽东的代言人江青正积极活动。江青正和张春桥策划新一轮进攻。由于《二月提纲》降温，江青只好暂别张春桥，寻找新的强有力的帮手。在毛泽东没有直接出面的情况下，还有谁是强有力的帮手呢，还有一个，那就是政坛新星，军界掌门人，赫赫有名的林彪同志。当时在朱德淡去，彭德怀臭掉，林彪已经成为军界代名词。

按照江青的话说，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

——搞得跟演戏一样，只能说江青入戏太深啊。但却是事实。林彪出马，搞定天下。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号，江青从上海到苏州见林彪，提出由她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以便对文艺界进行更有力的进攻。作为毛泽东的左右手，二人自然要好好合作。林彪一口答应，派叶群去通知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让他带人支持江青。二月二号，刘志坚带几个人去了上海。江青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并宣布了游戏规则：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随后江青解释了原因，还是老一套，大意说：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政的时候了等等。座谈会也是按照这个调子来。

从二月二号到二十号，江青带着大家看电影、聊天、喝茶、看戏。刘志坚等人的日子看似轻松，实际上压力山大。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这段时间内把江青的言行给整理出来，形式还不能采用儒家记录孔子言行那般，要形成一个结构合理、逻辑清晰、足以对抗《二月提纲》、战斗力超强的战斗檄文。

——这样的文章不好写啊。文章功底啥的还是次要的，问题是讨伐的对象可是不得了，国家主席啊、政治局常委啊、各地封疆大吏啊啥的，都不好惹，弄不好就把自己给卷进去了，赔了夫人又折兵。

十几天的时间，刘志坚等人看了十几部电影（在当时奢侈了），听了江青十几次谈话。座谈会结束的第二天他们根据会谈精神，整理出一篇大约三千多字的《纪要》。江青一看，立刻打电话给已经回到北京的刘志坚表达不满，说纪要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要刘志坚派人去上海帮助她修改，并说此事已告诉了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也参加修改。刘志坚在同总政正主任肖华商量后，派陈亚丁返回上海参加修改，并交代：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

纪要主要啥问题呢，主要是没有突出江青的功绩，即样板戏。还是陈伯达聪明，直接点明说，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沙家浜》、《红灯记》，这才真正是无产阶级的东西，要把这些写进去。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江青当然非常高兴，曰，陈伯达的意见很好，击中了要害。

稿子虽然是众人弄出来的，但题目却是《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又经过一系列折腾之后，成为研究文革的重要材料之一《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其中经历了毛泽东修改和林彪审阅。一个月后，林彪写信把稿子送给军委各个常委，准确的判定文件“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林彪说：“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四月十号，《纪要》转发全党，要求认真讨论研究，贯彻执行。

纪要的口号是破旧立新。这个口号没问题。任何一个行业都要破旧立新。文学本身也是一直破旧立新。比方说伟大的屈原写的那种骚体诗很伟大，现代人再去模仿，很可能被送进精神病院。问题在于：什么是旧，什么是新；如何破，又如何立。

《纪要》通篇也没啥新观点，基础是毛泽东二十年前搞的文艺规范《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两个都在强调无产阶级文学，说不好听点，叫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从政治立场看，这样干没错。甚至从文学立场上看，提倡无产阶级文学，让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也没有问题。问题是，这个纪要本身出了问题：它强调只搞无产阶级文学，他强调文学仅仅为政治服务，那就麻烦大了。

无产阶级文学是什么文学呢？概念很广泛，选题却很窄，就是工、农、兵。

再细一点，写工人如何可爱、农民如何可爱、士兵如何可爱。确实，工人是可爱的，农民是可爱的，士兵也是可爱的。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些可爱是在集体中才可爱。比方说军队在行动时，比方说一大队工人搞大项目时，那种积极配合，确实是可爱的。如果把单个的农民拿去相亲，把单个的工人捧上舞台，让单个士兵做节目，一点都不可爱，而且笨手笨脚很煞风景。说白了，工、农、兵还是社会基层人群，如何让大家欣赏。搞几个样板戏宣传工农兵，完全没有问题，甚至需要多高点。毕竟他们是社会主体么。

如果全部艺术集中在工、农、兵身上，很遗憾，艺术将死亡。艺术的真正魅力在于灵性和自由度。经典作品诞生需要一系列条件。比方说《将进酒》是李白写的，但李白也不能保证任何时候都能写《将进酒》。再比方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歌德早年代表作。等到晚年，歌德的精神境界已经归于平静，不可能再写出如此激进的作品。对于艺术家而言，不怕忍饥挨饿，就怕被关进笼子。对于这一点，身为诗人的毛泽东应该非常明白。毛泽东早年的文章，毛泽东的诗词，毛泽东的字，都是大气自由的。毛泽东本人也非常讨厌条条框框。

这就牵扯第二个问题：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可以为政治服务么？不能。

文学是文学，政治是政治。

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就不再是文学，那叫棍子，那叫马屁膏药。这点毛泽东也明白。那么为啥还要干。很简单，他只是想通过文学为切入点，过度到政治而已。他不是要搞文化大革命，而是要搞政治大革命。文化只是幌子。革命才是目的。

革命对象当然就是刘少奇为首的行政系统。但不能说政治革命。政治大革命听起来杀气太重，容易引起纷乱，乃至分裂。文化大革命听起来就温柔多了。把铁血的革命藏在文化面纱之后，可以麻痹敌人。

所以破旧立新，指的是破坏就的行政体系，建立新的行政体系。可悲之处在于，旧的行政体系是统统破坏了，但新的行政体系一直没能建立起来。破旧立新变成破而未立，这个过程是十年。黄金般的十年就这么给耽搁了。

**另一篇战斗檄文**

那是一段非同寻常的日子。以毛泽东为首的左派和以刘少奇为首的右派都是不正常的。现在回顾起来，因为政策和世界潮流的转变，大家对那个时期的印象基本上是毛泽东错误的相信了江青和林彪两匹饿狼，伤害了一大群善良的绵羊。实际情况远不是这个样子。

可以想一想，在各自单位里，如果你不是一把手，却想要取代一把手，容易吗？当然不容易。如果这样子也可以，那么表示单位太糟了，随便搞点小动作就能让单位垮台、让领导走人，太可笑了。文革时代，那些被伤害的人可是高干中的高干，封疆大吏、军队统帅、都是千锤百炼的人才。他们并不是绵羊。或许他们善良，但并不软弱。他们只是在同一种思想之下做出两种选择，在冰与火的交锋下暂时处于下风。

毛泽东明知道政治和文学是两个概念，却依然把两个概念扯到一起，为何？因为行政系统已经脱离他的掌控。此时的刘少奇正在指挥行政系统在全国范围内搞大四清运动。前面已经分析过，四清运动的根子在大饥荒，大四清只不过是把大饥荒的责任导向基础，进而洗清上层系统。说白了就是重官僚系统：上级是英明的，下级要服从，出了事和领导无关。这样做有好处，就是可以把全国局势给稳定下来，该干活的干活，该当官的当官。换成其它时候也就算了，有官僚系统也没啥不好，至少大家都有事干。

然而这个搞法当然引起很多人不满。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是从革命时代走过来的，都有革命传统。而且军方对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同志占据高位本来就不爽。再加上领袖毛泽东也看不惯那一套，问题就严重了。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那一套是在搞修正，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个问题从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那份著名的报告中就存在了。

看看彭真的《二月提纲》，实际上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缺乏理论依据，通篇在劝架和稀泥。如果仅仅是一份文件，不需要什么新的理论。如果这个文件要区分政治和学术这般重大问题，就必须有理论依据。这正是彭真，或者说刘少奇的遗憾。他虽然为了调整经济做了巨大努力，但身为理论家，一直没能在理论上前进一步，经济建设依然没有突破三面红旗那些圈圈。在轰轰烈烈的批判潮流中，《二月提纲》对群众而言是一盆冷水，但是左派高层却是一桶油。很简单：自己在那里搞运动，凭啥让别人回去休息任你摆布？所以才有林彪支援江青，所以才有江青的《纪要》。然而这这是第一步。

张春桥拿到提纲之后惆怅了一阵子，很快就抖擞精神，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到北京摸底。杨永直找到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等人，反复询问《二月提纲》中提到的“学阀”是否有所指（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作为敌对双方，太极拳肯定要打几个回合。最后还是彭真解决了问题。彭真对扬永直说：“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许立群又说：“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彭真生气地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空气不正常吧。

当杨永直把彭真的话带回上海之后，张春桥意识到机会来了。因为文章的策划人另有其人。张春桥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谈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盾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随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春桥说：“所谓学阀，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是罢官；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上海市委以势压人。”

张春桥判断是对的。毛泽东准备动手了。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笔杆子固然厉害，毕竟吐沫星没法发淹死人，杀伤力有限。毛泽东的手是巨人的手，动一动那是相当要命的。一根小手指就能让很多人的人生出现逆转。

三月中旬，毛泽东开会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三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同康生谈了两次话，说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毛泽东还要康生告诉彭真，要就许立群的问题打电话向上海市委道歉。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长、文化小组长彭真也是个大人物了，毛泽东两次谈话就决定了他的命运。随后彭真挨批。

批判彭真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因为彭真不但位高权重，而且经历各个时期的运动，久经考验，理论功底深厚，是会场辩论高手。一般选手很难奈他如何，必须超级选手，必须心狠手辣腹黑嘴功好。这样的超级高手一般难得一见，当时恰好有一位，他就是咱们的老熟人康生同志。林彪批陆定一遇到了麻烦，还是康生解的围。

其实康生早就想批判彭真，早在《二月提纲》下发时，没有给同事政治局委员的康生看。康生很不爽，决定利用开会机会批彭真。康生原本想先搞个预备会统一口径，然后再发动进攻，打彭真措手不及，没想到秘书把彭真也喊去了。这种情况下再提批斗，相当于康生和彭真一对一，胜算不大。但康生已经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冲了。

康生一本正经地说，本人反对提纲，它发出前没有给我看，我不知道，文件发出之后我见到了，这是彭真批发的。然后又说，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彭真在场纠正说，文件经过会议讨论，修改后，送康生看了才批发的，怎么没有给他看呢？

双方关于看与没看文件纠缠不清。情况跟小孩吵嘴差不多，听起来非常搞笑，想起来非常可疑。双方都是政治局的，为何会为了这般小事纠缠不清。何况康生和彭真也没有深仇大恨，两人均是白区出身，延安整风时，两个人还是同一个战壕里面呢。要说有啥不爽，也就是大饥荒只好彭真跟着刘少奇走，康生一直紧跟毛泽东。康生是那种极端精明的人，一般都是遇到好事自己往前冲，遇到不好的事让别人往前冲，为啥要主动挑出来和彭真对战？原因还是康生太精明了，他已经闻到了当时的气息，彭真要完蛋了。他要抢在毛泽东表态之前表达自己对彭真的厌恶和不满，进而赢得信任。说白了，看过活没看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表态。在政治舞台上，除了极少数政治家可以谈政治理念、求得青史留名，其他人主要就是靠站队讨生活。所以说看似搞笑的闹剧下面隐藏着深深的心机。

等到毛泽东表态之后，康生同志笑了，彭真，你的末日到了，让你尝尝我的手段。不要怪我无情，要怪就怪你眼光不够、智慧不足、站队错误吧。

只要给条件，康生可以整到任何人。康生的手段很简单，也不去和彭真搞辩论、喷口水，而是采用了奇袭战术，避实击虚；经过一系列推理联想，把彭真和兵变联系起来。二月兵变的事在贺龙故事里已经说了。就是北京部队被拉出去训练，城防空虚，外边掉了一个团搞防务。彭真是北京市长，找了几间营房。康生为这事说彭真搞兵变。有了兵变为基础，就说《二月提纲》说成一个兵变纲领，为兵变做掩护，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样一来，彭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彭真满腹才华，落得一个有口说不清的境地。而在那种严酷的环境下，也没人能帮助彭真洗清了。包括刘少奇在内，都知道彭真保不住了。所以要再一次佩服康生同志，他用才华康生我们，什么叫——腹黑。

可怜的彭真就这样成为“反党集团”中的一员。他手头的关于罗瑞卿“反党”案还没有结束，自己就和罗瑞卿一起“反党”，和他差不多同时跌倒的还有宣传部长陆定一。负责彭真案的，恰好是老领导刘少奇。

罗瑞卿、陆定一、彭真，再加上中央秘书长杨尚昆，一个反党集团诞生了。这个阵容虽然没有当年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那个阵容豪华，已经足够强大，文武齐具，位够高，权够大，拿出来足够震撼。这几个人倒下之后，刘少奇臂膀断了大半，随着贺龙逐渐失势，再次和军方失去联系。

在政治舞台上，拿下一个人并不是重点，重点是消除其影响。如何消除彭真影响呢，《二月提纲》就是现成的材料，只需要猛批就可以了。还要形成一个批判材料，从政治上彻底将其驳倒。那份材料就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号下发的一个文件，史称《五一六通知》。和姚文元那篇文章一样，这是一篇战斗檄文。

在这篇战斗檄文里，首先强调五人小组整出的《二月提纲》是错误的，违背了毛泽东思想，针对毛泽东亲自发起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其次强调这个错误的提纲其实就是彭真一个人整出来的，是彭真一个人的提纲，其他人不知道，不知者无过。

接下来用非常犀利、肯定的言辞提纲批判一通，什么采用偷天换日的概念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等等。概括起来就是，彭真同志坏人，混淆阶级是非，是混入无产阶级队伍里的过街老鼠，要人人喊打，绝不姑息。

比方说第七条表述：“提纲提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看看吧，彭真有多坏！

——多么犀利的言辞，多么顽强的决心，多么冷酷的态度。注意最后那个词，大党阀，比学阀给力多了。

如果仅仅是彭真一个人也就算了，直接批判、斗争、写检讨，然后再关进打牢好好教育。要命的是，不仅仅是彭真一个，彭真只是众多代表“党阀”中的一个。打到一个彭真只是开始，还要把其他党阀统统打到拿下，任务繁重啊！

通知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几十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

——尽管任务如此繁重，革命者依然不畏艰险，把斗争进行到底。

所以结论：“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在如此气势汹汹的政治压力下，没有谁顶得住。彭真也顶不住。此后十多年时间里，彭真的生活变成了两点一线：监狱和批斗会。

原本大权在握，原本高高在上，原本前呼后拥；突然之间，就变成刀俎鱼肉，变成时刻写检讨的阶下囚，变得冷冷清清。之后能干的就是多些点检讨，减少点批斗会，保住有用之身，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这是高干彭真的生活转变的写照。也是其他很多高干生活即将转变的写照。有人承受不了这个转变，就自杀了；又有人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

**第十章 刘少奇的对策**

彭真的人生陷入低谷，事情没完。彭真虽然是个大人物。仅凭一个彭真，还不需要如此大的动作。因为彭真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是行政系统内一员。整个行政的核心是刘少奇。批判彭真等人，矛头是对着刘少奇去的。

整个文革过程是，从中央大员到刘少奇，再从刘少奇打碎整个行政体系重新组合。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做了那份著名的“虎头蛇尾”报告开始，已经注定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那个矛盾导致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之际理论方面的被动。《二月提纲》实际上是整个行政系统，或者说右派的一个理论反击，很快以失败告终。《五一六通知》的诞生，意味着刘少奇为首的右派在理论论战方面的失败。

随着罗瑞卿被打到与贺龙失势，刘少奇和军方的势力再一次完全断裂。当毛泽东林彪通过军方控制着全国，刘少奇的结局已经注定要惨败。毕竟刘少奇背后有一大批人。从大四清开始，他们跟着刘少奇走，希望刘少奇可以成为一把手，大干一番。

然而事实证明，毛泽东还在世的情况下，那只是一个美好的幻觉。

从一九六四年开始，刘少奇的路本来走得很顺。经济调整有了成效，加上大四清运动赢得了整个行政系统，实力一直在增加。特别是一九六五年，在和毛泽东矛盾浮出水面之时，依然当选国家主席。在很多人看来，此时的刘少奇已经和毛泽东旗鼓相当，隐隐有取而代之之势。从整个党史看，共产党每一次出现重大挫折，都要更换领导人。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之后，陈独秀下岗。

井冈山反围剿失败，博古完蛋。

大饥荒也是一次惨痛的失败。而且从当时情况来看，刘少奇取代毛泽东似乎是大势所趋。然而这一切只是表面现象。

作为当事人的刘少奇发现，不论他的实力如何增加，和毛泽东之间依然有着难以弥补的差距。不论是魄力、手腕、还是威望，他始终无法追上毛泽东。他已经足够出色，在新中国历史上，已经是屈指可数的政治家，或者说谋略家。然而毛泽东是历史巨人，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巨人。在毛泽东面前，刘少奇的实力和档次都差那么一点点。

那一点，咫尺天涯之间。

七千人大会时，刘少奇已经是二把手，通过经济调整和大四清运动，在获取整个行政系统之后，在实力大大增强之后，刘少奇依然是二把手。

在刘少奇还在全力以赴指挥大四清运动之际，毛泽东开始反击了，从文化界入手开始反击。不经意之间完成了从批判罗瑞卿到批判彭真，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五一六通知》，毛泽东的反击是那么干净利索，是那么的不可阻挡。

刘少奇痛苦的发现，不论如何提升实力，依然是二把手，只因为一把手是毛泽东。

刘少奇的实力越增加，越是能体会到毛泽东的强大，越是发现心中的离梦想是迟尺天涯。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为他也不是一个人。如果是他个人，跑去跟老战友毛泽东叙叙旧、写个检讨得了，说不定还能继续工作。在他身后站着整个行政系统。他们的身家和前途都系在刘少奇身上。刘少奇倒掉，行政系统势必造成大范围换血，于公，国家动荡；于私，他的支持者讲失去养老保险、住房、配车、厨师等等一系列好处。因此只要有一线生机，他都要全力以赴去干。正如九大之后的林彪，无论如何都要干下去。

理论论战失败之后，只剩下行动一种途径了。因为没有军方支持，面对汹涌澎湃的批判他已经无能为力。现在他只能寄希望不要大乱。只要不乱，就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大饥荒那么天大的事，不是都解决了么？

在中国，只要不出乱子，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乱，不仅是刘少奇，也是所有掌权者最怕的局面。然而他的对手是毛泽东。毛泽东已经看穿了他的弱点。批判运动兴起的时候，一个特殊的群体，红卫兵出现了。

面对年轻激进的红卫兵，刘少奇已经看到其中蕴含的变数。因为他本人就是在五四运动的感应下加入革命的，一辈子都在搞运动，很清楚这种运动的杀伤力，特别是有国家机器作为后盾的情况下。所以他打出手中最后一张牌，派遣工作组进学校，希望能把炽热的学生运动给压住，进而得到一丝喘息的空间。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这已经是他最后的选择了，或许是没用的，只能尽人事、待天命，期待奇迹出现。

**所谓工作组**

当年的高校，尤其是北京高校，犹如一个个火药桶，继承了二十世纪善于罢课上街的光辉传统，外面有点风吹草动，就要放下书本、跑到街头去爱国。碰见文革那种风云激荡的年代，所有火药桶几乎同时被引爆。要想让那些已经引爆、即将引爆的火药桶安静下来，除非四大龙王同时出现在空中降雨。当然四大龙王没有出现，现在刘少奇就要代替龙王们灭火。

刘少奇手中的灭火器就是工作组。

所谓工作组，参照四清运动，就是在各个机关里抽点人开进北大清华等校园，和校方联合，去劝说那些骚动不安的年轻人。说啥呢，大意就是说，骚年们啊，你们还年轻啊，要好好学习啊，听政府和领导的话啊，不要受人蛊惑啊。总之要和谐，和谐啊。

如此等等，就像唐三藏同志念经，一条一条，有理有据，头头是道，却忽视了一点。年轻人本来就血气方刚，在理想和信念的召唤下，在同样来自中央内部的鼓励下，那里听得进去那些理论家们的啰嗦，该演讲还是演讲、该串联还是串联、该大字报还是大字报、该喊打倒谁照样去喊。

对待学生运动，两种人最合适，狠人和能人。

所谓狠人，就是拿着鞭子，小子敢再闹就抽你屁股，如同八九学潮之后，军队开入校园。

所谓能人，就是来吧小伙子们，咱们一起闹，咱比你花样更多，你们好好学习，如早期共产党人领导学生运动。

而某些工作组的人则是另外一个样，真把自己太当回事：级别不高，派头够大；权力不多，脾气够大；严于律人，宽于律己；世界观只有孙子和爷爷两种概念——领导面前当孙子，离开领导当爷爷，拿着鸡毛当令箭。对待高干子弟没辙，对待没背景的学生狠整。如同唐三藏西天取经的工作小组，对有背景的妖怪没辙，只能拿没背景的妖怪出气。

后来造反派领袖，都有过被工作组修理的经历。

某些工作组成员，如北大的工作组长张承先，宿舍和办公室之间只有一百米，这一百米的距离也得开车上班，架子不是一般的大。这种态度其实是表明，老子是中央来的，你们这群小王八蛋能怎么样嘛。这一阵势恰好给人右派变质的口实。

这种人唬一唬无知的老农民还行，派去浇灭年轻人的火气，浇下去之后才发现是油。

这种人应该是半官僚主义和半书生的混合体，处在从书生或大兵到官僚的进化阶段，既没有官僚的圆滑也没有书生或大兵的血性，平时装点门面可以，遇到事很可能添乱。

这种人数量不少。

不禁要问，刘少奇老人家为啥要派这种人去呢，能人和狠人他都没有，因为他无人可派了。如果军人支持他，一切好说。他本来是发动学生运动的好手，现在要去熄灭学生运动，能派的人也就是之前搞大四清的那些人，有啥办法呢，手头资源有限啊。

工作组也得完成自己的任务，不能辜负领导重托不是。既然一帮热血的愣头青一根筋转不过来，那就好吧，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某些工作组就把某些活跃分子给拉到某个单独的小屋子里批评教育一番：关黑屋子啥的，还有不给饭吃的。

这样一来确实起到一定作用，同时也刺激了激进派的神经。再加上江青康生等人在背后煽风点火，激进派就起来反对这些工作组。

一方要闹事，一方要维稳，自然而然就出现各种批斗会，而且是乱批乱斗。工作组是上级派来的，有权利搞做决定，就把一些问题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如六月十八号发生在北大的“六·一八”事件。说白了就是一群热血青年闹腾了一下，批评教育或者关起来教育都是可以的，偏偏定性为“反革命”，也太高调了。

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工作组领导们或许不知，这个反革命定性会在中央高层引起怎样的震动，又会给正准备放手大干的江青康生等人提供多少炮弹，更为致命的是加快了毛泽东全面清算的决心。

这种“反革命”定性也可以这么理解，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行政系统做最后的挣扎，在最后时刻行使权力，希望通过这种典型事件扑灭学生运动的决心，也就是拿大帽子压人。因为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这事就好像两个高手在较量。毛泽东的反击是从文学领域切入到政治领域。刘少奇的防守则从政治领域外扩，把政治延伸到校园。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再反击。说工作组干坏事，影响了运动，应该撤掉。

毛泽东说撤掉，那就撤掉。

工作组撤销，相当于拿掉了刘少奇和邓小平手上仅有的一点点资源。此时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基本上丧失了任何活动能量，只有老老实实地待在那里，如同待宰的羔羊，等待命运的裁决了。那是他们一生中最为低落的时刻。能让刘少奇和邓小平这种人同时落入低谷，普天之下也只有历史巨人毛泽东有如此的手腕、魄力、威望。

**第三次决定**

当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拿掉刘少奇和邓小平手中最后一点可利用资源时，他已经决定下了最后的决心，决心把一切打碎重新来过。

踏上革命道路之后，毛泽东至少做过三次足以影响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决定。

第一次是抗战之后，面对咄咄逼人的国民党和蒋介石，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抽了很多烟之后，很多不眠之夜之后，下定决心要带领共产党和国民党争霸天下。这个决定使得共产党赢得中国的统治权。

第二次则是五零年，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思索很久，抽烟很多之后，很多不眠之夜之后，拍板决定派志愿军入朝。这个决定在二战之后重新界定了亚洲格局，也为新中国赢得安全保障。

这是第三次决定，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重要决定。时间，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号到二十八号；地点，湖南韶山滴水洞。

和之前两个决定不一样，这个决定虽然前后只有十一天，酝酿的时间却最长。在北京闹得天翻地覆之际，毛泽东去了南方。批判罗瑞卿，毛泽东在上海。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毛泽东在杭州。彭真搞出《二月提纲》时，毛泽东在武汉。《五一六通知》下发，林彪谈政变，刘邓派工作组，毛泽东在沪杭一带散步。

六月十五号那天，毛泽东觉得局已经布好，应该做决定了，离开杭州，当晚到了南昌。

六月十六号到了长沙，回到韶山，十七号住进滴水洞。那是毛泽东祖坟所在地。

韶山西面有三座山峰，南面龙头山，北面黄峰山，西面是牛形山，滴水洞就被三山环抱。滴水洞占地约五平方公里，只有一条公路蜿蜒延伸期间。豁口处是韶山水库，深幽清雅。三面树木挺立，景色宜人。两山陡立处，有一桥，桥下有小溪，桥头边有一个山洞，即使大旱，洞中仍滴水不断，回声阵阵悠扬，韵如琴，那便是滴水洞由来。

滴水洞周围幽荫阵阵，上百种野花漫山遍野的生长在小溪边，又有上百种药材分布在山野间。特别是春夏两季，花朵漫天，绿荫遍野，人间天上。

从风水上说，此处当属龙脉，毛泽东的祖先下葬于此，也是一个好归属。当年蒋介石为了反对共产党，四处掘共产党领导人的祖坟。曾三次派人去挖坟，均因当地百姓保护未能得逞。毛泽东入住滴水洞之后，基本上不出门。

毛泽东一生酷爱游泳，韶山水库就在不远处。一九五九年六月份，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之后，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曾回过滴水洞，曾兴致勃勃的在韶山水库游泳。这一次，他在滴水洞住十几天，竟然没有一次去游泳，而且很少外出。在这里，他又回到决定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的那种状态，紧张的工作、静静地思考。对于一般人而言，面临大事常常心慌意乱。对于精英而言，重要时刻往往很冷静。对于巨人级别的毛泽东，遇到重要的事情却是出奇的细心，反复思索，把前前后后的可能性想很多遍，到算无遗策之际再做决定。

高明的政治家如同顶级修行者，心中有一种境界，叫做静。

懂得动的人不见得有多牛；懂得静，才真的了不起。

毛泽东在滴水洞想什么？当然是天下大事。对一般人而言，所谓天下大事是很复杂的。在毛泽东那里很简单，把天下大事简化一下，就集中在——刘少奇和林彪——两个人身上。这两个人，他要用一个（林彪）废一个（刘少奇）。用林彪，如何使用，需要方法；废刘少奇，如何废，需要方法。

林彪的事后面再说，这里先说说刘少奇。两个人从延安整风以来，一直亲密无间。

建国之后出现了高岗事件。高岗为了权力去对付刘少奇，毛泽东为了刘少奇判高岗违规。高岗是毛泽东最为忠实的粉丝之一。随后反教条运动中，毛泽东又为了刘少奇让粟裕靠边站，因为他要把刘少奇推向前台，要为未来的接班人储备人才。

刘少奇走向前台之际，正是大跃进兴起之际。那个时候灾难还没有到来，虽然有一系列征兆，总体形势看起来还不错。毛泽东选择在那个时候让出国家主席，实际上也有交班准备。如果没有大饥荒到来，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也许真的完成交班，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都不会发生，那将是梦幻般的。刘少奇上台之初，出现了彭德怀的事。毛泽东又为了刘少奇拿下彭德怀，扫除了一个对刘少奇不感冒之人。

然而此后一切都变了，大饥荒凶猛的到来了。

毛泽东检查了总路线，没错；错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操作上。毛泽东认为那是实践上的错误。当时在前台负责实践工作的恰好是刘少奇和周恩来，以及他们领导的那个官吏组织。毫无疑问，那个时候的毛泽东非常恼火。

更让他愤怒的是，在七千人大会上，有人把责任往他头上推。虽然他是领袖，应该负最大责任。但是当时普遍观点是操作失误。他忍了，没有当时发飙。不是因为他喜欢忍让，而是当时情况下，把责任承担下来才是最佳决定。

最让他难以容忍的是，亲手推向前台的刘少奇开始背离他制定的路线，而且把整个行政系统都拉过去了，还想把手伸向军方。

从一九六四年《二十三条》诞生开始，毛泽东决定布局反击。之前，毛泽东还在等待刘少奇回头；之后，毛泽东把刘少奇当成政治对手了。毛泽东要打掉的并不是刘少奇，而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一批人。于是他把江青放出来折腾，于是他把军权集中在林彪手上，于是他倒掉了曾经的心腹罗瑞卿和贺龙，于是他把年轻学生再一次放出学校。

一切布局结束，如今就差最后的决定了。

下决定不难，但他还要想清楚。因为这个决定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打一场战争，而是事关很多人吃肉还是喝汤问题、住别墅还是蹲牛棚的问题、批斗别人还是被别人批斗的问题，必须再想一想，好好地想一想。

想到六月二十八号，终于把一切想清楚了，再一次离开家乡。

一九二七年，三十四岁的毛泽东离开家乡搞武装斗争，彼时的他不过是一书生。三十九年年后，七十一岁的毛泽东再次从家乡出发，亲手发动领导文化大革命，此时的他已经是革命领袖。决定重新开始，从头再来。

离开常识之后，毛泽东去了武汉。在武汉徘徊了半个月，游了长江，放松了一下。仰望万里楚天，面对即将到来的狂风巨浪，他已经成竹在胸。在武汉，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很好的透露了毛泽东当时的心境。

那封信主要涉及到林彪，后面再谈吧。

**第十一章 史上最特殊的兵种：红卫兵**

**承传**

毛泽东办事，通常都是坚持两手抓，而且两手都很硬。

两手，即为文武。文韬武略相互配合，双管齐下，无往不利。

毛泽东的两只手，文的一只手即为中央文革那帮秀才，靠嘴皮和笔杆子攻击别人；武的那只手则是，非常熟悉的三个字，红卫兵。

到今天为止，红卫兵——已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词，主要有两面，一面是破坏性，另一面则是对腐朽制度的冲击。两面特点同样鲜明，争议极大。

就红卫兵本身来讲，就是一帮热血年轻人冲击社会现实而已。他们是学生，是知识分子，若干年后，他们将成为各类人，或者是专家，或者是教授，或者是学者，或者是罪犯，甚至可能成为国家的叛徒。但当时，他们是红卫兵，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冲击社会现实。

在整个历史上看，知识分子冲击社会现实一直都是一道风景。

一般意义上讲，所谓知识分子指那些脑力劳动者。这些脑力劳动者中，不包括那些一门心思啃老一族、以及一门心思啃异性（如白面先生和第三位女士）一族。主要指那种受过教育，在各个领域中，能够传播科学啊、文化啊什么的，能够自食其力，人格独立，且懂得生活或者说人生。如果把概念延伸一下，可以理解为用自身头脑去改变社会现状之人。按照这个理解，知识分子可以追溯很久。比方说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人士，很多知识分子，他们创建了各种观念，并试图用这些观念去影响改造社会，最终导致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诞生。他们堪称知识分子楷模。——尽管那个时候还没有知识分子的概念。

随着社会结构越来越紧凑，知识分子也在改变，无论如何改变，命运物外三种，要么敢于表露个性被杀掉，这种人很少，比如说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要么敢于隐藏个性，装糊涂保命，如阮籍，如各位隐士；大多数都选择了第三种，当奴才，听领导的话，为领导办事。

在中华文明强势之际，知识分子基本上被政治同化了。得志去当官，杀别人或被杀掉；不得志去隐居，有时写点诗歌留名，如读到——疏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便知那是隐士林和靖写的。

从汉代之后，知识分子冲击现实的途径有两种，要么就是战乱年代支持一个英明之人改朝换代，如李世民的十八学士；要么就是在和平年代为了某些事跪在皇帝门前请愿，如明朝那些跪在紫禁城外请皇帝上朝的文官。

两种途径只能算常规，算不上深刻，因为都没有触及到现实的根基——社会制度。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偶尔看见隐藏着的铮铮傲骨，比方说文天祥。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的几千年，知识分子们都在细心修补这中华文明。代表性群体就是唐朝之后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学派，如宋明理学。一直修补到中华文明遇到生存危机，才开始思索改变中华文明孕育出来的政治制度。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文明入侵东方文明，随着传统的华夏文明没落，东方的知识分子再一次试图真正意义上冲击社会现实的根基——政治制度——如同两千年前的前辈，春秋时代的知识分子那般。代表性人物就是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代表事件就是他们搞出来的戊戌变法。

尽管变法搞得不伦不类，最后还是失败了，但知识分子的脚步没有停下。一批知识分子聚集在孙中山周围，跟着孙中山推广“三民主义”的那帮人，一直推广到国民党离开大陆。

包括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也是试图改变社会制度。只是民族危机面前，他们多半从国外寻找政治体制，思考层次不及百家诸子的原创性高明。

在这个过程中，热血的年轻人越来越不安于书本，时不时跑到街上宣扬各种理念，也就是形形色色的学生运动。标志性事件当然是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号的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它诞生在传统的中华文明最为低谷耻辱的时刻：军阀混战、列强入侵，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却要割让主权。

所谓五四运动，从狭义上讲，就是一帮学生不想念书了上街瞎折腾；从广义上讲，则是传统华夏文明孕育的精英，不堪传统文明没落的屈辱，要斩断传统文明走向新生。其意义已经诸多宣传，这里不再累述。

五四运动之后，青年学冲击社会现实成为一种潮流。每当社会动荡，总会有学生跑上街去爱国，比方说抗日战争之前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年轻人一直运动，运到到新中国诞生，消停了一段时间。因为积弱百年的国家再一次新生。年轻人把精力和热心投入国家建设中去。

共产党搞反右派斗争，他们也忍了。然而随着大饥荒的到来，随着高层之间的矛盾分化，社会再一次出现混乱。混乱的社会状况刺激了潜伏在年轻人血液在的不确定因子。

——热血再一次沸腾了。

——他们决定再一次冲击社会现实。

如果说建国之前的历次学生运动的目的是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卖国、反独裁；建国之后的学生运动目标则是反官僚主义、反修正主义等等，他们反对的正是当年在五四运动精神熏陶出来的人。学生运动还是学生运动，只是学生运动的土壤变了。

客观意义上讲，所谓红卫兵运动，不过是继承了学生们面临社会混乱时便会运动的传统。但是他们必须面对现实。五四运动的学生们砸了曹汝霖等人的家，那是爱国。红卫兵抄了彭真等人的家，那是搞破坏。原因无他，客观现实变了而已。

理解了这一系列知识分子冲击社会现实的历史，解释红卫兵的行为。迄今为止，红卫兵并不是最后一起学生冲击社会现状的事件。学生最后一次冲击社会现实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当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冲击到中国，学生再一次走上街头，史称八九学潮。

为啥要勾勒这个呢，因为这是也是一种承传，属于文明范畴内的一部分。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种承传，将会老化、腐朽、衰弱、死去。这个地球上出现过许多文明系统，大绝大多数都衰亡了。我们仔细考察一下那些已知的衰亡文明中，它们有过辉煌（如古埃及文明）、有过伟大的帝国（如古波斯帝国）、有过先进的创造（如玛雅文化体系），但就是看不见这种承传——即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不断冲击，或许这是文明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看看如今最为强势的欧美文明，恰好是对“知识分子冲击社会现实”容忍度最高的。

——尽管这种承传有时候会表现为反作用。

提起红卫兵运动，有人把自己摆在受害者的位置上呻吟，还可能掉几滴眼泪；更有人咬牙切齿，紧握双拳，做愤怒状。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对于呻吟者要同情（对他人的人道），对愤怒者要无视（对自己的人道）。在这里不需要别的，只需要的是理解。因为一旦社会出现大的困难或者说变故，依然会出现大批知识分子走上街头、深入社会阶层、冲击社会现状的局面。

**起源和结构**

说起红卫兵的起源，资料记载非常简单。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号那天，清华大学附中的一帮干部子弟在圆明园遗迹聚会，激动玩乐之余，他们决定搞点花样，说咱们成立一个保护毛主席的秘密组织，咱们是红卫兵。

三天之后，他们在清华附中张贴大字报。大字报是一种传统，即物质贫乏时代的一种宣传方式。但这张大字报与众不同，因为它的署名是——红卫兵。

此后——红卫兵——几个字迅速成为一种流行元素。北大附中开始辐射，整个海淀区，整个北京城，从北京到上海到全国，从中学到大学，红卫兵组织迅速涌现，如同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短时间内席卷神州。

特别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号，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增加速度是爆炸性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一群中学生想要成为保卫毛主席的卫兵？是他们自发组织还是有高人指点已经无从考察。但是这事透露一个事实：就是经过建国十几年的广泛宣传，毛主席已经成为一个深入到各个角落的符号，在新一代的年轻人心中，分量已经非常重大。

年轻人容易崇拜偶像，周杰伦的粉丝、刘德华的粉丝、科比的粉丝、梅西的粉丝、乔布斯的粉丝、韩粉、哈日派等等都有一个巨大的群体，有部分人相当狂热。如果把这些粉丝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会怎么样？当然现在没人又这个魅力。但是在半个世纪之前，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可没有什么“天王”“天后”“巨星”去崇拜，只能崇拜伟大领袖，都是毛泽东的粉丝。而且他们在当初革命精神的熏陶下，远比如今的年轻人狂热。

在那个相对单调的年代，在那个如火的年代，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去诠释一代人的梦想。一个由狂热的年轻人组成的巨大群体，结构必然是复杂的。红卫兵大概可以分为四个派别：血统派，保守派，造反派，极左派。

红卫兵起于血统派，也就是老红卫兵。说起红卫兵构造，有人或许还不知道，最早的红卫兵清一色的高干子弟、正统红二代，比如毛泽东的闺女，比如贺龙的儿子，必如刘少奇的孩子，必如叶剑英的女儿，比如等等等。他们号称老红卫兵，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号之前诞生的红卫兵。那个年代虽然物质贫乏，老红卫兵绝对是衣食住行有保障，看病有医生，不愁找不到对象。

他们为啥这么干呢，是有原因的。人嘛，到了一定年龄段，自我意识就会崛起，会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思考问题。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观点和使命。如果说以毛泽东为首的那代人使命就是革命，就是建立一个国家。那么他们的后代也将有自己的定位。

红一代基本上都是白手起家，身经百战而不死。这样家庭里的孩子，家庭教育自然是红色的：要学习伟大领袖和你老爸、不要忘记革命传统、防止坏人窃取国家领导权等等。孩子们本身就是诞生于战火中，长于炮火连天的世界，比较懂事早熟，性格比较强悍。

一九六六年，他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年纪，都要思考一些问题，即如何定位自己的人生、实现自身价值等等。家庭教育加上年轻人的英雄主义情节，自然而然选择类似于英雄的父辈们走过的路，即搞革命。

恰好当时的社会现实给了他们搞革命的理由：经济建设不景气，政坛风起云涌，毛泽东和刘少奇为首的两派人各自摆出了自己的建国思路。年轻一代渴望表达自己的观点。于是他们就仿照父辈们走过的路，建立自己的组织，拿出自己的提纲，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宣称接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批判学校、领导、老师、基层组织，一句话，就是要“造反”。

这种自发的造反行为可以理解为在英雄主义面纱下的青春冲动。他们的造反行为有严重的血统论倾向。当时流行一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如果血统论也算数，那么中国现在还是秦始皇的后人领导呢，那胡亥应该和他老爸一样威武，那林立果应该和他老爸一样牛叉，可能么？所以说这种行为比较幼稚。但这种幼稚的行为揭开了更为广泛的红卫兵运动。

刘少奇和邓小平决定把这群激进的年轻人消化溶解掉。具体办法就是派遣工作组去校园，首先承认红卫兵的“左派”“革命派”地位，一步一步恢复共青团组织，扶持愿意接受领导的学生为领袖。对个别不听话的顽固派分子则予以打击。说白了就是，各位小爷们，不要闹了，即使要闹，也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闹。

工作组颁发了很多共青团委员、文化革命化委员等证书之后，红卫兵们依然我行我素，不愿服从领导听指挥。答案很简单，贺龙林彪的儿子有必要听公安局领导么？毛泽东、刘少奇的孩子有必要去听校党委的啰嗦么？都是高干子弟，没必要依靠基层组织。相反，基层却成了他们冲击的对象。因为在他们看来高层是好的，出了问题自然在基层。一方要管，一方不服管，双方矛盾日益尖锐。然而僵局并没有持续很久。

七月十八号，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已经做出了人生中最后一个重要决定，世间再也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实践自己的决定了。七月二十号，他找到中央负责人谈话：“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是写不出来的。大字报写得好。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

谈话之后，工作小组被迫撤出校园。

红卫兵们赢得了“革命”的一个胜利，拍拍身上的灰尘，抖擞疲惫的精神，抄起笔墨和口水，继续战斗了。很快他们又收获另一个更大的鼓舞。八月一号，建军节，毛泽东写信公开支持红卫兵。有了伟大领袖的支持，革命小将们乐颠了。

他们的胜利在十七天后达到巅峰。那一天，七十三岁的毛泽东登上天安门，亲自接见红卫兵，让他们沸腾起来。然而很快，老红卫兵们就惊奇地发现革命没路了。因为更为疯狂的红卫兵——造反派——出现了。造反派不仅仅要打倒黑五类，还要打倒高干们，也就是老红卫兵的父母，红一代。

叶向真，叶剑英元帅二女儿，生于一九四一年，文革爆发时二十五岁，当时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导演。叶剑英本人对运动非常谨慎。而年轻单纯的叶向真被卷进去了，成了“毛泽东细想战斗团”小头头，可谓热血燃烧、激情澎湃、斗志激昂。当时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体刚刚诞生，批斗会还没有开。中央文革一帮人四处宣扬说那几个老家伙是反党的，是牛鬼蛇神，不能让反党的牛鬼蛇神好过。中戏的红卫兵决定响应号召，把四位牛鬼蛇神拉出来一起开批斗会。

在指哪打哪精神作用之下，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两辆卡车驶向彭真大门。红卫兵从卡车跳下来，把一封重要的信交给门卫，趁门卫看信之际冲进去，直接从热被窝里把彭真抓走。同时抓走的还有陆定一和罗瑞卿。因为没有找到杨尚昆的住宅，开批斗会时四个人没凑齐。

为此，江青还把叶向真等人请到中南海吃一顿，表扬一番，大意说：你们干得好，革命后继有人了。周恩来很快知道是叶向真干的。这事肯定瞒不过周恩来，也难不倒他。小丫头片子，眼皮下面长大的嘛，好办。

周恩来就把叶向真交等人过去，笑眯眯地对他们说：“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见了周叔叔，小丫头当然要乖一点，但又不能把到手的“革命成果”送出去，只能半真半假说：“藏在一个安全地方啦。”周恩来对时局和红卫兵的心思了如指掌，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曰：“你们看不住，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吗？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就这样，首次出现了“中央一级”批斗大会，轰动全国。

但是很快，叶剑英元帅也深陷二月逆流，遭到冲击。叶向真也受到牵连。她被关押在一个九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与世隔绝。一开始觉得没事，两三个月后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叶向真明白了，并不是要关她，而是要对叶剑英动手。这样叶向真就陷入一个尴尬境地：弄不倒叶剑英，就不会放叶向真出去，弄倒了叶剑英，更不会放叶向真出去。总之是出不去。她曾想干脆死了算了，活着也没意思。幸好她没死，因为她找到事情干：在牢中钻研起中医，试验针灸。操作过程：趁提审时，在桌子上偷偷捡了根大头针，又从扫帚上截下一小段小铁丝，在水泥地上磨成针，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双城记》里那位老医生，在巴士底狱待了二十年之后，出来时人都傻了。其实用不了那么久。四年之后，叶向真从单人牢房里出来，几乎不会说话了，人也迟钝很多，直到一年后才基本恢复正常，惹得叶剑英老泪纵横。

叶向真出狱之后，真的成了一名外科医师。若干年后才拾起儿时梦想，干起了导演，改编的曹禺戏剧《原野》成为第一部走进威尼斯电影节的亚洲电影。但是这部片子在香港放映了十年之后才得以在大陆放映。叶向真晚年，吃斋念佛。

八月十八号之前，是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老红卫兵的天下，之后他们随着父辈们的失势退出历史舞台。工作组退出校园之后，面对来势汹汹的红卫兵小将，政府机构的各位大人自然不甘坐以待毙，他们组织、扶持了自己的红卫兵，也就是保守派红卫兵。

和老红卫兵不一样，保守派只是跟风的墙头草。他们的特色：没有家庭背景，想干革命又不敢拼命去干，就是凑热闹的。大串联时代到处游览观光的是这些人。

这派人要想存活，必须依靠基层组织。需要政府给提供火车、汽车，提供食物。这一派门槛很低，只要爹妈不是反革命分子，都能加入。因此这部分人数量惊人，全国各地都有。

红卫兵运动本来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领导的，是自下而上的，本质上是搞革命破坏的。如果红卫兵听基层政府的话，也就丧失了造反功能。但是这些红卫兵也不能说就是保守派，本身也会批判一些人，比如说学术界公认的右派啥的，也会冲击一下机关单位，前提是政府和基层部门允许。就好比搞游行，先请示好政府，走在政府划定的路线上。

所谓保守派，就是相对听话的一派。等到造反派兴起，政府组织瘫痪，这群跟风派又成了造反派的跟屁虫，去批斗大会上凑人数；游行时汉口号；屁颠屁颠去跟着人家抄家，偶尔顺手牵羊，塞点黄金在口袋里。据叶向真回忆，当年天安门广场上，每一次接见之后都能捡到金子。都是红卫兵抄家时塞顺便塞到口袋里，到天安门打坐朝圣时挤掉的。掉了也不敢捡起来，以至于白白丢在天安门广场。当时负责安全工作的是叶剑英元帅，非常愤怒曰：“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不知道会学成什么样！”

评：保守派不是头头，没有冲锋陷阵，推波助澜而没有承担责任。之后上山下乡，回到城里之后，又下海经商。他们一直隐藏着，等到文革被否定之后，他们又成了所谓文革受害者，满身伤痕之人，哭哭啼啼，样子很不好看。

真正有破坏力惊人的是造反派。

造反派的造反精神和老红卫兵是一致的，都是以冲击基层政府为己任，四处煽风点火之人；但出身和保守派一样。要加入这一派没啥门槛，需要胆子大，敢闯敢干。这帮人由于在文革初期积极参与造反事业，却没有家庭背景，经常被领导拉去批评教育。特别是工作组进入学校之后，他们成为被打压的对象。工作组那帮人也不是吃素的，管不了高干子弟也就算了，还管不了你们这些瘪三？当然要管。比方说蒯大富同学，曾经在工作组的指挥下，遭受上千人围攻。工作组挖掘出很多右派学生，搞阶级斗争，有人当场被斗昏，有人被迫自杀。工作组撤销之后，这些所谓的右派学生又成了造反派中坚。

他们不仅仅被领导打压，还被老高干子弟们看不起，成为不让革命的对象。然而他们虽然出身低微，血液里却流淌着不安定因子，渴望打破束缚、渴望造反、渴望被认可、渴望功成名就。他们是有才的，突破千军万马的独木桥，成为早期大学生。他们视红一代领导人为奋斗目标，渴望像他们一样，通过自身革命和自身努力走向成功。

一句话，他们敢闯敢干不怕死。

他们的父母清清白白，不涉及政治和利益，全无后顾之忧。一旦失去法律法规束缚之后，各种打、砸、枪自然不在话下。

开批斗会少不了他们，抄家少不了他们，砸文物少不了他们。战斗力极为强悍。他们是毛泽东真正需要的人。因为毛泽东要借红卫兵之手砸烂行政系统。老红卫们有革命精神，但也有致命缺点，因为他们的父辈基本上都在行政系统内部，干起事来会有顾虑，而且他们数量有限，集中在北京地区，远远达不到需求。

造反派就不一样了，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只需要发动起来，天南地北的官僚机构统统的、统统的别想有好日子过。凡是当官的，别想安稳。别说搞腐败、贪污、包二奶，当孙子不像样也要烧一烧，烧到服气为止。那些著名的红卫兵领袖们就出现在这一派中。如蒯大富同学，就是造反派中的杰出代表。

造反派固然牛叉，还有一个更为牛叉的派系，叫做极左派。这个派别的门槛极高，不是一般人能加入的。如果说老红卫兵讲血统，造反派需要胆气，极左派需要另一个词——思想。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旦涉及到思想，门路就会很窄。因为能思想的人历来都是稀有品种。权贵年年有，有思想的人则凤毛麟角。看看代表人物杨曦光同志。

杨曦光，生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六号，死于二零零四年七月七号，享年五十六岁。他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杨小凯。

外表：斯文，腼腆。

性格：深思。

人生经历：传奇。

一九九八年，有一本书出版了，书名叫《经济学原理》，作者杨曦光，该书被以于誉为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之后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代表作。对于该书有一段经典的评论：“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

该书让杨曦光成为当时最牛的经济学家之一，成为最为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如果多活几年，也许就获奖了。总之，这是一个脑细胞极为活跃之人。

文化大革命之际，杨曦光的身份是红卫兵思想家。

文革开始，腼腆的杨曦光倾听了伟大领袖号召，投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为此他付出了精神、思想，还有牺牲。当时两派都在很厉害，经常有军人抓红卫兵。比方说武汉，比方说甘肃，都发生大规模军人镇压红卫兵事件。杨曦光所在的湖南也发生军人镇压红卫兵的情况。当时军队镇压一个叫“湘江风雷”的组织。杨曦光虽然也是造反派，却不是抓捕对象。

此情此景让十九岁的杨曦光愤怒了：他和几个同学在军队大肆捕人之际，面对大街上到处是上着寒光闪闪剌刀的枪杆子，针锋相对地组织了一个红卫兵“夺军权战斗队”，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指责省军区镇压群众组织很混蛋。——有种。

结果很显著：杨曦光也被抓了，平生第一次尝到坐牢的滋味。虽然坐牢，却成了一个英雄人物。两个月后，这个英雄人物出狱了。当时正是运动高潮之际。按说这样的英雄应该大有可为。然而杨曦光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他在思考。

杨曦光把他的思考之后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该往何处去？》。这本书内容相当大胆出位，到什么程度呢，超出了造反策划人江青、康生、陈伯达的承受极限！

康生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杨曦光）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

位居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竟然在讲话中号召：“凡是受杨曦光这些人蒙蔽的人都要回过头来，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江青更直接：“（杨曦光）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他见鬼去吧！”据说后来杨曦光在长沙得知大家的反应，怅然曰：“想不到康生水平竟然这么低！”

周恩来更是亲自批判这本书，说他的毒害程度和蒋介石当年的大作《论中国之命运》相当。这个比较绝对是不公平的。蒋介石的大作涉及很多专家学者的心血，杨曦光的书绝对是自己写的，而当时他还不到二十岁。这事表明了一个事实：杨曦光的脑细胞非常发达！

闹出这么大动静，结果已经注定，再次进入监狱，长达十年之久。十年之后，三十岁的杨曦光出狱、成了一名技术工人，三十二岁考入社科院，三十三岁留学普林斯顿大学，四十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四十二岁被澳洲莫纳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四十五岁当选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四十六岁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五十岁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五十二岁成为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的首席教授。

杨曦光，典型的深思型人物，牛。

这就是极左派的门槛，一般人是进不去的。

**八日定乾坤**

走上革命之后，毛泽东一生有三个重要决定。第一个决定是跟蒋介石争霸天下，这个决定之后，解放战争爆发，四年之后，共产党一统天下，决定顺利实现。第二个决定抗美援朝，三年之后，决定基本实现。第三个决定，文化大革命，要砸烂行政系统，这个决定用了多久你，十年？不是，实际上只有八天！

八天之后，所有要打倒的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村干部，全部成为刀俎上的鱼肉。如同待宰羔羊那般，战战兢兢等待命运裁决。然而与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不同。解放战争四年打垮了敌人，结束之后也就结束了。抗美援朝三年实现战略目的，敌人退了，退了也就退了。文化大革命八天决定了“敌人”的命运，清扫工作确一直结束不了，整整持续十年！

十年之后，当事人都尘归尘土归土了，问题还悬在哪里！

从六月二号红卫兵诞生开始，他们就和领袖紧紧连在一起。

可以说他们很幸运，诞生在一个领袖需要的年代；也可以说很可悲，因为他们诞生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并为此付出代价。说幸运，是因为年轻时代他们狂欢过，毫无节制的狂欢过。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的年轻人享受过如此巨大的狂欢派对。说可悲，是因为狂欢的时间是短暂的，曲终人散之后，每个人都付出了代价，比方说杨曦光。

从八月十八号到十一月二十五号，毛泽东前后八次接见红卫兵，总数量超过千万人次。每次接见，人数从七十万到二百二十万不等。那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安排一个人和上百万人见面、互动、喊口号，绝对不是简单的事。百万人集中在一个地方，治安压力多大？吃饭睡觉怎么办？最为关键是要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一旦发生点意外，就可能牵扯到成千上万的人。难度不低于指挥一场战役。八次接见均有周恩来直接指挥。当时周恩来六十八岁，常常为准备工作熬通晓。毛泽东更为年长，七十三岁。

八月十八号夜，毛泽东整夜未眠，因为天亮时他要去看红卫兵小将们。天亮之前，他决定穿上军装出现在革命群众中，增加会见的象征意义。这是毛泽东建国之后第一次穿军装，五五年评评军衔，曾打算给他定制一套大元帅制服，他不要。没有军服，就从一个魁梧劲舞团干部那里借了一套军服凑合一下。

早晨五点钟，七十三岁的毛泽东就登上天安门。此时天安门广场已经人山人海，领袖的出现，广场沸腾起来。在《东方红》乐声中，八十万年轻人手持小红书从天安门广场经过，高呼毛主席万岁。除了挥手汉口号，还有感情互动，一千五百名红卫兵代表请上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亲切”会面。核心部分则是双方讲话，政府方面由林彪讲话，学生方面由红卫兵代表讲话。整个过程犹如一场盛大的“无产阶级狂欢大会”。

从第四次开始，规模越来越大，数量均在一百万以上。巨大的天安门广场显得太小了，不得不采取其他方式。比方说第五次接见，也就是十月十八号，从天安门西标语塔的马路上起，途经东长安街、建国门大街、东三环、北三环至北太平庄的马路上，排列了一百五十万万名红卫兵，全程五十里。毛泽东坐乘敞篷车，从红卫兵的夹道中间徐徐通过。两边的红卫兵欢呼连天，掌声雷动。

十月份之后，北京的深秋很凉。许多外地红卫兵没有衣服，吃住也困难。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城就超载了。半个世纪之前的北京城肯定不能和现在比，一下子涌入几百万人口进去，衣食住行肯定是大问题。中央决定疏散他们回原地。但年轻的红卫兵也有种：没有看到毛主席，坚决不回去。宁愿在京城喝西北风也不愿意回家。没办法，接下来又组织三次接见，接见人数超过五百万。

接见这么多人，对毛泽东而言，总共也就用了八天时间。

八天的时间，八场无产阶级狂欢大会。

所谓无产阶级狂欢大会，狂热的氛围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你们好好干吧，不会有人管你们，没有人敢管你们；谁敢管你们，我就去管谁。

八场狂欢大会之后，年轻人回到全国各地，化热情为战斗力，把整个政府基层砸稀巴烂。也就是说，毛泽东用八天时间就决定了一个国家行政系统中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如此效率可谓空前绝后！

**第十二章 红色进行曲**

**狂欢**

这么说吧，放任一个人，不去管，看看会出现怎样的后果。

按照某些规律，人，首先要吃饱喝足，之后就会追求点其它消遣。

如果市井之辈失去有效约束，如西门庆同志，如当今各种极品二代，找良家妇女调戏一下。因为拥有手中的资源超过脑袋拥有的智慧，饱暖之后脑袋里基本上只能容得下——淫欲——二字了，充其量再加一个——赌——字，个别极品的，还能装得下一个——毒。这种人的功能就是为某些人提供创造的，比方说兰陵笑笑生先生让西门庆名垂千古。可惜笑笑生之后再无笑笑生，以至于当今各种极品成为时代过客，可叹。

如果失去约束的是艺人，那么个别人会怎么办呢，可能会脱光衣服制造新闻，可能会留下各种“门”给大家欣赏，通过高科技手段记录下来，如照片和摄影。某些人兴致高昂，还会拉其他人垫背。因为他们需要话题、新闻、人气，再用这些玩意兑换金钱。这种人的功能是考验国人道德底线，推动世风下沉。世风下沉就能生产更多二杆子。

商人失去控制，那么诚信将失去，古有仙丹、还魂丹等高档货，今有地沟油、毒胶囊等等低档货。造假走私就会满天飞。当商人造假走私之际，就会拉动官僚搞贪腐，制造低智商二杆子。造假走私足够多之后，还会推艺人进一步考验国人底线。因为商人背离诚信之后只剩下一个字，奸。它是人类心灵中最为恶心、顽强的病毒之一。

在中国这个地方，唯一比商人的——奸——更邪恶的字眼，就是官僚的——贪。

官员失去控制会怎么样，就会疯狂的搞腐败，正如明朝某年的官僚，正如当今某些官僚。腐败二字，相信大家都明白，无需解释。如果是封疆大吏那就更不得了，唐代的安禄山，一念之差把繁华的大唐盛世推入低谷；大饥荒时代的五虎上将，把中国人口减少千百万。

如果是相对单纯年轻人失去控制呢？他们会说，小爷告诉你们，当官不能搞腐败，做生意不能奸诈，当艺人不能脱裤子，有牛逼的老爹也不能出来显摆。从道德角度上来看，确实是这样。然而道德总归是道德，如同一柄锋利的刀子，拿过来切割现实世界，会杀伤一大片。如果手握刀子的人足够强大，会血流成河。

半个世纪之前，毛泽东告诉年轻人，单纯的孩子们，用你们的世界观去清理现实世界吧，不用担心保安会拦你们，不要担心警察抓你们。去改造这世界，去清理这世界的垃圾、蛀虫、堕落者，努力干吧，有我在。

于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那个时代虽然没有人贪污千百万，没人走私千百亿，没有人各种艳照，没有多少二奶或妓女；依然有足够多的问题，比方说谁是资产阶级代理人？谁是美帝的特务？谁是苏修的走狗？谁是恶霸、汉奸、军阀以及他们的代言人等等等。

客观上讲，这些人都有。先不说这些人应不应该清理。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大一个辩论课题。但说到清理的手段：如何清理？这是一个技术问题。

按道理说，说某个将军叛国，必须给出证据。话说回来，即使某位将军叛国，那一定是秘密行事，那些天天在教室里念书，却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少爷姑奶奶们如何懂得侦查技巧？同理，说一个政治家搞修正主义，打着红旗反红旗，也需要足够的理由。

找理由，恰好不是年轻人的强项，因为他们没有搞过实践，也就不知道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所以说，这事从一开始就存在巨大的隐患。

年轻人思想相对单纯（好事），感情相对冲动（正常），行动相对激烈（可以理解），但是集体行动起来，就显得粗暴而幼稚。正是他们粗暴和幼稚的作风推动了文革最高潮。在那一波接一波的高潮中，许多人的人生迎来了高潮，许多人的人生迎来了低谷，许多人的人生高潮后又低谷，许多人的人生低谷后又高潮。

高潮低谷，低谷高潮，反反复复，无穷尽也，岁月由此而逝。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年轻人狂欢节之中，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在狂欢和灾难交织的过程中，大概有这样几个节目。

**第一个项目，大串联**

用现代的眼睛来看，根本就看不出大串联好在哪儿。大伙儿挤上绿皮车，很多人挤在一起，头靠头，脚靠脚，挤得喘不过气，有人在蜷缩在座位下面或行李架上，有人在靠背上练金鸡独立，比春运还拥挤。而当时恰好是夏天，车厢里没有空调，满身臭汗；更无法供应饮料或茶水，渴半死；甚至连上厕所都困难。那玩意搞不好还要停车熄火，活人可能被尿憋半死。最为困难的是女生，挤在一帮男生中间，极为不便。作家赵长天回忆云：“有个小子，才十三四岁，小巧玲珑地蹿上行李架。准是在家尿床惯了，高高在上好梦一场，竟淅淅沥沥洒下热雨来。底下恰是位面容姣好的姑娘，先还木然，待弄清水滴的来源，也只好满脸红胀地忍着，真是惨不忍睹。”

算狂欢么？好像是遭罪吧。这只是今天的观点，再过半个世纪回头看今天，大巴或火车也是效率低的惊人。二十世纪六三年代，建立在满目疮痍土地上的新中国，刚刚从历史最低谷中站起来，除了一股劲啥也没有。可惜的是，那一股劲又憋出了大饥荒。当时的中国，北京城只是现代北京的一小块，上海也是仅仅是现在上海的一小块，省份城市跟现在县级城市差不多，县级城市当时就是一个个大点的乡镇。市民的生活什么样呢，私家车、电话、空调之类的玩意就不用想了，能看到的也就是一点文件和几分报纸，都是领导非常英明伟大，买点东西还需要各种票票。至于农民，除非了打过仗、逃过荒的，基本上很少外出，一辈子进不了几次城，一年吃不了几次肉。但偏偏那个年头民族再一次崛起，国人都很强悍。

如此家庭出来的孩子又能怎么样呢？各种电子产品是没有的，各种书籍是没有的，各种零食是没有的，各种精神颓废也是没有的，强悍是有的，理想也是有的。即使是高干子弟、享受特供的家庭，物质也是有限。高干子弟毕竟有限。大多数孩子还是来自百姓家。民风还算淳朴、物质匮乏的时代，孩子自然是单纯的，世间的一切对他们而言都是新奇的。绿皮车也是新奇的，体验一下，如同现代乡村孩子坐飞机一般新奇。

人，特别是年轻人很容易被新奇的世界打动。在那新奇的体验中，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住宿不要钱。在某些接待站，还能借点零用钱。这样的待遇相当有吸引力。

——不用念那些该死的书了，路上还能逛一逛，看看风景。然而他们不用为此愧疚。因为目的不是看风景的——自身的使命。比方说大字报要批判校长，红卫兵要去校长家乡调查一下，看看校长是不是说的那么坏。校长是福建人，红卫兵是河北人，到了福建之后可能根本就听不懂方言，也就不了了之。当然，指望眼高手低的年轻人把调查进行彻底也是不现实的。调查不彻底无所谓，玩一玩也不错，有时候还能发生点风花雪月的事。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可不像现在有机会接触性知识和异性。

对当年那些年轻人而言，最大的吸引力当然是北京，当然是伟大领袖。在他们单纯的心理只有两个词，北京，领袖。这两个词浓缩了他们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他们忍着酷热跑到北京，喝稀饭、吃馒头、咸菜（待遇已经不错了），一直等到夏天过去才有机会见到领袖。然后是几十万人坐在天安门前远远看领袖一眼。

——所有的冲动、激情、梦想，只为在人海中看望领袖一眼。

**第二个项目，抓牛鬼蛇神**

当年轻人来整顿现实世界时，问题就来了。有年轻人认为，女孩子就应该保守一点，非但穿衣服不能露肉，而且不能穿高跟鞋，也不能留长头发。经常有这样的镜头：红卫兵在街头拔掉女孩子的鞋跟，减去她们飘逸的长发，美其名曰减去资产阶级尾巴。这种现象绝对不是政策宣传，而是不少男孩子在青春期因为性压抑而产生的对女孩子的仇视心理在作祟。当然这些只是小事。

红卫兵的主要工作是写大字报、辩论会、抄家、开批斗会、砸文物。

按照之前的设想，红卫兵运动是净化现实社会。方式就是通过下级斗争权贵、名流，把那些脑子不太洁净的大官贵人们洗洗脑，身体不太干净的洗洗身体。这些通过当时的法律是办不到的。法律办不到的事，只好由人民去办了。人民之中，活动积极、满腔热血、一往无前的年轻人是最佳选择。这些人有一个响亮的称呼，叫牛鬼蛇神。

第一步当然是写大字报。

大字报这玩意就不说了，遍地都是，内容激烈性、战斗性、犀利性远比网路上最职业的骂人专家牛。大字报的内容就是揭盖子。要批判市长，就写大字报宣传，某某领导工资和他拥有的财产数目不对，患了资产阶级病，成了资产阶级混入无产阶级队伍里的害虫，现在要求他对我们人民群众交心交底。他的精神出现了问题，成了牛鬼蛇神。我们革命小将要根据毛主席思想，对他进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让成了牛鬼蛇神的市长先生重新变回人。

如何救人呢，就让市长先生过来参加批斗会。如果市长先生恰好很忙，不想参加不要紧，红卫兵可以直接去市长先生家里或办公室，把市长先生扭到事先约定的地方，让市长先生交代自己的罪恶。罪恶是啥呢，就是市长先生的言行。通过揭发，很容易在市长先生的言行里找到一些句子，再采取断章取义、引申推理的方式加工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对自己的主子（人民大众）不敬的言辞。市长先生当然要自我辩护一番。

能混到市长地位，自身修为自然不低，基本上都是打过仗、办过公，都是文武双全的人物，嘴上功夫自然不差。再好的嘴上功夫也不行。因为市长先生只有一个人一张嘴，红卫兵却是一大堆。一大堆红卫兵中，也不缺能言善辩的，这是第一波；实在辩不过，还有无理取闹的（爱钻牛角尖的年轻人多得是），可以胡搅蛮缠；还有专门捣乱的等等。

市长先生毕竟不是诸葛孔明，不能以一敌百。诸葛孔明在江东遇见的辩论对手，基本上都是斯斯文文，而且当时地位比较高的人物。位高权重的市长先生面对的则是一群儿孙辈分的小屁孩，能不能吃得起馒头都是问题。要不是时事所迫，市长大人才懒得理那帮家伙呢。一想到自己堂堂大市长，被一群小年轻审问，心理就会波动，可能动气、发火，进而火上浇油。革命小将本来就是自以为站在道德高度代表伟大领袖清扫牛鬼蛇神的。牛鬼蛇神竟然敢于不配合，真是岂有此理！那就给点颜色看看，让牛鬼蛇神们知道何为长江后浪推前浪，让他瞧瞧后浪怎么把前浪推倒在沙滩上的。

给颜色的方式有多种，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戴高帽。所谓戴高帽，就是用纸篓子当帽子，上面写上标语或画个王八等等，戴在牛鬼蛇神脑袋上。主要功效是精神羞辱。想一想，一个几十岁了，有头有脸的人物，大庭广众之下，立正站好，脑门上套一个有王八的纸篓子，被如此羞辱，情何以堪！

然而这只是开始而已，所有程序中最为轻微的一种惩罚。第二个基本方式是开飞机。所谓开飞机，就是低头、弯腰、撅屁股、双手最大限度往侧后方伸，这是一种体罚加精神惩罚。一般人年轻人而言，保持这个姿势一刻钟，那也是头昏腰酸腿打颤，而年事已高、可能还有三高症状的市长大人可能要被迫站几个小时。而且不得喝水、喊冤，上厕所要请假（不见得得到批准）。因为他成了牛鬼蛇神嘛。这是他应该享受到的革命教育。

进行这两关之后，成为牛鬼蛇神的市长大人就面临着困局：招还是不招？

不招，将面临更为严酷的批斗，拉出去游街关禁闭都是小事。为了表达无产阶级的愤怒，革命小将们可能做出如下选择：每人拔掉市长先生的一根毫毛，如胡须或头发。一人拔一根头发不算多，如果人数多、次数多呢？结论很明显：市长大人理发钱就省了。

所谓招，就是承认思想有错误，表示要改；就是因为本人不小心，占了公共资源，要改；本人不小心向牛鬼蛇神靠近了，但不是真正的牛鬼蛇神。这些是过不了关的。因为革命小将需要的是反革命、资产阶级代理人，是真正的牛鬼蛇神。招的不够，也要面对进一步惩罚。

招或者不招，市长大人都要面临下一步教育，即抄家。抄家没啥好说的，相当于老母猪进菜地，但方式有效。凡被抄的，均为显贵之家。黄金钞票古玩字画自然少不了，而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证据。不管你是谁，在当时整个国家贫穷，国人革命高涨的情况下，抄到这些玩意就注定完蛋了，注定沦为阶级敌人。接下来就是批斗会、关牛棚、劳动学习。如果市长不堪忍受，可以选择自杀，背负一个自绝于国家和人民的罪名去死。

这不过是一个个案，还有很多人要抄家，国家主席以下，达官贵人、社会贤达、豪门公子哥均要批判，他们的家也得抄。

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份到十月份，据不完全统计，红卫兵小将们战绩如下：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四百多亿元，黄金百万两，古董一千多万件，挖出“阶级敌人”一万六千多人，破获“反革命”案犯一千七百多宗，从城区赶走“牛鬼蛇神”数万人。

古董文物中，很多价值连城。比方说四件套宋代钧窑洗子，也就是碗，原本是清宫东宫的珍藏，一级国宝，当时市场价一百万（如今过亿），可以买八十八辆解放牌大卡车。

最为典型的就是北京宣武区一个豪门世家，红卫兵抄到文物古董、明清家具等各类物品就装满十七大卡车，仅古籍就足足装满三卡车。据说其家族祖上仅在明清两代都有人做过兵部尚书，近代还有人当过驻俄罗斯大使等高官。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其家门口因悬挂德国国旗而未遭劫掠。日本侵占北平，因驻华司令官久闻其名，千方百计进行拉拢，没有进行骚扰。解放后，其家庭要员又是彭真市长的座上客（彭真罪状之一），曾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节。在其家中还抄出三眼顶戴花翎，这玩意就不用介绍了吧。

所有古玩中最为重要的一件玩意是一份地图。这本地图本身不值钱，对整个中国却意义非凡。地图标定的中印边界。中印边界上，该死的英国佬弄出一条麦克马洪线，把西藏领土弄走七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半个浙江。中国当然不承认那玩意，但证据难寻，之前有过原始地图，但是不见了。这份地图是原始地图的副本，明显标注出所谓麦克马洪线很操蛋。一九五八年，周恩来还特地寻找有关中印边境的资料。地图本应由清政府保存的，不知怎样落到那家去了。没想到这次被红卫兵给抄到了，歪打正着。可惜的是，家族族谱被毁灭了，如此豪门世家，应该是研究中国古代贵族的活样板。

后来根据中央文革和林办指示，红卫兵把抄家成果搞一个展览。珍玩、古董、文物、玉石翡翠琳琅满目，钻石、宝石、玉石、翡翠熠熠生辉。某位古董专家先后次前往参观，管后感叹曰：可不得了！都是些货真价实的一流珠宝啊。有好多宝贝只听说过，没见到过实物，这回可算大开眼界了。

撤展之后，枪支送往公安部门处理，珠宝黄金之类的送交金融部门，古董文物送博物馆，各有归属。而地契、大字报、红旗等物品，至今堆在午门的一个仓库里。

**第三项，砸文物**

红卫兵抄家无数，在他们单纯幼稚的心理，每一次抄家都和胜利联系在一起。因为按照当时的革命理论，他们的行为无疑是革命的，无疑是对国家有利的，无疑是合乎伟大领袖指导思想的。所以越干越起劲，不仅仅中国的要批，外国也要批，比方说伟大的爱因斯坦同志，因为名气太大了，也成了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好在爱因斯坦不是中国人。

中在中国的各位名人就悲催了，活着的不能免，死去的也不能免。在红卫兵幼嫩狂躁的心中，红色革命史之外，一律要扫除。根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主要针对才子、佳人、将相、帝王，所有的一切都要统统的清除。

佳人代表人物，虞姬。虞姬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美人之一，她对爱情的忠贞感动无数人，她和项羽的故事流传千古。虞姬墓前，每年一度的虞姬花为胜景。千百年来，无数人前去凭吊。千百年来，当地百姓都把虞姬庙和虞姬墓照顾很好。然后红卫兵去把它们砸稀烂。理由，英雄美人是旧社会的大毒草，不能留下来害人。仿佛中国近代积弱是项羽虞姬造成的！也不动脑子想一想，如果中国男人如项羽那般豪勇，女人如虞姬刚毅，中国人将无所畏惧。

再看看才子这一栏，代表人物，吴承恩、蒲松龄、苏东坡、王羲之。

吴承恩的故居并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没值钱东西。几百年来，曾有无数人来此凭吊。不行，封建毒草，要清理。于是吴承恩故居没了。

蒲松龄是个教书匠，很穷，死后更穷，没有故居，墓地被挖。墓里除了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挖墓人竟然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更为恶劣的是他们竟然将蒲松龄尸体被捣毁。就因为没有挖到金银珠宝么？

大文豪欧阳修在滁州做太守时写下的千古名牌《醉翁亭记》。苏东坡看望欧阳修时，把文章亲手刻成石碑立于滁县琅王牙山，已经存世已进千年，属于书法家至宝。红卫兵不仅将碑砸倒，还本着造反倒地的精神，认真仔细的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估计是凿累了，才把另一半保持下来。如果是抢金银珠宝，也能理解。——如此愚昧的学生，只能说是教育的悲哀。与此相似的是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也被毁于一旦。王羲之的字啊，在那个时候真是一毛钱不值。和王羲之苏东坡的字相比，什么康生、陈伯达、舒同这些党内书法家恐怕连浮云都算不上。

再来看看将军这一栏。

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中出了大力，帮过共产党大忙，并且因此失去一切，全家被国民党处决。可是在红卫兵眼中，一日国民党终生国民党。依然砸烂扬将军的墓。于此同样待遇的还有抗日名将张自忠，衣冠冢也被毁了。连被毛泽东、周恩来亲自肯定的戴安澜将军的墓都没能幸免！可见运动之疯狂。理由：他们都是国民党反动派。

如果说他们和国民党有关，那么两千年前，成为了汉帝国版图开疆辟土的名将霍去病呢，他的墓地竟然也給破坏了。难道说理由是霍将军扩大了中国地盘？

最难以接受的是，岳飞的墓竟然也被掘了。岳飞一生为国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是民族英雄。宋之后历朝政府，均视岳飞为英雄。他的墓被挖的理由：为了封建帝王服务。人家岳飞也就是血肉之躯，又不能穿越到千年之后看看人民民主专政是啥样。同样待遇的还有明朝最后的支柱，名将袁崇焕的墓地。

名臣这一栏也差不多。

中国最有名的宰相大概要数诸葛亮，号称千古人龙，被膜拜千年。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也不能否认，诸葛亮是个第一流的政治家、第一流的管理者。正因为名气太大，所以南阳诸葛庐、汉中定军山都有保存。红卫兵有了发挥空间，把它们砸个稀巴烂。诸葛亮怎么得罪红卫兵小将了？只因为人家没有念书便出将入相？理由是有的：地主分子。

张居正大概是后宰相时代权力最大的大臣，同时也是古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正是在张居正的努力下，明帝国经过荒唐的正德、嘉靖、隆庆三个祖宗折腾半个多世纪之后，得以短暂中兴。所以张居正也成了红卫兵目标。红卫兵砸烂他的墓，毁了他的尸骨。可怜一代名臣，一代人杰，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中国人是一个有清官情结的民族。历史上最有名的两个清官便是包拯和海瑞。在人治时代，他们两个老古董就是官吏的楷模，雷锋一样的精神模范。虽然法制社会不应该想念青天大老爷，就从为官节操而言，包拯和海瑞也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两人的墓地也成了红卫兵挖掘对象。他们跑到合肥去毁了包拯衣冠冢，又去海南掘了海瑞的墓地。破坏包拯和海瑞的墓，在民间，尤其是法制思想比较淡薄的时代，影响之坏不次于毁岳飞和袁崇焕墓地。

帝王这一栏最为诡异。

红卫兵虽然革命情绪很高，破坏力很大，但是去破坏巨型帝王陵墓还是不现实的。比方说武则天的乾陵，比方说秦皇陵，他们只能干瞪眼，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但是表面文章还是可以做的。比方说朱元璋的墓，挖不开他的墓，可以把巨大的墓碑给挖掉。可怜朱元璋，怎么说也重新建立汉人帝国。在他之后，再也没有过汉人开国皇帝。

虽然挖不了帝王陵墓，却可以挖比帝王影响力更大的墓地。比方说炎帝，炎帝陵墓被破坏了，仓颉的墓园被毁被破坏了，山西舜帝陵被破坏了，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破坏了，这些人是谁啊？可以说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却又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谁，因为他们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性符号。炎帝是谁啊，华人始祖，和皇帝并列。仓颉是谁啊，传说中的造字者。这些墓地或许是假的，或许是空的，或许什么都没有，但就是不应该动。需要原因么，需要理由么，不需要。这世界是个讲理由的世界，凡是还是清晰一点好。但也有一些事不需要理由，比方说挖墓，尤其是文明象征的墓穴，因为那是道德的底线。

红卫兵运动过火了，站在他们立场上看，有过火的理由。但是在挖墓这一项上，可以说是人品败玩，是不可原谅的。批判活人，虽然也过火，但每一个活人都犯过错，也不是不可以批。那些被批判中的呻吟者，本就有各种问题，大饥荒中绝不是清白的婴儿。

但是挖墓，那是自掘坟墓。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更为年轻的初中生，喊着——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口号走向康有为的墓穴，然后把康氏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有人拖着骨头游街，有人鞭挞那骨头，好像康有为的灵魂附着在骨头上。游街结束，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写着:“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康有为，民族之精英，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改革者，春秋诸子之后第一个敢于伸手去触碰政治体制之人。

那么多被破坏的墓地中，对时局走势影响最大的，是一个女人的墓地。

那个女人很平凡。所以重要，只因为她有一个不平凡的儿子，叫蒋介石。上海的一帮大学生领导宁波一帮中学生去浙江奉化县溪口蒋介石旧居破坏了蒋介石生母的墓。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毛泽东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过“准备进行行第三次国共合作。”金门炮战帮助了蒋介石一把（美国要联合国托管台湾）。同时又派双方老友章士钊传带信给蒋介石致以亲切的问候，把两党关系描述为：我们同你们谁也离不开谁，就像白居易《长恨歌》中所说“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又托人给蒋介石带去一首诗词《临江仙·寄友》

柳绿花红莺燕舞，

京都料峭风微。

菊香书屋奏琴徽。

依然明月在，

何日彩云归。

地覆天翻君亦老，

东征北伐声威。

草山薄雾拂单衣。

我今寻老友，

把手话心扉。

在毛泽东诗词里面，这首词水平一般，但意义胜过其它任何一首。

如果国共和谈成功，那么今天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乃至钓鱼岛问题都不是问题。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两岸关系中断了。蒋介石对生母感情极佳。生母墓地被破坏，也破坏了蒋介石对大陆的那一点点信任。相信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不想红卫兵去破坏蒋介石生母的墓地，然而他们都顾及不到。直到今天，还在期盼两岸和谈、拉关系、统一。台湾问题解决了，南海问题也就解决了。台湾问题是最核心问题，是主干，其它问题是枝叶。

**最严重的一次破坏**

破坏是无止境的。千年的珍惜抵不上一朝冲动。世界佛界至宝，释迦摩尼在世时亲自开光的八岁等身像为佛界三圣像之一，不容易被毁灭，却被糊弄得面目不堪。

吐鲁番附近的火焰山上有个千佛洞，里面有很多珍贵的壁画，曾被俄、英、德等国的无耻之徒盗割，贩卖卖到西方。成为国外博物馆珍品，想来每每义愤填膺。还有一部分壁画仍在，却遭到更为残酷的破坏：造反派将剩下的壁画中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这大概是史上最为恶心、下流、无耻的破坏。

最为严重的破坏发生在山东曲阜。红卫兵砸了孔庙，挖了孔坟。说这事之前，先要介绍一个人。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谭厚兰。

谭厚兰，女，湖南望城人，一九三七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之家。五八年在湘潭一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同年入党。六一年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六六年名扬天下时，年仅二十九岁。红卫兵狂潮到来之前，谁也想不到那个个头不高、体态瘦小、带着一副小眼睛、生活简朴的大龄未婚女青年有如此巨大的能量。

当北大老佛爷聂元梓贴出第一章名扬天下的大字报时，甚至北师大的谭厚兰立马跟上，矛头直指校领导。也就是说，谭厚兰女士是早期红卫兵之中的出头鸟。出头鸟都要付出代价，谭厚兰也一样，当刘邓工作组进驻校园之后，向她这种没有家庭背景的人就成了批判斗争对象。暂时的批判斗争没有降低谭厚兰的战斗力。

工作组被领袖撤消之后，谭厚兰来个华丽转身，成为北师大左派代表，成了造反派领袖。随后以弱小女流之身，组建“井冈山战斗团”，又成功联合群众，大大扩展了人员和规模。仅仅几个月之后，这个来自湖南乡下的剩女就有了自己的地盘和山头，如同大兵团司令一般神奇。地位和名声扩展之快，远胜任何一个革命时代的将帅。

此时的谭厚兰，这个祖祖辈辈都某某无闻的女人飘飘然了，在胜利的光环中，她觉得仿佛变成了一个热血沸腾无所畏惧的勇士。正因如此，谭厚兰进入了中央文革的视线内。中央文革那帮人打算利用谭厚兰干一票大的。老奸巨猾的康生把谭厚兰找去，让她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孔老二的反。“我想了三天三夜，画了一张那里的印象图。”康生把自己画的图交给谭厚兰，阴险地说：“到那里，该砸什么就砸什么。”

——从此，谭厚兰迎来人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人生之中，总是机遇和陷阱并存，能否识别就看个人的造化了。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一个陷入历史罪人的陷阱；谭厚兰却认为是一个机会，一个名扬天下的机会。

于是谭厚兰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带领井冈山战斗团两百人，又经过一番串联游说，在曲阜成立了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

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号到十二月九号，前后二十九天的时间里，战绩如下：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各种字画九百多轴，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七百余册；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在孔林中刨平上三代坟（孔子及儿子孙子），挖掉下三代坟（安葬在孔林的最后一个“衍圣公”孔令贻及父亲祖父），扒出五具尸体：孔祥珂及夫人，孔令贻及其妻妾，鞭尸批判，曝尸示众。

这些还没完，由于从棺材中清理出的元宝、翡翠、手镯等随葬品装满了一箱子。它们触动了潜伏在人心中那黑暗的欲望，以致半个月后，引发一次群众性的扒坟狂潮，把孔林的三千余亩、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的地下随葬品，洗劫一空。其恶劣程度，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只有拥有军阀、走狗、汉奸三重身份的石友三火焚少林寺堪与之相比。

——这是文革时代，中国文物典籍蒙受损失最大的一次。谭厚兰及其随从的疯狂行为、以及因为疯狂行为引发的更为疯狂的行为从此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谭厚兰出名了，一时间轰动京城。

她的表现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肯定和赏识，脑袋上的光环越来越多，不仅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又兼任了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和北京市革委会常委，还与姚文元一起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过阿尔巴尼亚，她担任副团长，出尽了风头。荣耀来的太快太突然太猛烈，超过那个来自乡旮旯的大龄女青年的心理预期。接下来她能干的也就是顺应形势，在打砸抢道路上一下子走到黑。

然而辉煌是短暂的，接下来就是黑夜。然后红卫兵分裂，两派斗争越来越激励，谭厚兰控制不了局面。随着工宣队进驻校园，谭厚兰失去了活动空间，然后被隔离审查，痛苦忏悔。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一九八二年因癌症死去，年仅四十五岁，未婚。五大领袖中，谭厚兰的结局最让人叹息。

尽管轰轰烈烈过，历史证明，谭厚兰最终还是个可怜的女人。

再说一说破坏孔子墓造成的影响。

孔子是谁啊，是中国，乃至中国文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甚至可以说那就是整个东方文化中最为重要的那个佛号。孔子的一生是孤独的一生、漂泊的一生、不被理解的一生、甚至是失败的一生。许多人说四川漂泊的孔子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但是他的主张在华夏走向统一之后开花结果，被推上神坛。

两千年的王朝，数百位皇帝，有雄才大略型的（如秦皇汉武），有风花雪月型的（如李后主宋徽宗），有荒淫无度型的（如陈后主），有满起来没有边际型的（如朱厚照）。但孔子只有一个。孔子之后再无孔子。正因如此，孔子之于传统世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不仅仅具备简单的“人性”，还有附加的“神性”。中国人没有信仰，视皇帝为天子，那么比天子地位更高的孔子自然有某种“神性”。这玩意孔子自己不知道，是后人加上去的。

孔子给了这世界一种思想行为方式，一种秩序。后人可以拒绝孔子的秩序，可以批判孔子的思想，挖孔子的墓有啥用呢？当然，挖了孔子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除去后人强加在孔子身上的多余的“神性”。然而当时的人们恰好不明白，去除一个人身上不正常的“神性”的最好的办法是批判和教育，而不是去挖墓。

挖了孔子的墓，相当于直接羞辱了孔子，自然不会有人再去尊敬崇拜孔子，大家不会认为孔子身上有超人一等的“神性”。但是大家心中对“神性”的崇敬没有消除。当年传统的国学大师、近代最为坚定的东方主义者辜鸿铭到北京大学任教，当他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们一片哄堂大笑，辜鸿铭则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是的，国人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心中对“神性”的依赖也是无形的。

破除了孔子身上的“神性”，却没有破除对是“神性”的依赖，那么“神性”就会转移到另外一个人身上，转移到毛泽东身上。正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登上神坛。就算他不想上、不愿上也得上。晚年纪要秘书张玉凤回忆：“在毛主席生涯的鼎盛期，人们都呼喊‘万岁’、‘万寿无疆’，但他讨厌这些。他认为有些人这样喊，是‘屁话’，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人们怎么看他。”因为方式不对，必须承担结果。这也是毛泽东如今被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爱因斯坦晚年自嘲曰：本人一生不信有什么权威，到头来我自己成了权威。

**第十三章 新时代，新天王**

**王大宾和韩爱晶的业绩**

在大饥荒篇章里说道五虎上将，这里又要介绍几个人。他们是千百万红卫兵中最为牛叉的五个人，分别是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航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覃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这五个人有如下共同点：出身不怎么样，但敢闯敢干，都是闲不住的主；都被工作组批判教育过；都曾名扬天下，最后都成了反面教材。

他们在文革初期有共同经历：短时间内闹大事，短时间内出大名，短时间内掌大权。

不管社会如何发展进步，有一个规律是不会变的，那就是想要脱颖而出很难。想要在一个班级里拿第一名都不容易，想要从千百万人中脱颖而出就更难了。他们五个人能够脱颖而出，是因为每个人都有特殊的故事。上面已经说了谭厚兰，接下来说说另外几个。

先从王大宾开始。

王大宾一九四五年出生，四川人，兼具汉族彝族两种血统，从小就受到了两种文化的影响，兼具两种民族的心理、语言表达方式、生活中的优长之处。王大宾确实兴趣广泛，能言善辩，而且特别能混，是那种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能混的很好的人。

几个人中，王大宾最能混。就结果而言，王大宾混得最好。文革后下海经商，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好不快活。

当时农民家庭出生的孩子多半都是子承父业——继续种地。王大宾比较幸运，得到学习的机会。学生时代的王大宾是个好孩子，天资聪明，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且考上了大学，成为乡村飞出来的第一只金凤凰。考上大学之后，面临专业问题。常言道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但是那些玩意都在地下，不能用。因为人才奇缺。加上中苏关系破裂，国家急需找到大量的矿产和能源，因此国家特别鼓励青年人要为找矿、找能源做出贡献。地质队员几乎成了青年人为国奉献的代名词。王大宾念书时，放映队到村里放过一个电影，是描写地质队员工作和生活的，艰辛而有趣。

于是王大宾立志搞地质勘探，报考了地质学院。此时的王大宾，热血爱国青年一个。

进地质学院之后，看了刘少奇当年的讲话：“地质工作就像我们过去打游击。你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先锋队，凡是要搞建设的地方，总是需要你们先去。你们几十万人吃苦，就能使六亿人民幸福。有吃苦的工作时，要敢于说‘首先我去一个’。要做完全的知识分子，还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去学习。”当时王大宾非常感动，决心毕业后第一个报名到野外去工作，为国家建设事业做出贡献。然而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毕业那年文革开始了，没得分配工作。毕业即失业，和今天广大青年一样。和今天年轻人不一样的是，现在毕业之后可以当啃老族，当时则没啥可以啃。

既然不让工作，那就把精神投入到一项方兴未艾——红卫兵运动——的事业中。情节还是老一套了。王大宾贴大字报批判学院领导，因为没有身世背景，反过来被工作组批判，增加了知名度。工作组被撤销之后，王大宾认为：自己没有工作是修正主义的错，出了问题是修正主义的错，总之，都是修正主义的错。好吧，那就和修正主义斗吧。

下定决心之后，满腔热血的王大宾利用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口才进行串联、游说工作，很快聚集了一批人，名曰东方红公社，自任政委兼司令员。一时间威风凛凛，身为拉风，开始干起了造反的营生。这里说明一下，当时的王大宾并不是地质学院一把手，一把手是朱成昭（此人应归于老红卫兵，随后立场转变了，挨了批）。王大宾因为把造反精神发扬光大，成了一把手。既然成了司令，那就要有个司令的样子，干点大买卖，就要冲出地质学院，冲向地质部。地质部曾派过工作组到地质学院修理过王大宾同学。冤有头债有主。现在王大宾成了王司令自然反过头来找地质部领导们算账。

让你当初欺负我，如今我来把你欺。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号，二十一岁的王大宾司令统帅东方红公社成员一千多人，打着红旗、拉着横幅、喊着口号去了地质部，要求批斗副部长邹家尤。邹家尤曾经是工作组组长，也是造反派痛恨对象。他们“盛情邀请”邹部长前来地质学院做客：享受戴高帽、挂牌子、搞喷气式等待遇。邹部长表示，老了，不行了，还是算了吧。

造反派说，交人。地质部说，不给。

双方口水几回合，搞得王司令很没面子。王司令决定发大招，率领一千多人在地质部静坐示威，说地质部不把邹部长叫出来，俺们这些革命小将就不走了，而且不吃饭，饿死在这里。说白了，就是耍无赖。就好比拿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去抢劫，说你不让我抢，我就自杀。

造反有如此巨大的勇气，了不得啊。

王司令勇敢的行为引起了轰动，赢得舆论界，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经过一番调查之后，文革小组认为王大宾同学家庭背景都可靠，是个可造之材，就要求地质部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革命群众。地质部顶不住了，邹部长顶不住了。

邹部长去了地质学院。革命小将们给他提供全套服务：从精神到肉体，一条龙，全程免费，热情周到，诚实无欺。

几番批判之后。王大宾觉得自己虽然没有找到工作，但人生还算可以，就放邹部长回地质部去了。然而眼见其他红卫兵社团红红火火，王司令又感到失落。他认为工作组不仅是邹家尤一个人的事，还有其他人，不仅要打到邹家尤，还应该扩大战果。于是在九月五号那天，王司令率领革命小将再进地质部找茬，说上次批判邹部长很过瘾，咱们需要再次过把瘾。

邹部长很识相，充分发扬舍身喂虎之精神，再次去接受革命小将提供的全套服务。

但是地质部领导们很快发现，邹部长虽然英勇献身了，世界依然没有清净，地质部窗外依然有小将们在那里静坐、耍无赖。他们也不是真的静坐，时不时闯入各个办公室、以宣传“文化大革命”为名、实际上到处乱翻，时不时抢走一些资料，比当今城管还要霸道。原来以王司令为首的小将们要攻占地质部、掌握地质部档案！不能不承认，毕业就失业的王大宾同学胃口大了那么一点点。然而他们能成功么？

他们的野心惹来了另外一群造反派，一个叫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的组织，当时很牛的一个组织。西纠的人不爽了，大家同为造反的，凭啥你王大宾要把功劳占完？他们决定跟王大宾的战斗队枪战功，就发出警告说，那些货赶快滚，地质部是我们西纠的菜，再不滚我们不客气了。王司令一看来个抢饭碗的，自然很不爽。你们谁啊，凭啥让老子滚？偏不滚。一方让滚蛋。一方不滚蛋。结果当然很明显，要比拳头。一番比划下来，王司令决定当一回好汉——好汉不吃眼前亏——暂时滚蛋。

滚蛋之后的王司令非常不爽，心想自己一帮人马在地质部搞了半个月，竟然一无所获，太没面子了，太伤自尊了。于是重振旗鼓，趁西纠那般龟孙子不在，率人三进地质部。为了师出有名，直接亮出旗号，要打到地质部党委书记何长工。何长工是老革命、老党员、老红军，深受毛泽东器重，在朱毛井冈山会师之前，毛泽东就是派何长工去给朱德传信的。王司令可不管这些，在他眼里，何书记是金灿灿的“战争果实”，要收藏好。

为了防止西纠的前来抢夺战果，王大宾下令，将何长工等人当夜绑架到北京地质学院一处秘密地点关押，慢慢审问批斗。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王司令再次率领小战士们四闯地质部，把地质部领导班子统统打倒在地才鸣金收兵。

前后两个月的时间里，待业青年王大宾同学化身司令官，四闯地质部，打倒砸烂一个部委，战斗力之强悍堪比最先进的坦克车。这样的光辉事迹，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奇迹”不断的年月依然十分耀眼。于是来自四川向下的穷小子出名了，成为红卫兵时代的弄潮儿。

此后王大宾同学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抄家、开批斗会、砸文物、毁古迹，一时间忙得不亦乐乎。在这一系列打砸抢表演中，王大宾同学更加赢得了中央文革的好感。最后混得了红卫兵“地派”领袖。

在王大宾的造反事迹中，最为恶劣的就是揪斗彭德怀。文革前夕，彭德怀复出去三线。名义上搞建设，实际在李井泉的监视之下，生活并不如意。尽管如此，只要李井泉在，彭德怀好歹还有一层缓冲区。李井泉紧跟刘少奇走了，而且跟贺龙和邓小平关系非常铁，在文革之中属于出头鸟，躲也躲不掉的。

一九六六年底，江青到地质学院讲话：“你们这也能，那也能，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精神，将来好回来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江青和彭德怀属于往日无怨、近日无仇的类型。彭德怀风光时，江青还在扮演家庭妇女角色。江青崛起时，彭德怀已经趴下了。但江青为了把文革演得像模像样，不允许彭德怀漏掉的。

听领袖夫人、文革旗手这样一说，王大宾再次热血沸腾了，仿佛有一盏灯照亮他的前程。立马就率东方红公社骨干队员数十人，去成都抓彭德怀了。王司令动作已经很快了。但是他仍然没想到，还有个人比他更快，也把彭德怀视为前进道路上的垫脚石。

那人就是后来的“天派”领袖，号称北航的司令官，韩爱晶韩司令。他们在彭德怀问题上，把阴暗一面展示得淋漓尽致。

当王大宾想去西南抓彭德怀，炫耀一把，韩爱晶也把目光锁定在韩爱晶身上。那时代让人很纳闷：红卫兵一边为抗美援朝自豪，一边去狠狠批斗彭德怀。。

韩爱晶和王大宾同龄，生于一九四五年，江苏涟水人。他的父亲是新四军革命烈士，继父是个中层干部，家境尚可，不为衣食住行犯愁。

韩爱晶这个名字就很女性化，用在大美女身上也无不可。其人低调沉默，看起来既不凶也不恶。但沉默的外表下是燃烧的内心，低调的行为里面是强悍的性格。沉默低调有助于抵抗外界的干扰。火热的内心和强悍的个性则是内在动力。这种人天生就是事业型的人物。这种人不管走上正确轨道还是错误轨道，都比一般人走得远。韩爱晶的一生就遵循这个轨迹。出狱之后的韩爱晶下海经商，孤身闯荡深圳，成了一家负债千万的国企总经理。数年之后，那家国企起死回生，竟然还清债务。

如果这些事业不算稀奇，那么在生活上绝对无可指责。

深圳是一个什么地方？直接说，就是欲望海洋：吃喝嫖赌抽的，坑蒙拐骗偷的，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欲望海洋就是有钱有权人物的天堂，诱惑无处不在。在这个海洋里，韩爱晶可以像其他人一样，享受天堂一样是生活，如同诸神一般放纵。韩爱晶不同，依然不喝酒，不抽烟，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不会玩牌，不搞男女关系。甚至不愿参加宴会，不陪客人吃饭，整天一碗米饭或面条打发日子，穿着上还是当年那副寒酸样。然而买卖依然照做，大家都知道他叫韩爱晶，标准的老派知识分子。假如中国当今的官商，不说全部，大多数能这么干，中国将无比的强大、富有、和谐。

看到一个如此品格的人成为红卫兵领袖，不得不让人陷入深思。这样一个人是当年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是不是和印象里的红卫兵不太一致？很显然后期的韩爱晶走在正确的轨道上。那么前期的韩爱晶呢？

沉默上劲的韩爱晶念书很好，去了北航，成为高材生，赶上文革。

还没有谈过恋爱的小青年韩爱晶同学出名了。别人出名基本上都是靠闹，而韩爱晶所以出名非常特别，靠一股傻气。

北航隶属于国防科委，文革开始后，大家都造领导的反。北航同学去造国防科委的反。当然国防科委的领导也不是吃素的，凭啥要接受你们一帮儿子辈、孙子辈的小家伙批判？没有理由啊。革命小将也有自己的招数，以静坐请愿——耍赖——方式开始。那意思就是说，你们老人家要是不出来接受俺们的批判，俺们就坐在这里不走，到时候找毛主席评理去，就说你们脱离人民群众，看你们怎么交代。

静坐人群中，韩爱晶同学表现最为突出，一口气静坐二十八个昼夜。想一想这是啥概念，二十八天，四个星期。这么说吧，四个星期连续上班，无休息日，看看有多少人能忍受？下班之后还有机会吃吃饭、唠唠嗑、玩玩游戏，甚至还能和发烧友一到发发烧。韩爱晶同学二十八天时间里，没有休闲娱乐、没有上下班，没有加班工资。吃饭估计也就是校友带点盒饭，睡觉也就是随便凑合一下。当时是夏天，夜里蚊虫肯定不断，就算有蚊帐好了。二十八天时间里肯定有天气变化，遇到暴风雨天气，最多也就是跑到走廊下面躲一躲。二十八天不下火线，肯定没机会洗澡换衣服了。就算能借雨水冲一冲，那也免不了满身臭味。可以说这二十八天静坐，艰苦程度堪比当年长征之后流落在南方的游击队员。远比今日普及民主自由的公知们努力。

韩爱晶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可以说是理想信念，倒不如说是傻气。一个沉默寡言却又不屈不饶的书生特有的傻气。俗话说，傻人有傻运。

二十八天之后，满身臭味的韩爱晶同学在同学们惊讶、钦佩、不解的目光中下了火线，立刻成为英雄。这下出名了，彻底出名了，成了名动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司令（总勤务员）。

第一代打天下的将帅们通常都是年轻有为。像林彪同志，二十三四岁就成了军团长。文革更快，韩爱晶同学才二十一岁不到就成了韩司令，手下的人手比林彪刚上任时的红一军团还多。林彪当军团长之前，好歹在黄埔军校里呆过半年（黄埔军校前精英最多的就前几期，在校时间也就三到六个月，学点基本常识），好歹经历过几年残酷的战争考验。韩爱晶同学到好，静坐二十八天之后一步登天。实际上则是拔苗助长。

韩司令为了扩大影响，建立联络站、调查站，开始批斗人。所有的红卫兵领袖中，大概韩爱晶的批斗名单最有分量。在他的名单上，有打到徐向前，有炮轰陈毅，有推倒叶剑英。另外他还联合成立过“揪刘火线总指挥部”，想要批斗刘少奇。然而韩爱晶同学还是太幼嫩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嘀。虽然他已经很卖力了，印制了大批传单，贴了很多大字报，说徐向前曾经是逃兵，说陈毅恶毒反对毛主席，说叶剑英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鼓开道。但徐向前还是徐向前、陈毅还是陈毅、叶剑英还是叶剑英，一个也没有倒下。即使因为二月逆流挨批了，也和他韩爱晶无关。批判刘少奇，也没有竞争过清华。

折腾半天变成瞎子点灯白费蜡。表面红红火火，实际事情没干成一件。韩爱晶同学表示很难接受大好环境下一无所获的局面。眼见中央戏剧学院抓走了彭真，清华弄出了刘少奇，北大批判邓小平，甚至连朱成昭和王大宾都跑成都抓彭德怀去了。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大走资派”一个个减少。

怎么办呢？那就抢。去成都和王大宾他们抢彭德怀！想干就干，带着大队人马去成都抢人。听了江青的鼓动，王大宾第三天就带着井冈山公社人马去了成都，已经很迅速了。哪知韩爱晶更迅猛，第二天就带着红旗战斗队去了成都，在王大宾之前找到彭德怀，把彭德怀押到成都地质学院。王大宾非常恼火，一边派人探听彭德怀被关押的地点，自己则亲自带领造反派骨干，闯进成都永兴巷七号彭德怀办公室，把彭德怀及其秘书的住处和办公室抄了个底朝天，带走了几大箱历史资料、书籍、照片和笔记本。不仅如此，王大宾还擅自扣留了彭德怀保存多年的珍贵资料和文件两百多份。

然后王大宾带着人马赶到成都地质学院，趁韩爱晶的人马和军区警卫吃午饭之时，突然发动进攻，一涌而上，打倒看守，抢走彭德怀，等北航“红旗战斗队”大批人马赶来时，王大宾跑到四川省地质局，会合该局造反派，把四川省地质局的门和窗户全部堵死，手持木棒，严阵以待，摆开了要在成都和韩爱晶决一死战的架式。

想彭德怀一生英雄，遭遇穷凶极恶之辈无数，临了却越到两个克星：二杆子王大宾和一根筋韩爱晶。两人在从北京去成都，上演了争夺彭德怀的闹剧。

正是因为这两排敌对人马竞争，导致回京之后，彭德怀遭到两伙人迫害。两帮相互看不上眼的二逼青年轮番把怨气发泄到彭德怀身上。戎马一生，落得如此下场，可叹。

在回北京的路上，王大宾就开始对彭德怀进行审问。下面是当年在场的红卫兵记录下来的王大宾和彭德怀的对话。

问：你为什么公开反对唱《东方红》？这是反对毛主席!

答：这话不对，我一生最敬佩毛主席，他对中国贡献最大，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比我强得多，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不知要吃多少亏。但是，我不同意喊那么多万岁，喊那么多伟大，唱那么多《东方红》。不好嘛！毛主席也不赞成嘛！这不是反对毛主席，你们不能妄下断语。

问：你要把庐山会议的情况说清楚!

答：那是党的机密，我无权奉告。

问：你历来就反毛主席，早在遵义会议后你就暗中指使人（不知道如果得知是林彪，敢不敢说）写信，逼毛主席交权。

答：不对！你所说的那个写信人已在庐山和军委两个会议上声明过，信是他写的，与我无关。

问：抗美援朝你为什么抢着出兵，贪天之功为己有？

答：混帐话！出不出兵，那是中央、主席决定的。至于我带兵，也是组织决定的。就算我抢着去消灭敌人，有什么不好？难道让他去而他不去的人，比我这抢着去的人还好吗？

问：毛岸英同志是怎样被谋害的？

答：你怎么能这样血口喷人？毛岸英同志是被敌人扔下的汽油弹炸死的，怎么说是被谋杀的呢？谁谋害的？是我，还是你们？岸英牺牲已经十六年了，可一直是我的心病，是我难以弥补的遗憾，什么时候想起我心里就难受，现在你们是在用刀戳我的心！

审问对白是如此滑稽，颠倒是非；和当年红卫兵运动一样滑稽，颠倒是非。

王大宾没问出来啥，感觉很没面子。回到北京之后就采取了野蛮的办法。王大宾让彭德怀写材料。彭德怀被烦得不行，就把自己真实想法写出来。王大宾看后大怒，劈头向彭德怀的头上打了一拳，打得彭德怀一下子倒了下去，头撞在桌子的角上，鲜血流出。此时的彭德怀已经六十九岁，白发老人。当彭德怀像他这般年纪时，已经历经磨难，当兵。

这些只是开始。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彭德怀在北京军区被保护一段时间。后来压力越来越大，被迫交给红卫兵，最丑陋的一面上演了：由地派的韩爱晶和天派的王大宾轮番审问。

江青在天安门广场的声讨大会上嘶喊“打倒彭德怀！”，跟班们赶紧跟上，跟屁虫一样连忙吆喝。以戚本禹最有代表性：“彭德怀从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你们不要轻易放过他，一定要他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要他向红卫兵低头认罪。他这个人很不老实，是一个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你们对他一定得厉害点，对他不能讲客气。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不得不承认，戚本禹这段话，文字功底甚佳，但没良心。即使放在文化大革命年代，也是最没良心的话之一。

七月十九号，轮到北航批斗彭德怀。韩爱晶非常积极。鉴于王大宾对彭德怀拳打脚踢，韩爱晶也绝不会落后，上演了更为丑陋的节目。

让彭德怀交代罪行未果，韩爱晶觉得自己没有完成光荣使命，怒气冲天，决定来点野蛮的。他走到彭德怀跟前，把六十九岁的彭德怀从座位上拉起，当胸就是一拳。其他人也蜂拥而上把彭德怀被打倒后又再揪起来，再打倒，再揪起来，反反复复，还摁着彭德怀的头往墙上撞，使他头破血流，昏晕过去。批斗会结束后，门口堵着一堆人，彭德怀出来时，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他们一边打还一边喊着毛主席语录：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革命的犯罪！

当时的记录：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不大武斗即可），并说总理的五条指示过时了，中央文革小组是最新指示，他们只听中央文革的。

经过一番批斗，六十九岁的彭德怀食欲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屋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不吃饭，不能吐痰，要他写材料，他说现在不能写，要不就杀头算了。第二天，他的胸部疼的面积很大，而且泛肿，起床很疼，也非常困难，需要哨兵拉一下，否则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折断，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打断彭德怀的肋骨，韩爱晶迎来人生巅峰。

——这仅仅是一次批斗会而已。六天之后，也就是七月二十六号，六十九岁、白发苍苍、肋骨被打断几根的彭德怀再次被批斗。这位曾经在朝鲜战场上统帅百万雄兵的汉子，曾经顶住了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敌人，面对十万后生，只能低着头、弯着腰、脑袋上挂着大牌子，任凭拳打脚踢、鸡蛋白菜。

批斗会之后，白发苍苍的老人，只能躺在硬床上，什么也干不了。此后两个月时间，批斗彭德怀成为一种时尚，各个单位你争我夺，以至于两个月时间彭德怀被批斗上百次。各个高校，各种单位，各样的人，争相批判最值得崇敬的英雄。——国人啊，你们在干什么？

彭德怀英雄一生，面对豪杰无数，无人能伤他一根汗毛。到如今，被一群狗崽子羞辱，心痛莫名，悲愤难抑。要知道一辈子战斗，也就是为了眼前年轻人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而已。有了安静环境的年轻人竟然对自己拳脚相加，何其讽刺。与此同时，朝鲜战争的美国同行却在北美享受这安静的退休生活。

——彭德怀心里在想什么？或许什么也没想——能想什么呢？都是曾经拼命保卫过国人啊、下一代啊。又或许他庆幸自己没有留下子女生活在那个疯狂的年代。

一个不懂得珍惜自己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而王大宾和韩爱晶则是悲剧的代表。说他们是悲剧，除了摧残彭德怀这事，还包括他们自身。

王大宾摧毁地质部的勇气，韩爱晶在国防科委前静坐二十八天的恒心，在常人身上极为罕见。如果说王大宾能把这种勇气用在正确地方，比方说他的专业，地质勘测，可能做出常人难以完成的业绩。如果韩爱晶把他的恒心，用在他自己的专业上，很可能在航天事业上做出杰出贡献。凡是真正能干一番事业之人，除了必要的知识和才华，还需要勇气去面对困境，还需要恒心去坚持。王大宾和韩爱晶这样的人完全具备这样条件成为真正的社会精英。

评：韩爱晶和王大宾两个人在当时或许年少无知、或许冲动鲁莽。但这些都不是理由。他们的行为是中国人永恒的耻辱。

不能说他们本人十恶不赦，而是他们的行为不可原谅。

和他们同样不可原谅的还有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的李钟奇和北京军区副政委的王紫烽，他们以军人的身份，为了私仇和私欲，殴打曾经的统帅，老上级，老军人，老领导，丢尽军人的脸，不配为共和国将军。

**聂元梓是怎么炼成的**

造反派红卫兵领袖中，最特殊的一个叫聂元梓。

五大高人中，聂元梓年龄最大，入党时间最早，斗争经验最为丰富。其他四位领袖均为后生学生，聂元梓不是，只有她过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竟然也成为红卫兵，讽刺。

聂元梓生于一九二一年，那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头。在那一年出生的还有两位杰出的女性，王光美和孙维世。和豪门世家的王光美、以及革命世家的孙维世都不同，聂元梓是另外一类人：虽然生逢乱世，却衣食无忧；虽然衣食无忧，却精神却动荡不安，因为那是乱世。性格上类似江青，家庭环境比江青好一点。

聂元梓生于中医世家，她的爸爸聂挺俊是一个医生，同时拥有一百多亩田地的小地主。但是身兼中药生和地主两重身份的聂挺俊受过高等教育，并不保守，闲着没事关心国家大事，几个孩子都送去念书。那恰恰是一个读书人没办法读书的年代，聂家几个孩子无一例外的搞革命去了，把聂家变成了一个革命根据地。老大聂真去北京上中法大学，总是没办法毕业，老是问家里要钱。后来才发现，原来聂真同学不是不学习，而是过于积极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以念书为名向家里要钱支持同志们搞革命。当然中法大学那是有革命传统的，比方说陈毅和张云逸就是杰出的革命派，身为师弟的聂真也不想落后。当局为了逮捕聂真，常常深更半夜去聂家搜查。尽管如此，聂家孩子还是一个又一个革命了。为了革命，被通缉的被通缉（聂元梓大哥），被逮捕的被逮捕（聂元梓四哥）；结婚的闹离婚（聂元梓大哥大姐），要当新娘子的跑掉（聂元梓二姐）。

这些人把聂家变成了革命基地，周边同志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在当局统计榜上）肚子饿了就跑去聂家吃免费晚餐；有伤病就去聂家治病，没钱就免费。聂元梓的三哥成了当地县委领导，就把办公地点设在自家。鼎鼎大名的赵紫阳去过聂家活动。革命家庭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比方说当局抓聂元梓的三哥抓不着，就把聂元梓的妈妈抓去和猪关在一起。比方说敌人抓住聂元梓的二哥之后，为了让她二哥招供，就把她侄子给残忍杀了。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聂元梓，除了干革命就看不见别的出路。

聂元梓天生就是干革命的料。聂元梓生在旧时代却不裹脚，敢于离家出走，年纪轻轻就敢去寻找革命党，寻找八路军。一九三七年，年仅十六岁的聂元梓就和她二姐一起在太原城墙下面印情报刊物。那份刊物的读者只有五个人，分别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

由于表现积极，十七岁的聂元梓成了中条山地委副书记。太原陷落之后，聂元梓跟随组织辗转到开封，然后又九死一生到延安。正是在延安，聂元梓对理论工作感兴趣。为了在延安党校学习理论，她甚至放弃了去中央办公厅工作的机会。因为对理论感兴趣，她回绝了拿枪杆子的追求者，选择了一个笔杆子，也就是她的第一任丈夫吴宏毅。

延安当时女性比例非常低，聂元梓当时正值青春妙龄，要是选择一个将军的话，级别绝不会低。但是她选择了吴宏毅。吴宏毅知识分子出身，当时是有名的战地记者，身材高大，能说会道。解放后，吴宏毅成了哈尔滨副市长。

客观上说，吴宏毅条件不错，完全配得上聂元梓，只是有一个毛病，生活太超前——乱搞男女关系——像今天某些干部。那种事是任何一个正常女人都无法忍受的。聂元梓做了一个正常女人的正常选择，离婚。

离婚后聂元梓去了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是当时的北大校长陆平亲自要求的。六年之后，陆平肠子都后悔青了。单以工作而论，聂元梓在北大还是合格的。虽然她不懂经济，但是长期走江湖闹革命，使得她善于梳理人际关系，对知识分子啥的，该尊重尊重。而她工作比较讲原则，干得还不错。正因为干得不错，陆平把她调到北大哲学系干党委书记。当年北大哲学系是整个北京大学的核心，成员都是鼎鼎大名之人。

名人总是和高层扯在一起。所以哲学系人际关系相当复杂。聂元梓很快对工作作风不满。她发现陆校长在北大高小圈圈。

在北大，领导核心是党委。党委又有核心，是常委会。在常委会里，还有一个小核心，就是以陆平自己为首的几个人。大圈套小圈，圈内有圈圈。其实聂元梓也可以看作是陆平的亲信。毕竟是陆平调进北大的嘛，而且把她放进了哲学系党委书记的位置上。按一般观点，聂元梓只要干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实际情况是聂元梓确实干好了自己的工作，还干了工作之外的事。

从成长经历来看，聂元梓应该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属于那种眼睛容不得沙子的人，永远的革命者。而且在聂元梓看来，陆平还有官僚主义作风，理由是不怎么管哲学系的事。然而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首先陆平是铁道部进北大的，从铁道部带几个信得过的人当助手是可以理解的。其次陆平对哲学系那一大堆理论争论是否搞得清、是否有能力搞得清楚、以及是否有兴趣搞清楚是值得讨论的。但是聂元梓认为陆平工作不到位，要提意见。

提意见本正常。不正常的是，当时容易上纲上线。当时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来四清去，清个没完。聂元梓对工作组提了陆平的意见。陆平认为聂元梓这个人不可靠，反过来对她进行批判教育。一段时期内，聂元梓等提意见的人在北大成了被监视跟踪的对象。聂元梓很来火，甚至给毛泽东写信诉不平。文革开始之际，又给了聂元梓提意见的机会。于是她和几个人一起写了陆平的大字报。

大字报这玩意在当时不算啥，满大街都是。然而聂元梓这张大字报不同，得到了最高领袖的认可，登上“全国第一张无产阶级大字报”的宝座。

接下来的事自然而然，陆平倒霉了，成为牛鬼蛇神；聂元梓出名了，成为北大一把手。北大一把手的战斗能力是很强大的，成绩单不可能就打倒一个北大校长那么简单。她的战斗力很强，成绩单也是非常优异的。

聂元梓第二个丈夫叫吴溉之。吴溉之，年长聂元梓二十岁，是一位老党员老红军，黄埔四期毕业，参加过南昌起义，跟过贺龙和黄公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作为高干，当时吴溉之和组织部长安子文、海军司令肖劲光关系不错，几个人常常在一起打麻将。聂元梓嫁给吴溉之之后发现组织部长安子文和一个叫邓觉先的女人关系非常暧昧。通过一系列观察、取证、推理之后，聂元梓认为邓觉先可能是特务。

既然邓觉先可能是特务，那么正部级的安子文也有特务嫌疑。这事本来和聂元梓也没有关系。但聂元梓再一次眼中容不得沙子，为了党和组织的利益，决定揭发。本来她想向公安部长谢富治揭发，后来在同僚的指点下向康生揭发。结果当然很明显。安子文完蛋了，当然后来也平反了。邓觉先没了下文。由安子文联系到吴溉之。聂元梓没法，只好和吴溉之离婚了，尽管她对吴溉之感觉很好。吴溉之在两年之后病逝。

在聂元梓造反成绩单上，最为鲜亮的一笔应该是关于邓小平的。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被认为是走资派后台老板。大家把火力集中在刘少奇身上，还没有贴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当然是聂元梓同志。于是一份战斗力极强的大字报出炉了，主要内容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我们当前最危险的敌人，而且地位越高者危险性越大。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刘少奇，二号就是邓小平。

大字报不是聂元梓写的，却是她签名的。由于聂元梓当时名气很大，就把这份“功绩”算在她身上了。同时揪出全国第二号走资派功劳也落到北大头上，所以北大也成了当年仅次于清华（揪出刘少奇）的战斗名校。

当时聂元梓是头顶风光的，后来辩护时才说和她没有关系，晚了。

此外，在聂元梓的成绩单上，还包括错误的参与批判朱德（误以为是批判刘白羽），到上海搞串联，参与夺权，相当优异。康生请她吃饭，告诉她有事常来汇报。江青请她吃饭曰：毛主席的指示谁也不听；刘少奇怎么派人安窃听器，怎么派服务员监视她和毛主席的行动，在家里她和主席都不能随便谈话，把阶级斗争都搞到她们家里了。中央文革的秀才们请她吃饭，探听革命行动新信息。她可以出入中南海，可以去告状，并且获得一个响亮的绰号，北大老佛爷。上一个拥有——老佛爷——绰号的女人，是在中国只手遮天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聂元梓能在北大混得此荣耀，也算是慈禧的山寨版本。

看到这个华丽的成绩单，联想到红卫兵造反，不要以为聂元梓是一个人品极为低劣之人。前面就已经说过，聂元梓经历过最艰苦的年代，曾经为革命理想出生入死。而且放着好好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妇人不当，为了所谓组织原则跑去揭发毫不相干的安子文，丢了还算满意的家庭。只能解释为此人是个组织原则很强之人，典型理想主义者。

当然这一切可以解释为投机倒把，想要掌握权力往上爬。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提供了额外的证明：文革很乱，中宣部把全国司局级以上有问题的干部档案，足有一两百人的档案，都转移到了北大，交给聂元梓等人负责保护。那些档案都是有问题的。把它们放出去的话，在那个年代不用任何指示，红卫兵就会扒了他们的皮。可以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然而聂元梓不但没有公开，连一点也没有泄露出去。反而是工宣队进校之后，把档案公开。从这点来说，聂元梓人品是值得肯定的。

那么人品不坏的聂元梓为何成了红卫兵领袖呢。首先，红卫兵领袖也不见得就是坏人。如果把红卫兵说成坏人，那就大大降低了文革的悲剧性。其次从聂元梓一贯的表现来看，她的人生是一致的，即革命年代对敌人斗争；和平年代继续斗争，把她看不惯的人或事当成敌对势力，借助特殊年代，以特殊方式解决之。

评，聂元梓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一直处于革命状态。如果说聂元梓有什么错，那就是没有理解：这世界不需要持续不断的革命斗争。这是聂元梓个人悲剧。更为悲剧的是，那个时代，聂元梓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第十四章 蒯大富崛起与刘少奇衰亡**

**蒯大富同学**

当初的红卫兵组织中，最有名的五个人，被尊为五大领袖。看看他们的斗争业绩：谭厚兰去挖了孔子墓。王大宾搞垮了地质部。韩爱晶把国防科委折腾得鸡飞狗跳。韩爱晶和王大宾各带一伙人万里迢迢跑到成都，把彭德怀抓回北京打伤打残。谭厚兰批判朱德，到处张贴邓小平大字报。可以说一个比一个猛。

最猛的那个人，叫蒯大富，直接去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

造反派五大领袖中，三男两女，三个男人同龄，都是一九四五年人。

曾经的风云人物，红卫兵天字第一号领袖，蒯大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特能折腾的人。他的祖先曾经富有过，后来变穷了。到他爷爷那一辈变穷了。他爷爷爱赌钱，很有特点，逢赌必输。把家财和土地输光光之后重抄祖业，贩私盐。当时正在抗战，贩私盐利润很大，但是蒯大富的爷爷走私很不走运，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当兵也不是去抗日，而是跟新四军打仗。而蒯大富的爷爷当兵也不走运，跟新四军打仗也不成功，成了新四军的俘虏，最后变成新四军。蒯大富的父母都是在抗日战争结束那会入党的，都是给新四军和八路军办事。

蒯大富就成了典型的生在旧社会长在新国家的人，并且成为那一代人的典型人物：能吃苦，爱劳动，并且以此为道德准则要求别人。

如果说是农民，能吃苦爱劳动的品德体现在种田上。蒯大富是学生，吃苦劳动的本事就体现在学习上。蒯大富同学学习成绩非常牛叉，在没有报辅导班、请家教的情况下，他的数理化成绩经常考满分，某些不是满分，会拉下脸老半天，做一副懊恼状。不要以为他是天才，这是努力得来的。为了备战高考，蒯大富同学拿出老农民耕地的精神，常常半夜三更不睡觉，又常常半夜三更起床。老师一般对别的同学都说，人生在此一举，多学点吧，革命需要多投入点；对蒯大富同学则说，你小子悠着点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就是这样一番努力，蒯大富修成正果，麻雀便凤凰，成为苏北村旮旯里首位清华大学生，而且是搞核研究，全班清一色男同胞。按道理说，核研究足够蒯大富同学搞一辈子了。然而蒯大富同学是与众不同的，把吃苦耐劳的精神发扬光大。看见别的同学吃饭剩饭，浪费粮食。蒯大富同学就贴大字报，提倡大家节俭。这是好事，理当得到赞扬。为了杜绝大家浪费，蒯大富同学进一步提倡大家吃红薯不要剥皮，向乡下老农民那般，连皮一起吃掉。这就是好事干过头，强人所难，就左了。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吃红薯皮的。即使在乡下，红薯平多半为牲口。现在蒯大富同学竟然号召清华那些高干子弟去吃红薯平。别人不吃，他就和人家吵架，说人家是资产阶级思想。

这还是小事。蒯大富同学放着核物理不去研究，给中央写信，反应农村干部腐败情况。虽然读书人要关心天下事吧。如果都去关心天下事了，还谁去读书？核物理谁去搞。这些事情至少展示了蒯大富同学的性格，爱折腾，能折腾。这种人生在文革，就是红卫兵最好的料子。也正是蒯大富同学在，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组织的战绩和学校名气非常的般配。

红卫兵起来之后，蒯大富写大字报保清华乡长蒋南翔。工作组进入校园之后反蒋南翔。结果蒯大富和一干同学发现工作组的工作方法和毛主席的要求不一致，就去贴大字报，和工作组辩论。六月十六号那天，薄一波去清华，看见蒯大富的大字报。当时两人互不相识，一番交谈之后，互补感冒。薄一波问蒯大富属于哪一派。蒯大富说他是革命左派。薄一波说。左的太过火了，就跑到这（右）边了。

蒯大富所以在清华闹得那么大，主要是因进清华工作组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就是博学多才漂亮优雅的王光美女士。在大四清运动中，王光美也作为工作组一员搞四清的，通过一系列蹲点、调查、取样、研究之后总结出一个样板，就是当时非常著名的桃园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一次王光美再次化名，以工作组顾问的身份到清华，也是想通过同样的方式总结出一个样板，如果成功的话可以成为“清华经验”。

由于蒯大富同学积极张贴大字报引起工作组主义。工作组就跟蒯大富说，王光美同志要来参加座谈会，你也去参加吧。当时王光美确实去了，也没有自我介绍、也没有发言，大家也不认识她（信息传媒不发达啊）。开完会之后，蒯大富等人以为王光美没到，感觉小心灵受到伤害，又去战斗了：就去贴大字报说工作组骗人，搞得工作组相当狼狈。

工作组当然也不是吃素的，决定修理修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穷小子，就说蒯大富同学有野心，要夺权，是反党反革命。实际上是想把蒯大富竖立成典型，然后以此为经验推广。然后蒯大富同学的好日子过完了：凡是蒯大富同学上台讲话，总会被喝倒彩；蒯大富同学四处告状说俺受了不公待遇，没有人鸟他。

换成一般人估计就消停了，反思一下自己是否不对。毕竟对方是政府，对手都是高干，弄不好真的反党反政府了，可不是闹着玩的。然而蒯大富同学充分发扬能折腾的精神，决定一条路走到黑——天天去贴大字报。

工作组则喊出：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终于，蒯大富同学进了黑屋子。

能折腾的蒯大富使出最后一招，绝食。

蒯大富不想死，只想用绝食的方式表达不满。结果没人鸟他。继续绝食吧，肚子抗议；吃饭吧，又拉不下脸。眼看年轻的蒯大富同学即将把自己折腾掉，当时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就点化了蒯大富同学，闹啥闹嘛，身体是革命本钱。于是蒯大富有了台阶下，开始吃饭，抖擞精神准备新的征程。

恰好这时，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把工作组给撤了。可以说是毛泽东救了蒯大富。毛泽东一生救过很多人，井冈山肃反救过人，刚到延安救过人，延安整风又救过人，这一次撤销工作组再次救了人，蒯大富就是其中之一。

这一切当然都被中央文革看在眼中。中央文革的王力和关锋穿着军装找到蒯大富，说你写材料吧。不仅如此，周恩来亲自找蒯大富同学谈话多次，询问工作组的事，并亲自为他平反。好吧，咸鱼翻身了。

蒯大富来了一个华丽大转身，人生从波谷上升到波峰，彻底演活了咸鱼翻身的反转剧。张春桥亲自把他推荐给江青，一时间红得发紫。就连王洪文同志从上海到北京，是蒯大富带着去见中央领导人。

这么多领导人亲切关怀，能折腾的蒯大富当然不能、也不会辜负他们的期望。当然，他也不会再一个人战斗，而是搭建文革顺风车，组织了那个年代最后战斗力的组织之一，清华井冈山。作为强有力的战斗组织，除了大串联等基本技能必须纯熟之外，还需要整出自己的特色。它有啥特色呢？主要有两点，第一特色是一副连环漫画。该漫画是以当时“被打到的”党政军领导人为题材，进行一系列丑化，把彭真、薄一波等人丑化到一起，便于大家泼脏水。比方说把刘少奇的下巴拉得老长。比方说邓小平的脸画得很胖且耳朵很大。比方说把彭德怀的鼻子画得很高。看起来更像恶搞。但是敢于如此恶搞的，也只有文革中才会出现。

第二个特色，蒯大富领导他的战斗组织喊出了那一声惊人的口号：打倒刘少奇。不仅如此，还带人进入刘少奇家进行批斗，又把王光美骗出来批斗。如此对待国家元首和元首妇人，翻遍世界通史也找不到第二例。

红卫兵领袖带人闹，无非两个原因，理想（青春年少，热血奔腾，想要大干一番的冲动）和私怨（被工作组修理过）。比方说韩爱晶在国防科委静坐，那是因为理想热情。比方说王大宾冲击地质部找邹部长，基本上是私人恩怨。

能折腾的蒯大富原本也有很大理想成分，所以才被工作小组关入黑屋子。但蒯大富的对手可不一般，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并因此名扬天下，成为文革闹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当然，仅凭蒯大富一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除了他的清华井冈山战斗队伍，他还有一个威力无匹的战友，就是鼎鼎大名的江青同志。

当然，江青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边有一个更强有力的组织，也许是历史上出现过最为拉风的文人组织，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文革小组**

文化大革命，文武两手，武的一块由红卫兵来做，那么文的一块由那些人负责呢，具体来说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提起这个小组，许多人至今都是咬牙的切齿。

中央文革的前身是五人小组。前面说过，五人小组是在一九六四年建立的，功能是引导全国文化方向。五个人分别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小组存在两年时间里，一共召开过一次重要会议，就弄出来一个《二月提纲》。随后遭到批判。

《五一六通知》之后，彭真和陆定一成了反革命，改组势在必行。

于是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诞生了，功能比之前稍微加强了一点：引导文化革命的走势。起初它仅仅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组织，既没有办公地点也没有自己的刊物，甚至连公务员编制都没有。但是成长速度却极其惊人，很快便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可以说是史上掌权最为迅速的组织之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也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那天，中共中央下达通知，中央补发通知，通报中央文革成员名单：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

看看这个名单，一共十四人，除了陶铸、王任重、刘志坚有干实事的本领，其他人基本上都是靠理论（嘴和笔）吃饭的。康生也能干实事，只不过特殊一点，是整人。

随着时间推进，凡是动嘴不积极的，统统抛出去，十四人又开始精简。第一个出局的是穆欣。穆欣，河南人，生于一九二零年，十七岁加入中共，一直搞宣传，加入中央文革小组时，职位是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因态度不够积极、和之前的一些牛鬼蛇神关系扯不清，就从江青那里领到一顶帽子，叛徒。

尹达最为怪异。因为尹达是搞考古的，时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没理由进中央文革。尹达一辈子都在搞考古，搞学术研究。这种人拉去搞文革斗争，明显是专业不对口啊，出局也是必然。当然中央文革小组不会白白用人，辛苦劳累一番，报酬也是有的，也是一顶帽子，反动学术权威。

接下来轮到三位能干事实的人了。在笔杆子和嘴皮子耍宝的中央文革里面，能干事实的必然要被淘汰。因为理论家们可以让牛在天上飞，实干者则是不可能的。王任重和刘志坚两个人实际上也有不错的理论功底，由于要干点事实，肯定不能达标，于是遭到理论家们的火力伺候。于是王任重被迫“离职养病”，靠边站了。

至于刘志坚，本来算林彪的人。林彪曾派他到上海帮助江青。江青那个谈话纪要，刘志坚参与整理过。刘志坚能进入中央文革，也和这层关系有关。无奈他是军人，干事和演戏出身的江青实在不是一个风格。然而中央文革是一个是非之地，进来容易出去难。想要出去，必然要戴帽子的。军人最怕的帽子是啥？答曰，叛徒。

然后陶铸。陶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毛泽东精心安排的。却被中央文革自己给踢出去了。经过一系列策划炮轰之后，陶铸成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之后第三号走资派。陶铸的出局，中央文革看似胜利，实则干了一件蠢事。左派很少有人意识到，陶铸出局已经暗示了中央文革最后的结局。这一点稍后会仔细讲到这一点。

从此之后，中央文革成了一个纯粹的舌头笔杆派。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靠这些人干事业是没有指望的。正因如此，文革结束才遥遥无期。毛泽东一世英名，被空喊派玷污。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号，武汉七·二零事件之后，毛泽东对他们失望之极，把王力、关锋、戚本禹给扔了。加上陈伯达生病，实权落到江青手中，后来倒向林彪。中央文革实际瘦身为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加上后来王洪文异军突起，四人帮便诞生了。中央文革是五人小组的变体，同时是四人帮的母体。

中央文革的改组，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江青。通过二十几年的折腾，她终于堂而皇之的登上政治舞台，而且是最高级别的政治舞台。

**战斗**

中央文革小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从宣传角度上说，很简单，坏人。然而好人和坏人的概念常常是模糊的。特别是现实世界中，好人和坏人都不是绝对的概念。他们有人人品确实不行，比方说康生同志；有人有过混乱的私生活，比方说早期的江青；所有人都显得很狂热，舌头上堆满棍子和帽子，随时准备横扫一大片，然后戴上某种帽子。简直是贩卖棍子和帽子的专业户。然而从另外一面看，他们虽然各个声名显赫，却很少以权谋私。除了康生善于私藏文物古玩，除了江青收集衣帽装饰品，其他人基本上没有按照惯例中饱私囊，也没有把亲朋好友安排要职。

从人品上说，有投机倒把的嫌疑，但还是可靠的。比方说张春桥，一直追随那种思想到最后。如果说张春桥受到毛泽东的信任，那么戚本禹是被毛泽东一手推入深渊的，文革结束时，又因为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被判刑。晚年的戚本禹看见李志绥写《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污蔑毛泽东时，依然为毛泽东辩解。其实他可以像李志绥一样写东西污蔑毛泽东赚钱，而且可以“爆料更猛烈”，但他没有那么做，表示人品还是可以的。

从政治角度上讲，左派和右派，或许境界有差别，但各有各的追求。正是因为在政治上，造成了重大的灾难。政治灾难又影响到社会生活，一直影响到现在。

中央文革那些人都是玩笔杆子和嘴皮子的。他们通过笔杆子和嘴皮子去影响指挥红卫兵打砸抢。殴打彭德怀，侮辱王光美，都是他们的杰作。他们试图通过嘴和笔摆平现实世界，却发现敌人众多。因为嘴和笔只能捣鼓出理论。理论那玩意均不是万能的，即便是可惜定律，也和很多社会现实冲突，何况政治理论。

当一群理论家坚持一种理论的时候，就会发现满世界、满大街、满房子的敌人。根据极左派的理论，官吏体系内部修正主义者、官僚主义者、资本主义者遍地都是；根据极左派理论，满世界都是危险的人和事，很多人的行为不仅和资本主义挂钩、而且和特务很相似；根据极左派理论，中央开会时，除了他们几个人，其他人要么右派、要么即将是右派。仿佛这个世界即将完蛋了，只有他们几个在拯救世界，怎么办呢？那就战斗吧。

如果让世界服从于道德，那么自己首先应该是道德的。首先就要把那些认为自己不道德的人和事消灭。这方面，中央文革的实际领袖江青给大家做了一个模范。在前面说过，江青的性格里面有动荡不安的因素。正是因为那些动荡不安的因素，使得她在年轻时代有过一些看起来不可思议的行为。他交过不少男朋友，在上海滩和同行抢戏。这些本来没啥，用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标准来看，道德作风上是过不了关的。即使能过关，至少没有资格成为旗手。江青要成为旗手，就要修补过去的形象。

当江青高高在上，成了最高政治舞台上的表演者。江青是一个爱记仇，或者说爱恨分明之人。有时候她分不清细节和原则之间的轻重。比方说她看毛岸英的遗孀张松林不爽，就在北大接见红卫兵时啰嗦张松林的不是。红卫兵就去批判张松林。搞得张松林姐妹被迫流浪。毛岸英是毛泽东最爱的儿子。毛岸英牺牲之后，毛泽东对刘松林非常关照的。

刘松林不是重点。重点是修理一些当年知道她老底的那些人。在当时社会背景下，要修理那些旧时代的“戏子”简直是太容易了，举手之劳。跟她抢戏的王莹悲剧了。知道她和唐纳结婚的那一大串人悲剧了。除了国外的和死去的，基本上是一网打尽。包括孙维世（知道江青在上海的事）在内，基本上都是死的死、残的残、伤的伤。连当年给她打下手的秦桂珍都没能幸免。

秦桂珍只是一个普通妇女，照顾过江青。江青当年对秦桂珍相当感激。为了旗手的声誉，江青让吴法宪派人把秦桂珍从上海挖到秦城监狱，成了“特务”。可怜的秦桂珍当了一辈子佣人，生于贫苦，结过一次婚，丈夫是个穷水手，没几年就死了，她没有孩子，一个人孤独地活着，一辈子不知道特务二字怎么写，竟然享受到特务待遇。一次次提审，挨皮鞭，挨棍子，原本身体非常好的秦桂珍大病不断。她的头发被拔光了，脑袋上只留下一小撮头发，是用来揪脑袋用的。直到一九七五年，奄奄一息的秦桂珍才走出秦城监狱。

幸好黄敬早死，幸好唐纳在国外，不然不知道又将闹出怎样的风雨。

中中央文革舞台上的江青，第一个角色是复仇者，第二个角色才是斗争者。从女人角度上看，够得上分量的对手也就王光美。其他高干妇人非常低调，比方说邓颖超，比方说卓琳。叶群当时倒是非常高调，但她是跟着江青的。

王光美和江青比起来有很多优势。比学历、比知识，均是王光美胜出。论风头，王光美跟着岁刘少奇出国访问，风头盖过江青。论干事，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整出了样板，桃园经验。论容貌气质，两个人旗鼓相当。江青也有优势，比方说革命资历，入党比王光美早，在戏剧才华上高于王光美。这些优势可以不计，值得计入的优势是毛泽东地位高于刘少奇。更大的优势则是当时第一号人物的毛泽东和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政见不合。最大的优势则是，利用中央文革之便，操纵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前期，红卫兵是决定性的筹码。能压住红卫兵运动，刘少奇胜。压不住红卫兵，则是毛泽东胜。

实事求是地讲，江青和王光美本来没有关系。但政治把他们扯在一起。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合作的那些年，江青和王光美关系甚至可以说还不错。江青时常会拉王光美唠嗑。王光美有时也去江青那里串门。两个人常常唠叨唠叨衣服、看电影什么的，相敬如宾。

然而她们两个终究不是很合拍的女人，差别很大。王光美出身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性格比较温和；江青则出身寒微，早早闯荡社会，性格比较倔强。这样两个人，即使最终归于中南海，思考方式和处事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她们可以走在一起，但并不能形成默契的朋友关系。随着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建国思路上出现分歧，她们两个人的关系也开始晴转多云。

一九六三年开始，也就是七千人大会之后，王光美与江青的关系比以前冷淡了，但两个人见面时还是彬彬有礼，还会习惯性征询一下意见。王光美将要陪刘少奇到东南亚访问有一天，不知道自己该穿什么衣服，给江青打了个电话寻求意见。江青建议王光美穿一身朴素的天鹅绒套装，衣服上不要戴别针，就像《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主角穿的那样，高雅而大度。但是东南亚有些地方很热，穿鹅绒套装简直是找虐。于是王光美改穿了旗袍。在缅甸时，缅甸领导人又赠送王光美一条金项链。处于礼貌，王光美就穿上旗袍戴着金项链出席晚宴。王光美本是大家闺秀出身，兼具知性和美貌；长期出入高层，气质不俗；再配上旗袍和金项链，那叫一个耀眼。要知道当时不仅仅是中国，包括整个东南亚，都是相当保守的。

照片传过来之后，同为女人的江青心中有了嫉火。因为王光美俨然成了第一妇人，抢了原本属于自己的风头。如果江青像邓颖超或卓琳那般温和性格也就算了。江青偏偏非常要强，从演戏开始，不是她的要争取，是她的更不能让别人拿走。不是第一妇人的王光美抢了她的风头，如果没有嫉火反而不正常了。嫉火不要紧，要紧的是发泄。直到文革开始，江青才有机会，来自蒯大富的机会。

**一组队友**

其实蒯大富和王光美原本互不相识。仅仅因为王光美是否参加座谈会引起的误会，最后竟然弄出来阶级斗争。咸鱼翻身的蒯大富把这一切都归于刘少奇和王光美。他决定继续折腾，就是把刘少奇和王光美给揪出来。这就是著名的“智擒王光美”事件。

所谓智擒，确切说，是骗。当时的王光美还是国家主席妇人，住在中南海，要想把她骗出来批斗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要骗她，必然瞒不过刘少奇。刘少奇除了是国家主席之外，还有几十年地下工作经验，被忽悠的概率应该不高。但是能进清华的人智商都不低。看看那帮清华园学子的智商究竟有多高。

清华井冈山专门有一个小组叫捉鬼队。这个小队就是负责打击各类牛、鬼、蛇、神的。小队成员决定把王光美给偏出来。十一月六号那天，捉鬼队行动了。

捉鬼队首先发挥聪明才智说服了王光美的二女儿刘婷婷，让她和他们一起欺骗自己的妈妈。接下来找到师大附中的人，把王光美的大女儿刘平平控制下来，不让她回到中南海，同时扣留了师大女附中的二女儿刘婷婷以及在四中的儿子刘源。行为已经构成了绑架罪，但那个年代是不会有人追究的。然后有人先冒充西单交通中队的交警给王光美打电话，说你女儿刘平平出车祸受伤了，送到北大医院了。这时候王光美还可能不相信，但这只是第一招。

第二招：冒充北大医院医生给王光美打电话，证实说你孩子受伤了。

最绝的一招就是，在假冒医生和王光美通话的时候，还让刘婷婷出来说了一句话：“妈妈，姐姐受伤了”。又是公安机关，又是医院，又是女儿打电话，这样一个连环套可以忽悠特工了。刘少奇王光美虽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但是在对待孩子方面终究还是父亲和母亲，孩子是连心肉，和一般父母没有区别，上当在所难免。

所以清华园高智商的学子们成功了，成功的把刘少奇和王光美给骗了出来。只是当时局势不明朗。他们没敢对刘少奇怎么样，只是把王光美给抓去批斗一番。这就是第一次批斗王光美。得知清华大学的红卫兵骗斗王光美的事，亲自打电话给蒯大富，笑的非常开心。江青对此很开心。因为王光美是她的敌人。

事后江青特意打电话给蒯大富，表扬了他一番。蒯大富同学仿佛看到了人生的巅峰。

第一次批判王光美，在周恩来亲自干预下还算比较文明的，没有人格侮辱。十一月天冷，他们给王光美一个军大衣。还有一个女生把棉袜脱给她穿了。等到一九六七年四月份，第二次批斗王光美时就没有那么客气了。那时候刘少奇的问题已经定性。作为刘少奇的夫人，必然遭到清算。既然清算，那就比较野蛮了。

批斗王光美之前，江青对蒯大富等红卫兵说：王光美当时去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都哪去啦，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又有传言，江青说过：王光美出国访问时戴项链，完全是资产阶级作风，我本不让她戴，她也曾经答应我不戴首饰，后来在看电视时，我却见她戴了项链！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蒯大富觉得应该让王光美穿当初的旗袍去受审。

红卫兵到王光美家之后就问：你上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哪去了？王光美说不知道。红卫兵就自己打开箱子，把三年前那套衣服给找出来。但是王光美已经变胖了，里面还有毛衣，穿不上。清华天才们就把两边撕开，直接套上去。至于项链，一般项链太小，没啥效果。捉鬼队——又是他们——别出心裁，把一串乒乓球串成项链，挂在王光美的脖子上，以示羞辱。王光美那样被压倒清华三十万人面前接受批斗。

——这是非常恶劣的恶作剧。但江青对此很满意。因为她看到了对手倒下。又经过一番功夫，整出一个王光美专案组。专案组再一次七整八整，把给王光美整出一个死刑。最后还是毛泽东表态——刀下留人——王光美才免得一死。

王光美当然不能满足刘少奇的胃口。蒯大富的目标是刘少奇。王光美所以挨批，根子还在刘少奇失势上。在刘少奇政治上还有一口气那会，还可以派遣工作组进校园，可以把蒯大富等人修理一顿。王光美被批斗时，意味着刘少奇政治生命结束了。

为了打倒刘少奇，蒯大富带领五千人上街贴大字报“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一直张贴到天安门，牛。

在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蒯大富迎来了人生高潮，恍然间拥有呼风唤雨之感觉。

红卫兵五大领袖，各有各的战绩。他们凭借自身战绩在那个诡异的年代，在短短的时间内风靡天下，麻雀变凤凰。他们的获奖感言：首先要感谢国家和伟大领袖提供了机会，其次感谢老师们多年栽培，感谢父母给个好出生；最主要的、也是最需要感谢的则是中央文革的各位首长们。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直接领导指挥下，才尽量少走弯路，指哪打哪。

中央文革操纵红卫兵取得很大成绩，扳倒很多大人物，比方说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等。整人方面，更是数不清。抄家方面，还是数不清。按道理说，战绩如此辉煌，该差不多了，可以考虑一下鸣金收兵、整理一下战果了吧。

不，还要继续战斗。

红卫兵们靠着燃烧的激情在前面打砸抢，中央文革则在后面给红卫兵的打砸抢寻找光鲜的理论依据。中央文革的支持反过来刺激红卫兵造反欲望。红卫兵造反又给中央文革壮大声势。没有中央文革理论跟进，红卫兵运动就是粗暴的破坏活动，很难引起多大反响。没有红卫兵运动。中央文革也就是一帮叽叽喳喳的秀才，就是文字功底和战斗力比现在网络世界的喷子高级一点点。

可以说二者相互联系，文武合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在国家机器被控制的情况下，二者结合成为强有力的战斗集体。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夺权。

按照当时的理论，因为权力掌握在坏人之手，所以国建建设才会出现那么大篓子。又因为权力掌握在坏人之手，所以把权力夺回来是天经地义。有了权力才能掌控资源、才能继续折腾出更大的动静。运动之前，张春桥只是一个笔杆子，王洪文只是一个愣头青，都后期，张春桥差点成为国务院总理，王洪文更牛，差点接班。

在进一步描述之前必须指出：红卫兵和中央文革很能闹、能折腾，仅凭他们还无法扳倒国家主席，也无法造成天下大乱。他们背后的几个人才是支柱。

**第十五章 三位大人物的命运**

**刘少奇的结局**

用两个人的遭遇描述文化大革命：就是蒯大富的崛起和刘少奇的死亡。

当刘少奇还可以执行国家主席权力之时，蒯大富不过是一个能折腾的学生。蒯大富的能量越来越大，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权力却渐渐减弱。等到蒯大富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之时，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却相当脆弱。脆弱到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保护。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后，刘少奇一步步退却，首先从党内二把手的位置上退下来，不行，退却。写检讨，毛泽东批了，还是不行，继续退。终于失去了人身自由，为了防止他向高岗同志学习，腰带被强行抽走。王光美被捕入狱，孩子们被赶出中南海。

刘少奇孤身一人在牢笼里，而他的身份是国家主席，理论上的元首。理论上，他代表的国家没有发生大的动乱（如政变），只是在搞一下文化大革命而已，听起来很文明的样子。他个人虽然检讨，却不见明确的罪行，没有审判，没有辩护。

失去行动自由的刘少奇遭受如下待遇：必须改变长期以来的生活习惯。长时间以来，领导人由于工作压力大，睡觉都要服用安眠药。有人不堪忍受，就通过吞安眠药自杀。之前高岗同志不堪羞辱，把每天的安眠药藏起来一部分，然后一口吞下二十颗，试图自杀。之后江青同志因为不习惯秦城监狱里的生活，也试图吞噬安眠药自杀。就连林立衡，都曾自杀。鉴于这些案例，被抽去裤腰带的刘少奇自然就没有足量的安眠药，也就无法入睡，有时彻夜不眠，以致他神志恍惚。

根据中华民优良传统和那个时代的潮流，自然是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捶，落难的刘少奇自然要享受红卫兵的批斗。批斗会自然少不了拳打脚踢。刘少奇战争年代受过伤的胳膊再次被打伤。刘少奇已经七十岁了，原本个人生活就不便利，被打伤之后，更不便了，穿一件衣服要折腾一两个小时。

——好吧，想象一下一个老人家用两个小时穿衣服起床的情形。

如果说穿衣服折腾一两个小时还可以对付，反正已经挨批了，不用处理公务，慢慢折腾呗。但是腿脚被打伤，问题就打了。因为要去餐厅吃饭。到餐厅只有三十米的距离，刘少奇要走五十分钟。警卫员看他可怜，也不敢去扶一把。一开始还有工作人员帮他打饭，但是打饭的同志被尊为“保皇兵”，也就不敢再帮。他自己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打一次饭，分成若干次吃，相当于吃剩饭，可以少遭点罪。

——三十米的距离啊。想当初干革命，走南闯北，三千里、三万里不在话下。想不到如今成了国家元首，竟然连三十米的距离都难以跨越。

饭菜主要是窝窝头和粗米饭，和乡下老农民的伙食相当。但刘少奇已经七十岁了，嘴里只剩下七颗牙齿，根本就啃不动那样的饭食。而且他有胃病，吃剩饭之后更严重了，身体虚弱，手脚颤抖，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

——国家元首，满脸都是米饭，和街上的疯子差不多。

当然咯，既然是文化大革命，还是很文明的，有病自然要医疗，究竟如何医疗，那就是很难说了。彭德怀、贺龙、罗瑞卿、许光达，个人的医疗方式不同，但结果都一样，就是身体不会变好只会变差。刘少奇呢，也差不多，大夫护士让职业道德屈服于政治需求，变身为历史滑稽剧的金牌演员。他们的表演如下：看病之前，开一阵批斗会；批斗会一直伴随着看病过程：他们一边检查病情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光骂还觉得不过瘾，有些“演员”表演过于投入，会用听诊器狠狠敲打某个部位，或者用注射器使劲乱捅一阵子。如此这般折腾一阵子，没有病死，也气死了。当然这些“演员”可能不是职业医生，而是造反派特意找的临时工，没啥职业道德的。

仅仅如此表演是不够的，还要采取一些手段，比方说把刘少奇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也给停了。后果不用再说了吧。

在那些“演员”们努力表演之下，刘少奇身体一系列恶化。一九六八年七月份，刘少奇高烧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可能死掉。“有关部门”得知后，立即派遣职业医生前来抢救。他们不想刘少奇死掉，理由很简单：九大即将召开，权力即将重组，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气死他。

医生提出住院治疗，被拒绝；医生请求撕掉卧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使病人少受精神刺激，被拒绝。当时的刘少奇还是国家元首，只能无力地躺在床上，无力起床也无法活动，双腿肌肉逐渐萎缩。他的胳膊和臀部由于打针被扎烂了。

护土记录日记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因为身体被摧残，因为精神受折磨，刘少奇的神经也乱了，不能正常下咽食物，只好靠鼻饲维持即将枯竭的生命。刘少奇自己毫无办法，只能听凭摆布。无法忍受之际，他就紧紧攥着拳头，或伸开十指乱抓，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如同落水之人抓住救命稻草。

此时的刘少奇还活着，实际上还不如死了。和彭德怀一样，他应该死了，却不想去死。他还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之身，证明自己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司令。

如果是，倒也好说。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号是刘少奇生日，行将枯朽的刘少奇最后一次爆发。那一天有人告诉他：他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那个决定十月份就做出了，为了折磨刘少奇，特意等到他生日那天告诉他。得知消息之后，刘少奇浑身颤抖，大口吐血。

一九二二年入党，已经四十六个春秋，这些年有过高峰和低估，胜利和失败，我都毫无保留的贡献全部，为组织、为党、为国付出一切，最终却如此结局，情何以堪啊！

事到如今还能说什么呢，我已经老朽不堪，已经离开人世，只能攥紧干瘪的拳头，睁开愤怒的眼睛表达我的愤怒。我知道无人在意为的看法。好吧，我沉默，让历史来评判吧。我这衰落的身躯已经被摧毁，但是我干过的事业无人能抹杀。

——冤。

**另外两位**

刘少奇的悲剧是文革的标志，并不是结束的标志，而是巅峰的标志。国家元首尚且如此，其他人就不用说了。

刘少奇案，共和国历史上第一大冤案。这个冤案的制造者是谁？看蒯大富领着红卫兵在折腾，看江青带着中央文革小组到处煽风点火。但是要说蒯大富和江青能扳倒刘少奇，估计他们自己都不相信。

刘少奇是国家元首，到死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无非就是一个特殊时期特殊组织而已。红卫兵更寒碜，连基本的编制都没有，活动费用更是可怜。江青凭啥去放火烧刘少奇？还不是背后的毛泽东么。如果没有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江青也好，蒯大富也罢，见了刘少奇都要笑脸相迎的。

把责任说成毛泽东一个人的，没有问题，也行。因为毛泽东本就是文革发动者，本就应该承担最大的责任。就如同陈独秀当年推行国共合作，理当承担后果。正如国际派当年推行左倾政策，理当承担后果。但是要说毛泽东一个人搞定全部的事，那也是下策。他制定政策，开启政策，如此而已。政策的执行者是谁？

江青算不算执行者？当然算。在文革设计中，江青就是待着文革小组煽风点火的。蒯大富和其他红卫兵也算。但是他们加在一起仍然不足以执行文化大革命政策。原因很简单，红卫兵组织也好，中央文革小组也罢，虽然上蹿下跳，坏事干很多，但并不掌控国家机器。掌控国家机器的是另外两个人，林彪和周恩来。

林彪和周恩来的事，后面有单独篇章。为了文章结构，这里简单说一说。

国家机器有两部分，文的一块和武的一块。

其实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之中表扬并不多，一直跟在毛泽东后面，奉行毛主席画圈我画圈的政治原则。但是林彪的地位功能却异常重要，远比江青重要。

林彪的功能前面已经说过，就是掌控军方力量，红卫兵造反派可以随便折腾，不会遇到任何障碍。正因如此，红卫兵批斗国家大员时，才没有任何障碍。如果没有林彪掌控军方力量，王大宾有机会对彭德怀施展拳脚？陷入是不可能的。蒯大富有机会“智擒王光美”？敢去中南海张贴刘少奇的大字报？给他熊心豹子胆也不敢，就算敢，也没有机会。江青有着本事么？给她一个连都搞不定吧。

实质上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那个位置，除了毛泽东亲自上阵之外，基本上没人搞的定。军方大权基本上掌控在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手中。朱德淡去，彭德怀倒下，无人能和林彪争锋。其它山头的巨头，刘伯承靠边站，邓小平成了走资派，陈毅挨批。就连同为天才人物的粟裕都没机会接触核心东西。

正是因为林彪的紧跟，手中握有整个系统的刘少奇才败得如此彻底，甚至连还手之力都没有。和刘少奇关系紧密的罗瑞卿和贺龙统统遭殃，就连和刘少奇没有什么关系的许光达（红二方面军和第一野战军在军内的大将代表）都丢了性命。

正是因为刘少奇倒台，林彪才得以升迁。一九六六年八月一号到十二号，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党内第二名掉到第八名，林彪则从第六名上升第二名，成为党中央唯一副主席，名正言顺的接班人。在刘少奇死去自由，挨批，死去的时间里，林彪又成了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以接班人身份写进党章。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号，刘少奇被疏散到河南开封，根据就是林彪的“一号命令”。当时的刘少奇已经气息奄奄，无法动弹，随时可能死亡。光着身子裹在一床棉被里，活着同等于死了。十三天之后的十一月十号，刘少奇四万，离七十一岁的生日只差两周时间。刘少奇孤身一人躺在地下室地板上，身上盖着一个白床单。他的白头头发有一尺多长，蓬乱异常，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

但是林彪并没有辉煌很久，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号，葬身异国他乡。而且比刘少奇下场更为惨烈。刘少奇虽然冤死，也就是个人的事。起码妇人和孩子熬过了文革的狂乱。和林彪一起死于大漠的，还有他的妻子叶群，唯一的儿子林立果。这一切究竟怎么一回事？等后面再说吧。不是我喜欢卖关子，而是这里不是说林彪的时候。

关于文化大革命，武的一块，在林彪手中，这个没有异议。文的一块在周恩来手中，为啥这么说？

对于执行文化大革命政策而言，只有周恩来的作用接近林彪。林彪掌控军队，解除造反派全部障碍。周恩来的功能是灭火，也就是说服教育工作，让大家服从组织、服从大局，放弃个人利益，相忍为党。

某人挨批了，想不通，周恩来就去做工作。某人危险了，周恩来把他保护起来。保护不了，也就算了。比方说贺龙，周恩来让他出去避一避风头。一段时间之后，周恩来保不住了，贺龙完了。贺龙的追悼会上，周恩来连连鞠躬，有用么？没有。

刘少奇的事情上也差不多。刘少奇打算找毛泽东辞职之前，给周恩来透过气。刘少奇找到周恩来：“总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是我怎么也没料到的，我现在这个国家主席的位子已毫无用处，为了尽早结束运动，让广大的干部免受更大的冲击，让国家少受点损失，我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

周恩来按照一贯作风对刘少奇说：“少奇呵，你不要太伤心，好多事情都很难办，这不行，不行啊。还有个全国人大代表大会问题。”

如果国家主席辞职，必然通过人大代表。刘少奇就是人大代表选举上去的。刘少奇赢得了整个行政系统的支持。人大代表很难通过。如果周恩来同意，那就在高人大选举，刘少奇赢的概率还是很大。人代会，正是刘少奇在和毛泽东闹僵的情况下当选国家主席的根源所在。因为刘少奇的“修正”，确实是有成绩的，给百姓实惠的。也正因如此，刘少奇案，才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因为他的政策是对的，却斗败了。

那么周恩来为何如此选择呢？这个问题将在周恩来篇章里说。不是我喜欢卖关子，而是这里不是说周恩来的时候。

只有林彪和周恩来的全力支持，文化大革命才能搞下去。江青才能到处煽风点火。红卫兵小将们才能继续自己的“伟大事业”。林彪和周恩来的事先放一放，先把目光集中到中央文革和红卫兵这里，看看他们的精彩演出。

**第十六章 风暴与伤害**

**夺权**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后的第六天，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号，中央颁布了一个纲领性文件，简称《十六条》。

思想基础：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思想基础是有道理的。

目的：一，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二，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目的也有道理的。

主力军：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

——这些革命主力军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他们的知识水平和认识水平有限，所以造成文革种种奇怪的现象。比方说不准女孩子穿高跟鞋。而且那个阶层中，愤青和压抑者众多，允许他们蛮干后果极为严重。

战斗手段：敢字当头，方式发动群众，以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

——这个方式非常可疑。因为这种方式中失去最核心的部分，即取证。没有严格的取证程序，这种方式将真假难辨，打击者、报复者、污蔑者、投机者都可以从中浑水摸鱼、顺手牵羊，在革命的旗下行偷鸡摸狗之目的。

战斗原则：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归根结底，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不要停下来。

这个文件下发的时候，红卫兵运动正在高峰，工人运动正在兴起。三个月之后，也就是十一月十号，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当时的走势。整个中国近代史，有两个群体最喜欢闹事，就是北京的学生和上海的工人，那是有传统的。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就是一系列闹事事件中的代表作。当北京学生闹得轰轰烈烈时，上海工人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要夺权嘛，首先要让学生和工人闹起来。中央纲领，红卫兵串联，在加上闹事传统，上海工人行动起来了，学红卫兵的样子搞运动。他们成了“工总司”，搞起了批判事业。由于经验丰富，很快就搞起来了，而且是大手笔，要求批判上海市长曹狄秋。上海属于中央直辖市，市长省部级别。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虽然打砸抢正搞得轰轰烈烈，夺权还没有开始，除了被中央划定的右派，还没有大规模揪斗高官。上海要开先例，当然不容易。市委就不同意。工人就闹。

工总司的头头叫潘国平，人称潘司令，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血气方刚并能说会道，处于敢闯敢干敢闹事且的年龄段。潘司令当过几年兵，刚刚在上海滩卖了几天力气，就要批斗上海市长，口气派头不是一般的大。今天最牛的公知们，有几个敢让上海市长辞职？

市长不让批斗，那就游行喊口号。再不行，那就来点花样。

什么花样呢，带着一批工人兄弟去北京上访。他的部将王洪文带着另外一批工人兄弟跟进。现在大家印象里的上访，都是装孙子，偷偷摸摸，好不容易到北京，能否如愿亦未可知。但是潘国平和王洪文不一样，不但大摇大摆，还大声喊出来说老子要去北京告你们。更牛的是，他们直接冲进火车站，强行上车不买票不算，还要火车给他们调时间。就这样雄赳赳气昂昂的出发了。

潘司令的工人兄弟在嗷嗷乱叫中挤上一列火车，他本人没能挤上去，在月台等到王洪文的人，就和王洪文上了同一辆车。但是潘国平和王洪文并没有到北京，仅仅到安亭以西几公里的地方停在那里不动了。派人去跑到安亭站询问情况，得到如下答案：“你们留在上海车站的第三批造反队员，本来已经抢占了一列北上的列车，原定在上午十时十分开车。可是我们车站方面接到市委传下来的命令，这趟车不开了。把你们送到安亭的荒郊，也是市委的安排，我们铁路局只是奉命行事，希望你们有事去找上海市委，不要怪到我们的头上。”

——原来上当受骗了！太伤自尊了！太可气了！

而且工人内部也出了问题。已经折腾了很久，大家全凭一股热情支持，现在被骗到荒郊野岭，又累又饿又冷，开始骂娘。有人开始骂王洪文。王洪文也不敢吭声。最后还是潘国平比较聪明，勇敢地站出来，想了一招精神胜利法：读毛主席语录。

潘国平就领着大家曰：“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自己的勇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如此等等，如同和尚念经一般。这一招还真灵。

大家不闹了，再次情绪激昂起来，表示坚决跟着潘司令把伟大的造反事业进行到底。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集中在一起想到新招：卧轨。他们可不是要自杀，是要扩大影响。安亭是个小站，当时是单线，这样一来整个北京和上海的运输线就断了。没办法，双方展开谈判，淡了老半天没有结果，运输瘫痪，惊动中央。

不但惊动了中央，而且还影响了时局。

周恩来打电话上海市委迅速解决问题，一定要劝工人回到工厂抓革命、促生产。连中央文革小组长陈伯达发电报给工人：“你们这次行动，不但是影响了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铁路交通，希望你们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张春桥去了，他站到人生轮盘上，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赌博。

当时的张春桥，还是中央文革中一个没有编制的公务员，即将爬权力的山坡。

当时的张春桥，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错。

张春桥夜里十二点到火车站和工人代表谈话，谈到第二天早餐，没有结果，继续谈，谈到中午，没有结果，继续谈，谈到下午四点钟，谈成了，大家回上海再折腾。

前后十六个小时，没有中场休息，没有喝水，没有吃饭，一直在喷唾沫星，还要面对对方车轮战。

按照张春桥的回忆：“工人那个骂起来可是凶呀，他们有好多人，我只有一个人，来的工人我一个人也不认得，在场的究竟张三，李四，根本不知道。那时我就是听哪。因为我出发以前，以陈伯达同志的名义发了个电报给他们，劝他们回上海，说我到上海去给他们谈话。他们就在那个万人大会上骂，说陈伯达这个电报是个大毒草，是修正主义，说我要把他们骗回上海，是个大阴谋，说我是和华东局、上海市委勾结好的，要骗他们回去。总而言之，整整在那里攻了我十六小时就是了。我讲话顶多一个多钟头，那就是攻了我十五个小时。”

——这战斗力不是一般的强。换成一帮情况，搞十六小时娱乐也不见得能支持啊。何况战争那里，听粗话，挨骂，不还口不说，还要慢条斯理讲道理！政治，不是一般人能玩的。能在玩政治玩出花样的人，更是不一般啊。张春桥，牛。

那么张春桥如何出招呢？从北京出发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找过他，说原则问题不能妥协，也就是说潘司令及其追随者们卧轨扰乱交通的事不能算革命行为。

中央给张春桥的任务是把工人忽悠回上海。按照保守的选择，张春桥应该把那火药桶扔给上海市委，然后拍拍屁股回北京等着时局进一步发展。因为当时夺权还没有开始，局势还不明朗，连陈伯达都在走稳妥的路子，跟周恩来一个调。然而张春桥是一个有水平的人，而且想要的更多。

回到上海之后，张春桥参加了市委常委会议。曹市长在会议再次强调中央精神。张春桥没有表示不同意见。由于张春桥是中央文革的人，是靠批判闹事上去的，走的并不是正常的官吏升迁之路。所以曹狄秋对张春桥还是很警惕，给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常委工作的陶铸打电话汇报工作，请示之后，特地叫张春桥直接听了一遍陶铸的指示，免得张春桥日后又不认账。当时陶铸还没有被打倒，不仅主持中央工作，还是中央文革顾问，和康生职责一样。

应该说曹狄秋能做的就这些了，而且做的不错，只是错误的估计了张春桥。张春桥对陶铸的指示表示服从，随后又去和潘国平、王洪文谈判。就在谈判过程中，张春桥表态：陈伯达给安亭车站的电报是在听了上海市委的片面汇报后发的，是受骗上当。

王洪文向张春桥提出五点要求：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二、承认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一一认可并签字，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说他们是发扬了工人革命运动的光荣传统。

张春桥这是干什么？先斩后奏！

这是一个极大的风险，如果中央权力框架不重组，那么张春桥的结局只有一个：坐牢，政治生命结束，还可能做很久。

别的不说，就那第一条：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啥意思？就是承认那个机构可以带领上海所有行业的工人闹事。大革命时代搞的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也没有这样一个合法机构。刘少奇和李立三还要过东躲西藏的日子。张春桥倒好，私下承认这一切，相当于跟整个政府对着干。而且他根本就没有权力那么干。

这个行为在当时看来，就是相当于把自家的房子给卖了去卖彩票，相当疯狂，相当脑残。完全是一种搏命似的赌博。但是他很幸运，赌赢了，中了大奖。因为接下来毛泽东认可了工人的行为。张春桥的孤注一掷变成了政治正确。而陶铸随后成了刘邓之后的第三号走资派。中央政治局其他老干部，一个月之后的“二月逆流”中回家写检讨。

就这样，张春桥则收获了政治生涯中一桶金灿灿的黄金。应该说张春桥根据自己的思考，准确的判断了未来局势。

事情还没完，既然承认人家工总司是革命的，那对立的上海市政府怎么办？就是反革命咯。即使不说上海市政府是反革命，那工总司要批判的人总该叫出来吧。造反派们在十一月底夺了解放日报的权，造成了解放日报事件；十二月份又纠集一帮人去平康路去高喊打倒曹老头，弄出来平康路事件，通过一场武斗冲垮了上海市委。

一九六七年到来了，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主题：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宣传一九六七年为大革命关键的一年。借着这股势头，上海造反派决定再接再厉，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收拾已经被冲垮的上海市委。一月四号，夺文汇报的权；两天后以工总司的名义开会，宣传打倒上海市委，并发布通令：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市长；勒令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交代反革命罪行；要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随后市委、市府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陈丕显、曹荻秋都完了，站到被批判的位置上。

结果，张春桥成为上海市的光辉代表，一把手，老大。

短短时间里，张春桥同志就从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上升为一把手，填补了柯庆施死后留下的权力空白。与他一起获利的还有王洪文。原来闹事的头子是潘国平，成功之后，大家重新派座次。王洪文农民出身，当过兵，又是工人，又是共产党员，根正苗红。潘国平虽然也当过兵，可惜不是共产党员。于是乎，原来的潘司令让位于王司令，变成了潘副司令。在整个上海，在张春桥、姚文元、许景贤之后，王洪文做第四把交椅。

这就是所谓一月革命，在张春桥眼中，与俄国十月革命相辉映。问题是，俄国的十月革命改变了政权和政治体制。张春桥的“一月革命”算啥？

为了增加权威性，张春桥又把一月夺权冠名为“上海公社”，和巴黎公社对应。巴黎公社改变了历史走势，“上海公社”则徒有虚名。

文革之后，这事作为文化大革命标志，称为一月夺权。它成了文革的节点。在它之前，只是局部的乱；之后，大乱。

夺权行为、各类伦理文章以及造反派打、砸、抢结合起来，造成了一系列伤害。

前面已经说过，文革是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延续，用道德大棒横扫现实生活。在这样情况下，没有谁是安全的，连朱老总都受到批判，曰大军阀。因此很多人注定成为悲剧的牺牲品。能成为悲剧牺牲品的人，都是精英。

牺牲品主要有两类：被迫害致死和被迫害自杀。因为他们的死去，导致整个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创造出现断层。代表事件分别是张霖之被批斗致死和老舍自杀。

张霖之的死，意味着行政系统内部开始断裂。任何时代，没有一个完整而稳定的行政系统就别想搞社会物质生产。行政系统的断裂，意味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停顿。有行政系统的时候，生产出来的食品可能安全系数低一点，有人吃了会拉肚子；生产工业品可能质量差一点。如果没了行政系统，连食品都没有，连次品都没有。

老舍的死是另外一个情况。老舍是文化界精英，他的自杀不仅仅是死了一个创作者那么简单，意味着整个文化界的精神被截断。因为文化界的精英之中，老舍和人民大众距离非常之近。而且老舍平时生活低调，踏实创造。在整个文化界中，几乎没有任何负面信息。创造思路也是取之人民用之人民，可以说是精英的楷模。如果连老舍都活不下去了，那表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真的出了问题。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问号：如果连老舍都容不了，那么文化大革命之后培养出来的创作者能胜过老舍吗？能像老舍一样朴实平静的创造吗？能像老舍一样清白吗？

**伤害之一，张霖之之死**

张霖之，生于一九零六年，河南人，师范学历。在早期共产党中，算知识分子了。

一九二九年，二十三岁的张霖之考入国民党军陆军第二十一师军官教导队，之后加入共产党。然后经过一系列战斗，担任过一系列职务。因为有知识，前期在白区当地下党和后期担任文职工作，参与过淮海战役。解放后担任过南京副市长，重庆市委书记等职。一九五五年之后迎来人生高峰，历任城市建设总局局长兼国家建委副主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电机制造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煤炭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正部级。

接下来情节很老套，大跃进，大饥荒，然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建国路线上发生分歧，张霖之和所有行政官员一样，被夹在中间。和其他行政关于不一样的是，他的煤炭部管理的是资源，而非实实在在的生产。一个普通行政干部受点贿，也就是贪污腐败。煤炭部那可都是大手笔啊，加上管理经验不足，就很容易和“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

放在今天，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意味着酒肉穿肠、香车美女、风光无限。那个时代则是无休止的批斗、批斗、再批斗，形同反党反革命。所以张霖之的处境比其他同僚更为艰辛，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就摇摇欲坠了。

一九六五年一月五号，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争论。

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哪里的那么多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的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顶撞说：“对于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当即说：“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

完了，张霖之的命运就此注定！

从工作关系上看，毛泽东和张霖之并无交集，也没有矛盾。关于煤炭部、冶金部，毛泽东未必知道多少人，但部长名字还是记得的。当毛泽东认为煤炭部、冶金部存在资本主义当权派时，随口就把张部长的名字说出来。

只能说张霖之真是太倒霉了！

文革刚刚起来，张霖之立马遭殃。和其他人不同，张霖之并没有被绑架到秘密地点，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挨批斗。矿院的学生、教室、干部把文斗武斗的基本项目——喷气式、侮辱、毒打——一遍又一遍用在张霖之身上。因为他们要夺权，要解决张霖之。

张霖之的女儿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份去看望爸爸，看到如下情形：“就在我焦急地在楼道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忽然听见从楼下传来一阵吆喝声，夹杂着嘲骂和口号声。我心砰砰地跳着，急忙迎到楼梯口等着爸爸。他一步步被押解上来，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爸爸下身穿着妈妈为他下跪挨斗买的棉裤，因为长，裤腿还挽着一截，上身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军大衣，爸爸的头发被从中间剃掉了一半，胸前胸后各挂着一个大木牌，手里还举着一个牌子，上用大字写着‘三反分子’，‘彭真死党’。”

“爸爸看见我，情不自禁地喊出了我的名字，那帮暴徒一把抓住我，逼问爸爸我是什么人，爸爸怕他们再向我下毒手，不肯回答。他们就当着我的面用皮带抽打爸爸，边打边骂：‘看你说不说，看你说不说……’看着爸爸挨打，我哭了，我上去喊道：‘要听毛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承认是爸爸的女儿来看他。他们立即打电话给我所在的学校，在这短暂的时刻里，爸爸的目光是那样深沉地望着我，虽然没有一滴眼泪，可我看得出，他内心充满巨大的痛苦和忧虑。”之后张霖之的女儿也没能回家，成为被批斗对象。

然而张霖之始终没能屈服，没有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子虚乌有），没有承认自己是彭真同党（这个其实可以有，他和彭真其实挺近）。

矿院造反派表示压力很大。因为他们向中央文革保证过，要让张霖之“认罪”，要在煤炭部夺权。当时是夺权高潮，各地夺权行动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要夺权，必须让张霖之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名正言顺，才能防止将来张霖之咸鱼翻身。

为了达到目的，造反派决定按照口号行事——敌人不投降，就叫他消亡！也就是要张霖之的命。于是乎，斗争升级。

造反派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智慧，把斗争进行了创新：把张霖之的铺盖卷裹上铁炉子，用粗铁丝挂在他的脖子上，然后让他站在凳子上，双手高举木牌。张霖之坚持不住摔下来，一顿毒打后，再拉上去重复。张霖之的后颈被勒出一道道血印。

不仅仅创新，还有复古：造反派弄了一个重三十公斤——六十斤——的钟型铁帽，把它作为高帽子往张霖之的头上戴。将近六十岁的张霖之，就是年轻人也无法用脑袋承受这样的重量。造反派就用绳索四面拉住，扣在张霖之的头上，把他压倒在批斗台上。张霖之昏死过去，造反派是欢呼。这种事只有古代的太监们才干得出来，不愧是读书人啊，果然见多识广。文革后，这个凶器公示于众，并被拍照存档，作为时代见证。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号夜，张霖之死，被虐待致死。第二天的大字报上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霖之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号清晨五点五十五分畏罪自杀。实际上几个小时之前就已经死了，只是没人知道而已。

张霖之死前两周，一月八号，张霖之的战友，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不堪羞辱，奋而自杀，留下遗书曰：“文革这样搞法，谁高兴？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

张霖之死去的同一天，他的老战友、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被逮捕。杨勇，生于一九一三年，经历历次反围剿、长征、抗日、解放战争，在抗美援朝后期曾任志愿军副司令，开国上将，跟过彭德怀、林彪、刘伯承三位元帅，和杨成武与杨得志并称为中共三扬，赫赫威名。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也是文革需要夺权的人物之一。杨勇还好，九一三事件之后重见天日。陶勇的事成了一桩悬案。

张霖之死去的前一天，一月二十二号下午，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在舰队司令部离奇死亡。

陶勇，生于一九一三年，出身红四方面军，之前一直跟随徐向前，直到西路军失败。抗日战争时期，跟着陈毅打；解放战争时期跟着粟裕打。抗美援朝时，陶勇再次走上战场。陶勇在军中一直以悍勇称著。渡江战役之前，英国人的战舰最后一次在中国耀武扬威，遭到打击，下令开火的人正是陶勇。毛泽东说：既然陶勇那么喜欢打军舰，以后将让他当海军吧。

正是因为这个机缘，陶勇成为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并非林彪嫡系，东海舰队也成了夺权的对象之一。夺权过程中，陶勇竟然死在司令部的井里。造反派说陶勇投井自杀。海军政委李作鹏通报曰：叛徒陶勇，畏罪自杀。老领导陈毅则说，说陶勇自杀，打死我都不信。另一个老领导，时任军委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则说，陶勇案不破，死不瞑目。然而正义并未到来，陶勇案未破，她的妻子又被关押迫害身亡。

一月二十八号，张霖之在重庆的老同事、西南局书记于江震死于非命。

一月三十号，山西省委书记卫恒死于造反派囚禁之中。

如此密集的高干死掉，即使在革命斗争中也不曾出现。而且这些人多半五十多岁，完全成熟，正值干事业的黄金年龄。而且他们都是实干家，经过艰苦的磨练，非常靠谱。虽然他们的工作中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当官或者为人有这样难以的缺陷，但那些并不构成在暴风雨中死去的理由。他们还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他们的死是整个社会机器的损失，对整个社会现实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他们只是死去的人，那些没有死去的，也没有办法正常工作，因此整个社会物质生产和运行出现断裂。

这是以张霖之为代表的行政官员的死给社会造成的损失。

这个损失只是整个社会损失的一部分。下面看看另一部分损失，精神损失。

**伤害之二，老舍之死**

前面一个例子讲到了张霖之的死。张霖之的死并不是一个孤证。他的死意味着文革对现实生产的一种冲击。下面说一说另外一种破坏，即对创作者的破坏。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号晚，邓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第二天上吊自杀，成为文革风暴中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难者。邓拓生于一九一二年，福建人，历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建国之后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大饥荒时代写过《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针砭时弊，借古讽今，非常毒辣。文革开始后，被戚本禹尊称为叛徒。

邓拓的死仿佛是一个启示，即文化界的精英们如果受不了“牛鬼蛇神待遇”的话，自杀是唯一的一条路。这些人不是一个，而是一批。

当时最好的散文家之一，杨朔，一九一三年生，山东蓬莱人。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一九六八年七月底，不堪忍受之下吞服安眠药自杀。

最好的翻译家之一，学贯中西，精通文学、美术、音乐、外语的傅雷，曾经被划为右派，文革之后，被连续抄家四天三夜，与此同时，傅雷夫妇被造反派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高帽子批斗。不堪侮辱之下，夫妻双双绝望，上吊自杀。

最好的历史散文学家之一，翦伯赞，文革中对前途绝望，夫妇二人割腕自杀。

民国时代，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周瘦鹃跳井自杀。

旧时代电影演员上官云珠跳楼自杀

著名学者储安平投河自杀。

在一连串形形色色的自杀事件中，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老舍的死。老舍也是不堪侮辱自杀的，方式是投湖自杀。尸体在北京西北的太平湖漂起来。

老舍，生于一八九九年，满族正红旗人生。

职业，作家。

性格，敏感。

绰号，人民艺术家。

老舍的父亲是一位军人，曾和攻入北京的八国联军打巷战，战死。老舍诞生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年代。灾难和战争，通常会促使两类人登上历史舞台，军人和文人。它让军人战死或成为英雄，同时刺激文人的灵感。

二十世纪前半个世纪的中国，军人在舞台上表演，文人在纸页上表演，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老舍就是文人之中的成功者，甚至可以说是几个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通过几十年辛苦劳作，老舍把他的人生和心血倾注在《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等经典著作中。以独特的叙事方式，把风俗文化、市民形象、人生步履与作者本人的主观情愫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奇妙的世界，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后人读到这些作品时，就会知道有一个叫做老舍的男人在世上存在过。

从事业角度上讲，老舍的一生是成功的一生。

感情上讲，老舍也值得称道。通常情况下，成功的文人另一面常常感情混乱。老舍不同，老舍的夫人也是满族人。老舍给她写的“情书”中列出这么三条：第一，要能受苦，能吃窝头，如果天天想坐汽车就别找我。第二，要能刻苦，学一门专长；第三，不许吵架，夫妻和和睦睦过日子。读起来一点也不像出至文豪手笔，反而像乡下人讨老婆。然而生活就那么回事，二杆子文人是看不透的。从这是上可以看出，老舍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

一生忠于艺术，又拿艺术服务大众生活，人民艺术家，当之无愧。

尽管老舍如此低调，尽管老舍离人民如此之近，依然遭受到批判。从一九六二年开始，老舍的文艺作品便遭到批判。可以想象，这个结果也是必然的。因为老舍是一个真正的创作者。所有他那个级别的创作者的工作都有内在规律：不可能符合任何政治规范。

如果按照政治规范来，那么所有真正的创作者都将完蛋。——文革中肯定不受待见之处。

一九六五年，老舍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回国后，他将旅日见闻写成长篇散文《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但未获准发表，老舍由此被迫停笔。

文革开始，江青记起了老舍。那个时代，凡是被江青想起的人，结局通常不太好。

文化大革命是江青的表演舞台。江青扮演的角色就是找茬。人嘛，尤其是文人，通常都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要找茬非常容易。但老是清清白白，低调朴实，没啥可抓。

然而江青充分发扬鸡蛋里挑骨头的本领，还是找到老舍的毛病：“老舍每天早上要吃一个鸡蛋，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同时康生捎话给老舍，让老舍去红卫兵那里参加运动，感受一下政治斗争的气氛。老舍只有遵从。

江青和康生的目的很简单，就是通过批判老舍这样一个有分量的人给文革造势。

一九六六年，老舍六十七岁，到了应该安享晚年的时候。八月二十三号那天，按照康生的建议，老舍到文联感受一下政治斗争气氛。他身穿一件浅色衬衣，外面一件中山装。文联还有萧军等二十几个等待批判的作家。他们都曾名动一时，都有过自己的事业，现在都在等待年轻人的判决。红卫兵把他们押到文庙批斗。老舍被挂上“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听着“反革命分子的呼声”，然后接受教育——被殴打。批斗会进行到深夜，老舍已经遍体鳞伤。尽管如此，他依然被要求第二天继续参加批斗会。

第二天，也就是八月二十四号，老舍并没有去参加批斗会。那是老舍生命的最后一天，没人知道他干了什么。又过一天，二十五号凌晨，老舍的尸体在太平湖被发现。比较靠谱的推测是，二十四号上午，老舍应该去太平湖了。整整一天，他应该在太平湖某个地方思考，然后投水自杀。

为什么？老舍以及老舍之前或后那些文化界精英，他们代表不同流派，不同思维方式，为什么选择各种各样的方式自杀？回答这个问题颇为不易。回答之前，先把目光往前推，推到两千年之前，那个象征中国人风骨的楚国人，三闾大夫屈原。

当年屈原是抱着石头沉入汨罗江。屈原为啥投江呢，原因无外乎，一，因为谗言遭受驱逐，个人遭到羞辱；二，他所效忠的楚怀王遭难。归根结底，就是前途漫漫，才华无处施展。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求索的结果，自杀。

屈原可以选择在屈辱中苟活，但屈原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二十四号在太平湖畔的老舍在想什么呢，一定想到了屈原。

实事求是的讲，老舍虽然遭受打骂和羞辱，和当时其他人比起来，如干部比起来，实在不值一提。包括文化界其他精英人士，承受的批判力度远不如党政干部。但是他们选择了各种各样的方式自杀。这是一个很值得一说的现象。

他们忍一忍，或许能过，但是他们均选择不忍。

为啥就不能忍一忍呢，是不是太玻璃心了？这个先要从事业角度说一说。当官的，需要的机敏、忍耐，只要有一丝机会，也要慢慢等待，要不然就没法在政坛上混，忍过了崎岖坎坷就是光明大道，继续当官。搞创造的恰好是另外一个样子，需要独立自主的思考，而非埋头忍耐。可以像李白那般在旅途中思考，也可以像曹雪芹那般在穷困潦倒下思考，唯独不能在镣铐下思考。文革恰恰要把他们置于镣铐之下。

太平湖畔的老舍是绝望的。不仅仅是因为个人遭受到侮辱，不仅仅是身处枷锁之下。更为致命的一点，是那些批斗者的身份。那些红卫兵都是什么人？如果是国家机器内部的人也就罢了，也许还有忍耐的理由。

年轻时代的老舍，面对汹涌而来的敌人，国破家亡之际，他选择抛妻舍子，提只皮箱赴国难，如同战士一般，不可谓不勇猛。怎么到老了，被一群年轻人批判一天就去寻死？似乎不可理解。仔细想想，那群年轻人就是他寻死的理由。

老舍一辈子辛苦勤劳，号称人民艺术家，为人民工作。如果说人民是国家的现在，那么人民的孩子就是国家的将来。而批判他、殴打他、侮辱他的那些人恰恰就是红卫兵，也就是孩子们，所谓未来的希望。

如果是一个年轻人，那也就算了，就当被狗咬驴踢了。

如果是一群，也可以忍一忍，就当遇到黑社会了。

整个年轻人都是这么干，那只能说明，国家出来问题。他只能理解为他为之创造的人民，以及年轻人抛弃了他。就创作者而言，这才是最大的绝望。正如两千年前被抛弃的屈原——被毕生服务的群体抛弃了。

所以在太平湖畔的老舍和汨罗江畔的屈原心思是相通的。

老舍的悲剧犹如当年屈原的悲剧。老舍的悲剧，恰好诠释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即割断了创作者从事创造的梦想。隔断了创作者不说。毕竟老舍的一生已经走完大半。参与文革闹事的那些人，也没有出现真正的创作者，这恰好是文革之后这些年，文化界创造力荒漠的注解。这个结果，或许是老舍自杀时就想到的吧。

一九六八年，老舍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在五个提名者之中，老舍得票最高。按常规，诺贝尔文学奖就是老舍的了。然而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最高潮，瑞典驻华大使多方寻觅老舍无果，认为老舍已死，奖章改颁日本的川端康成。有趣的是，获奖之后的第四年，也就是一九七二年，川端康成也自杀了，吞煤气自杀。自杀的原因也是绝望。就世界范围内，文学大师的自杀也是有历史传统的，比方说海明威，比方说茨威格，均对社会绝望而自杀。

**第十七章 失败的种子**

古人云，福兮，祸之所倚。

祸福成败，皆有因果。个人或者集体，灾难低谷时，暗藏重生的希望。上升阶段，灾难就来了。比方说长征，中共最为低谷的时刻，结束之后便时来运转。中央文革则是另一情况，在一九六七年，满世界找事、闹事、夺权、掌权，急速上升时，灾难的种子便埋下。所谓灾难，不外两种原因，外因和内因。

所谓外因，无非是折腾过程中竖敌很多。当然咯，想要夺权，就难免竖敌。权力是一根魔力棒，无论谁拿到，都不会轻易放弃。想要去夺，必然是以敌对的姿态出现。但是竖敌也有不同，数量和质量总有不同。敌人的数量和质量完全取决于自身，也就是所谓内因。

一个组织在上升阶段就埋下失败伏笔，必然是内因。

中央文革的失败伏笔，集中表现在陶铸身上。

陶铸，湖南人，生于一九零八年，死于一九六九年。

信仰，共产主义。

性格，讲原则。

从第一代领导人身世看，陶铸还是不错的。他的爸爸是个知识分子，参加过伟大的辛亥起义，之后还伙同别人一起开过煤矿，集知识分子、革命家、企业家于一身。陶铸出身在这样的家庭，教育自然不差。一九二六年，十八岁的陶铸结束了文化课程学习，进入黄埔五期，成了群英荟萃大黄埔中的一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可谓文武双全。

当时国共合作，很利于年轻人闹革命。然而一年之后风向变了。国共分裂，陶铸选择了共产党，积极投身于武斗事业，参与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这层身份算是元老级人物之一了。

作为元老级人物的陶铸，战争年代名头并不是特别响亮。不是他无能，而是因为他运气很差。广州起义之后，陶铸留在了白区。留在白区就算了，还不幸被捕，做了好几年牢狱。错过了军史上最为艰难的金色年代。

但陶铸还是在战争年代留下脚印的，参加过一系列战斗，干过一系列事实。比方说抗战时期，陶铸曾担任军委秘书长。比方说辽沈战役之后，陶铸成为沈阳市长。能在大战之后成为一个大城市市长的人都不简单，比方说陈毅成为上海市长，比方说聂荣臻成为北京市长，刘伯承成为南京市长。在平津战役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和傅作义谈判。陶铸就是平津前线全权代表，不仅负责和傅作义谈判，而且负责收编傅作义的军队。

四野南下时，陶铸已经成了政治部主任，四野中的第三号人物。解放之初，代理广西省委书记，负责剿灭西南大山里的土匪。剿匪是件很辛苦的事，高光程度不及指挥战争，力气一点也不少出。特别是西南土匪，那是有历史渊源的，基本上就没有断过，唐朝剿不完宋朝剿，宋朝剿不完明朝剿，明朝剿不玩清朝剿，蒋介石去剿，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依然非常猖獗。历史记载，西南剿匪是一场和攘外的抗美援朝并行的安内战争，非常艰苦，非常重要。

从这些履历来看，陶铸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能文能武，文韬武略都没得说。随后陶铸角色一直是封疆大吏。直到一九六五，文革将要兴起之际方才进京，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一九六六年，权力重组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取代了刘少奇的位置，排在毛泽东指挥的第二名，林彪之后是周恩来，周恩来之后就是陶铸。也就是说陶铸成了当时中共中共第四号领导人。

与此同时，陶铸的身份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按照文化大革命的布局，中央文革将是新的权力机构。把陶铸放入中央文革，实际是把他放入权力核心。

陶铸上位，是毛泽东的精心安排。

文化大革命将要打到一大堆实权派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在当时的情况下，说他们修正主义也罢、说他们叛徒也罢、说他官僚主义也罢，但是有一点无法否认，那就是他们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干了很多活。当干部本身就是干活的。

干部不干活，国将不国。

打倒的那些老干部，官僚作风是有的，活也是要干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红卫兵冲击一个个老人家，感觉很爽很革命很有成就感；中央文革那些人，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夺权，感觉很爽很革命很有成就感。但是那种成就感是建立在干活人被大趴下基础上的。年轻冲动的红卫兵可以不管这些，中央文革的理论家们可以不管这些，但是作为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不能不管这些。原因很简单，把一帮人打倒了，还得有人干活吧？

看看中央文革那些人，用笔写文章可以，用舌头鼓动宣传也可以，但是笔和舌头的功能是有限的，也就是给人家戴高帽子，也就是鼓动红卫兵。至于维持国家运转，靠的还是脚踏实地干活、认认真真的干活、无怨无悔的干活。

毛泽东把文武双全兼具实干精神的陶铸放入中央文革，放到权力核心中，就是希望他能在刘少奇和邓小平靠边之后，多干点活。除了干活之外，陶铸还有两个功能：一，陶铸比较年轻，比林彪还年轻一岁，当时五十八岁，年富力强；二，他是老干部，对老干部起到一种安慰作用；三，陶铸四野出身，林彪对陶铸比较欣赏。罗荣桓元帅去世之后，陶铸算是四野系统的第二号人物。把陶铸放这么搞的位置，相当于加强林彪的权力。如此这般，陶铸干起活来阻力会小一点。可以说这是一招妙棋。

然而实际工作和理论吹嘘是两回事。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工作中或许失误不少，但能力摆在哪里，换个人也不见得能干的更好。任何一个想干实事的人都要规则办事。

陶铸进入中央之后，和江青陈伯达关系就不怎么样。特别是关于刘邓问题上，陶铸是另外一个调子。江青想让陶铸带头去批判邓小平，陶铸说刚到中央不了解实情。非但拒绝批判，而且连“炮弹”都不提供。不提供炮弹也就罢了，当别人去批斗时，陶铸还去泼冷水。比方说组织部组织人马去中南海高喊打倒刘少奇，陶铸则说，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是同志，不能喊打倒。

对待造反派上，陶铸跟之前的刘邓也是一个调子。最为显著的就是对待安亭事件，张春桥做出赌博性选择之后，陈丕显打电话去北京，陈伯达推卸责任，陶铸明确告诉陈丕显：“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

陶铸支持上海市委，从事实角度上看，没有任何错误。一群工人搞革命闹事也就罢了，往北京去闹也就罢了，卧轨拦火车，造成交通堵塞，即使是恐怖分子也不至于这么干吧？陶铸这态度是负责，为他的——国务院副总理——身份负责，却没有为另一层身份——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负责。

所以江青给了陶铸一个评价：“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这个评价很准确，但不够精确。精确的讲，陶铸是干实事的。

陶铸的这个态度，是江青不能容忍的，恰恰是毛泽东需要的。刘邓那么干，毛泽东不能容忍，是因为他们树大根深，拉着整个行政系统去修改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在毛泽东那里就是修正主义。陶铸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同时有可以安抚老干部，一举两得。但是江青无法理解这一层，以为陶铸唱对台戏，要打掉。

实事求是的讲，江青是个出色的女人，比传统思想下那些只懂得持家生孩子的女人出色很多。但是作为政治家来讲，虽然远有武则天近有慈禧为榜样，她还不够格。从各种回忆录就能看出，比方说红卫兵造反派的蒯大富，比方说工人造反派的潘国平，比方说同为女人的聂元梓。他们对同为四人帮的张春桥评价都比江青高。在这些回忆里，江青最大的弱点就是过于情绪化，打着毛泽东的招牌惹事。最要命的是，她把自己当成毛泽东的代表，反对她就是反对毛泽东。现在陶铸反对她，她要打掉陶铸。打掉陶铸最简单的办法是通过毛泽东。只要毛泽东点点头，陶铸也就要休息了。

然而毛泽东选择保陶铸。

然而江青实在无法容忍陶铸。陶铸不仅不像其他人那样对她低头哈腰装孙子，而且常常和他吵架，让她下不了台。某次开会，江青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支持革命左派？”陶铸说：“有的革命左派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江青很蛮很自信：“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这些之后江青又傲慢地问陶铸：“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火了，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侯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而这个革命左派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这些话让江青非常受伤。因为重来没有人敢怎么跟她说话。当年彭真顶撞过她，已经成为反革命了。没想到现在又来个陶铸，真是岂有此理！

对于玩政治的而言，愤怒不怕，怕就怕怒火损伤了理智。

愤愤怒之下，江青竟然命令陶铸去支持左派。当时的江青只是文革副组长，级别和资历上都拿不上台面。陶铸是整个国家第四号人物。她有什么资格命令陶铸，骄傲？蛮横？这些都不是理由。忍无可忍之下，陶铸选择不在忍。陶铸站起来，直视江青，厉声说：“你干涉的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事已至此，从政治角度上讲，江青败给了陶铸。但是江青还有一层身份，女人。

江青选择用女人的方式对付陶铸——大哭大闹。哭闹着啰嗦，陶铸欺负她啊镇压她什么的。说撒娇也可以，说撒泼也可以。然而她不明白：所以有机会在政治舞台上“撒”，只因为身后那个巨大身影还在；等到那个身影消失了，她连“撒”的机会都没有了。

陶铸和江青的尖锐对立，使得中央文革的其他人认为必须除掉陶铸。大家齐心协力，通过编制谎言、断断章取义、收购材料等一系列方式，终于把陶铸打成中国第三号走资派，位列刘少奇和邓小平之后，成了刘邓最大的保皇派。

陶铸倒下了，规格更高：百万人批斗大会！节目还是老一套，拳打脚踢什么的。陶铸脑袋上常常长出大号疙瘩。中央文革的人很开心，架起摄像工具，拍下现场留念。然而此时陶铸已经撑不住了，生病了，没人理会，拖了几个月之后，直到非常严重时，医生才开点止疼片。直到一九六八年三月份，陶铸的腹部长出一个大大的疙瘩，才得以进医院，犯了囊癌，需要动手术。医院也是很有特色，四周窗子钉死，投不进一丝阳光。手术之后癌细胞扩散，疼痛难忍，鉴于没有更好的医疗措施，只能忍着。其中滋味，非局外人能描述。

一九六九年，由于战争压力，老干部要疏散。陶铸被疏散到合肥，享受特级护理：在小黑屋里，医务人员不得和病人说话，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人监视。四十三天后，也就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号，陶铸死去。年仅六十一岁

打倒陶铸和打倒刘邓不一样。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那是毛泽东的布局，是自上而下的。打倒陶铸这事上，完全是中央文革小组煽动的结果，是自下而上的。等到把陶铸那些“罪名”抛出之后，陶铸立刻就被洪流给冲垮了。连毛泽东也保不住他。正如刘少奇最后时代对王光美说的，运动发动起来之后，主席也没法控制。这话是对的。刘少奇本人就是精于运动的政治家，对政治运动可谓一针见血：只能引导，无法控制。

倒掉陶铸，加上轰轰烈烈的夺权运动，相当于宣布，把整个老干部全部打倒。那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说不可能完成，倒不是因为老干部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有毛泽东在，老干部会退让。问题在另外一面。放在后面说。

陶铸的死，实际上是一个征兆，意味着文化大革命正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陶铸的死，意味着中央文革小组根本无法掌控实际的权力，只能煽风点火瞎起哄，最终要完蛋。江青和四人帮的结局，基本注定。

对林彪而言，陶铸的死，意味着四野失去一位可以左右政坛的人物。

陶铸的死，自己影响到毛泽东。

由于运动过于猛烈，造成的长期伤害（中断生产和抹杀文化创造）还没有显示出来，但是体系内外大批精英死去还是过于震撼。毛泽东也要考虑给运动降降温。

文化大革命，说白了也就是社教运动的升级，旗号还是所谓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把人给整死了，偌大一个国家是，谁来干活？然而中央文革那帮人可不管这些，他们要干的就是扯着嗓子、挥动笔杆，趋势红卫兵一起往前冲。他们认为，冲的越猛，打倒的人越多，战果越大。

一系列打砸抢运动，一系列自杀事件，让毛泽东认为运动搞得过头了。他决定在大方向不便的情况下，适当引导一下运动方向，也就是给运动降降温。

为了给运动降温，毛泽东采用了两手准备：对中央文革新晋升的首长们，毛泽东采取的办法是批评教育一下；对造反派，毛泽东的办法是，以支左的名义让军人消一消年轻人的火气。这两个手段是一个信号，既毛泽东要对文革初期的狂热运动调整一下。

然而遗憾的是，这两手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导致了两个著名的事件：发生在北京的二月逆流和武汉的七二零事件。先看发生在北京的二月逆流。

**第十八章 逆流**

文革初期有两条线，一条是在社会上内闹，一条在军内闹。前面说那么多都是社会上闹的。同一时期，军内闹得也很凶：揪斗军内一小撮，带刀的刘邓路线。所败了就是林彪领着四野同志们在军队内部重新洗牌。

社会上闹文革，得利者为江青为首的文革小组。军内闹文革，就很乱。彭德怀、黄克诚就不必说了。贺龙成了大土匪。还要批判陈毅、叶剑英、聂荣臻。红卫兵天天去喊来喊去，喊个没完，惹得几位老师烦的不行。

如果仅仅批判他们几个人也就算了，都是高层，一边凉快一会也不要紧。下面那些非四野系的将领也遭到批判。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不明不白的死去就是例证。最为有趣的是许世友。许世友是毛泽东的心腹将领，也被逼得东躲西藏，从南京躲到大别山，有跑到北京避难。

上海夺权的风波很快波及到南京。一夜之间，南京掀起打倒许世友的浪潮，满大街都是大字报，曰，打倒徐大马棒。又有人曰，许世友在延安要杀毛主席，打过毛主席，现在又是华东六省一市的头头，不千刀万剐不足以平民愤。造反派抄许世友的家，满世界去抓许世友，当然是抓不着的。因为许世友已经带人躲到大别山里了，那是许世友造反闹革命起家的地方。许世友什么人啊，毛泽东最为信任的将军。这还不算，许世友并不是善茬，绝不是那种乐于被欺负的主。许将军放话，别来大别山惹老子，不然开枪。

毛泽东难寻到上海，明确表态保许世友，并让张春桥乘飞机去南京找许世友去上海，意思是让许世友支持文革。此时许世友恨透了张春桥，怕张春桥害他。但是不见又不行，就和张春桥在房间里单独谈了十多分钟，然后大家一起去吃饭。

吃饭之际，许世友借机溜到隔壁，关紧门窗，压低声音对安徽省军区司令员、政委说：“我对主席忠心耿耿，而对这个‘四只眼’，我太不放心。万一半路被杀，你们帮我办两件事，一，我死后，请照顾我的几个孩子，上学、当兵都行；二，十天内没有我的消息，赶快派人到上海收尸，把我运回老家新县埋了。记住，千万不能送火葬场。”

当然许世友多虑了。凭张春桥还没胆杀许世友。很快见到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说，世友啊，你还好吗？许世友二话不说，扑通跪倒在地，磕了很响的一个头，放声大哭。

虽有毛泽东表态，造反派依然不打算放过许世友。一直把许世友追赶到北京。许世友躲进京西宾馆。和他一起躲在哪里的还有韩先楚上将、皮定均中将等二十人。当时北京造反派正在批斗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甚为风光。南京来的几百号人也不甘寂寞，决心要把许世友抓回去批斗。他们围住京西宾馆，警卫不让进，他们就不走。

许世友知道，落到那帮小崽子手中，不死也得脱几层批。他决定反抗。他把子弹上膛，大喊曰：我可不客气了，谁敢冲，来一个枪毙一个。当时他们二十几个将军，身上只有两把手枪。许世友一支，韩先楚一支。大家表示听许世友指挥。许世友也不客气，立刻进入战斗状态，把皮定均、韩先楚等将军和工作人员组织起来，发扬野战本领，就地取材，把宾馆的热水瓶灌满开水，集中在两个楼梯口，同时关闭电梯，静待造反派。

这是粗的一面，还有细的一面。许世友电话报告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并请他们转告毛主席，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我不怕，抓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开枪！周恩来深知许世友的脾气，怕出事，立刻派傅崇碧和徐向前到京西宾馆。徐向前是许世友老领导，他的话许世友得听。傅崇碧当时管北京警卫，可以处理安全问题。

毛泽东也指示中央文革做造反派的工作，让他们撤回南京。事情才算了结。日后傅崇碧也因此事遭殃，这是后话。

这事并不是一个许世友的问题。许世友作为坐镇一方的大员，竟然被造反派追赶上千里，表示军队也开始乱了。别的地方可以乱，不要紧。但军队是国家支柱，一旦混乱，后果堪忧。与此同时，军内还在大搞特搞。

一月十九号，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参加了。为啥请中央文革的人参加呢，就是要和他们协调一下文革应该怎么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坚持军队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像地方那样搞文革。而中央文革的人则不同意：“军队不能搞特殊，要和地方一样开展‘四大’”。不搞军队，怎么夺权呢？他们决定搞突然袭击，攻击萧华。江青打头阵：“部队执行中央文革(小组)指示不彻底，是萧华打马虎眼。”陈伯达跟进曰：“萧华不像战士，像绅士。”叶群帮腔：“萧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江青还指着萧华的鼻子质问：“今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

萧华敢去吗？当然不敢去。

萧华，江西人，生于一九一六年。

军衔：上将。

萧华是标准的第一代将领，出身贫寒。一九二九年，年仅十三岁的萧华加入了毛泽东开办的干部补习班，十四岁入党。历任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委员，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随后参与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开始任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当时主任是罗荣桓元帅），参加平型关战斗。一九三八年，年仅二十二岁的肖华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率领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渡过汾河，穿过同蒲路，横跨太行山，越过津浦线，深入敌后的冀鲁平原，创建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

整个抗战期间，萧华最为解气之处并非打日本人，而是消灭了汉奸石友三。

石友三，江湖号称倒戈将军。石友三原本是冯玉祥的人。冯玉祥和阎锡山打仗，石友三头靠了阎锡山。阎锡山和蒋介石打仗，石友三头靠了蒋介石。蒋介石和李宗仁打仗，石友三又头靠李宗仁。又经过一系列折腾，石友三再次成为冯玉祥手下，随后中原大战，石友三再次头靠蒋介石。随后日本人来了，石友三投靠日本人。共产党和日本人打仗，又投靠共产党。蒋介石秘密反共，石友三再次头靠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弱，中国军人弱，皆因石友三这样的人在。如此军人，不如妓女。不仅没有节操，而且罪大恶极。在河南期间，纵火毁坏河南登封少林寺，千年古刹，毁于一旦。恶劣程度堪比谭厚兰带人挖孔墓地、拆孔庙。

萧华消灭了石友三的主力部队，实在是大快人心。损失惨重的石友三想要再次投靠日本人当汉奸。连结义兄弟兼部下高树勋都看不下去了，把石友三骗到濮阳，活埋在黄河岸边。高树勋这事手法之残忍、态度之绝情让人难以认同，但用在石友三身上正合适。天理昭昭，报应永存。做人是不能没有底线的。

解放战争，萧华人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是特种部队最早的领导人之一。辽沈战役之后出任四野十三兵团政委。文革时，任解放军中总政治部主任。总政和总参一样，是军委下面三个最为重要的机构之一。萧华的地位和总参谋长一样高。总参谋长罗瑞卿已经因为不合作被打倒了，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依然是不合作，前景依然是不容乐观呵。

军委散会之后叶剑英立即报告周恩来，说江青等要批斗萧华。周恩来马上想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报告？赶快制止，总政治部主任是能乱批的吗？！”毛泽东为啥这个态度呢。因为萧华也是毛泽东一手培养的，不论任何时候都会跟着毛泽东走。

周恩来电告叶剑英，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并说：“告诉他们，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作检查。”又打电话给江青、陈伯达，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萧华不能批。但是问题和陶铸一样，中央文革的人煽动造反派去搞萧华。当天夜里，造反派去萧华家抓人、抄家。萧华比较机灵，听到动静从后门跑了，到叶剑英家避难。

第二天，也就是一月二十号，军委继续在京西宾馆开会。见萧华迟迟未到，江青挑衅曰：“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恐怕来不了啦！”既得意又失望。得意的是，军委没有保住萧华，失望的是造反派没有抓住萧华。军委的元帅们则非常愤怒。

大家也不说话。一会之后，萧华到了会场。徐向前见萧华来了，问他昨晚跑哪去了？萧华如实回答。徐向前气愤地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了吗？”徐向前说话时愤怒地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震掉了。徐向前生气是有理由的。因为当时是军委文革小组长。他觉得萧华应该敢于直面造反派，有军委罩着嘛，怕啥。

陈伯达阴阳怪气地对萧华说：“看来一定有人保护你，是谁呀？”

这时叶剑英忍不住了曰：“他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藏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火气上涌，愤怒地猛拍桌子，茶杯和碟子都被震落地上。由于用力过猛，致使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缝，受伤挂彩。

元帅的盛怒镇住了江青、陈伯达等人，不再纠缠萧华了。其实徐帅叶帅都是老人了，已经很久没动火气。江青和陈伯达能让他们来火也不容易了。

这事在历史上叫大闹京西宾馆。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萧华还要继续挨批，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莫名其妙的完蛋了。老帅们认为这么下去不行，打电话找管事的林彪，林彪不见。一月二十四号，徐向前直接去毛家湾，见到林彪：“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能夺权。”林彪点头答应：“是的，军队不能乱，我同意军委发一个文件。”当即由他口述，秘书记录，整理了七条。接下来有请聂荣臻和叶剑英商量了一番，大家都赞成。七条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的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月二十八号下午，林彪和徐向前把文稿宋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又加上一条：高干要关好自己的子女。一共八条。前七条保证了军队的稳定。毛泽东加上的第八条也是非同寻常，所谓管好高干子女，即剥夺了老红卫兵造反资格，也就是否决了老红卫兵的功能。

红卫兵四大派系之一，造反派先锋，骨干型人物就此推出历史舞台。——算是给红卫兵运动泼一盆冷水。

军委八条下达的过程中，林彪扮演了关键角色。起初不愿意见老帅，是因为他们不想趟浑水。从林彪角度讲，他希望文革，乱一乱可以的，可以烧掉更多对手，扫除障碍。特别是其他有威望的元帅。比方说贺龙就掉了。但他不希望军队下边乱。因为军队是他管的。军队乱了，他也没好处，最后还交不了差。他的人，比方说李作鹏、吴法宪都被批斗过，没办法，控制不了。萧华也可以看成是林彪的人。林彪未必想批他。

破坏过猛，军队出乱子，毛泽东决定敲打一下中央文革那帮理论家，给文革适当降温。

军委八条下达一周之后，二月六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吹风：“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这是实话。

毛泽东还对陈伯达和江青做了一番点评，“陈伯达对我是不接触、不谈心，就是送一点文件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可谓一针见血。

接下来毛泽东又苦口婆心教育他们：“对干部要宽大一点。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也没有同林彪同志、总理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对干部，不要不许革命。徐向前，我保，住到我这里来。”

四天之后，继续开会。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指打倒陶铸）！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说完陈伯达说江青：“你这个江青，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从审定《军委八条》到敲打陈伯达和江青，短短十来天，毛泽东连续出手，极为不常见。毛泽东本意是恨铁不成钢，安慰一下老同志，却给老干部们造成一种幻觉：领袖是不是对中央文革不满了？是不是放风要结束文化大革命？往好的一面想，好像是。

那年代，毛泽东说谁有事不商量时，基本上意味着那人完蛋了。大家想必还记得，打到邓小平之前，毛泽东说你邓小平有事从不找我商量。然后邓小平就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派。

老干部决定反击，理由如下：如果继续文革，很多人将继续遭殃，还有很多人讲开始遭殃，迟早会烧到自己身上；如果领袖决定结束文革，那正好大家用力，把中央文革那帮讨厌的家伙给一锅端了。豁出去了，干！

大闹京西宾馆之后，大闹怀仁堂就此拉开序幕。

怀仁堂位于丰泽园东北，原为仪銮殿旧址。光绪年间建仪銮殿，用时三年。建成后慈禧入住并在此殿召见大臣处理政务。戊戌政变之后，慈禧亲自在此训政。仪銮殿取代紫禁城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政治中心。后来仪銮殿被火灾焚毁，重建的宫殿名为佛照楼。袁世凯更名为怀仁堂，用于办公。

建国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这里举行过若干重大会议。五四年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处理高岗；一年之后，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在怀仁堂加冕而载入历史；五八年反教条，刘伯承在怀仁堂挨批。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故事。

时间到公元一九六七年二月，怀仁堂再次发生一件大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闹怀仁堂事件。此次事件之重大，超过建国之后任何一次政治较量。

在这次较量之前，中央政治局还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这次较量之后，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局成为最高权力机构。这次较量之前，周恩来召开整治碰头会，中央文革跑过来参加；这次较量之后，周恩来必须去参加中央文革召开的碰头会。

战斗开始之前，先介绍一下双方阵容。按照正统说法分两派：正义一方和非正义一方。

正义一方：谭震林和陈毅冲锋，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人协助。

非正义一方：张春桥和江青打主力，陈伯达、谢富治、王力等人协助。

愤怒的谭老板

谭震林，湖南人，生于一九零二年，卒于一九八三年。

性格：坚强。

个性：爱放炮。

绰号：谭大炮，谭老板。早期领导人中，绰号千奇百怪。周恩来早年蓄有漂亮络腮胡子，得美髯公称号；朱德胡子也颇茂盛，将士称其为胡子军长；罗瑞卿个子高，年轻时消瘦修长，曰罗长子；李作鹏眼睛不好，戴了墨镜，人们喊他“李瞎子”。

大家喊谭震林为老板，其实谭震林一点也不像老板。谭老板身高一米六，面黑，特别是没有老板的大肚皮，怎么看都像干活的。大家偏偏喊他老板，从毛泽东到普通战士，都这么喊。至于大家为啥这么喊，大概因为谭震林店员出身吧。后来在新四军中冒充过一次老板。

谭老板虽然不像老板，但脾气很大，和彭德怀有几分相似。陈毅对谭震林脾气有过经典评价：“谭老板朝你发脾气，你可能受不了。可是一转身呢，他又在说你的好处了。”谭老板批评人时，叫你下不了台、无地自容、难以忍受。但过后他不记账，从不背后给人小鞋穿。

建国后，谭老板当了官，大到副总理。

政治上的金科玉律是——沉默是金，如果不得不说，那就和稀泥，不行就当墙头草。谭老板倒好，得了一个雅号“谭大炮”。只要他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就要开炮。

曾经有段时间，神秘的“有关部门”为了首长的安全作出规定：外出开会，不得随便乱喝水。警卫人员、秘书应该给首长带个暖壶，喝自带的水。一天，谭老板到西苑旅社去讲话。司机拎了个暖壶放到车上。他问：“带暖壶干什么用？”

司机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他火了，说：“这是什么人的规定？”“保卫部门。”

“乱扯淡！”谭老板说，“这简直是国民党！”顺便说一下，那时候共产党称国民党为匪。谭老板就这么一路放炮，一直放到怀仁堂。在那里他遇到人生终极考验。

八年前的彭大将军孤身一人在庐山做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应该做的事，现在谭老板在怀仁堂就干了一个老牌共产党应该干的事。

文革一开始，谭老板就很多事看不惯，鉴于大革命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领导的，很多事也就忍。等到忍无可忍之时，那就无须再忍了。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六号，六十五岁的谭老板进了怀仁堂参加政治局碰头会，周恩来主持会议。谭老板原本要和周恩来李先念等人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的事。在大饥荒时代，谭老板管农业，最后因为牛皮满天飞出了天大问题。虽然是集体灾难，但无论如何谭老板难逃责难。他的左倾蛮干，也是推动因素。对此谭老板非常内疚，决心好好工作，弥补自己曾经犯下的过失。然而他没想到，以谭老板的身份进入中南海之后，却变身为谭大炮，放出一辈子最大一颗炸弹。

因为在这次碰头会上，谭老板恰好碰上了张春桥。

本来谭老板和张春桥是老熟人。当年谭老板在上海工作时，张春桥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属于晚辈后生。他们不仅打过交道，谭还曾经批评过张后生。那是谭老板还没有感受到张春桥这位后生的可畏之处。

文革开始，张春桥凭借书生气和深厚的理论功底被毛泽东看中，从此平步青云，步步得宠。但在谭老板那里，张春桥还是后生，并不怎么可畏。当张春桥迈着四方步进入会议室时，谭老板拦住了他，冷不丁问：“春桥同志，陈丕显同志为什么不让来北京？”这是明知故问。因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已经在一个月之前的一月风暴中被打倒了，现在正在群众哪里交代“罪行”呢。老干部对此极为不满。谭震林的言外之意，就是小张啊，你要好好说说。

张春桥看了一下谭老板，还是当年那样子。但现在的张春桥，已经不是前几年的张春桥了，就不冷不热地回答：“群众不答应啊！”言外之意，不要摆谱了，老家伙。

一听“群众”二字，谭老板就来火。文革初，很多惨案都是借“群众”之名搞的。现在又把“群众”抬出来，真是气死老夫了。张春桥啊张春桥，老子搞群众运动时你还不知道在那儿呢！谭老板忍不住开炮了：“什么群众！群众！老是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这话当然说给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听的。

文革小组虽然是理论高手，还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吼声镇住了。他们印象中，这些老干部都是绵羊，只要亮出毛泽东的旗号，他们就会任其宰割，这个谭老板怎么就变成饿狼了呢？非常意外，想不通，一时愣住了。

见张春桥不说话，谭老板继续开火，指着张春桥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又把目光转向在座的老战友，沉痛地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这些话揭穿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目的，同时引起老干部的共鸣。说这些话的过程中，还有一系列肢体动作，比如拍桌子啥的，非常有感染力。

当然这些都不致命。张春桥等人虽然红得发紫，终究还是小字辈。在讲究资历的年代，谭震林就是指鼻子骂他一顿也不是啥大不了的。问题是，谭老板把炮筒对准了江青，说：“去年十二月，我让农林部发一个通知，渔汛期间集中力量捕鱼，渔轮可暂不回港参加运动。这事，江青、陈伯达就要把我整成反革命，连着逼我检查四次，说我镇压群众运动，破坏‘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江青可以查查嘛，我从井冈山到现在，哪一天反对过毛主席？！”

这倒是实话。谭震林一九二六年入党，在朱德上井冈山之前就已经跟着毛泽东干了。可以说是最老牌的井冈山之一。随后一直在红四军和红一方面军干活。长征之后，谭震林和陈毅一样留在南方打游击。随后一直在新四军干，是新四军元老之一。最为辉煌的时刻，跻身于淮海战役五大前委。

“江青同志、中央文革小组还是保过你的。”谢富治说。

“我用不着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谭老板大声回应。到此还没事。但是他忽视了中央文革中有康生这样阴险的暗器高手。

“捕鱼问题是主席点了头的，希望谭震林同志正确对待。”康生阴险的说。言外之意，是说谭震林还是反对毛伟大领袖，替江青敲鼓呐喊。

但老板已经愤怒了，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我跟主席四十多年了，从来没反对过他。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说什么：“我一不该参加革命，二不该加入共产党，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让你们这些人跟着他干去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说什么“我就是和你们斗，我还有三千御林军。”

谭老板估计已经气昏了，说这些授人以柄的话。这样“自杀式”的言论，一时口舌之快后，恰好落入中央文革的陷阱，整理成记录交给毛泽东，会有谭老板好果子吃？

当然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冷静下来的谭老板看到自己一方力量有限。几个老帅没有军权，几个副总理没有实权。就算把周恩来拉进来依然没有胜算。于是他想到一个人，那个人有力量有权利，如果他愿意，胜算应该大一点。那个人就算林彪。谭老板给林彪写信：

林彪同志：

昨天的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此致

敬礼！

震林

二月十七号

谭震林这又是一招臭棋。他以为林彪也是老革命，会对中央文革不顺眼。林彪确实是老革命，确实看中央文革不顺眼。在那种情况下，手握军权的林彪如果敢按照谭震林那样子折腾，估计下场比谭震林还要难看。

林彪做了当时唯一能做的事，把谭震林的信转给毛泽东，还做了批示：“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信送上，请阅。”这个批示的言外之意就是，虽然谭震林拉我，但我和他没有关系、也不想有关系。

谭老板也足够硬气，两天之后，毛泽东面前重复了他的三不该：不该入党四十年，不该跟你干革命，不该活到六十五岁。把毛泽东气得愤然离场。

毛泽东自然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在说严重后果之前，看看谭老板亲密战友，陈毅元帅的表现。

**陈毅的表现**

谭老板发泄完心中的愤怒，正要转身离开，以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不屑。一个声音叫住他：“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那人便是陈毅。

大家或许有些纳闷，这个大闹怀仁堂，为啥陈毅和谭震林搞冲锋，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何没有冲到最前方？当然他们也拍了桌子，也大声呵斥了几句，但是比起谭老板那些自杀式的言论，比起陈毅那种不要命的演说，只能是和风细雨。

回答这些之前，要先理清一些关系。

谭老板参加革命很早，二七年武斗刚开始那会就跟着毛泽东在井冈山工作了，属于毛泽东老部下。但是谭老板那时级别不高，无法跟毛泽东一起搞。反围剿失败之后，谭老板被迫留在南方打游击，成为新四军铁杆，后来成为第三野战军一员。反围剿失败之后，陈毅也留在了南方打游击。皖南事变之后，陈毅一直是新四军和三野形象代言个人。

也就是说，陈毅元帅一直是谭震林直系老领导。而周恩来是陈毅老领导，南昌起义就是，建国之后还是。周恩来和陈毅，一直就乘坐同一辆战车。

中央文革那帮人崛起之后，想要上位就必须搬掉一批人。当年最大的障碍当然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已经被打到了。还有一个障碍，即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二月之前，政治局日常工作落到周恩来身上。只要拿下周恩来，政治局就会落到中央文革手上。然而要打到周恩来并不容易。周恩来势力不见得比刘少奇小，和刘少奇不一样，周恩来没站在毛泽东对立面。但是这不妨碍那个戏子（江青）以及她的理论家施展雄心。

打到刘少奇之前，首先清扫刘少奇的外围，就是扫掉彭真、安子文、薄一波、以及罗瑞卿等人。按照这个经验，打到周恩来，也要先清扫外围，就是清扫陈毅谭震林这些人。

陈毅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谭震林国务院副总理，和周恩来牢牢绑定在一起。于公于私都要奋起抗争。中共高层中，包括倒没倒的加在一起，唯有周恩来和陈毅历史上曾经让毛泽东下台（以后分析），这场运动无论怎么看，周恩来和陈毅都不能幸免。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争一争。

徐向前和叶剑英还在军方，当时不掌实权，军方有了八条命令之后已经没有那么迫切。所以才有陈毅和谭震林冲锋在前头。

谭老板已经当了一回大炮，火力覆盖了整个中央文革，而其波及到毛泽东。那么陈毅呢？也开了一通大炮，而其火力同样不差：“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是要搞修正主义！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是谁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权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吗？”

这一通火力犯了天大的忌讳。

战场之外，如果说有某位同志给毛泽东的震撼最大，既不是老对手蒋介石，也不是党内对手刘少奇等人，而是远在万里之外的赫鲁晓夫同志。赫鲁晓夫所以能极大的震动毛泽东，并非他有多大功劳，也不是其他能力，而是其政客之阴险。阴险的在斯大林面前谄媚，阴险的利用朱可夫登上最高领导人地位，随后又阴险的接触了朱可夫一切职务。

然而在斯大林问题上，赫鲁晓夫做到了极限，经过他的秘密报告，把已死的斯大林攻击的体无完肤。在赫鲁晓夫的政治报告中，斯大林变成了人家魔鬼，希特勒第二，相当于鞭尸。客观说，斯大林确实是那个年代的独裁者。但是在作为斯大林继承者赫鲁晓夫显然缺少政治家的智慧和气度——他期望通过鞭笞斯大林的方式树立自己的威信。所以最后，捏日博列夫用同样的办法赶走赫鲁晓夫之后，没人同情他。终其一生，赫鲁晓夫不过是个政客，眼高手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毛泽东同样担心自己死后的事，担心中国出现赫鲁晓夫，所以每一次运动都在寻找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彭德怀啊、贺龙啊、刘少奇啊、林彪啊都成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但是毛泽东自己可以讲，陈毅不可以讲。但现在陈毅豁出去了，偏偏就讲了。不但讲了，还讲的很多。一直唠叨到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整过很多人，周恩来陈毅都是被整对象。通过延安整风上去那一批人，刘少奇、邓小平、高岗、安子文这些人已经被毛泽东亲手除掉了，原因各种各样。这无疑是毛泽东的伤疤。

当年毛泽东亲手给了刘少奇高岗等人机会，结果倒好。高岗不听话搞串联。刘少奇和邓小平更是明目张胆跟毛泽东对着干。

啰嗦这些之后，陈大元帅还嫌不过瘾。因为延安时代的整人专家，康生同志今天仍然坐在这里，以中央文革的身份继续整人。所以陈毅很生气，把矛头指向了康生：“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当然咯，这些话说得很重，换成一般人估计就架不住了，但对康生同志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康生同志在数十年如一日的整人事业中，那是久经考验，啥场面没见过？

这还没玩，当晚九点左右，陈毅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团，再次拉开大炮，用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慷慨陈词，一口气讲了好几个小时：

陈毅说：“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前面冲。”

陈毅说：“现在把刘少奇的一百条条罪状贴在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呀？”

陈毅说“朱老总今年八十一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人家不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

陈毅说“贺龙是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

陈毅说：“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十一个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十一个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陈毅说：“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要很长时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不治！”

陈毅说：“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

这么一番话，连现在很多网络喷子都说不出来。当时陈毅以国务院副总理、共和国元帅、外交部长的身份说出来了，冲击力之大可以想象。

说这么多，激情发泄了，愤恨说出来了。后来人把谭老板和陈大元帅的这些话当成正义之声加以转载。正义归正义。很多时候正义解决不了问题。陈毅这一方慷慨激昂的讲话算捅了马蜂窝。没有解决任何实际性问题，相反连中央政治局都断送了。

为啥呢？中央文革这种人，书呆子也好，政客也好，理论家思想家也罢，说到底只有一张嘴。他们的那些嘴加在一起既不能掀起文革，也不能结束文革。不管是江帮主还是其他人，能做的就是高谈轮廓，浑水摸鱼，借机打到一批人自己上位或者演戏而已。让江青、康生、张春桥他们去搞文革那是抬举他们，离开了毛泽东他们啥都不是。

没有毛泽东，江青只能从事自己老本行，演戏事业，什么共产主义战士，瞎扯。

没有毛泽东，康生估计能成在文化上投机倒把一番，就如现在某些不良“大师”，丧尽天良，坏事做光光。

没有毛泽东，张春桥估计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思想家，姚文元要乖乖的当文人墨客。

既然根子在毛泽东那里，此时的谭老板和陈大元帅还没有见到毛泽东，就在这里乱放炮。等待他们的只有毛泽东的雷霆之怒。

谭震林的讲话和写给林彪的信已经超出了毛泽东的容忍度，陈毅再来这么一篇演讲，再加上聂荣臻和叶剑英等人从旁协助，快构成一个小集团了。

中央文革的人一看就乐了，他们还记得十年之前的高岗和饶漱石，并没有如此团结；庐山之上的彭德怀等人也没有如此团结，但依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彼时的高岗和彭德怀还没有任何反对毛泽东的苗头。现在好了，谭震林和陈毅竟然不知死活朝领袖叫嚷，太好了，太好了，另一个反革命集团诞生了，你们死定了。

正愁没办法整你们呢，这下倒好，你们自己送上门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管你老帅还是副总理，只要是反党集团，就得完蛋。

接下来文革小组要做的就是把他们说的话记录下来，添油加醋向毛泽东汇报，再想办法把那群人打成反革命集团，然后开批斗会，开飞机，殴斗，打翻在地，让他们跟彭德怀贺龙去做伴。最后大获全胜，唯我独尊，哈哈哈。他们很得意。当然他们有得意的理由。特别是江青同志，本来就是主修表演的，现在有了这么大一个舞台，当然要好好表演一番。

当然咯，站在毛泽东角度上看，一定要好好教育教育这些老战友老部下，特别是陈毅同志。想不到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陈毅再一次站到对立面，一定要敲打敲打。

**毛泽东和陈毅**

陈毅，生于一九零一年，卒于一九七二年，和朱德邓小平一样，都是四川人。

性格：豪迈，刚毅。

兴趣：领兵打仗，舞文弄墨。

个性：善于放炮。

军衔：元帅，十大元帅排名第六位。

陈家原为地主，清朝前期有很多土地，等到近代，便和清帝国一起衰落。但陈毅接受很好的教育，早早识字，念私塾，新校，后来又去留学。和所有元帅一样，陈毅，血液里流淌着不安的因子，不甘于现状，不甘于被压迫，渴望成就一番事业。辛亥革命开始之际，年仅十岁的陈毅就剪掉辫子，以示和传统决裂。

评价陈毅一生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借用官方评价，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有像郭沫若那样，说元帅本质上是诗人；或者说光明磊落豁达大度等形容词等等，这些都是大实话，陈毅都当之无愧。

本文的评价是只有两个字：坎坷。

陈毅本是豪迈风流之人，却生活在乱世之中，曾经加入“文学研究会”，和茅盾、周作人、朱自清等人一路，差点成为文豪。加上陈毅面相还可以，肯定是感情丰富。然而陈毅的感情经历丰富而感人。法国留学被遣返之后，在重庆靠文字讨生活。不喜爱那个成为报刊主笔。有美女读到陈毅诗文，无限向往。

陈毅第一位知音叫胡桂兰，号称乱世佳人，和陈毅同龄，国民党女少将，明朝开国重臣胡大海后代。军阀军阀杨森慕胡桂兰姿色，欲讨之为妾，被拒绝。大文豪茅盾听此事后，写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虹》，原型就是。胡兰畦因爱慕陈毅的诗文与他相识，二人成为密友，亲密到啥程度，只有传说。后来胡桂兰嫁给了军官，夫妻二人掩护陈毅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哥们工作。南昌起义前夕，陈毅辞别胡桂兰，一别十年。二九年，胡桂兰被蒋介石点名驱赶，后留学欧洲，加入德共，和德国共产党领袖谈过恋爱，随后做过监狱，出国后写本书叫《在德国女牢中》，名扬天下。此后又去苏联，深得高尔基喜爱，赞曰，她是一个真正的人。高尔基去世，斯大林亲自抬棺，胡兰畦则被斯大林钦定为高尔基灵柩的执绋人之一。但是胡桂兰和王明不和，在苏联受到监视，遂回国，任何香凝的秘书。

国共再次合作，胡桂兰又和陈毅相见。二人倾诉衷肠，定终身，并得到陈毅父母同意。眼看有情人终成眷属，命运再次开了个玩笑。项英亲自找胡兰畦谈话，说二人倘若结婚，胡桂兰党员身份就暴露了，你这个国民党的将军，还是留在国民党部队里，对革命更有贡献。为了革命，为了组织，二人只好痛哭分别，并相约：假如我们三年内不能结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三年后，陈毅自由再婚，胡桂兰还在默默从事地下事业。从此再没和陈毅相见。

一九三零年，胡桂兰出国之后。二十九岁的陈毅结婚了，娶了当地一位才貌出众的岁女学生，叫萧菊英。第二年陈毅去开肃反会，归途遇土匪袭击，马死了，步行绕路回去。然而萧菊英认为陈毅已死，跳井殉情。陈毅闻讯悲痛异常，写诗曰：“泉山渺渺汝何之？检点遗篇几首诗。芳影如生随处在，依稀门角见冰姿。”后陈毅冒险亲自化装去岳父家报信。

萧菊英去世后第二年，三十一岁的陈毅和十八岁女红军赖月明结婚。当时陈毅指挥六个师和所有地方武装，居然没钱摆酒席，还是赖月明借了二十块钱应付。结婚之后，聚少离多。长征后，陈毅重伤留守。担任石城县妇女部长的赖月明照料陈毅的腿伤。陈毅却动员她带头疏散，回乡打游击。从此生离死别。抗战之后，陈毅去寻找赖月明，得知赖月明被捕后为抗拒逼嫁，跳崖自尽。陈毅再一次写诗抒悲痛：“兴城旅夜倍凄清，破纸窗前透月明。战斗艰难还剩我，阿蒙愧负故人情。”其实赖月明并没有死，她在战斗中失去组织联系后，流浪乞讨，被老爹抓回家卖给一个鞋匠，鞋匠死，她找到一位负伤掉队的红军结婚，生下一女二男。一九七二年，赖月明从生产大队的喇叭里陈毅死讯。而陈毅一直不知道赖月明还活着。

一九四零年，三十九岁的陈毅和十八岁的张茜结婚，感情才算风平浪静。十大元帅之中，陈毅最有文采，感情最为坎坷。

不仅仅是感情，事业上同样坎坷。当然那一代人都很坎坷，然而在这一群坎坷者之中，陈毅是坎坷派代表。其他人的坎坷仅仅来自于敌人，陈毅之坎坷除了敌人还有老领导毛泽东。

五四运动之前的陈毅干两件事，一样念书；另一件和那一代人一样，对现实社会不满。五四之后，成为马克思的粉丝。因为是马克思的粉丝，留法期间被遣返回国。

二七年投入武斗之前，陈毅当过编辑，和学生一起搞过运动，和工人一起搞过运动，成绩和刘少奇和项英等人是没法比的当然。此时陈毅本质是个文人，不安分的文人，左派。

文人永远都是不安分的。不安分也有两种，一是风骚；二是有理想。究竟是风骚还是有理想那是需要考验的。当然如今这年头难得有考验的机会，但陈毅那年头绝对不缺机会。蒋介石的屠刀就是最好的考验。当蒋介石举起屠刀的时候，风骚的文人就安分了，有理想的文人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投笔从戎。

陈毅赶去参加南昌起义，但是没赶上正式起义，却迎上来败退队伍。然而陈毅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朱德重整部队，随即跟着朱德一起去了井冈山，成了正统派之一。

陈毅在井冈山上见了毛泽东。

毛泽东和陈毅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答曰，说不清的关系。按照宣传，毛泽东和陈毅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战友兼诗友，非常特殊，非常美好迷人。但是在美好迷人的外衣下面，也有结。剖析二人之关系，绕开那个节点是不可能的。

一九六七年，毛泽东面对侃侃而谈的陈毅时，一定会想起一九二九年的陈毅。一九二九年的陈毅同样侃侃而谈，结果让毛泽东栽了一个难堪的跟头。

毛泽东在苏区被人家“夺了几次权”，第一次，一就是一九二九年那次，被陈毅给轰下台的，最为窝囊的一次。窝囊在哪里呢，后来也有被轰下台的经历，比如在宁都会议上，但那是被中央架空，说得过去。陈毅是下属。

被下属轰下台，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丢面子的时，何况自尊心极强的毛泽东。

朱毛会师于二八年，会师之后，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陈毅当政治部主任。当年毛代表对陈主任印象很不错。因为这个陈主任和自己差不多，是个文人。虽说文人多半相轻吧，在数量较少情况下会物以类聚的。当年井冈山能遇到文人相当不容易的。毛泽东的寂寞可想而知，现在陈主任非但能诗善文，字写得也不错，而且说话风趣幽默，知音啊！

二人相见，可谓相见恨晚，相见恨晚，相慰平生。

非但志趣相投，陈主任也很够意思，处处支持毛代表。

当年朱毛会师之后，可不像现在宣传那样家和万事兴，矛盾摩擦是不可避免的。最主要的矛盾体现在前委的权力分配问题上。

在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建立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了指挥的方便，红四军决定军委停止办公，将权力集中到前委。当时毛泽东是任前委书记。但是建立根据地有很多事要干，什么柴米油盐的，一大堆。这时刘安恭来到四军工作，任军委书记，并接替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职务。刘安恭同志认为：前委只管好行军打仗就行了，其他杂七杂八的事还是让军委管吧。这种做法有一定道理。朱德表示赞同，但毛泽东坚决反对。因为这个刘安恭等于给前委书记毛泽东行动上多了约束。

所以朱毛就有了矛盾。

既然两位领导有了矛盾，下属们都要思考一个问题：自己应该支持谁。毛泽东最坚定的支持者有两个，一个是林彪同志，另一个就是陈毅。林彪和陈毅都是跟着朱军长上井冈山的，现在他们选择支持毛代表。在毛泽东将四军政治部主任让给刘安恭时，只有林彪和陈毅表示坚决反对。而在朱德和刘安恭倡议成立临时军委时，也是只有林彪和陈毅明确反对。连秋收起义就追随毛泽东的罗荣桓都没有如此明了的表态。

有了矛盾就应该解决。于是开了一个会议，会议表决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压倒多数，决定撤销军委。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而是进一步激化。于是大家决定再一次开会，看看事情该如何解决。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号，福建龙岩城，苏区开会，大会主持人：陈毅。

因为陈毅和林彪已经两次明确表示支持过自己，所以毛泽东认为这次陈代表也会和林彪一样，坚决地支持他。

会议之前毛代表特意找到知音陈主任，请他出面肯定一下自己在四军中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毛泽东没想到提前打招呼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和最初设想的相反方。陈主任严厉的指责了毛代表。

看看陈代表说了啥。陈主任说毛代表：“毛泽东同志是家长式管理，搞得是一言堂，谁也说的不对，只有他说的对，他说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联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低估和信任不够，是认识模糊。为什么调查研究之后便有了发言权呢？因为他的所谓调查研究就是背后收集你的材料，党员放个屁也是香的，群众的意见就是右倾？说毛好的就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

陈主任说朱军长：“朱德是旧军队里面出来的，江湖义气浓厚，什么都是一帮一伙的，搞的是家天下，不得人心。从来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总以为自己就可以包打天下，那么，还要党干什么？”

此外陈毅还把刘安恭给骂了。简直是一棍子横扫一大片，把所有人骂了干净。其实不是陈毅喜欢骂人，他就那风格，以为把问题说出来就可以解决。而且他说的也是事实。

最后说到朱毛的矛盾，陈毅又说：“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我是郑国，是小国，夹在中间进退两难，我是进出之间为难，两大之间为小。我跟着谁走？站在哪一边？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所以，请你们高抬贵手，尽快和解为上（听众大笑）。”

大会还总结了毛代表的几条问题：英雄主义啦、什么固执己见过分自信啦、什么虚荣性重啦、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啦、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啦等等，从工作到生活一应俱全。

会后朱德表态：“陈毅同志对我个人的批评从公不从私，我现在不辨。如果是对的，对我有好处的，我会考虑，如果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的。”毛泽东异常恼火，不停地吸烟，一言不发。当然他是有理由的嘛，诗歌、文章、知己这一切都不重要了，毛泽东脑子里估计只有一个词——背叛。

最后大家投票选举前委书记。结果晋国（毛泽东）和楚国（朱德）都是落选，而小小的郑国（陈毅）当选了。这就是慷慨陈词的力量啊。

据当事人回忆，投票最后关头，毛泽东只是差陈毅的一票就能当选，结果陈毅把这一票投给了他人，毛泽东落选。毛泽东气愤难平，离开四军到蛟洋去养病。离开亲手开创和建立的红四军，离开他赖以生存的枪杆子。

毛泽东一生最恨以下犯上，这是他的一生中唯一一次败在下属手中。

在毛泽东的记忆里：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在自己一亩三分地上，被知音兼下属的陈毅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夺权。此事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及，可见刺激之大。最后由陈毅亲自登门道歉，才将毛泽东请回来。

延安整风时期，陈毅这么辩解：“我总觉得，既然是开会解决问题，就应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而不是事先定了调子，等候大家的补充，而且，我当时认为，四军是党的军队，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军队，毛泽东同志的缺点和错误在四军中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公开的讨论，于是，也就采取了一些激进的手段。”前面说过，延安整风时，陈毅没少郁闷。竟然被后来者饶漱石给折腾得很惨，体验了一把当年毛泽东的心境。

这事成了陈毅历史上反对毛主席的最大罪状，也是陈毅的历史包袱。每一次整风，陈毅就要检讨。每一次毛泽东旧事重提，陈毅就要检讨。每一次毛泽东御用理论家们提起这事，陈毅还是要检讨。不停检讨，检讨没完。

陈毅能在不停地检讨中成为共和国元帅，能够在文革中批而不倒，非常不容易。当然这事和周恩来的支持分不开。

当然二九年之后，陈毅再没反对过毛泽东。此后峥嵘岁月中，二人大体上合作愉快。陈毅和毛泽东的关系大体上符合官方宣传的轨道——下级、战友、诗友。陈毅无条件服从毛泽东领导，在残酷的战争中把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新四军搞得有声有色。

打仗之余，两人时不时诗歌来往。

文革前夜，陈毅还写诗《西行》请毛泽东修改：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山栽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以诗歌形式描述了出国感受，写得相当不错。当然不仅仅是诗歌探讨这般简单，主要保持感情上的交流和沟通。

然而三十八年之后，直到一九六七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陈毅再次反对。不仅仅反对，还把延安整风中的陈芝麻烂西瓜给抖出来。延安整风之于毛泽东是什么意思？奠定领袖地位啊！陈毅一番炮轰。毛泽东当然忍不住回忆往事。

**毛泽东的反击**

在毛泽东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事业，第二次革命。在原则性问题上，毛泽东寸步不让。所以他不能容忍任何人反对文化大革命。他本来想批评一下中央文革的过火举动，聚拢一下人心，没想到遭来这么大的反对声。

为了阻挡这股逆流，毛泽东决定坚决反击。如果不击溃这些人，文革势必难以展开。如果在战争期间，毛泽东想同时反击这些人相当困难。现在不一样了，他有足够的筹码。

大闹怀仁堂的第三天，即二月十八号，毛主席开了一个会，两派人都请了：周恩来、李富春、康生、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叶群等人到会。

这个会既不是政治局常委会议，也不是文革小组碰头会，就是毛泽东请人开会。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亮出了全部筹码。这些筹码是夹杂着雷霆怒火抛出去的。

毛泽东愤怒了：“我听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第一步，首先亮出态度。

“谭震林、徐向前（有点冤枉）、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

——指出打击对象，这是第二步。干净利索，绝不拖泥带水。

“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执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如果打分的话，我看可以打九十七分。你们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第三步呢，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言外之意，并非我强人所难无理取闹，是你们这帮人言而无信在先，说过话不算数，逼我如此这般的。告诉你们，政治是不能开玩笑的。

“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行，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枪毙，康生充军，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第四步，再一次亮出态度，分析其中的厉害。前面是悬崖，你们再往前一步就会粉身碎骨。军队在林彪手上，你们有实力吗？苦海无边，还是回头是岸吧，老同志们。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吗？谭震林、陈毅都是老党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呢！”

再一次点名要打击对象：做错了事就要惩罚。特别是陈毅同志，历史上反对我也就罢了，现在又反对起我的历史来了，这还了得？一定要惩罚。下一步当然是惩罚方式。

“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解决！”

在毛泽东这样愤怒的声音里，可以听到两点信息：这些跟了自己几十年的老同要否定文化大革命；预见到他们翻案复辟的严重后果：改组、抓捕革命者（十年之后来四人帮的命运，虽然没有枪毙和充军，却也是活着等于死了）。

在毛泽东号令下，先后召开七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谭震林、徐向前、陈毅等人大闹怀仁堂的错误。

这时候，周恩来态度就很重要。因为周恩来是他们的核心。如果此时周恩来振臂一呼，那么这些人将团结在他周围，成为一个巨大的“右派”，最后就算失败，结果必然天崩地裂。然而周恩来没有那么做。和之前很多次一样，周恩来再一次顾全大局，选择服从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三番五次发表讲话，讲“现在有一股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

这样毛泽东再一次获得胜利。

批判会上，流程还是老一套：认错，认认真真、反反复复作检查，发誓再也不敢坚持自己的错误做法；最后大家一致表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听从毛主席的教导，努力紧跟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云云。

三月十八日会议一结束，林彪就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宣布：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

从此江青可以得意洋洋地对周恩来说：“以后你要来我们这边参加碰头会。”

周恩来也很配合：“以后给你们做决定。”

这一次轮到中央文革乐了。特别是善于表演的江青同志，当然少不了表演一番。其他人等自然也跟着庆祝胜利。然而他们庆祝的还是太早了。正如大闹怀仁堂之前，“老右派们”以为自己可能取得胜利一般，“左派”犯了同样一个错误。

毛泽东并没有真正想要打到“老右派”。毕竟风雨同舟几十年，剩下的也不多了，而大家态度良好，也没有彻底打倒的必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人在毛泽东面前虽然俯首帖耳，但是在其它地方都是巨人，就算不掌权，在军方或政界也有巨大影响。如果全部打倒，军队将全部落到林彪一个人手上。最为重要的是，这些人久经考验，干活能力超强。将来文革搞定之后重新搞建设，还指望这些人干活呢。

毛泽东雷霆之怒第三天，发生在青海的血案提醒毛泽东，靠江青那帮人是不行的。毛泽东需要“老右派”稳定局势。

一个月之后，毛泽东觉得批得差不多了，就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等请到自己家里，开了一个团结会，并批准这些同志在“五一”节上天安门城楼上看焰火。翻译成通俗用语就是，你们不要闹了，大家都不容易，加把劲把革命工作搞好吧。

“九大”时，除谭震林外，其他六位老同志都是中央委员，表现良好的叶剑英、李先念还进入中央政治局。但此时的中央政治局已经名存实亡，成了空架子。

这就是毛泽东高明之处：批判你，给你留点希望，转换成军事术语就是——围师必阙（给敌人留下一个逃命缺口，溃散了再打）；批判少数，拉拢多数，军事上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大歼灭战。对高岗如此，对彭德怀如此，如今还是如此。很多人会说军事和政治想通，政治能做到毛泽东这般游刃有余者，古往今来又有几人？

真正胜利者只有一个，那就是毛泽东。这一番折腾，毛泽东成功地摆脱了中央政治局，以中央文革取而代之，此后便可以放手干他的人生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遗憾的是，局势的进展和毛泽东的期望相反。

二月逆流的本质是毛泽东变相解除几个老干部最后一点决策权。

一千年之前，宋太祖在退朝后留下功臣宿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锋、赵彦徽、罗彦环等人喝酒作乐。酒至半酣，宋太祖遣散左右对部下掏心窝子：“我若没有诸位，也当不了皇帝。虽然我身为天子，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当了皇帝之后，我从来没有好好睡过。”众人一听大惊失色：“陛下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天命已确定，谁敢再有异心？”宋太祖曰：“谁不想要富贵？有一天，你部下一样对你黄袍加身，拥戴你当皇帝。纵使你不想造反，还由得着你们吗？”众人惊慌，痛哭曰：“臣等愚昧，不能了解此事该怎么处理，还请陛下可怜我们，指示一条生路。”宋太祖借机建议：“人生苦短，犹如白驹过隙，不如多累积一些金钱，买一些房地产，传给后代子孙，家中多置歌妓舞伶，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没有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众人答谢说：“陛下能想到我们这事，对我们有起死回生的恩惠啊！”第二天，功臣宿将们称病辞职。宋太祖说，好。

这就是历史上杯酒释兵权。毛泽东不喝酒，但他一打一拉，起到了和宋太祖一样的效果，可谓新时代的杯酒释兵权。方式不同，目的相同，达到目的的方式同样很艺术。从此之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列车全速前进，知道坠入深渊。

评：二月逆流，中央文革的威势到了顶峰，也是下坡的开始。

**第十九章 七月二十号，武汉**

**从青海流血事件说起**

凡事都有因果。

毛泽东引导文革的方式是两手：批评中央文革和军队支左。

批评中央文革闹出了二月逆流，军队支左则引出了七·二零事件。二月逆流把中央文革送上权力的巅峰。七·二零事件则是中央文革完蛋的开始。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号，中国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联名签发支左文件：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所谓军队支左，名义上是用军队的力量支援左派，支援有两层含义：增加左派力量，同时降低他们的狂热性。

文革初期的主力军，是由狂热的笔杆子跳动狂热的年轻人搞的，不论如何美化，一通狂热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笔杆子文字犀利，注定缺少实干本领。热血青年能冲敢干但过于幼稚。军人的风格是坚定且高效。用军人弥补工人学生和理论家的不足，看似一步好棋，最后却落入死角。正如文化大革命本身一样。

红卫兵成分原本就很复杂。运动是由老红卫兵搞起来的。但他们有着天然的缺陷，就是高干子弟的身份。在运动过程中，老红卫兵赖以存在的优势——长辈——均受到冲击，《军委八条》中的最后一条，相当于把老红卫兵送入历史。红卫兵中的极左派一直没有成气候。红卫兵只剩下两派：造反派和保守派。

前面说过，造反派是那种意志比较坚定、干事比较果敢、行动比较坚决的人，敢于把理想当面包，为了理想把理想变成面包，敢于上天摘星星的那种，代表人物就是五大领袖。保守派没有那么坚定，比较重视现实世界的面包，能吃到嘴的面包，依赖于基层权力机构。

两派亮出的旗号都是坚决捍卫伟大领袖、捍卫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万岁等等。大家旗帜是一样的，口号是一样的，行为方式都很像，但结果却是不一样的。下面要批斗一个人，造反派从道德角度出发，要批；保守派从现实角度出发，要保。

即使军队涉入又怎样？

一群军人来到社会上，面对同样的旗号，同样的口号，不同的目的。两派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帮助谁？谁是左派？那只有自己判断了。

判断之后，则是左派遭殃，原因有几点。

第一，关系问题。军人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世界，来到社会中难逃社会关系网的影响。行政系统内部的干部，多半都是军人出身，革命时代缺人手，都扛过枪上过战场，是战友。现在造反派去批斗行政系统官员，军人从感情上就难以接受，因为他们曾经是战友，开可能是搭档。比方说阎红彦自杀时，昆明军区司令秦基伟就很愤怒，因为他们是搭档。

第二，原则问题。造反派造反时，那是无所顾忌，倒处横冲直撞，从国防部到地方军区大院，都被他们烦得不行。军人最讲究原则，原则之一就是以牙还牙。你敢扇老子巴掌，老子就要拿拳头砸你。即使军人比较听话，既往不咎。军委八条之后，仍然有造反派去冲击军人地盘，那军人就无须再忍。

第三条，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造反派数量。真正铁了心、不计成本投身造反事业的革命小将其实很少。能做国防科委前面静坐二十八天的，也就韩爱晶一个；带人到地质部横冲直撞的，也就一个王大宾；清华大学那么多造反派，也就蒯大富最有种。后面的都是等而下之。造反派打掉一个就少一个，并无后续兵源。因为学校停止招生了。

因为这几条，军人支左之后不但没有减少纷乱，反而添乱。军队支左之前，纷乱多半是打砸抢闹得太过火。军队支左之后，加剧了红卫兵内部的分裂。分裂的结果是造反派力量减弱。因为保守派不会去调训军人，也没有勇气跟军人对着干。只有真正的造反派才会和军人对着干。这样就闹出了武斗事件。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号，毛泽东还在批判教育老战友时，青海就闹出了恶劣的二·二三事件。军人向“八·一八”造反派开火，死伤几百人。

过程是这样的，大饥荒之后，原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因为左倾蛮干下岗了，王昭是后来调去的，任青海省委书记。王昭在青海干得很不错，有些老百姓称之为王青天。但王昭原来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副手，去青海前彭真亲自谈了话的。文革中彭真罗瑞卿都打倒了。造反派认为王昭是罗瑞卿和彭真的死党，应打倒。

这事本来跟军人没有关系。但军人要支左之后，青海省军区内部对是否打倒王昭分歧甚大。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在党内积极揭发王昭和彭真、罗瑞卿的关系，认为应该打倒王昭。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等与刘贤权素来不和，赵永夫认为“王昭有错误，如果和彭、罗没有关系，是批判的问题，不是打倒的问题。”

这样就形成了对决：刘贤权vs赵永夫。

上海一月风暴吹向全国，西宁的“八·一八”也开始夺权《青海日报》的权。刘贤权表态支持。造反派更神气了。但是在省军区内部，赵永夫的追随者占多数。赵永夫对造反派不爽，加上和刘贤权不和，决定动手。他利用支左文件含糊不清的空间，仿效“八·一八”组织一个与之对立的组织，号称指挥部。指挥部宣称，省军区之前支持“八·一八”的决定无效的，并且把刘贤权给软禁在家。赵永夫掌控了整个青海武装力量，同时以顾问的命运对指挥部进行实际领导。

“八·一八”不卖赵永夫的账，在军区楼前张贴大字报，曰“当指挥员叛变革命时，革命战士不仅不应该听取他的指挥，而应该掉转枪口对准他。”并拉出巨幅标语“打倒军区一小撮混蛋！”“坚决揪出青海军区内一小撮混蛋！”

赵永夫的人马以彼之道对之曰，“八·一八”队伍不纯洁。“八·一八”队伍是造反派，基本上都是学生和工人，造反可以，政治头脑和手段基本上没有。采取应对措施是自己整风，把“八·一八”战斗队几个成员定位反革命分子交给公安局，要求严惩。

赵永夫控制下的部队立刻采取行动，把“八·一八”交出来的几个人戴上“八·一八”的袖章和写着“八·一八”的高帽，游街示众，向“八·一八”示威。这使双方对立局面更加激化。他们认为军队内部存在“小贺龙”、“小罗瑞卿”，一定要揪出来。矛头指向赵永夫。当时青海省委已经瘫痪。只有“八·一八”控制的《青海日报》还在出版，继续攻击赵永夫。赵永夫很生气，决定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管。

二月十四号，大闹怀仁堂之前，军管小组到报社，遭到抵制。“八·一八”成员组织划分地段守卫报社。报社原本只有二百人，增援到两千人工人守卫报社。一个小小的报社当然容不下这么多人，十一月份的西宁已经相当冷了。但是大家相当有革命精神，很多人就睡在临时搭的帐篷里坚守岗位。

面对这种情况，赵永夫也没有蛮干，调动军队封锁通向报社的主要道路和大桥。军队许可人员出入，不许运送物资进去。赵永夫是想让“八·一八”知难而退。毕竟人都不是铁打的，不可能在饥寒交迫下坚持多久的。但是赵永夫还是算错了一招，就是中国人的坚韧。想当年赵永夫自己也是在革命道路上爬出来的，应该理解中国人被理想和信念武装之后的强悍。“八·一八”寸步不让。工人和学生家属趟过刺骨的河水，给守报社的人送去棉衣。由于煤炭送不过去，守卫在报社的人只能喝带着冰渣的河水，就着冻硬了的馒头充饥。强悍程度堪比当年在斯大林格勒巷战的市民。

这事闹出来之后，肯定是包不住的，青海军区的上级兰州军区领导给赵永夫指示，让部队撤。赵永夫当然知道撤退意味着什么。撤退之后，那就意味着无休止的批斗会，甚至还可能反党反革命，可能是生不如死。赵永夫一边继续封锁报社，一边派人到兰州军区抗议，要求收回命令。

“八·一八”的人知道兰州军区命令后，更加坚定了保卫报社的决心。又经过一系列折腾，赵永夫决定走绝路，即武力占领报社。二月二十三号之前，青海军区给中央发了好几封电报，均无回应。因为当时正在大闹中南海怀仁堂：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正在跟中央文革斗法，毛泽东正在反击他们，林彪不表态，周恩来看毛泽东脸色行事。赵永夫对兰州军区的命令又不服。所以悲剧诞生了。

三月二十三号，西宁军区实施全城戒严，通告要求取缔“八·一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赵永夫动员部队：“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也动刀（指刺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压死人。”

悲剧发生在下午两点。枪声响起。部队从报社前面以及后面临河的桥头同时向报社院内密集射击。

守卫报社前的三个人首先倒下，其中一位当场身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河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场工人。他们手挽着手，高声朗读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第一排的同志倒下去了，第二排的同志巍然不动，仍然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第二排又倒在血泊中了，第三排仍然坚持，结果又壮烈牺牲。

结果：平民死一百六十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军人死四人，伤四十六人。四个军人系误伤。怎么说呢，首先这是一场屠杀。全副武装的军人从四周对手无寸铁的贫民开枪，不管什么理由，都是屠杀。文革中首次出现的屠杀。

更让人悲痛的是：中国军队屠杀了中国贫民。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干过很多不可容忍之事，搞了很多破坏。但是这些并不是他们应该站在那里被屠杀的理由。

其实不难理解赵永夫的决定，就是想自保。刘贤权支持造反派，而他本人反对造反派的情况下，如果退让，那就意味着落入造反派手中，不死也得脱几层皮。所以他才软禁上司刘贤权，软顶上级兰州军区的命令，找中央政策漏洞。不管什么理由，赵永夫必须负责，必须付出代价。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允许军人屠杀人民。哪怕人民正在闹事。可以关，可以处理，可以追究责任，但不可以屠杀，这是底线。

赵永夫越过了底线，希望险中求胜。

赵永夫，赵屠夫。

然而诡异的是，赵永夫没有立刻付出代价，还当了一个月的英雄。

二月二十三号当天，赵永夫打电话给叶剑英，按照他自己的调子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占据报社的人开枪挑衅，军队根据《军委八条》精神反击，胜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乱”云云。不明真相的叶剑英回应：“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当时叶剑英是中央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有了叶剑英支持相当于有了中央军委撑腰，赵永夫非常高兴，决定再接再厉，在青海继续平叛：仅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一万○一百五十七人，其中逮捕四千一百三十一人，拘留二千五百二十二人，看管和软禁三千五百○四人。

监狱严重超载。青海本来就没几个城市，没多少人。赵永夫这么搞，相当于把造反派一网打尽。如果事情到此结束，青海省的文化大革命也就结束了，好事。

三月八号，叶剑英特地把赵永夫等人接到北京，让他们谈谈“评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当然赵永夫成了英雄，开会时免不了吹嘘一番。他的冒险计划似乎成功了。

赵永夫吹牛吹了三天。三月十一号的时候，北京风云变了。虽然有叶剑英支持，但是叶剑英并不是最后决策者，因为在叶剑英之上还有毛泽东。毛泽东的意志不是叶剑英能对抗的。

刚开始毛泽东并没打算处理赵永夫。因为他刚刚签发《军委八条》，刚刚同意军队支左，并不想把火烧到军队身上。然而赵永夫在青海一番蛮干抓人，相当于把青海省的文化大革命弄熄火了，好啊，赵永夫，你太过分了。毛泽东动气，后果很严重。三月十一号，张春桥要求重新检查那事。毛泽东轻轻写下一行批示：“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三月二十号，林彪表态曰：“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毛泽东赞同林彪的讲话。具体过程由周恩来处理。赵永夫的冒险行动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他曾经担心的劫难还是降临了，一点都没少。借着赵永夫问题，顺便烧一烧叶剑英元帅。二月逆流中，陈毅等人已经请假检讨了，还有叶剑英和徐向前还在工作。

现在他们都支持赵永夫，好了，可以跟随陈毅的步伐，请假检讨了。

不少人认为，赵永夫之所以倒霉，主要因为毛泽东意识到二月逆流老干部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障碍，想要借这事修理徐向前和叶剑英。澄清一下，有这个原因，但只是细节末梢。当时毛泽东要挪动徐向前和叶剑英那是举手之劳，没必要把火引向军队。

赵永夫倒霉的真正原因不是三月二十三号那场屠杀，而是屠杀之后在青海到处抓人。当赵永夫把青海造反派全部投入监狱时，意味着在彻底反对文化大革命，意味着走向毛泽东对立面。他在毛泽东面前算啥？连走到毛泽东面前的资格都没有。螳臂当车，不堪一击。

如果仅仅是那场屠杀，事情也许真的就过了。赵永夫不知道其中的利害么？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赵永夫那场屠杀之后，相当于和造反派为敌，如果不把造反派全部镇压，造反派会不停造他的反，直到他彻底完蛋。他想要冒险取胜，就必须继续镇压造反派。继续镇压造反派，就要走到毛泽东对立面。那是一个死循环。

赵永夫想侥幸过关，侥幸没有得逞，却落下屠夫恶名。

——世间事，因果相连。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无数像赵永夫那样的军官文革中都面临着同样的死去。他们共同的死去构成了整个文革的死局。

处理赵永夫，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相当于把文革之火再一次烧到军队，再一次在军队中打开一个文革缺口。这点毛泽东非常清楚。当中央文革要杀赵永夫时，毛泽东把赵永夫给保下来。因为类似的事件并非一类，杀了一个赵永夫，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军队可能乱。

四个月之后，那个缺口最终在武汉导致更为严重七二零事件。

**军委十条**

《军委八条》是为了防止造反派对军队过度冲击。毕竟嘛，军队是国家的柱石。没了军队也就没有整个国家机器。毛泽东所以能发动起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出于对军队的控制。要不然怎么能轮到红卫兵无法无天？

然而之前《军委八条》之中的第五天给军人留下一点点缝隙：第五条、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这条的原则是防止造反派再次冲击军事机构。之前的规定是，军人面对造反派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军人处境确实不好，泽东的铁杆嫡系许世友都被造反派从南京追到北京，别人更不用说了。现在相当于把军人脑袋上的紧箍咒给松一松，说现在被打可以还手了。不仅可以还手，有军队拉进来支左。军人强大的执行力闹出了青海事件。

通过青海事件，毛泽东看到《军委八条》和军人支左给造反派带来的伤害。因为双方理论完全不对等。造反派冲击军队一百次，军队还是军队。军队反击一次，就可以把造反派连根拔起。不行，要想办法。

为了防止军队把造反派连根拔起，四月六号时，中央军委签发一个《十条》：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作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过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节录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本质，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件作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为啥要搞出来这样一个《十条》？就是要把《八条》中第五条那个小小的缺口堵一堵。

很简单嘛，防止再次出现赵永夫之类的事。每个省出一个赵永夫，文化大革命就结束了。然而即便如此，悲剧依然要发生。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万能的规则。只要军队那个庞然大物依然在文革的剧本中，伤害将不可避免。

这事发生在武汉。

**七月二十号**

武汉位于长江中游，华中地区的心脏，在整个中国地图上，也处于中央南北冲要地带。由于地理位置重要，交通方便，经济活跃。自古以来就是经济文化活跃之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智力大爆发之际，楚国人围绕这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创造了绮丽多姿的楚文化。

楚文化的特点之一便是神秘而绚丽的变动。在楚文化千年以来的熏陶下，那一带的人血液里流淌着不安定的因子。经济上的优势，文化里面不安定因素，加上地处冲要地带，造成武汉历来是个多事之地。整个历史上都是多事地带。近代更是如此。

孙中山先生一辈子革命，奔走呼喊，募捐很多钱、起义很多次之后，清政府终于垮台了。然而最后导致清政府垮台的那一下，和孙中山没有关系。一九一一年，辛亥年，武昌新军哗变，清政府完蛋，史称辛亥革命。武汉，那是有斗争传统的。

随后军阀群起，天下大乱，武汉成了北洋军阀和革命家争夺的最前线。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国民政府离开从鸡裤裆（广州）迁到鸡心（武汉）。武汉工人也是有闹事传统的，靠工运起家的刘少奇，就成在武汉大显身手。随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武汉一代也是大打特打，没完没了。

有了如此“光辉”传统，如此特别的经济文化地理优势，文革之中，武汉当然不会消停下来。不仅不消停，而且闹出很大动静，大到影响了文革走势。

中共将帅之中，湖北将星闪耀，林彪就是其中的光辉代表。当然林彪是唯一的，在林彪之后，王树声和徐海东大将也是大名鼎鼎。这里要说的主角就讲一个湖北将军的故事。

陈再道，湖北麻城人，生于一九零九年，一九二八年入党。

和第一代将领一样，陈再道出身贫寒，别人念书时他给别人放牛。放牛途中常常跑到私塾外面的窗子下面偷听一阵子，然后斗大的字认识了一箩筐。最底层的人，总是备受磨难，陈再道选择抗争。一九二七年，年仅十八岁的小娃娃陈再道参加黄麻起义，侥幸不死升为班长，又侥幸不死仍未排长，升为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一路侥幸下去，破刀换大刀，大刀换破枪，破枪换好枪，最后成为高级将领。陈再道打过百团大战、淮海战争，解放后搞定大别山土匪。

性格：强悍，机智。

陈再道是大别山资格最老的老战士之一，在他升为营长时领全营向敌人冲锋，左臂被子弹打中，鲜血直流。他让通讯员用刀把子弹从伤口里给挖出来。通讯员面对自己的首长不忍心下手。在这种情况下，陈再道干了一件比兰博还兰博的事：自己咬紧牙关，用手指把子弹从伤口里给挤出来了。反身再次冲上了战场。身经百战而不死，足够强悍。

当时生活艰苦，全军经费只有几百银元。那时候保护军费是个大问题。林彪就曾在这事上栽过跟头。军长把保护银元的任务交给陈再道。一旦行军打仗，陈再道就要背着一袋银元屁颠屁颠跑。某日吃了败仗，被敌人追赶。别人腿脚麻利都溜了。陈再道感受到银元压力。眼看就要连人带钱落入敌手。陈再道发挥了放牛娃的机灵，跑到一个水塘边故意摔一跤，顺便把银元丢到水塘里。然后爬起来脚底抹油，一溜烟不见了。晚上又和战友一起回来打捞银元。银元又解决了同志们生活问题，机灵啊。

陈再道就是凭借自身的机灵和强悍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在一九五五年赢得一个至高荣誉：解放军上将。他有一个绰号，叫陈大麻子。也可以多少体现一点他的性格。据说风靡一时的《亮剑》男主角的原型之一就是陈再道。

从资历上看，陈再道出身红四方面军，随后后跟着刘伯承统帅的第二野战军。在军方山头之中，不管是之前的红四方面军还是后来的第二野战军，都不是嫡系。不是嫡系的上将，不是嫡系的武汉军区司令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注定要接受考验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陈再道躲过了第一波冲击。并不是陈再道多么神通广大。而是第一波冲击主要发生在京沪地带。华中地区其实也冲击到了，主要在行政系统内部。华中地区的头头，王任重，就被冲得头晕眼花黑。第一波冲击之后，海军和空军冲击较大。陆军过于庞大了，不可能辐射到下面每一个地方。但陈再道也是睡不踏实，局势太乱了。

心惊胆战的陈再道中央等来《军委八条》，刚刚出了一口气。结果青海就发生屠杀事件。中央处理了赵永夫。陈再道的心再次提到嗓子眼，因为西宁的情况，武汉也有。武汉虽然没有屠杀事件。造反派依然分成对立的两派，各派势力和火爆程度过犹不及。而且更为要命的是，军委又弄一个《军委十条》出来，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啊。

《军委十条》都是堵漏洞的。可是不行啊，军队已经陷入其中，潘多拉魔盒已经开启。陈再道同志在心中慢慢祈祷：马克思保佑，千万不要在武汉出事啊。

可以说怕鬼就有鬼。

武汉出现了大规模武斗。而且斗得很凶。武汉本是造反派闹得最凶地方之一，惹得很多人不爽。毛泽东让军队支左，作为武汉军区负责人，陈再道执行指示，搞出来一个大规模的组织，叫百万雄师，和之前的造反派对立。

两边都扛着拥护毛泽东的大旗，行为对立，称自己为左派，视对方为右派，闹得不可开交。武汉本就是火炉子，两派对立起来，相当于在火炉子上面放一个炸药包。随时都有引爆的可能。一旦引爆，威力绝对胜过青海惨剧。

鉴于之前青海发生的惨剧，毛泽东决定解决问题。原本是要让陈再道去北京的，后来毛泽东决定亲自去武汉，解决一下武汉的矛盾，顺便再游长江，有机会的话写点诗，放松放松。青海惨剧中，最主要的部分表明，必须对军队加以约束。不然的话，军队会很快摆平周围的造反派（如赵永夫把青海造反派投入监狱），让文化大革命偃旗息鼓。所以毛泽东的决策是，把军方支持的百万雄师定位保守派，争取他们，但在操作上要讲究策略。在毛泽东看来，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实力，只要略施手段即可。

七月十三号，周恩来让公安部长谢富治去武汉执行紧急任务。谢富治也不知道去武汉干啥，估计是和文革有关，就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给拉上了。一行人身穿军装，手持毛主席语录上路了。十四号早晨，周恩来到武汉，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东湖宾馆给换一批服务员。因为东湖宾馆是军方背景的百万雄师的人警卫的。既然按照决策，把百万雄师定为保守派，毛泽东要住东湖宾馆，让百万雄师的人搞警卫工作显然不合适。周恩来把警卫工作交给空军去搞。毛泽东在十四号晚到武汉，入住东湖宾馆。这时谢富治才知道他的紧急任务是参与保卫毛泽东安全。让谢富治来，并非因为他是公安部长。公安部长在军队中是没有多少分量的。因为谢富治也是出身红四方面军，也是成长在第二野战军，陈赓谢富治兵团曾经在那一带纵横驰骋。武汉军区的人主要是当年红四方面军和后来第二野战军人员。谢富治曾经指挥过驻守武汉的军队，比较熟。而且之前谢富治干政委的，善于搞人际关系。

第二天，也就是七月十五号，周恩来着急武汉军区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央决策，虽然说得比较婉转，意思还是明确的：定军人支持的百万雄师为保守派。现场的陈再道一听就来火了，当场顶撞周恩来曰：“周大胡子你了解武汉的情况吗？”周恩来在井冈山留有浓密的胡子，大家称他为周大胡子。建国之后就很少称他为周大胡子了。陈再道是个急性子，着急之下就喊出来了，那一声周大胡子，蕴含不满和愤怒。

陈再道为啥不满呢，周恩来传达的决定，意味着军人继续退让。造反派本来就已经很猖狂了，到处瞎折腾。还让军人退让，往哪退？难不成退回文革初期那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旮旯里？要知道军人都是有血性的汉子，不是基督徒。现在军人已经参与了，如果退回去，那么岂不是要面临无休止的冲击、甚至侮辱？不是陈再道不尊重周恩来，实在是这个决策让人难以接受。然而难以接受也得接受。

此外还有更深的背景。武汉军区的班底是红四方面军和第二野战军。红四方面军的旗帜徐向前，因为和张国焘搞过，一直被冷藏。建国之后，第二野战军司令刘伯承靠边站。文革开始，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又被打成走资派。前不久的二月逆流中，被冷藏的徐向前再次挨批。相当于说，中央和军方高层，武汉军区完全失去了代言人。明里不说，心理就不服。有闹事的机会，自然对着干。

对周恩来不爽也没啥。因为周恩来威望摆在那里。换成别人就不同了。

七月十七号，王力找到陈再道，说百万雄师保守。陈再道屈服了。不是王力比周恩来牛叉，而是王力背后那个人。王力告诉陈再道，指示是毛泽东的意思，而且毛泽东本人就在武汉解决问题。陈再道一听毛泽东亲自制定的方针，表示立刻接受中央意见，并表示军区将做深刻检讨。像陈再道这种，关键时刻只服从毛泽东一个人的人，在军队一大把，像许世友，像陈锡联，像韩先楚。这也是毛泽东面临一波波挑战，依然稳坐钓鱼台的原因之所在。十八号毛泽东召集大家开会，把方针宣布一下，大家表示同意。随后军区做了检讨。

剧本到这里还是一帆风顺：伟大领袖再一次展示魅力和意志，把所有不同派系给搞定了。周恩来也离开武汉回北京了。接下来如果没啥事，毛泽东估计要去长江游泳了。然而事情到处发生了逆转，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

周恩来回北京之前特意交代过王力和谢富治：局势复杂，不要抛头露面，以免惹得不必要的麻烦。然而这两位大爷可没有周恩来的政治敏感性，以为政策执行了，一切就完事了。

两人闲着无聊到街上去看大字报。结果被认出了。那个年代，政治氛围比较狂热，中央的人到地方上通常会享有两种待遇：要么被骂挨批，如同过街老鼠；要么人人追捧，如同超级明星。当时谢富治是公安部长，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里的首长，都是继红一时的人物，自然受到热捧。

一种罕见的局面出现了：严重对立的两派共同拉着条幅，欢迎中央的人到来，欢迎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使者。那场景简直要把王力和谢富治当成钦差大人。王力也有了钦差的感觉，忘记危急关头保存自身的必杀技：和稀泥才是王道。

于是王力和谢富治去了一个造反派的据点，水运学院，发表了一通把他自己推向茅坑的谈话。在介绍王力的谈话之前，先看看王力是个怎么样的人。

王力，一九二一年生于江苏淮安。早早入党，早早干革命。别人干革命扛枪，王力是笔杆子战线的。战争年代还有时间写小说，据说还不错，现在估计是卖不出去了。于是后来江湖人称大笔杆子。在中苏论战那一会，王大笔杆子是出了不少力的，当夸奖。

在中央文革内部，王力出门号称首长，实际角色还是书生、笔杆子、理论家。他熟悉的世界就是以毛泽东或江青的意图写文章，然后给大家讨论，然后以中央的名义下发，然后大家学习，享受那种幕后参与的快感。至于决策，或者台前执行，从来就不是他的强项。他以为顶着中央的名头在下面就可以大杀四方。所谓书生误事，就这意思。

王力以钦差大臣的派头对造反派代表表态：“钢工总的案是要翻的，这是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意见，也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点过头的。”在王力看来，自己不过是把中央决策给说出来，没啥大不了的。按照之前的经验，只要是中央决策，大家只有接受。在王力的意识中，连元帅们都不敢对中央决策对着干，下面这群丘八又能如何。他不明白：政策是死的但人是活的，政策可以有很多种解读方式；他虽然传达中央决策但不是中央决策者，一言九鼎还轮不到他王力；中央决策是要传达但传达方式有很多种，有的方式可以成事，有的方式只能坏事，遗憾的是哪种能成事哪种会坏事他王力是没有概念的。

此时此刻的王钦差已经忘记了周恩来的交代。在他看来，他的表态没有超过中央决策范畴，说出来也无妨。但是作为理论家、书生、兼笔杆子的王力同志不明白，政治本身没啥秘密，关键在于是一种谋略运作。同一个决策，让军方领导，层层下达，慢慢消化，就能执行。在军区还没有下达命令之前，作为中央大员直接支持一派贬低一派，后果很严重的。

后果是啥呢，后果就是：造反派欣喜若狂，当天即用仅剩下的七八个广播台同时向武汉三镇广播：“中央文革坚决支持我们，‘百万雄师’的末日就要到了！”

这下彻底惹恼了百万雄师：好哇你这个王大胖子，不是打我们的脸么？你也掂量掂量自己。要是毛主席或林副主席如此说也就罢了，你王力哪根葱？打过仗吗？被批斗过吗？知道我们实际情况么？竟然企图骑在老子脖子上拉屎！在你骑到老子脖子拉屎之前，老子要把你踩在脚下！

百万雄师发力了，他们利用自己控制的大小广播台同时播送战斗进行曲和军乐，喊出“炮打谢富治、打倒王力！”；“王力是反革命的两面派”等口号。右派广播才停下，左派广播台又高呼：“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你来我往，节奏比好莱坞大片还紧凑，好不热闹。

晚上王力和谢富治乘车进入军区司大院。全副武装的警卫营战士持枪肃立，枪刺寒光闪闪。团级以上军官都到了，大家要开会。搞笑的是，直到此时王力还以为这些人都是来听自己教诲的，带来大家读毛主席语录之后，重提给左派翻案，还说军队这个不好那个不对，全然不知道已经置身狼穴。

司令陈再道咬牙低声对身边的钟汉华政委道：“好一个混蛋，要是在战争年代，老子非宰了你不可。你王力算什么东西，也配到我们军区指手画脚，乱放臭屁。”钟汉华小声回应：“这小子太不知好歹，来武汉不先找军区党委开会商量，反先去找什么造反派，心目中哪有解放军！得给这黑秀才一点厉害尝尝！”

有位牛师长高举起手要求发言。王钦差傲然地挥挥手：“我是在代表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作指示，不准别人打岔，更不准你们讨价还价。”然后再次强调道歉之类的玩意，就像中学生打架一样，一点不懂得变通。当然王钦差如此强悍，不是因为他本人强悍，而是他代表强悍的毛主席、林副主席。

牛师长也是有备而来，一抬手掀翻桌椅，带头退出会场，副师长、政委等人也愤愤离席。可以想象，王钦差很生气，但后果一点都不严重。因为他能做的只是大喝一声：“站住，给我把名字留下来！”

同为将军出身的谢富治理解军人，上前和稀泥。人家根本就不领情，还大叫：“老子就是不服气！告诉你们，这样闹下去，你们一个也逃不出武汉，老子也只有一条命！”一般情况下，地方军官敢在中央大员面前如此叫嚣，就表示要豁出去了。谢富治已经感觉到危险的来临，脸色变了。王力仍然浑然不觉。

等到王力气派十足地回到招待所，发现住所已经被层层封锁，到处站着端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的陆军士兵。他们都是“百万雄师”的人！

直到此时王钦差才明白咋回事。此时钦差大人才显露并不强悍的本质。气派没有了，活脱脱换了个人，哭丧着脸说：“怎么办？这是反革命行动，我们跑吧，总不能让这伙暴徒捉住吧。”想跑，已经太晚了。

谢富治还想和稀泥（硬顶只能送命）。军人们和造反派冲进会客室，逼他们走出去，谢富治手握小红宝书，笑眯眯说：“你们都知道我是谢富治，我是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委派来武汉协助王力同志工作的，希望你们头脑冷静，不要发生误会。我们都是湖北老乡么，我也是解放军军人嘛！”

谢富治军衔是上将，和陈再道一个级别；同时还是公安部长，国家大员，江青都得给三分面子。没想到人家根本就不买账。“你他娘的是解放军中的败类！”一名军人冲上前推他一下，差点把他推倒。身为狼狈。

下级军官敢如此对他，表示已经豁出去了。

众人愤怒地高呼口号，声震楼宇，楼下军人、“百万雄师”群众也跟着呼应。

王钦差瘫坐于椅上！他的警卫拔出手枪警告：“不准胡来，再动一动，我们立即开火！”

一名团级军官大步向前：“你们几个人敢开枪，我们就叫你们粉身碎骨，扔进大江喂鱼虾！”又对钦差大人说：“快走，识相点，跟我们上军区礼堂辩论！”

面对众人的怒吼，王力胆战心惊，赶紧抓住救命稻草——红色的毛泽东语录，慌忙间又不知读哪一条语录最合适、最具威慑性。

陈再道司令员和钟汉华政委进入会客室，大家都静下来。陈再道两眼通红，满面怒容，挥挥手：“大家有意见可以向中央首长提，他们走不了的，谁也不准动武，谁违抗我的命令，我就干掉他！”又威严的指指警卫：“你们还不放下枪？嗯！”

陈再道许下安全保证之后。在牛师长示意下，军人一拥而上把王力架出门，拖上小汽车。

第二天，军区大院临时召开对钦差大人的辩论大会。这场辩论大会很有趣。王钦差被七手八脚架上二楼一个阳台。台下黑压压站着几百名军人，一名青年军官冲上前，一把抓住王力的衣襟，扯下他军帽上的五角星：“你这臭秀才也配当军人？你算什么玩意儿呀，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坏蛋，挑动群众反对解放军，挑动造反派之间打血战，你亮亮相吧！”

台下一片鼓掌喝彩叫骂声：“打倒王力，王力不能代表党中央！”

钦差大人当然没有啥好说的。他虽然搞理论有一手，代表中央时也是滔滔不绝，似乎能言善辩。但是他面对的是军人，才终于晓得老祖宗留下那句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接下来的辩论就很俗套了，就像中央文革手段一样，王力同志享受了一番在北京多次强加于别人的待遇。一群“造反派”上阳台，给钦差大人一顿强劲的拳脚；阳台下的人群则在一旁愤怒的配音：“绞死王力，油炸王大胖子！”等等。

王钦差鼻子流血了，眼睛青肿了，头发被揪掉了；他能做的也就是杀猪般叫：“哎呀，不能打我呀，要文斗，不要搞武斗，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

王力同志，此刻你感受到那些曾经被你批判的人的痛苦了吗？如果把中央文革那帮人都这么批斗几场，或许可以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自己的行为。

这些人干得很解气，却害苦了陈再道。作为一个军区司令，中央大员在他的地盘被批斗、被暴打，与暴乱何异？在留守北京那些人眼中，这就是兵变。当然王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在武汉。一旦真的兵变，那将是西安事变重演。演员由蒋介石和张学良，换成毛泽东和陈再道。

一九三六年，张学良在西汉扣押蒋介石。南京乱作一团。一九六七年，事件爆发时，毛泽东深陷武汉，局势不明，北京同样乱作一团。

中南海紫光阁。

风云人物们正在紧急开会，连向来怕见光、见风、怕声音的林彪都参加了。

会上，那位眼高于顶的江女士放下了一贯的骄傲，眼含泪花，说：“这可怎么是好？陈大麻子当真翻脸搞反革命政变了，向我们反扑了！他扣押住富治、王力事小，倘若他煽动军队扣住主席不放，那可不得了。”怎么办？江女士当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她知道怎么办，就不会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落到自杀的结局。就像所有妇人一样，失去主心骨（毛泽东）时扮演一个手足无措的女人。从这点上看，她还不如宋美龄。西安事变期间，宋美龄好歹懂得坚持和谈，好歹敢于去西安犯险。

江青手忙脚乱，那么她的助手呢？陈伯达手摇折扇，摇头叹息道：“是呀，我早就预感到七月的中国处于反革命全面复辟的前夜，非常非常非常之危险！我早就向主席说过。我在前几天还接见蒯大富、王大宾、牛辉林、韩爱晶等小将，向他们指出：由于带枪的刘邓路线分子已公开行动，中国已处于大决战的历史关口，弄得不好，文化大革命有失败危险。青海出了个赵永夫，内蒙古出了个王良太，如今武汉又冒出个陈再道。”啰啰嗦嗦讲半天，就是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案。难怪林彪说，陈伯达是一书生。何止陈伯达是书生，那帮人都是书生，事到临头除了啰嗦还是啰嗦。

至于天才的林副主席，反应一点都不天才，提出“立即派陆海空三军包围武汉三镇，做好镇压准备，同时对武汉军区发动政治攻势，争取广大指战员反戈一击、幡然悔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个提议比何应钦当年提出处理西安事的方案高明一点点。当年何应钦是决定蛮干，直接轰炸西安。现在林彪的方案里是武力压迫，政治攻心。但中央文革小组多数成员表示支持，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只是担心如出兵镇压，特别是出动空军镇反，会危及伟大领袖的人身安全。

最后还是没有失去主心骨的叶群建议：请周总理去武汉给主席解围，而后再采取一切能采取的行动平定“武汉地区反革命暴乱”，众人均表同意。当然咯，如果发生意外，最好连周恩来一起陷进去，那样大局就在林副主席控制下了。

叶群这一招，牛！

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再次到武汉，先见毛泽东，两人作了长谈。周恩来亲自安排车辆，护送毛泽东一行乘车去武汉空军二号机场，一路上车帘封严，遇陆军士兵和“百万雄师”人员盘问，都是周恩来亲自露面调节，一路通行无阻。陈再道、钟汉华闻知周恩来随一车队去了二号机场，并不知他是护送毛泽东安全离开，忙轻车简从赶到机场，欲向总理申诉，却受到担任机场警卫任务的空军部队官兵们的阻挡。周恩来目送那架军用专机在八架歼击机护航下消失在天边，终于长出一口气。

只从一九五八年之后，毛泽东就不再坐飞机了，这一次破例，可见形势之紧迫。

毛泽东离开武汉之后，周恩来着手处理七·二零事件。经过一系列谈判、分析、忽悠、利益转化之后，陈再道同志效法当年的张学良将军，和周恩来一起回到北京，享受一系列批评教育，直到林彪事件之后再次上岗，九三年离世。

陈再道将军虽然没有行张学良之实，还不如张学良。张学良被软禁，好歹有吃有喝有女人陪着。在中央文革的宣传中，陈再道同志从来都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调戏良家妇女无数……总之是打着灯笼找不到亮点。因为这些特点，陈再道同志得以享受和彭德怀在一起接受批斗的高等待遇！

当然，这事中最搞笑的就是王力了。深陷粗暴大兵蹂躏之中的王秀才体验一番中下层军民文革斗争滋味，原本心灰意冷，回到北京之后再次热起来，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另一个场景——一个盛大的欢迎大会。在机场，王力同志见到了革命战友兼靠山江青女士。她穿着军服，一手握住小红书，一手搀扶王力的手臂，热泪盈眶，泣不成声：“同志们，战友们，你们终于回来啦，这归功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呀。王力同志，我得知你们被杀人成性的大刽子手陈再道关押后，急得两天不能吃东西，夜夜失眠。”此刻的江青是一个很好的演员，演她自己，演得不错，只是离一流政治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武汉是王钦差，京城当王英雄。王力同志抚摸自己青肿的脸，发现挨了那些拳脚还是值得的，毕竟自己成了“大英雄”！一时之间人气指数直线上升啊。得意之下，不停挥动小红书给江青同志壮势。当然他有得意的理由——人生高潮嘛！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新华社电讯：“中央派往武汉处理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谢富治、王力同志光荣回到北京”！文章还配有王力光荣受伤的大幅照片。两天之后，天安门广场人头攒动，红旗招展，口号震天。京城百万群众隆重集会，欢迎王力、谢富治“胜利归来”。在京城主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了，甚至连怕光、怕水、怕声音的林副主席也冒着酷暑，亲自出席这场声势浩大的欢迎大会。

王大英雄拖着伤腿上了天安门城楼，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凭栏雄视万众欢腾的场面，这是故意安排，和武汉军区大院那个小阳台形成鲜明对照。真是受宠若惊啊！这一刻，王秀才打到了人生光辉顶点。天安门的欢呼让王秀才忘了武汉阳台下战士的咆哮。

古人云，水满则溢，月圆则亏。人生也是一样，定点之后就是下坡。四个月之前，赵永夫在青海屠杀了两百人之后，跑到北京去当了三天英雄。三天之后沦为阶下囚。王力比赵永夫走运一点，多当了几天的英雄。

英雄如同一杯兴奋剂，喝下之后增加当英雄的冲动。赵永夫如是，王力亦如是。

成为英雄的王力，只能在英雄的道路上开足马力往前行，直到撞到南墙。

秀才遇到兵当然是有理说不清，但是秀才成了英雄，那就更无厘头了。王力同志成了英雄之后，脑袋逐渐发烫，烫到整个世界都是红色的。国内已经容纳不了他了，要折腾到国际去——要去管外交。外交是周恩来的地盘，把外交拿下来，就可以送周恩来和陈毅喝西北风了。在中央文革集体智慧指挥下，王力趁自己人气正高，充分利用自己的煽动能力，鼓动红卫兵去外交部夺权。外交部经常被冲击。外交部长陈毅已经摇摇欲坠了。再加把劲，踹一脚或许就倒了。所以造反派很高兴，后果很严重：火烧了英国代办处，造成重大外交事件。

所谓文化大革命，说到底还是内政，跟外人没有关系。

给英国办事处来把火，相当于外事，外事无小事。

王力长期在中央高层工作，不会连这点常识都没有。他为啥要这么干？或者说，王力鼓动红卫兵冲击外交部，也绝不会鼓动大家去英国办事处放火。火是意外么？可以理解为意外。因为造反派搞起来，啥意外都可能出现。如果不是意外会怎么样呢？两种可能，一种有人故意搞破坏；另一种还是有人故意搞破坏。搞破坏的人要趁乱搞点事，那是易如反掌。他们是谁呢，可以理解为敌对势力，比方说敌国特工。如果不是敌对势力，那就是自己人搞的。那么谁会搞这么大的事，动机何在呢？回答这问题需要一点波折。

**第二十章 冬天里的一把火**

**谈谈起火动机**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陷入狂欢之中。在江青、张春桥等人眼中看到的全部是胜利。特别是江青同志，她认为自己的演出很成功，成绩很大。因为她看到的，是上海夺权成功，是全国夺权成功，是成功取代中央政治局。高层所有的反对力量，要么已经被打倒，如刘、邓、陶；要么正在被打倒，如徐向前、叶剑英、陈毅。至于地方上的反对力量，赵永夫和陈再道已经在北京开喷气式飞机了，不是么。所以形势一片大好，非常好。当然还没有达到最好。

最好的结果是啥呢，那就是反对者最好全部趴下。虽然很多人都倒了，还有一个人挺立着。只要哪个人还挺立着，就谈不上最后的胜利。那人就是周恩来。

从表面上看，周恩来对中央文革好像没有威胁，他全心全意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对中央文革的行动相当配合，从不和江青甚至中央文革的人争风头。在中央文革的人到处煽风点火，去抓革命，周恩来只是默默的在搞生产，不动声色。尽管他小心翼翼，周旋于“抓革命”和“促生产”之间，在那个狭小的政治舞台上，他依然是个庞然大物。

站在政治舞台之外看周恩来也就是一个干活的，每天加班加点地干，没有加班工资。辛辛苦苦不算，还要对各路人马笑脸相迎。中央文革那帮人呢，到处煽风点火，咋咋呼呼，吸引眼球，聚敛人气。实际情况确是另外一个情况。所谓政治舞台，所谓各种表演，说到底都是在推动国家机器运转。国家机器运转的基础，归根结底也就两个字，干活。

假如身在社会底层，可能白费力气，累死累活，功劳都是别人的。然而在政治舞台最中央，干活多，意味着权力大。周恩来恰好就在政治舞台正中央。各级政府，各个部委，所有关于生产运作的事，都由周恩来说了算，也就意味着整个国家机器的基础都在他手里。

中央文革那帮人到处煽风点火闹夺权闹革命，说到底也就是想上位。他们煽动红卫兵去打去闹去夺去抢，以革命的名义夺权。打倒各个组织的人，从各个地方夺权。

然而夺到权力之后发现一个巨大的悖论：夺权之后，如果稳定下来搞生产建设，那么权力将汇入国家机器，从各级政府开始，一步步向上，最后又汇入周恩来手中。如果继续折腾，那么相当于自己折腾自己，啥时候是个头？看不到尽头。不论怎么搞革命，终究有个尽头。如果革命尽头之后，权力还在周恩来手中，那么相当于为他人作嫁衣裳，白干了。

如果不想自己辛勤劳动成果（夺权）被人摘，只有一个办法，除去周恩来。

要想除去周恩来很难。因为周恩来角色是合作者。和刘少奇邓小平要修正毛泽东路线不同，周恩来从来不会违背毛泽东的意图，对中央文革的人也是笑脸相迎。中央文革四处煽动造反派冲击政府部门，基本上把国务院管辖下的各个部委，上上下下都冲击的七零八落。换成一般人当总理，早就干不下去了。想一下嘛，今天外交部长跑来找你诉苦，明天煤炭部长过来找你理论，后天农业部长说我没法干了，如果你是总理能架得住么？把那个位置上换上江青，估计每天要哭好几遍（详情参照被陶铸说几句就大哭大闹）。

中央文革曾经以为这样就能把周恩来整垮。可是他们太低谷周恩来了，王明时代周恩来就在中央干活了。那时候江青还叫李云鹤，那时候张春桥还希望国民党带来光明，那时候中央文革的其他人还穿开裆裤。周恩来历经党内所有领导人更换，历尽所有艰难残酷的日子，走的路都比中央文革那帮人过的桥多，韬略和涵养远非那群理论家能比拟的。在中央文革看起来搞不定的事，周恩来轻而易举的化解掉。中央文革不是要冲击各级政府部门么，让你去冲击。周恩来还配合中央文革，去搞游说工作，让大家跟着毛主席走，听党组织的话等等。如此一番之后，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那些被冲击的人，倒了，就躲在周恩来周围，周恩来尽量去保护；没倒的，依然在周恩来周围，因为周恩来在抓生产，搞建设啊。

就是这样，任凭中央文革风吹浪打，周恩来在风浪上闲庭信步，左推右挡，前摇后晃，就是不倒。后人因此说周恩来是政坛不倒翁，说他精明滑头，就说好了。说这些话之前要想一想这些话的前提：周恩来参与过各个时代的中央，党内各个时期的人才基本上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第一代将帅中，所有人都跟周恩来关系都不赖；各级政府之中的官吏，被打倒的只有周恩来能提供保护伞，想干活的，只有周恩来能提供干活机会；另外，周恩来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容易吗？敢问如此不倒翁，有几个人能胜任？不信可以试一试，有几个人能让十大元帅中的任何一个改变主意？

但是对中央文革的人而言，无论如何都要把周恩来给推倒。周恩来不倒，实权就落不到他们手中。他们干革命就是为了夺权。没有权力相当于白干。为了不白干，就要去推周恩来。如何去推周恩来呢，党内干革命、冲击政府的办法是行不通了。要不制造点外交事件试试？你周恩来能摆平党内所有人，不见得能搞定全世界吧，看你如何向英国人解释！

一九六七年八月份，江青和康生找到红得发紫的王大英雄，让他出面搞一搞外交部。他们认为，周恩来直接领导、陈毅任部长的外交部是“老保”。在中央文革策划下，组织上千人的“揪陈大军”，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要揪斗陈毅。八月七号，王力会见造反派代表们，发表了一通鼓动演说。

王力说：“外交部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部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

王力说：“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

王力说：“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威风。”

王力这些话是对外交部内部的造反派说的。这些人平时在外交部底层，负责端茶倒水拍马屁等工作。趁文革东风，决定夺权翻身当老大，享受别人端茶来，享受别人来拍马屁。现在王力告诉他们，你们的理想是远大的，前途是光明的，手段是合理的，干吧。

对本来信心不是很足的造反派而言，王力同志本身就是榜样。革命时期没有战功，凭借文革青云直上，成为中央首长。到武汉捅出一个大篓子，回到北京却成了英雄，人气指数还在直线上升中，还有啥好犹豫呢，干吧。

一直闹腾到八月二十二号，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的一些红卫兵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引起了英国的抗议，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

中央文革的目的到达了。在他们看来，冲击外交部，事情闹大之后，至少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给周恩来出难题；二，冲垮摇摇欲坠，正在家里写检讨的陈毅。陈毅周恩来的屏障，就好像彭真是刘少奇的屏障。彭真垮掉之后，就可以利用彭真的事直接冲击刘少奇。陈毅垮掉之后，可以利用陈毅的事冲击周恩来。第二点比第一点更为重要。

中央文革的人知道，陈毅历史上反对过毛泽东。文革开始之后，陈毅就受到冲击。是周恩来和陈毅机智，利用毛泽东说的话——陈毅是个好同志——给挡了。二月份，陈毅那番高谈论阔彻底激怒了毛泽东。陈毅被迫检讨。中央文革决定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机会选择的是不错，结果闹大了。

所以说应该办事处失火案，如果不是意外，如果不是敌人搞破坏的话，一定是中央文革中的某个人的下的手。放火不见得是王力交代的，但王力鼓励造反派其冲击外交部是事实。如果闹出严重后果，一定得有人负责。王力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中央文革给周恩来出了难题。但是他们忘了，这样的难题是难不倒周恩来的。因为敏感时期，重要问题上，周恩来向来是听从毛泽东的指示，而非自己拿主意。周恩来对眼前的局势，中央文革的良苦用心渴望一清二楚。换成一般人估计要去领导毛泽东那里反应，中央文革的人处处跟我作对，这活没法干了云云。周恩来反击非常艺术：找到杨成武将军，让他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汇报材料两条：王力的讲话，和冲击外交部的事实，以及当时因为陈再道再次引发的批斗“军队一小撮”；二，周恩来的个人观点：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八月二十五号，杨成武去了上海，把材料交给毛泽东。

**另一条线**

看看周恩来的两个观点，好像是老生常谈，实则不然。

一个中央的领导不动摇，就没人能代替他的位置。中央文革也就折腾不出来啥花样。唯一能让一个中央动摇的前提就是军队动摇。只有军队动摇，政府才会动摇。所以才重复说军队威望不能动摇。谁都知道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但当时的情况是，解放军威信有动摇的危险，甚至可以说正在动摇。

文革开始，军方受到冲击，批判军内一小撮，和地方上没有两样，很多中高层军官叫苦连天，连毛泽东最铁的铁杆许世友都被冲进大别山了。后来为了稳住军队，搞出《军委八条》，算是在军区大院前面竖一堵墙。接下来有搞军队支左。支左在青海除了乱子，又出台《军委十条》，把军区大院门前的那堵墙打一个窟窿。结果惹出武汉的事。

陈再道到北京之后，毫无悬念的享受到批判。林彪发话，全国大军区就北京军区、武汉军区、成都军区不听话。然后掀起一阵批判热潮，名曰，批判带刀的刘邓路线。周恩来是想把情况稳定下来，然而搞笑的是，批判陈再道的理由是“顶撞总理”。没办法，兵变材料没有找到，只找到陈再道在武汉顶撞周恩来的证据。

文革初期的大批判中，受益者有两帮。一帮是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他们从没有公务员编制的几个人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另一帮以林彪为首。林彪本人就不说了，已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四大金刚军衔都不高，竟然都在短时间内成了三军大红人。吴法宪成了空军总司令。黄永胜当了总参谋长。这一切都建立在，打倒一堆元帅、大将、上将、中将的基础上的。打倒的那些人多半都是四野之外（比如军委的贺龙元帅，比如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比如地方上的陈再道上将），要么是四野出身却不怎么听话的。打倒这些人的同时，不可避免的要造成军内动乱。

周恩来提出解放军威信不能动，实际上也是要一个政府领导不能动。都是一个意思。两条都是从大局出发。从大局出发，也就意味着给中央文革降火。

这一列过程中，中央文革的关锋比较活跃。

关锋，山东人，生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三三年，十四岁的关锋成为党员，可以算天生的革命者。四年之后，十八岁的关锋成为县委书记。和王力一样，关锋靠笔战斗的，属于革命书生、笔杆子、理论家。如果说他有啥不同，那就是和老乡康生认识比较早，并且得康生赏识。那个时代，关锋那种人最好的位置是中央研究室。

中央研究室是中共中央下面的智囊机构，和大人物们关系亲密，是笔杆子们镀金的好地方。毛泽东的几个有名的秘书均在那里干过。大名鼎鼎的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等人都曾在那里工作过，并由此走向人生的巅峰或低谷。在康生推荐下，关锋也进入那么一个前途光明、暗礁密布、随时可能升入天堂或跌入地狱的机构里。当年反右派时代，作为红色笔杆子，关锋就非常活跃，逐渐进入毛泽东的视野。他的大作一次又一次得到毛泽东的赏识。比方说文革宣言《五·一六通知》，关锋就是起草人之一。

正因如此，关锋才有机会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

在关锋的大作中，有一句强有力的战斗口号：揪斗军内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一月份，上海风暴刚刚刮起来，全国范围内都在搞夺权。林彪为了表示紧跟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合作，让关锋在军内喉舌刊物《解放军报》上亮出那个响亮的口号，揪斗军内一小撮。由于那个口号过于响亮，关锋作为发明者，也将永载史册。

那个口号杀伤力极大，把光荣的军队搞得鸡飞狗跳，办到了蒋介石和美国大兵没能完成的任务。关锋不仅仅发明了那个口号，还将其推广。

七·二零事件之后，江青和林彪以为领袖这一次肯定要大发雷霆，加大批判力度了，就以陈再道为突破口，批判带刀枪的刘邓路线。为了配合领袖的行动，红色笔杆子、书生、理论家的关锋自然要有所表示。怎么表示呢，很简单嘛，再写一篇大作，再次吹出——批斗军内一小撮——嘹亮的号角。文章在八月一号发表的，是建军节，离八一南昌起义刚好四十周年。在那样一个中大日子弄出那么一篇东西，结果可想而知。各路造反派人马闻风而动，南下北上，倒处串联，冲击军事机构，抢夺弹药，去揪斗军内一小撮。军区大院再次鸡飞狗跳。比方说南京的许世友，又被赶入大别山了。

然而这一次，江青和林彪都没有弄明白毛泽东的意图。

离开武汉之后的毛泽东直接去了上海，没有回北京。江青和林彪在北京折腾老半天，还没有见过毛泽东人影，更不可能知道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只能凭经验和感觉去臆测毛泽东的意图，结果南辕北辙，弄反了。其实也不能怪江青和林彪，他们在北京城里，对武汉发生的一切不是很清楚。

江青不用说了，让她在旁边也不会明白七·二零事件到底意味着啥。至于林彪，每天只是听半个小时“报告精选”，也不会明白究竟是咋回事。或者说揣着明白装糊涂。

周恩来让杨成武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关锋的新出炉的大作也带上了。

八月二十五号，杨成武到上海见到毛泽东，干完了自己该干的事。毛泽东对杨成武说：“成武啊，你也累了，休息休息吧，让我好好想想。想好了告诉你。”

**毛泽东再次选择**

七月二十一号，事变开始第二天，周恩来再次到武汉见到毛泽东。二人在谈话期间，基本上各种情况都估计到了。最坏的情况就是兵变。正是考虑到这种可能，毛泽东才速速离开，留下周恩来处理问题。

毛泽东直接从武汉去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有了被愚弄的感觉。如果说真的搞兵变，自己没有理由如此出来啊？陈再道等人实在不行扣押个总理也不错嘛。这种事不但没有发生，陈再道还跟着周恩来一起去了北京，听候中央发落。而在接下来的证据取证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陈再道搞兵变。这样一来就留下一个悬案：为什么会发生那事？

只从延安整风，毛泽东成为共产党核心之后，在任何时候，他的意志都将实现。他要干的事，没有干不成的，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都取得预期的效果。建国之后历次运动，毛泽东想要哪个完蛋哪个就得完蛋。即使文化大革命，老干部反对声一片的情况下，依然展开了。可是这次武汉两帮人闹事，多大事嘛，按惯例一行批示就搞定了，没想到亲自坐镇，加上周恩来布局，弄出来一个震惊中外的事故来。

——这是毛泽东意志第一次遇到真正障碍。第一次没有得到预期效果情况下狼狈而归。之前大跃进也撞得头破血流，但那是败给了自然规律。这次不一样。

要知道毛泽东和周恩来什么人，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从他们联手开始，所有敢于挡路者通通靠边站了。

如果真的是陈再道搞兵变，那倒好事。直接镇压也就完了。一个小小陈再道带着武汉军区能玩出多大花样？让他出不了武汉三镇。也就是说整个事件就是一场群众闹事，明知道王力代表中央的情况下还要抓过去痛殴，如果不是积怨太深，断不至于如此粗暴。

很明显，从西宁到武汉，以及其它地方发生的类似的事都之明一个事实：军队支左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是反作用。故事陷入了极端，放任军队不管，会扑灭文革之火种。对军队管太多，又会造成军队本身的混乱。七·二零事件，就是军队本身出了乱子。

北京的喧嚣没能影响远在上海的毛泽东。他陷入了沉思，思考文化大革命这盘大棋接下来该如何落子。思考有两点核心思想：一，文革要继续；二，军队不能乱。

北京的事，军内再次揪人，外交部夺权，毛泽东都知道了。看见杨成武之后，他还是想了一个晚上。

思考的结果，就是在关锋搞的社论旁边留下醒目的批语曰：“大，大毒草！”

又曰：“还我长城！”

要知道之前吴晗那篇闹得满城风雨的文章也才得到——大毒草——的待遇，还少一个“大”字。至于“还我长城”更为悲壮了，好像之前只有悲愤之下的岳武穆手书过“还我河山”可与之相比。有了这样一个批注，关锋的美好生活是到头了。

八月二十六号，毛泽东派人把杨成武喊过来，对杨成武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杨成武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说完，把杨成武的记录拿过来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

从此号称中央文革“车”“马”“炮”的三大笔杆子、理论家、兼书生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拍拍身上的灰尘，抖擞疲惫的精神，眼泪汪汪的走向监狱大门，直到十几年之后才得以重返自由世界享受普通人生活。

关于中央文革的精神和出牌套路，毛泽东看得很明白。他知道中央文革的人想攻下周恩来。但是他也知道，周恩来不能倒。周恩来到了，就没人干活了。聚集在周恩来周围想干活的老干部，在失去周恩来的安慰之后，必然出乱子。而且军队会继续乱下去。那样的话，文革就将变成彻底的武革。

周恩来火了一把

毛泽东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警告中央文革，安抚一下动乱的军方。中央文革的核心还在，但是手臂断了。陈伯达、康生等人都是老滑头，才不会去冲锋陷阵哩。真正煽风点火的工作，都是王力、关锋、戚本禹在干。江青虽然战斗力十足，但文化水平有限，写文章不是她的强项。张春桥非常有能力又肯干，毕竟精力有限。还剩下一个姚文元，还得兼顾上海那样一个烂摊子，斗呀斗呀都的。这样一来，中央文革的功能保住了，制造纷乱的力量减小了。毛泽东如此选择虽然有无奈成分，也不失为引导文化大革命的一招好棋。

然而任何一个决定都会引起不可预知的结果。

八月二十六号下午，杨成武把毛泽东的意见带回北京。周恩来开始行动了。周恩来办事可不像中央文革那班人，折腾半天也没有所以然。周恩来表示立刻喊人开会，召开一个小型中央碰头会。开会的目的就是解决王力和关锋。

为了达到目的，周恩来做了如下部署：

第一步，开会之前，先跟陈伯达打招呼，放点风。因为陈伯达虽然名义上是中央文革小组长，生了一场病治好，大权却落到江青手中。陈伯达受不了江青，就倒向了林彪。周恩来选择和陈伯达通气，是免得闹起来形成一个人面对整个中央文革喷口水的局面。虽然中央文革的那帮口水天王不太敢怀疑毛泽东的指示，万事还是有个准备好。削弱中央文革，对林彪那帮人也有好处，加上此次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形式，争取陈伯达并不难。

第二步，安排警卫守在会场门口，一声令下进去抓人就是了。

中央文革的人一听要开会，纷纷把口水制成弹药，准备在会议上继续给周恩来出难题，比方说陈毅的问题怎么处理啊，比方说徐向前是不是七·二零事件的黑后台啊，比方说那个外交事件究竟是咋回事啊、伤害了外国友人的感情怎么办啊等等。他们似乎看到了周恩来难以收场的样子，心里正在暗爽。

然而向来隐忍不发的周恩来这次没有给他们机会。会议开始，周恩来就说，今天要宣布一个最高指示，依然是他那不紧不慢的绍兴腔调把杨成武的记录读一遍，做出结论：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

其实就是隔离审查，怎么变成请假检讨了呢。只因为周恩来善于人际关系，说法委婉一点而已。效果都是一样的，就是把两位大神踢出舞台。

当然王力、关锋心情立刻从夏日青葱的呼伦贝尔草原急转到秋天的沙哈拉大沙漠，被卫兵带走之后还没反应过来。江青和康生的脸色也从盛夏进入寒冬，心里盘算的是如何推卸责任，和那几位仁兄划清界限。陈伯达也是脊背上冷飕飕的，庆幸被带走的不是自己。他们看着眼前的周恩来，顿觉世界不同了。

周恩来还是那个周恩来，还是那么一团和气，还是那么讲究分寸，还是那么给朋友和对手留足面子。然而这样一个周恩来，之前在中央文革的口水战大师眼中，是那样软弱善良，如同羔羊一般。此刻口水战大师们深刻感觉到，那善良的羊皮之下比狮子还要勇猛。

这是周恩来的高光时刻，在整个文革中间，这样的时刻非常之少，但总算有过。尽管有过这样的高光，周恩来的日子并不好过。还有很多烂摊子等着他。当然，王力和关锋被带走之后，这个世界清静了许多。当二人再次自由的享受到风吹日晒，那是很多年之后的事了。那时候国人已经慢慢从政治狂热中解脱出来，想办法发财了。

**从戚大帅的行为看文革**

中央文革的车、马、炮同时失去，损失不小。号称大笔杆子的王力是车，革命急先锋关锋是马，戚本禹就是炮。炮，威力大，火药味浓。戚本禹，脾气大。

戚本禹，一九三一年生在山东，在上海长大，积极分子。十八年之后解放军进入上海，积极的戚本禹加入中国共产党。

性格：耿直。

特点：脾气大。

绰号：戚大帅。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戚本禹的人生应该是最为顺利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均有过饿肚子的经历。江青也经历过上海的是是非非，甚至被捕过。低一级的王力也经历过战场考验。关锋虽然比戚本禹还年轻两岁，人家入党时，战争还在继续。唯有戚本禹，入党时全国正好解放。而别人打仗时，戚本禹学文化。十八岁那年已经有了高中文化水平。当然十八岁高中文化水平放现在不算啥，当时非常稀有，直接去了中南海搞机要工作。这样的就业机会，简直和天山掉下馅饼差不多，而且是很多年才会掉下一个的那种。

中央机要处的戚本禹具备一系列优点：学习刻苦，工作认真，常常受到领导表扬。而戚本禹本人也是个人才，写字模仿毛泽东，写文章模仿鲁迅，均小有成就。

毛泽东和鲁迅，是哪个年代最有力的两个符号了。如果一个人能用类似毛泽东的字体写出类似鲁迅的文章，即使山寨版也罢，想不走红都困难。所以戚本禹走红了。

吴晗的《海瑞罢官》引起一连串风波之后，戚本禹也写了一篇文章，写李秀成的。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支柱，力战之后，兵败被俘，写下自供状依然被杀。当时大家对李秀成的行为褒贬不一，褒的一方认为，李秀成已经为革命尽力了；贬的一方则曰，叛徒，不解释。戚本禹写文章曰，李秀成是叛徒，并且在大作中证明了一番。这事也没啥大不了，言论自由嘛，然而在那个文艺界即将整风的年代，就特别耀眼了。当然和所有时代一样，一篇有影响的文章会引来一大串板砖和口水。戚本禹面对四面而来的板砖毫无惧色，卷起袖子力战群雄，直到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战斗力之强悍，连号称大理论家的陈伯达也要让其三分，连康生也对其另眼相看，风头丝毫不让姚文元同志。

正因如此，在中央文革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是，戚本禹却是相当活跃。田家英自杀之后，戚本禹迅速填补空白，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重要权力。与此同时，戚本禹还是江青的秘书。在那个年头，身兼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的秘书意味着什么？大家（各地党政干部）都明白，所以大家闲着没事都主动和戚本禹同志沟通。

戚本禹同志没有经过真正的革命考验，十八岁便跻身中南海，然后是名扬天下，受到领袖及其粉丝们的夸奖，根本不知道含蓄谦让为何物。所以看起来派头很足、脾气很大。

由于派头大，脾气足，江湖人称，戚大帅。

戚大帅开会时昂首阔步，气宇轩昂。对那些地方大员，也是趾高气扬。连江青都说：“戚本禹眼睛长在额头上，朝上看。”

戚大帅当然会充分发扬自身战斗力，干好写文章、扣帽子、喷口水这些基本工作之外，还干了两件附加工作：煽动红卫兵造反和保护文物。从理论上讲，这两件事不冲突，然而那年代，这是两项完全矛盾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一月份，是全国大夺权的开始，也是运动的最高潮阶段，此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本应非常忙碌。然而他在百忙之中干了一件很多人看不懂却应该鼓掌欢迎之事。一月二十七号下午，戚本禹在政协礼堂召集北京文博界和造纸厂等十二个单位造反派代表开座谈会，谈论红卫兵抄家抄出的古旧书处理问题。

当时情况是，许多红卫兵抄家之后就把人家资料文献啥的放把火。许多书籍非常珍贵，然后就飞灰湮灭了。戚本禹决定改变这个那样的情况。

中国书店代表反映：“有些学校认为古旧书没有用了。建筑科学院的满楼都是书，我们拉回了几车。住户有烧字画的。”

新华书店代表说：“旧书现在停售了，内部同志也有这个意见。地方上反映，县里烧书较多，八月份破四旧时烧了不少。”

北京造纸总厂代表说：“古旧书现在收了一部分，有些已经造了纸。大部分还没造纸。但这些古旧书都当成原料了。”

戚本禹问：“为什么？”答曰：“怕。”

——好一个“怕”字啊！怕啥呢？怕自己和那些玩意沾上关系？

戚本禹说：“秦始皇焚书是有道理的，商鞅也焚过书，他代表新生产力么！他是为了统一思想。他们当时不懂得批判。我们无产阶级不能这么办。要批判才能解决问题。”

戚本禹说：“一个青年读这些古书干什么？广大群众不看那些古东西是个大解放。但少部分人要看这些东西。研究历史可以看。这是为了批判，为了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科学，不是为了吹捧这些东西。过去经史子集是每个知识分子都读，这是套在我们头上的枷锁。现在不读这些东西是大解放。搞理工的读它干什么。”

戚本禹说：“线装书不要烧，你们看怎么办？有的书可以低价收购，低价售出。搞文科的要看这些书。将来可以内部发行。少数人要搞这些东西。不论哪个阶级起来造反，都要拿这些东西在制造舆论。”

这些理由听起来极为不舒服。但在当时，在中央文革中，已经是非常理性的声音了。最重要的是结果。戚本禹给中国书店的指示是：“有些古书一部几百册，今后大批印不可能，还是要收下来。收书没有地方放，我给解决。图书馆送给你你就要。”给北京图书馆的指示是：“北京图书馆的书是国家财产，任何人不许动，这是群众的财产嘛！”给北京造纸总厂等单位的指示是：“你们造纸单位可联合开个会，历史研究所、文物局、北京图书馆、中国书店、科学院图书馆出人帮助搞。”如此等等。

最后来一个总指示：“古物、古书画有的集中起来。我是不赞成烧的，真的烧了就烧了，没什么了不起，要想开一点，以后要保护。红卫兵抄了多少，放在哪里调查一下，写个报告。古书画、古物先集中保管起来，这是全国性的。这些东西将来归故宫，归历史博物馆保管。地方上的东西不少，要送文物局选，抄家的文物要管起来。有的可交文物商店。东西不要落入个人手中。一切交回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共同搞。这些事明天就组织搞。不管是哪一派都要管。第一、图书鉴别；第二、文物保管；第三、不要烧。”

根据戚本禹的指示，十九天后，这些单位的造反派联合向全国红卫兵和造反派发出《关于保护古旧书刊、字画的倡议书》。弄出了几条紧急倡议：第一、全国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彻底批判古旧书刊、字画所传播的流毒；第二、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加强对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的保护工作；第三、全国大中城市原古旧书刊的收购部门，应该恢复收购，限制流通；全国各地图书馆、文化馆以及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所存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在未鉴别前，暂行封存，不得随意处理；各造纸厂收到的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要暂行封存，妥善保管，与当地有关部门革命造反派共同鉴别处理；第四、个人所藏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亦不得随意销毁。个人交售、捐献的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各有关部门应该欢迎、收购。

评：那个座谈会才是戚本禹一生的闪光点。

戚本禹虽然保护了一批文物。但他的本质工作还是鼓动红卫兵闹事。

起草《五·一六》通知有他。

鼓动红卫兵围攻中南海有他。

鼓动中南海的造反派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有他。

鼓动造反派冲击朱德住宅有他。

如此等等，那是相当活跃，光辉业绩一串串。不仅纳闷，戚本禹同志，就不能安分一下吗？当然不能。如果能安分，他就不是戚本禹，就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不是毛泽东的秘书，就不是江青的秘书。因为世事均有因果。戚本禹同志能够成为“中央首长”，不安分就是他的因。

一边是保护文物，一边煽动造反派造反，这个完全不符合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印象，至少不符合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印象。用时髦的话讲，这不科学。

那是一个人干的吗？当然是一个人。

首先戚本禹作为一个文化人，尽管文化程度不高，因为地位重要，对文化至少了解不少。知道秦始皇焚书不稀奇，知道商鞅焚书的就稀奇，知道秦始皇和商鞅焚书是缺乏批判精神，已经可以算很有头脑了。

作为一个有头脑的文化人，戚本禹当然知道烧书是不对的，要改变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戚本禹又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年纪轻轻进入中央，接触到的都是革命意识，认识到的全是革命行为。在他们那一代人之中，脑袋里都有这样一个信念：旧文化导致了中国近代落后（基本上是这样），革命带来了国家浴火重生（基本上是这样），所以要继续革命，要扬弃旧文化。当他之处秦始皇和商鞅焚书是缺乏批判精神时，也应该看到，他的首长同志们做得更加过分。

然而把这个理论放入实践中时，造成的结果是那样触目惊心，已经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所以戚本禹的行为才那么怪异。评价戚本禹这个人，可以称之为有文化的革命者。

一个有文化的革命者行为看起来如此奇怪，就表示文化大革命本身出了问题。

正因如此，毛泽东对待戚本禹的问题上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写下“大毒草”几个字。

**从车、马、炮的结局看文革**

最高指示下达之后，王力和关锋的世界当时就步入了黑夜。一开始二人只是被软禁在钓鱼台二号楼，还是在中南海内部。吃好、喝好、睡好，生活待遇啥的，还是和先前一样。只是不能随便出去带领大家汉口号，不能煽动人家去造反，不能买帽子了。

每天都有专人给他们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给他们检查身体。他们不需要劳动，只有一项任务，写检讨。日子清闲得让人发狂，但比起街头武斗的广大炮灰要好多了。有一天，他们等来了领导陈伯达和张春桥。领导人当然还是那样春风得意，还是那样的笑容可掬，只是不再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了。陈伯达和张春桥告诉昔日部下曰，要好好地写检讨，深刻的写检讨，从骨头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希望改过自新重新做人。那天是十月十六号。

十六号之后，专人打扫卫生的生活没有了，定期检查身体的医生没有了，因为二人离开了中南海钓鱼台，被关押到北京西山，每人一栋别墅。在那里，日子更无聊了，待遇也不一样了。然而比起那些被他们煽动起来红卫兵残酷斗争的老革命，他们还是天堂一样的舒服。他们是任务还是老一套，写检讨，加深检讨。

检讨啥呢？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但是必须得写。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写得好的话就可以继续出去吃香喝辣，继续当中央首长，继续煽动红卫兵去批斗人家。写得不好，就要完蛋，还可能成为狂热的红卫兵批判对象，要开喷气式，要戴铁帽子（如张霖之），那是生不如死啊。所以要好好写，可是又写不好，那个惆怅啊，那个郁闷啊，那个心有不甘啊，那个无可奈何啊，就不说了。这样写了两个月，终于不用写了，因为他们去了秦城监狱。

此后的十几年，他们住的房间只是两个木凳架上的一块木板，吃得也很差。没有了服务人员百般照顾，他们依然活得好好的，既没有生病死掉，也没有上吊撞墙出意外。大家甚至忘了他们的存在。不管他们曾经多么风光，多么不可一世，在秦城监狱的夹板上，他们和墙缝里的被遗忘的蟑螂没啥区别。尽管如此，这个待遇也比被打断肋骨的彭德怀，比被截取腿的罗瑞卿好多了。

其实王力和关锋被忽悠了，在他们住进秦城监狱之前，他们只是供昔日战友们泼脏水的粪坑而已。所谓写检讨，也就是让自己承认错误，替中央文革背黑锅。当然，他们干得很好，把所有的错误自己扛下了，光荣留给了战友们。

戚本禹是另外一个行情。在王力和关锋倒下时，戚本禹还没彻底倒下。在警卫员把王力和关锋带走时，戚本禹还发言了。当然戚本禹也不想倒下。他也不太相信自己会倒下。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之后，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以为毛泽东过去很赏识他，会对他继续手下留情，放他一马。于是他做了一个错误选择：猛烈批判王力和关锋了。

戚本禹直接写材料揭发王力和关锋，所有脏水往昔日战友身上泼。与此同时，陈伯达、康生、江青也在往王力和关锋身上泼脏水。不同的是，那几位战友兼领导不仅把脏水泼向王力和关锋，同时泼向没有倒下的戚本禹，说戚本禹和王力、关锋是一路货色，坏人披了一张好人皮，挂羊头卖狗肉，扮演好人害好人，欺骗俺们这些无产阶级老实人。

一开始，毛泽东对戚本禹是有感情的，是保的，是欣赏的，所以才让周恩来争取一下戚本禹。然而戚本禹表现太差了，出了问题首先是推卸责任、是向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泼脏水。这种人如何能重用？成大事者，没有不出错的。出了错而不敢承担，还能干啥？如此一个不敢承担之人，保下来何用？看看周恩来，有了错先自己扛下，然后再寻找要因。那才是老一代领导人的处事风格，也是他们干革命成功的原因。

所以戚本禹很简单，即没有中南海钓鱼台过度，也没有北京西郊别墅软禁，直接投入秦城监狱了。他的待遇和曾经的战友王力和关锋一样：住的房间只是两个木凳架上的一块木板，吃得也很差。毛泽东不仅对王力、关锋、戚本禹很失望，同时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也失望，一看就没有一个可以独当一面之人。但是不用他们又能用谁呢？能独当一面的都成了资本主义阵营去了，死的死（如刘少奇、贺龙、陶铸——正在死去），贬的贬（如邓小平、陈云），伤的伤（如彭德怀），残的残（如罗瑞卿）。

然而，尽管王力、关锋、戚本禹几个人在后人看来没少惹事，本质上也就是书生而已，写写文章、煽动一下，不是决策者，也不是执行者。说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起多大作用，那是鬼也不信。但是站在文革立场来看，他们又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他们参与程度远胜过绝大多数人。写文章最起劲，搞煽动冲在前，可以说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理论最为坚决的知识分子。最后的结果竟然是在一九六八年的时候，各自在秦城监狱挣得一个单人房间。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还在高峰。在文化大革命高峰期间，执行文化大革命最为坚定的知识分子却跌入谷底，说明了什么呢？很简单，中央文革名义上为指导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玩不下去了。

促使王力、关锋、戚本禹走向秦城的因素，不仅仅是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的失望，还有另外一件事，即武斗。

**第二十一章 血**

**最后一个选择**

武汉闹事之后，到上海的毛泽东意识到两件事：不能任凭中央文革无限制闹了，要泼点冷水，于是就有了文革干将王力、关锋、戚本禹从中南海辛勤劳动到秦城吃免费皇粮的故事；第二，就是军队支左是个错误。如何错的，参照前文。

在中央文革战斗力下降，军队支左不成功，王、关、戚事件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只剩下一个空壳。其中陈伯达是林彪的人。康生是老滑头。只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事业而奋斗。指望他们三人玩出花样，鬼都不信。

文化大革命必须继续的情况下，接下来该怎么做呢，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继续挖掘红卫兵的战斗力。原本军队支左，目的也是增加红卫兵战斗力的，没想到起到反作用。那么如何挖掘红卫兵的战斗力呢。从文革开始以来，在强大的宣传力度下，基本上所有在校年轻人都发动了。红卫兵也是非常卖力，能冲击的都冲击了，该打倒的都打倒了，战斗力基本上到了极限，还如何增加？

只有一个办法，给他们武器，改善装备。

武汉事件之后，红卫兵有了枪支弹药，一部分是发放的，一部分是抢的。

没想到武器一到手，不仅没有增加红卫兵的能量，更起到反作用，造成彼此自己的更大规模武斗。伟大领袖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果，赶快在九月五号号召大家把武器上缴。然而正如红卫兵运动本身一样，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之后不是那么容易关上的。双方都有武器，谁愿意上缴？谁能保证自己缴枪之后对方也缴枪？谁能保证对方不私藏？所以很大一部分武器流落在红卫兵手中，武斗一直持续着，一直持续到红卫兵进入历史。

不论从正面还是反面，文化大革命都是一段惨烈的故事。故事本身浓缩着深深的悲痛。所有被牵涉进去的人都付出了自己的代价。所有人付出的代价加在一起促使文革走到尽头。

前面说过，因为文化大革命，许多党政要员付出了代价，社会精英付出代价，军方统帅付出代价，中央文革小组本身也付出代价。最后连江青和张春桥付出了代价，走向监狱。毛泽东也付出了代价，如今被非议。

这一连串的代价之中，现在说一说造反派和保守派红卫兵付出的代价。

关于文化大革命，很多人印象中都是红卫兵去干人家，拉着高干开喷气式飞机，去社会精英家里去抄家，去挖墓砸文物。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文化大革命之中，付出代价最大的群体，对之后社会影响最大的群体，恰恰就是红卫兵本身。

社会影响暂且不谈，谈谈付出代价吧。代价就是大武斗以及后果。

**大武斗**

从红卫兵诞生的那天起，不合的种子就已经种下。大饥荒篇章里，描述了一个走向大饥荒的农民张三。现在描述一个走向大武斗的红卫兵，叫红小鬼。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会，红小鬼在上学，不管是中学、高中、还是大学，身份是一样，都是建国之后，在豪迈、阳刚的红色思想下教育出来的第一代年轻人。

要理解红卫兵所作所为，离不开那个时代的大背景。红小鬼的童年或少年，正是新中国第一个十年，即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那十个年头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在那个十年之前的一百年，中国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战争，从英国鬼子到俄国长毛到八国联军到日本鬼子，遭受过各种各样的磨砺；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垃圾人物，北洋军阀前后各种各样的垃圾军阀，如热衷于盗墓的孙殿英，如火焚少林寺的石友三；中国人遭受过各种各样的耻辱，比方说各种租借内的歧视。

中国人和其它国家人不一样，中国人没有统一的信仰。耶稣基督、释迦摩尼、安拉、太上老君、玉皇大帝、财神土地，中国人都相信，但没有一样东西能让多数中国人相信。唯一能把所有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的那个东西叫政治。其它地方常常为宗教打仗，你死我活，看看《圣经》，记载的基本上就是宗教战争史。中国人只会为政治打仗。

在中国分分和和的历史上，凡是和的时代，是以一个政治家为首、其它政客俯首听命的时代；分的时代，就是那种有一大串政客冒充政治家的时代。

远的不说，看看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失败，就因为他们大大小小的政治家各自盘踞一方。共产党胜利，只因为大大小小的政治家唯毛泽东马首是瞻。百年积弱之后，再一次重新聚拢在一起，在同一种思想下，以一个人为首，骄傲的挺起胸膛。特别是抗美援朝之后，民族意志和热情空前高涨，豪迈的英雄主义笼罩华夏大地。

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红小鬼，他爸有权也好、有钱也好、修地球也好，受到的教育统统是一样的：你们是红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红小鬼没有变形金刚看，没有奥特曼可以玩，整天接触到的都是各类英雄。那些英雄们都是实实在在的、从枪林弹雨中滚出来的。他也不会去早恋，在那英雄主义充满天空的世界，没空搞那些儿女情长。各种享乐主义也是没有的，因为没啥乐子可想。在那种情况下生长的红小鬼有两个三个特点：淳朴，刚强，参与社会活动积极性高。

建国第一个十年之后，也就是五九年之后，社会出了大问题，各种矛盾激化。在今天，一点小事可以引来一大堆口水，一个项目就能引来群众事件（如什坊事件）。那个时代可是全国性的饥荒。今天的人，在吃饱喝足之后，有麻将可以玩，有比赛可以看，有各种风花雪月场所可以去，有各种奇闻八卦可以唠嗑，依然会为了一个项目走上街头，而这个行为还是遭到政府反对的。当时那些人，啥消遣都没有，整天关心政治，谈论英雄，幻想有一天成为英雄，吃不饱饭饿肚子，要不要去闹？当然要去闹。而且他们还有最高领袖的支持。支持他们的那个领袖，还是中国历史上数千年以来排得上号的政治强人。

有了这个背景，红小鬼自然而然、甚至可以说是必然走上街头去闹事。闹事的前半年，当然是很爽的。把那些看似高高在上的大人老爷们拉到某个地方批评教训，那一瞬间还真有当英雄的幻觉，真有成为革命接班人的幻觉，真有拯救天下的幻觉。然后在那强悍且稚嫩的心理就会有这样一种错觉——小爷是代表革命的，是保卫毛主席的，凡是阻挡小爷脚步者，就是反革命的，反对毛主席的。

在咱们中国，凡是都不是孤立的，除了高端科研（很少）和创造（稀有），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都会有一大堆抄袭的、模仿的、跟风的，闹革命也是一样。红小鬼很快就发现，周围出现同样的组织，但是却在干不同的事。红小鬼及其同伴们要打倒的人，其它组织却在保，在对着干。他们也和红小鬼一样有错觉——小爷是代表革命的，是保卫毛主席的，凡是阻挡小爷脚步者，就是反革命的，反对毛主席的。

这样一些人碰到一起，就好比火焰和炉子同出一个房间，迟早要擦出火花的。

一开始大家自诩为革命接班人，还是讲点文明的。首先是贴大字报辩论，不过瘾，就约架，搞辩论，搞文斗。换成现在就是，在网络上辩论谩骂，谩骂不过瘾，通过网路相约，出来搞辩论。辩论不成就动手。只不过现代人相对文弱，缺乏血性，即使冲突了，也就是踹几脚，然后回到网上继续骂。那时候的人比较强悍，动起手来是成群结队，菜刀、钢钎、枪炮应有尽有，而且没有警察抓人。如果当年有新浪天涯什么的，口水战肯定相当可观。

军队支左之前，红卫兵也有内斗，还是以竞争为主。大家高喊诸如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之类的口号投入打砸抢事业。因为夺权刚刚开始，观点不同不要紧，各有各的山头和地盘，各干个的嘛，一方去冲击外交部，另一方可以冲击农业部，共同建功立业，积攒吹牛资本。国家机器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机关部门虽多，却也禁不起造反派连续不停地冲击。一段时间之后，能冲击的地方都冲得差不多了，能夺得权力也夺了，大家又见面了。

红小鬼及其同伴们又看见讨厌的对手。怎么办呢，文斗辩论都搞了，唾沫也吐得差不多了，谁也没办法说服谁，好吧，那就武力见高低吧。

其实红小鬼讨厌的那些人看红小鬼也是一样，讨厌着呢。然后就会出现一系列场景。

场景之一：红小鬼和某个讨厌的敌人相约于某时某地辩论搞文斗，去了一看，对方呆了一群人，大爷的，是个陷阱。红小鬼一看，要么拔腿就跑装孬种，要么硬着头皮当好汉，结果可能被揍得头青脸肿。事情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红小鬼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属于某一个战斗集体，他的脸面不仅仅代表他个人，还代表整个战斗集体。面子被人家泼了屎尿，怎么办呢，自然要捞回来。于是红小鬼和一帮战友，在某一个角落抓住一个或几个敌人。其实那根本不是敌人，还可能是同学或者老乡，因为站在不同的战斗集体里而成了敌人。对待敌人是要残酷的。个别敌人就丧命了。有人不堪侮辱，会从楼上跳下去，寻找生机，在落地摔成肉饼之前高喊口号，如战斗到底！毛主席万岁！

当然也可能不是跳楼，或者跳悬崖。当然也可能不是跳，是被扔下去的。当然跳下去或者被扔下去摔成肉饼的不是别人，就是红小鬼。但是为了借用红小鬼的绰号，假设他没死，死的是别人。如果是敌人死了，那是最好。如果是战友死了，那就举行一个哀悼会，化悲伤为战斗力，继续战斗。

场景之二：凡是立场坚定的红卫兵必然卷入武斗。红小鬼也一样，要和战友们一起于敌人相约比武，时间是某时某地。原先说好是六对六，或者十对十，而对方不守（也可能是己方）诺言，战场四周设下埋伏。

结果就相当于一群人包围一队人。这个时候，一群人心头充满喜悦，好像要抓住老鼠的矛；一队人心中自然是恐惧，如同看见陷入猫的包围圈之中的老鼠。然而喜悦也好，悲伤也罢，都是前戏，都是铺垫。喜悦者是否能喜悦到最后还要经过残酷的考验。战斗一开始，就没有喜悦或悲伤，只有生和死。在生死之间，人就会变成凶猛的野兽。不管是周围的人，还是被包围的人，都会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像野兽一样战斗。

战斗中的野兽是凶猛的，残忍的，没有情义的。尽管他们都是同一个国家的同胞，尽管他们之间没有深仇大恨，尽管他们可能有着同样的身世同样的梦想，但是在生存本能驱使下，手中的菜刀或者钢钎会毫不犹豫地招呼对方。如果有炸弹，也会毫不犹豫地拉开导火索。

这样的情况下，红小鬼可能拿刀砍死别人，也可能被别人砍死。为了红小鬼这个绰号，现在假设死的是别人，红小鬼依然毫发无损。如果是敌人死了，那是最好。如果是战友死了，那就举行一个哀悼会，化悲伤为战斗力，继续战斗。

场景之三：最为残酷的斗争方式当然是枪战。用刀砍棍打的方式固然热闹，杀伤力毕竟有限。就算一伙人围住一个，也不见得非得把对方打死，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嘛。枪就不一样了。一旦打起来，子弹不长眼睛，打中要害铁定完蛋，即使打不中要害，医疗跟不上，流血也会死掉的。

枪战一开，必然是大规模的，是一派对另一派。两派人马可能占据一个学校当战场，再看看如何解决对方。也可能从城市混战到郊区。交战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很多场面，比方说可能有人不小心弹腔匹马误入敌阵，然后就会小命不保。

枪战一开，就再也没有朋友之情，再也没有同窗之谊，只有枪支弹药、准星、目标、敌人，只有生和死。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如果是敌人死了，那是最好。如果是战友死了，那就举行一个哀悼会，化悲伤为战斗力，继续战斗。

场景之四：武斗过程中，战友的死亡是一个必须面对的过程，哀悼战友也是一个特殊的仪式。死人盖着红布，爹娘亲朋都成了过去式，活人戴着黑纱，还要继续战斗；死人平躺，旁边放在陪伴他去另一个世界的红宝书，活人直立，手中拿着这个世界的宝贝——红宝书。然后在墓碑上写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明月换青天”；或者“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嘉华”。看这诗歌，多么坚硬。

接下来朗读一段祭文：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某某某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或者，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或者，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

这个仪式很的功用很简单，一边为死去的战友哀伤，一边聚集怒气继续战斗，去杀伤，去制造更多的死亡。大家都是血肉之躯，都是爹疼娘生天地养，就这样死了，去不去反思死亡，而是追求更多的争斗，可以说是疯了。

大家仿佛都以林副主席的《战歌》为榜样：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多大仇啊。

如果有俘虏，还会把俘虏。俘虏全部光着上身五花大绑跪在一旁。俘虏全身有可能被涂抹已成黑黑的锅灰，鲜红的血液从伤口中流出，处于一种不死不活，要死要活，不红不黑，又红又黑恐怖状态。如果仅仅是一个追悼仪式，可能会散步一种恐怖因子。俘虏起到一种鼓励作用。伤痛的刺激加上俘虏鼓励，会释放出更为强大的战斗力。

如果经历这一系列遭遇之后，红小鬼没还活着，那么好吧，到今天已经是个老人，终于可以回忆反思过去。

要想全景式描述红卫兵武斗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太复杂，太乱了。下面通过两个具体战例讲一讲武斗对红卫兵走势和结局的影响。

**战例之一：重庆战例**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号，毛泽东在北京首次接见红卫兵的三天之前，地处遥远大西南的重庆成立了一个新的红卫兵组织，成员包括学生、工人、干部等人，他们组织了各种战斗团体。后来为了方便宣传，全部称为“八·一五”派。

这个派别一看就知道先天不足。男女老少一大堆，大杂烩，意见不合在所难免。特别是面对大家共同的事业——打、砸、抢——方面看法不同，偏偏那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年代，意见不同怎么办，分裂。最后分裂出一个超强的战斗集体，叫“反到底”派。这个名字就传递出两个信息：一，很唬人，战斗力肯定不弱；二，没前途，何时才能反到底？

等武斗来临时，就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八·一五”对决“反到底”。

双方成员组成大致相当，都是学生和工人混编。所以武斗地点主要集中在各大专院校和各个企业，根据业余的军事常识对战。比方说占领战场制高点，就是抢先占领战场上的厂房，学校宿舍大楼什么的。进攻或者反制，就是争夺厂房、宿舍楼什么的。

重庆武斗特点是斗争程度激烈、持续时间长、伤亡大。很大原因是，当时中苏关系紧张，重庆地处西南腹地，为了应付突然而来的战争，很多军工企业迁移到大西南。当时全国有四分之一的军工企业在重庆。比方说现在建设摩托生产基地，当时就是军工企业，有一个连的军队守卫。大量的军工企业自造大量武器。大量生产军火的工人卷入武斗。加上中央在武汉事件后允许持枪。大量的武器流落到武斗战场上。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号，武汉七二零事件爆发后的第五天，重庆武斗开始了。夜里，“八·一五”偷偷占领了建设机床厂旁边山顶两栋小楼（占领制高点）。建设机床厂属于“反到底”的势力范围。旁边山顶小楼却被对手“八·一五”占领，“反到底”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他们决定夺回那个制高点。上午八点，“反到底”的集结人马进攻山顶小楼。一番喊话、谈判、警告、威胁无效之后，进攻！“反到底”手持钢钎、大刀、燃烧瓶，身穿劳保服，头戴藤帽，围着小楼，投掷燃烧瓶。

“八·一五”的人则凭险据守。双方就这样展开攻防拉锯战，均有伤亡。两个小时之后，“反到底”的人渐渐失去了耐心，决定来点真格的，于是就出动了他们攻坚力量，一个叫红大刀的战斗小组。红大刀的成员以建厂年轻工人为骨干，各个身强力壮、狂热冲动、牛劲十足。他们常规武器全部自己手工生产：钢管焊上本厂生产的三棱刺刀，人手一柄，长约丈许。如果不动用枪支弹药等热兵器，在常规冲突中，那玩意在对战中的杀伤力即使比不上关二哥的青龙偃月刀或张三哥的丈八蛇矛，对付肉体凡胎是绰绰有余了。他们找来梯子，手持武器，在燃烧瓶的掩护下开始攀爬攻坚，上演真人版电影。

与此同时，驻守大本营的“八·一五”发现昨夜拿下的堡垒冒起了滚滚浓烟，开始派出增援队伍，八一兵团。这个兵团也是战斗力很强。在武斗之前，他们在空压厂制造两栖坦克车。现在他们离开空压厂，手提砍刀、钢钎，一路喊着口号冲向战场。

援兵赶到，内外夹攻，“反到底”支持不住了，承认暂时失败，开始撤退。“八·一五”则乘胜追击。一个“八·一五”的人看见一个“反到底”的红卫兵退在后面，就提着钢钎从红砖楼边冲过来。那里有一个长年堆积如山的垃圾山，大约有一幢楼那么高。红卫兵同志潜力迸发，硬是从垃圾山跳将下去，追赶者把手中的钢钎当标枪，奋力朝那个红卫兵掷去！幸好那个红卫兵是体育健将，差点入选空军飞行员，凭借矫健的身手躲过一劫，后来还是死在武斗中。另外一个叫宋正言的红卫兵小将就没有那般幸运了。

宋正言是一高中生，跟随本方人马撤退过程中，很不行落单，陷入包围圈中。“八·一五”的人一看抓住一个活的，便好好发泄了一把被武斗激发出来的兽性。他们用钢钎招待宋正言，捅了又戳，戳了又通。一群如狼似虎的兽性大发之人把宋正言弄得全身都是窟窿，往往冒血。宋正言不过十几岁，小草一样的年华。

宋正言倒地的地方是一个鸡笼，人血溅到鸡笼的木栅上，厚厚一层。

战斗结束之后，双方撤离战场，宋正言被战友们抬下来，全身二十多个伤口，于下午一点钟死掉。宋正言是这次武斗中第一个牺牲者，成为烈士。他的死彻底激怒了“反到底”派。他们愤怒了，回到大本营立即布置战场：在重庆两杨公路上拉起了一条钢索，钢索上全是钢钉。交通中断了，一场大战即将拉开序幕。

在大幕拉开之前，武斗还是冷兵器，杀伤力不大。四天之后，七月二十九号，终于发生了枪战，你没看错，我也没说错，是枪战。

武斗立即开始升级，从步枪发展到机枪，从机枪发展到动枪动炮、坦克、军舰。除了原子弹和飞起，中国军工厂生产的兵器搬到中国大地上演示，实景演示。

属于“反到底”势力范围内部的建设厂，主要以生产轻型武器，以枪炮为主。宋言正的死亡加上枪战发生，使得他们立刻做出反应，准备释放大招：发枪！

七月三十号，也就是枪战发生的第二天，他们在建设厂灯光球场举行隆重的发枪仪式，发誓一定要为宋正言烈士报仇！崭新的半自动步枪举向空中示威；再拉开枪机，刺刀撬开一箱箱的子弹，分发下去。各路人马开始汇集，摩拳擦掌，发誓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另一方的情形也差不多，都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意图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八月一号，建军节，建军四十周年。那一天，中央文革的关锋在报刊上重提批斗军内一小撮。差不多同一时刻，全副武装“反到底”向“八·一五”发动进攻。他们用自己生产的武器开道，用炸药爆破。一时间“八·一五”占据的地盘火光冲天。

在冲锋于反冲锋的拉锯中，喊杀声不绝于耳，夹杂着惨叫声、呻吟声，构成一曲恐怖的乐章。在哪恐怖的乐章下面，是绝望挣扎的人们，是兽性大发的人们，是伤痕累累的人们。

狂野的枪炮声昼夜不熄。惨烈的战斗持续两天两夜。八月三号早晨，“八·一五”支持不住了，全线溃逃，带着战友们的尸体。“反到底”的人马则在后面追击。一路上枪战连连，打死打伤不少人。

这个回合，“反到底”胜。

八月五号，“八·一五”的人马为了夺取建厂夺取武器，不惜一切代价向建设厂清水池制高点发起攻击。“反到底”的人抬肩扛，将两台大口径四枪管的重机枪推到半山腰上架上。“八·一五”的人携带轻武器仰攻冲锋。在重机枪的扫射下，“八·一五”死伤惨重，死伤者漫山遍野。八月天，尸体很快腐烂，白骨森森，惨不忍睹。他们都有父母，很多人还没有娶妻生子。如果不死，他们可能成为各个行业里的精英。

这些只是武斗的一角。武斗中死掉的一部分“八·一五”成员埋葬在重庆沙坪公园小溪亭阁不远的地方，称“八·一五”公墓，依山傍水，鸟鸣清幽，曾是解放军烈士墓。那些生前热血满怀的冲动派，终于在幽静的环境中长眠了。他们曾经有最热的血浇灌纯粹的理想，最终从后人那里得到的只是质疑的目光。现在人看见红卫兵墓，感情总是复杂的；对待红卫兵当年的行为，也是困惑的。

一方公墓留下一个巨大的课题。

重庆乃至全国的武斗，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八年夏。武斗最为严重的一段时间是一九六七年七月下旬到九月上旬。那段时间，中央给了造反派武器，允许武斗，因此斗争极为凶狠，完全超出了预期。九月五号，中央下命令鼓励大家把武器上交。一部分上交，另一部分没有上交。比方说“八·一五”和“反到底”就没有缴枪，或者说缴枪也没用，人家自己生产枪支弹药的，掌控资源。要么文化大革命结束，要么另外一种强有力的政策介入。

双方你来我往，明争暗斗，一直斗到一九六八年建军节，来一次决战。这次决战中，“八·一五”依靠人多势众，精心布置，打散了“反到底”。

这一战之后，双方尘归尘、土归土，死的死了，没死的拍拍屁股上的灰尘，查干身上的血迹，下乡接受再教育去了。

在乡下，他们荒废了人生之中的黄金岁月。

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号武汉事件开始，文革之火基本上失去了控制。特别是双方大武斗，直接导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直接导致中央文革小组成为空架子，直接导致文革在基层的行动中的破产。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更多表现在概念和象征意义上。

压垮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恰恰是另一个故事。

**案例之二：清华百日大武斗**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一九六八年的时候，该干的事都干差不多了：该打倒的人打倒了（如刘、邓、贺、彭、罗），该夺的权利也夺了，该裁员的裁员（如王力、关锋、戚本禹）了，军队也出动了，武器发放了，武斗也斗了大半年了，改出的招数都出差不多了。接下来怎么办呢，大家都在思考。

高层正在考虑召开九大，对两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一个回顾总结，展望一下未来。在普通人身上，回顾过去或展望未来，也就是给自己鼓鼓劲之类的。中央不一样，需要权力重新组合。被打倒的那些人形成一个个真空，需要有人填补。在基层，骚乱还在继续，武斗的枪声时不时从不同地方传来。

骚乱过程中，许多红卫兵组织分裂了。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井冈山兵团。井冈山兵团，红卫兵最著名的领袖蒯大富亲手创立的、亲自领导的、一手指挥的，依然没有都过命运的侵袭，走入不可挽回的结局，分裂。

井冈山兵团从诞生那一天开始，在蒯大富领导下，从骗斗王光美一鸣惊人，就没有停止过，时不时把中央大员（如彭真、罗瑞卿等人）拉过来批斗一番。

关于夺权，蒯大富认为：“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右倾；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不夺权，就是对人民极大犯罪。夺权，就是捍卫党的领导，就是捍卫无产阶级。夺权，是无产阶级派的当务之急。此时不夺，更待何时！”

蒯大富认为：“真正的革命派，应该满脑子里想的是夺权，眼里看的是夺权，双手干的是夺权。有人笑我们满脑子权权权，是一个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对！我们就是满脑子权权权，就是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在政权问题上，我们就是毫不含糊，当仁不让！我们宁可做野心家，也不愿当糊涂虫、马大哈。”

由于战绩过于辉煌，北京已经容不下他们，他们称霸清华园，不够；名扬北京城，不够，还要继续。把手伸向全国。在夺权的黄金岁月里，井冈山兵团以联络站、记者组的方式向全国各地派遣近千号人马，直接干预当地文革斗争，武斗文斗都有，劝方位服务。

蒯大富带着他的井冈山兵团把手伸向军方，甚至把军委文革小组长徐向前的家给抄了，还想绑架徐向前，好在没有得逞，不然又多一冤案。揪斗军中一小撮有他们，武汉七·二零事件背后有他们。他们派出许多军事动态小组，分赴各大军事单位或战略要地，收集有关部队番号、军队动向及军事首长状况等机密情报，绘制有关图表，力图使军队乱一点。

然而一切辉煌和风光都是表面的，兵团从诞生那一块起就蕴含着很多不确定成分。

当年清华以内大大小小的派系一大堆。为了寻找存在感，各派都有自己的观点。都是书生嘛，观点话题自然不难找。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倒下之后，有人渴望继续建功立业，结果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有人把贴康生和江青的大字报，还有人想挠一挠毛泽东和林彪的虎威，自然都是不了了之。因为造反工作要靠中央文革的支持。没了中央文革，他们就是秋后蚂蚱——没啥可蹦跶的。

井冈山兵团是靠大棒和帽子起家的。大棒和帽子不仅在高干和社会精英中推销，还在造反派中推销。井冈山兵团要当老大，成为一哥，对于其它红卫兵组织只能分化瓦解，招数如下：一，兵团内部，以联合、团结为由，指责那些意见向左的人为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再通过各种帽子压住；二，对自己的嫡系倍加关照，即使他们犯了“错误”，也内外有别；三，下令解散非井冈山红卫兵纵队，强化自己的集权。归结起来就一条：听话是战友，不听话是对手。

这一系列折腾之下，不满的人和团体越来越大，分歧越来越大。大家同样是造反，凭啥一切都是你蒯大富和你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说的算？凭什么你们就是真理？真理是你们表叔二大爷不成！既然权威算不了什么，既然夺权就是一切。那么你蒯大富可以去打倒权威，可以通过打倒权威而成为权威，可以通过夺权而掌权，那么我们也可以打倒你蒯权威不是。

终于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号那天，井冈山兵团分裂了，分为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和“四·一四”总部（简称四派）。团派归蒯大富领导指挥，四派是他的敌人。

四派发表文章质疑蒯大富的团派：“为什么清华团总部在全国各地无一例外地到处反军区、反革委会，而且是在各地揪军内一小撮的急先锋？打倒许世友、韩先楚、陈锡联、李再含、刘格平等第一炮几乎都是清华团派打响的，这是为什么？”翻译过来就是，为啥老是我们清华当出头鸟，是不是被人家利用了？是不是蒯大富同学利用咱们清华的热血去追求自己的个人梦想，比方说进中央（当时有传言）。

为什么，夺权呗，运动呗。大家都是一个样，只是主张不一样而已。四派要求给老干部平反，说团派干部也有缺点，总之是要另起炉灶和团派对着干。如此这般的结果只能是没结果：在唾沫星为常规兵器的战场上永远不会有胜负。

双方开始用嘴辩论，你来我往，不已乐乎，谁也没办法说服谁。弄倒最后，两派人完全对立起来，一派说应该往西，另一派也不管对不对，本质为反对而反对的思路，一定说往东；一派说咱们红卫兵今天应该出门大狗了，另一派则说，不，应该去捉鸡。

团派认为：文革前十七年的清华是黑线专政，几乎无可取之处。清华的干部，尤其是五十年代培养并相继任职的，是资反路线的第二、第三套班子。这些干部作为“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起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更加反动与危险。

四派则针锋相对：这是从根本上否定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共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给团派那套理论贴上标签，美其名曰“大翻个理论”。

原来战斗力强大的井冈山兵团，就这样陷入无休止的内讧中，严重影响了造反的宏图大业。开始开会只是喷口水，升级到会场拳头，就像台湾议会那般。紧接着会场拳头升级为会场暴力。解释一下会场拳头和会场暴力的不同：会场拳头，是指与会者双方看对方不爽，亲自上阵挥动手臂、扔破鞋、青菜、臭鸡蛋，详情参照台湾两党开会。会场暴力则是外界力量干扰。比方说团派开会时，四派人马取冲击会场，扔破鞋、青菜、臭鸡蛋之余，还会加上配音：团派龟孙子王八蛋等无休止的口号。

这样一来形式发生了转变：继续造反之前，要摆平内部斗争，攘外必先安内。

既然如此，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办了：既然唾沫星无法消灭对手的反对精神，那就用武力消灭对手的身体。

双方在清华园内部拉来战场，好吧，你们占领图书馆，俺们占领科技楼，对战！开火！

从一九六八年四月中旬到七月二十七号，前后大约一百天的时间里，清华大学的莘莘学子们用拳头代替舌头战斗、用屁股代替脑袋思考，双方你来我往，交锋无数回合，依然没有分出胜负。斗争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方式，绑架：这是黑社会流氓团求财的手段么，不错。黑社会绑架勒索，那都是小儿科，和当年红卫兵比起来，他们只是一根冒险。当年的红卫兵，那可是连大元帅和中央大员都敢绑架（参照彭德怀和彭真待遇），绑架了部长给批斗死的案例（张霖之）都有。团派和四派的内斗也不会放弃这么有效的手段。具体操作，就是通过侦查、追踪、引诱、突袭等方式把对方重要的人物控制起来。这是连锁效应，团派绑架四派的人。四派的人也不甘落后，会报复，反过来绑架团派的人。那种绑架和黑社会不一样。黑社会绑架一个人，只为点钱财。红卫兵则不同，为了所谓理念。绑架一个人，目的是策划对方反水，从敌对阵营投入我方，弃暗投明。如何让对方弃暗投明呢，首先像唐僧一样唠叨，诸如我们代表真理和正义啊等等。当然唐僧咒不管用时，他们会挥动孙悟空的金箍棒，砸丫的，具体就是对待社会精英的那一套，如喷气式。总之是不惜代价让反水，正如黑社会不惜代价要钱。

第二种方式，群殴：每个人想必都见识过群殴场面，某一天放学路上，某个城市角落，都可能会有群殴事件发生：一帮人叽叽喳喳，跟唱戏一样叫个不停。然而大学群殴有几人看见过？休说群殴，斗殴都不多。毕竟大家也都是成年人了，墨水也喝了不少，自尊心、自主意识、是非观基本上都形成了，懂得用脑子解决问题。要说全国第一流的清华大学，还是顶尖的学生群殴，那事也只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了。没办法，大家都要革命，脑袋瓜子都不错，嘴皮子也不错，谁也不服谁却要说服对方，要啥办法呢，只有动拳头了。当然不是赤手空拳，大刀、长矛、弓箭、钢钎啥的应有尽有，古人云，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形容书生战斗力差的。然而逼急了，战斗力差也得去战斗。而且只要去战斗，就会打死打伤打残。

如果有人不幸被绑票或被俘，将遭受如下待遇：捆绑，用电线或细绳五花大绑，结果是关节肿胀；被关押在几个一百瓦的灯泡房间里，四周门窗全部钉死，日夜不熄等，墙壁或者房顶上有一个小孔，充当摄像头，有人监视（监视者也辛苦啊）；皮鞭、棍棒、拳头是不可避免的，某些时候还能品尝到别样花招，如罚站，一直站在那里不动，直到腿脚肿胀、汗流浃背、头昏眼花。当时七八月天，空调电风扇啥的就不要想了，蚊香蚊帐也没有，光蚊虫就够喝一壶的。

第三种方式，武力威慑：眼看前面的方式都解决不了问题，只能进一步升级，威慑。威慑不等于威胁。个人角度上讲，老子要拿刀砍你，那叫威胁；在人家家门口加上枪炮，叫威慑。从国家角度上讲，不要在占领俺们领土，不然俺们开炮了，那叫威胁；把原子弹放好，那叫威慑。按道理说清华园的高材生们都有发达的脑袋，不会搞武斗的。既然要搞武斗，那也是非常有特色。别的地方武斗，那是真刀真枪的实干。清华园的武斗不同，他们是有清华特色的武斗。他们手中也有枪支弹药。但是他们很少摆开战场大干一番，而是在清华园内修筑工事，拉铁丝网等等，建造一个易守难攻的据点威慑对手。四派不敢轻易进攻团派的同时，团派也不敢轻易进攻四派，达到一种无力上的平衡。相当于一个山寨版的冷战格局。各自躲在自己的据点里侮辱攻击对方，也有对战，但基本上不是生死肉搏。

这就是双方在清华大学大战一百天，仅仅只有十一人死亡（被长矛刺死、被毒打致死、跳楼摔死等等，只有四个学生中弹而死），三十余人残废，伤亡率颇低。大家都是知识分子，有头脑的不是。所以嘛，把枪弹当成核弹来用，搞武力威慑嘛，挺好。要是想重庆那个武斗方法，估计双方别想离开清华园了。

那场武斗除了时间持续的长，规模并不大（放在当时背景看），残酷程度上讲也不算啥。因为是众人瞩目的清华园，因为是大名鼎鼎的清华井冈山，所以影响很坏。

所谓影响，不仅仅是社会影响，还影响到高层决策，即毛泽东的决策。闹到最后，四派撑不住了，开始求援。

**第二十二章 无奈的结局**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以巨人手腕搞出来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巨人的两只手，便是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组织。

由武汉七二零事件导致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下岗吃皇粮，导致了中央文革煽动努力大幅度下跌。除了老滑头江青之外，仅仅剩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其中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上海一个烂摊子要管。中央文革基本上走到了尽头。

武斗事件造成红卫兵内斗，再也没有力量去管社会上是是非非。早期那种强悍的冲击力消失在内斗之中。可以说红卫兵武斗，就是中国内斗传统的山寨版。

其实毛泽东对清华园，乃至全国的武斗非常清楚。七·二零事件之后，也正是他同意给造反派发枪才导致武斗升级的。一年之后，武斗如同文化大革命本身一样，进入了一种宿命般的循环，看不见结束的希望。

毛泽东意识到：应该让红卫兵小将走人历史了。

一九六七七月二十七号清晨。北京市数十家单位的三万多工人打着另一个旗号进入清华园，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大名鼎鼎的工宣队。这三万人干嘛呢，调节武斗双方，通俗点说也就是劝架的；高雅点说法，维和部队。

当时清华园内对战双方加在一起不到一千人，维和部队来了三万人，斗争双方都傻眼了。尤其是蒯大富同学，一心消灭四派，眼看把四派逼到墙角，一看黑压压的几万人（讹传为十万人），那个小心脏扑通扑通乱跳，心房差点硬化为玻璃了。

冷静下来一想，部队啊，该打倒的都打倒了，中央除了还有什么人如此大的能量呢？如果是中央整出来的，以自己和中央文革的关系，那一定会得到通知的。事实上啥消息也没有。蒯大富同学再一次迷茫了。

迷茫之中的蒯大富灵光一现：一定有黑手，对，是黑手。蒯大富跑到北京文革委转了一圈，讨说话，结果啥也没有捞到。这是蒯大富第二次迷茫了。第一次迷茫是两年之前刘少奇和邓小平派工作组进清华，把蒯大富同学关进黑屋子。

是否有黑手，那是后话。当务之急是保证自己的阵地不当孬种，等待中央救援。于是团派组织人马抵抗，打伤一部分工人。但是双方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人员对比大概五十比一。而且工人天天干活，全身肌肉肯定比满脑子理论的学生发达。毕竟满脑子的马恩列斯毛或者牛顿伽利略不能转化为拳头。

拿五十个肌肉发达的工人对付一个穷酸书生，一点悬念也没有。而且工宣队的领导人还有一些中央警卫部队的军代表，非常善于战斗。在他们的带领下，工宣队逐步推进，稳扎稳打，一边拿着大喇叭喊话，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放下武器、不要反抗等等。行动上一点也不慢，迅速完成分割包围，把一群要肌肉没肌肉、要战斗力没战斗力的学生给团团围住，集中起来宣传教育。实际上和扣押差不多。清华大学那帮秀才，平时也都是喷口水教育别人的主，自以为理论造诣颇高，现在只能老老实实接受老实巴交的工人教育，那个憋屈啊，莫提了。但是没办法啊，形势比人强。

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至理名言啊。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团派英勇抵抗过，还打死了几个工人。还是在当天晚上八点钟接受了无奈的局面：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

达成协议之前，蒯大富和他们的战友们开会，分析了当前局势的危险性：“我今天跑出去以后，到市革委会见到吴德，其他人没有见到。吴德同工人站在一起。吴德告诉我，说我们打死了工人，打伤的工人特别多，北京大医院已经住不下了。我们今天已经闯了大祸。不打死人还好办，一打死人，我们向中央没法交代。现在，工人对我们恨极了，要和我们拼命。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留在清华继续和工人打，另一条是退出清华。”

然而那些高智商的人才们似乎打红了眼，多数人选择留在清华继续打。这个时候，能折腾的蒯大富却展示了难得的冷静，继续分析：“如果我们留下来，也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明天我们用我们的全部武器、弹药再和工人打一次，那工人的死伤就更不得了；另一条是我们打输了，我们就可能被几万工人打得全军覆没，和‘上柴联司’（被王洪文带着工人消灭的）下场一样，这两条路都是死路。唯一的活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蒯大富分析：“我们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这么大的事件，中央马上就知道。只要中央知道了，一切就好办了，中央会救我们。请大家相信，有人在，就有清华井冈山在。我们跑出去，我们就是弱者，这样，在中央面前，我们就好说话。”不得不说，蒯大富同学如果早生四十年，说不定是打游击的好手。

随后，蒯大富和一帮人从清华撤到北航，寻找机会反击。暂时脱困的蒯大富发电报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七月二十七日在黑手昼夜策划下，假借宣传七·三布告，挑动十一万不明真相的工人，携带凶器，突然包围、洗劫清华园。我井冈山战士全部撤出清华，衣食无着，生命安全无保证，清华井冈山生命垂危，形势万分危急。向中央呼救，寻求中央马上接见。

这封电报明显夸赞，把三万人夸大为十一万，还说幕后有黑手。也许不是蒯大富的真实感受。知识分子嘛，常常被感觉欺骗，对有利或不利的事夸大。蒯大富刚发完电报，就接到通知，说中央领导人要接见，他不敢去，担心遭“黑手”暗算，后来由聂元梓亲自通话，才敢去人民大会堂。去了人民大会堂，蒯大富准备告一状的，然而他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等他找到工宣队“幕后黑手”时，只有在那人面前嚎啕大哭的份。因为那个人就是毛泽东。如果不是毛泽东，蒯大富或许早在文革之前和工作组对抗时就挂掉了。如果不是毛泽东，蒯大富也没有人生中两年多的风光和之后十几年的牢狱之灾。毛泽东不仅仅是蒯大富的救命恩人，还是他的精神支柱、以及红卫兵存在还是消失的决定性因素。

武斗第二天，也就是七月二十八号凌晨两点，毛泽东刚刚上床休息，周恩来打电话过来了，说工宣队进入清华过程中留血（死人死亡），毛泽东非常来火，冲口而出：“造反派，反了？！”毛泽东很少发火。发火意味着雷霆之怒。庐山批判彭德怀时来过火。清华大学这点事怎么会让见过大风大浪的毛泽东来火呢？

原因有二：一个是刚刚睡下，被吵了，烦。毛泽东一生，习惯于晚上思考、工作，而且他很难睡着。所以他很不喜欢有人吵醒他，人之常情。

另一个原因才是主要的：恨铁没成钢。

毛泽东搞文革，红卫兵是急先锋。他希望用年轻人的热血和勇气去冲击逐渐固化的官僚制度。为了鼓励年轻人的革命热情，他允许他们造反，允许他们去抄家、开批斗会、去修理高干们。那些高干都是他当年的战友。他对他们抱有很高的希望，希望他们把革命传统继承下去，去冲击千年以来的官僚积习，给社会注入新的元素。然而两年过去了，他失望地发现，红卫兵不仅啥都没干成（除了破坏），而且陷入内斗无法自拔。

把毛泽东看成铁匠，把文革看成铁炉。铁匠希望用铁炉把生铁锻炼成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之后，铁还是铁，终究没有成钢。

后来有人回忆说，毛泽东从决定派遣工宣队到下达任务前后仅十几个小时。好像工宣队的事情非常仓促。实际是瞎扯。毛泽东啥时候在重大事情上仓促过？

毛泽东一辈子，要干的事基本上都能成功。但是在红卫兵这事上看不见成功的希望，正如当年大跃进。事实上他已经意识到红卫兵不能成事。因此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五号，枪支发放两个月，就要求缴枪。那个时候他已经意识到，放手去造反是一个错误。但是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所以一直在拖着，一直拖到清华大学的百日大武斗，终于压断了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清华园的井冈山兵团是所有红卫兵组织中最为核心的组织之一，如果连蒯大富的人都陷入内斗无法继续干事。那么意味着红卫兵的使命结束了。如果放任不管，让清华园的武斗继续下去。最终的最终，蒯大富或许可以指挥团派消灭四派，只是不知道是啥时候。到时候清华园或许不存在了。又或者，只剩下团派的一帮人。那时候团派还会继续分裂。然后继续一派消灭另一派。在斗争哲学指导下，继续分裂。如此循环，无求无尽，最后剩下的那个人会是谁呢，是蒯大富么，或许是，或许不是。是，或者不是，都不重要，因为都完蛋了。

**七月二十八号**

那是一个死局，一个任何人都无法解开的死局。只有一种办法，用强力把死局推倒打散，彻底送入历史胡同。

毛泽东意识到，应该解决红卫兵问题了。所以在七月二十八号早晨，蒯大富还在想办挽回局势时，毛泽东召集红卫兵五大领袖开会。那是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毛泽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召集五大领袖开会。那场会议在文化大革命中非常重要，它决定了红卫兵——整个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的命运。

凌晨三点半，周恩来给的电话叫醒毛泽东之后两个小时，除了蒯大富之外，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几个人到了中南海。对普通人而言，那个时间段是睡觉的黄金时间。风光无限的红卫兵领袖却因为武斗的事头焦额烂。尽管他们习惯了黑夜工作或者战斗，依然对那一次深更半夜的会议惊讶不已。当然他们渴望中央的指示，如同干裂的大地各位降雨。

然而他们依然没有想到，他们将面对当时最为强大的权利阵容：伟大领袖毛泽东，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兼接班人林彪，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还有中央警卫团的老大汪东兴、公安部长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等人。

——当年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负责人。

看看如此强大的阵容，深更半夜就为了召见几个毛头小年轻是不是太隆重了？几个人只有聂元梓稍微年长一点，四十四岁，相对召见者也是非常年轻。谭厚兰梳着两条小辫子，加上个头瘦小，像小姑娘。韩爱晶更老土，穿着土布衣服，裤腿卷到膝盖之上，到乡下放牛都不用打扮。而故事的主角蒯大富还没到。然而历史证明，那天的事非常重要。

据韩爱晶回忆，那日凌晨，毛泽东脸上皮肤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神圣的毛泽东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不见了之前接到周恩来电话时的火气。他将在弹指之间决定千百万红卫兵的命运。他已经习惯了弹指之间决定千百万人的命运。

毛泽东问：“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来。”

韩爱晶替蒯大富解释说：“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是知道中央领导接见不会不来，他要是见不着毛主席，他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泽东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首先亮出态度：并非和清华过不去，实在是清华那帮家伙闹得不像话了，逼得我老人家动一动手指头。谈话就这么开始的。

谈话的目的：动员红卫兵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过程：极为温和的，或者说是家庭式的。蒯大富是最后一个到的，他进去就嚎啕大哭。韩爱晶回忆，当时的蒯大富如同一个在外面挨打的孩子回家告状。毛泽东看见蒯大富起身迎上两步，在座的也都跟着站了起来，站在主席周围。蒯大富握住毛泽东的双手，脑袋靠在毛主席胸前，边哭边啰嗦：“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等等等等等”

毛主席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

一边韩爱晶流着眼泪劝蒯大富讲：“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傻眼了说：“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是啊，怎么会，还不是被逼的。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让谢富治（公安部长）和温玉成（北京卫戍区司令）立马放人。

韩爱晶如此回忆现场情形：“蒯大富如在梦中，无知的悲痛感染着气氛，蒯大富嗯嗯地哭。他还完全认为自己是无辜遭劫，其言、其声、其情、其态，悲恸至极点，见到毛主席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样，只顾告状。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主席是极重感情的人。毛主席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江青重复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蒯大富，晕头转向，不知怎么回事。”

过程就是这样，富有感情味。这么说或者会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那么残酷的年代，怎么能说现场有感情味呢，应该是铁血冷酷的命令才对。其实这个不难理解。首先毛泽东的政策都在谈笑间落实的。其次毛泽东当年是全民偶像，粉丝对偶像当然是柔情的。最后，毛泽东对几个年轻人也挺喜欢的，仿佛看见年轻的自己。

谈话从凌晨三点半持续到早上八点半，主要是毛泽东在讲，其他人一旁帮腔。一共讲述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现状。

现状是什么样的呢。现状就是红卫兵运动出现了问题，违背了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毛泽东说：“你们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四·一四’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四派理论家）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布告明明宣传好多天了。你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会做怎么样的宣传，工人是没有武装的，所以毫无办法，你们打到哪一年去？你们应该欢迎嘛！工人又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五个工人，打伤工人。”

毛泽东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

——啥叫恨铁不成钢，这就是。

林彪则说：“打走资派和文艺界的牛鬼蛇神，现在不是，相反学生打学生、群众打群众，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是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是双料反革命；有的开始是革命的，后来革命性差了；有的是走向反面，革命精神消失了。这个发展下去就会走向反面，你们脱离群众。”

这些话从正副统帅口中说出来，分量可见一斑。红卫兵运动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建设一面，即文斗方面没有达到预期，反而陷入内乱；破坏一面，即武力打砸抢过头了。这一正一反之间就让文化大革命陷入深渊。不仅如此，派工宣队解救，蒯大富同学反而被战斗欲望冲昏了头脑，和工人开战，白白让另一路人马捡了便宜。想想都是郁闷啊。

但是政治家不能讲郁闷。政治上的事，可以有现实手段，不讲精神感觉。所有的负面情绪，只因为手段失误而已。从武斗这一块来讲，彻底暴露了一个事实，就是红卫兵不足以继续支持文革了，而五大领袖也不是成事的主。也搞了一两年了，连自己手底下那帮人都搞不定还不如去乡下种地呢。除了韩爱晶的北航稍微好点，其他地方乱得不成样子。

既然如此，如何解决问题呢。解决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临时性方案，即眼前方案。另一个长远性方案。

关于临时性方案。毛泽东说：“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院校五十九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就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

毛泽东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

这是临时性办法，即解决武斗的办法。但是解决武斗只是暂时的。

武斗所以武斗，除了文革初期政策鼓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事干，闲着无聊。该毕业的没地方工作，比如王大宾同学，本来应该去搞野外勘探去了，结果没单位接收，就干革命了。很多人本来应该在学校念书的，但是停课了。那些领导啊、教授啊什么的，都拉出去游街了、搞喷气式了、扫大街去了，精神被摧残成为乞丐了。没有成为乞丐的就自杀了。而且他们的家被抄了，读书馆被砸了，公共资源被封了，自然就没得教。最为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还要继续。

怎么办呢，那么多年轻人留在城市里，青春热血，都是不安定的主。本来管还不好管呢，看看校园黑社会，看看那些聚众斗殴的少爷小姐们。没有工作去消耗血管里滚烫的热血，没有学习任务去中和不确定的因子，终日无所事事，即使没有鸡鱼肉蛋，窝窝头和咸菜那点能量就足够他们惹是生非了。

只要文革还在继续，年轻人就没法安排。

那就去农村吧，那里有着广袤的大地，有几亿农民，他们是国家的支柱，都需要帮助。年轻人，去农村吧，那里不仅仅能解决就业问题，还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这些老人家当初都是从那里冲出来的，现在你们将重复我们走过的路。

建国之后，改革开放之前，一共出现过两次人口大范围转移。第一次是大跃进时代，千百万农民涌入城市去炼钢。刘少奇调整经济时，城市人口直接砍掉千万回农村。第二次，便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第一次可以理解为农民返乡。第二次则是知识青年穿越回原始世界。中间的是非曲直，酸甜苦辣，请参照各种伤痕文学和回忆录。

七月二十六号凌晨，讲到了下乡问题。讲下乡问题之前，谈到教育问题。

毛泽东说：“你们这张大宇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会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我说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多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二年，四年，八年，你还不是在那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一个办法，谭厚兰不就是想走了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还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高中比大学的课程还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这段话透漏出教育在毛泽东心中的样子。应该说对教育界看的还是很到位。教育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样子。今天也还是：教育时间太长，灌输理论太多，而实践不够，各个阶段的基础课程差不多。但是不搞又不行。不搞的话，那些年轻人就没地去，没法和社会接轨。

聂元梓说：“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打趣说：“她是老佛爷。”

毛泽东说：“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来的吗？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说：“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泽东说：“如何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写小说，每周给我写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见什么了！”

周恩来说：“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都僵化了。

毛泽东说：“我跟你们讲讲马、思、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大学读完了。其他人都没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半年，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待了八年，根本没有进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二年。”

——这就是上山下乡的理论基础，即现在教育不好，无法和社会接轨。要想搞好教育，必须搞好实践。古人的教育制度是不行的。因为按照那个模式培养出来的精英差一点把中国推入万劫不复之深渊。建国之后的教育也是铺张浪费多。既然如此，那就打散重新来过。

——应该说毛泽东对待教育的思考方式和对待官场是一样的，搞不好就打散重新搞，搞不好再打散，直到搞好为止（如果寿命足够长的话）。

人，尤其是成功的人，干事找不到模板可循时，就会从过往的经历中寻找经验。关于教育问题，毛泽东找不到出路时，就想到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取得了成功。因此要教育下一代，也可以把他们送到农村去。因此才有这么一番对话。

毛泽东说：“学问才不是靠在学校里学来的，以前我在学校里很不规矩的，我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考试嘛！好几门学科我都不搞的，再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有时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嘛！因为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帮腔：“我读中学，读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又没有中学文凭，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泽东说：“现在办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证实：“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到了四期加长了。”

毛泽东说：“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学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说：“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里几天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百闻不如一见。”

谈话过程中，韩爱晶向毛泽东提个人前途：“主席，文化革命搞完以后让我当兵去吧。”

毛泽东回答道：“当半年兵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兵干什么？当半年兵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就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不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还不是丘八！”

毛泽东问总参谋长黄永胜：“黄永胜，你念过几年书？”

黄永胜马上站起来，把军帽放在茶几上，毕恭毕敬答道∶“一年半。”

毛泽东又问：“你家什么成分呢？”

黄永胜回答：“下中农。”

毛泽东又转向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呢？”

黄永胜坐下去了，温玉成又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回答说：“三年。”

毛泽东问：“你家什么成分呢？”

温玉成说：“贫农。”

毛泽东说：“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就学这么点，他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黄永胜这个人我原来也不认识，到北京来谈了两次就认识了。”

毛泽东说：“学文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讲了吗？他们学文，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幸运的，你上了三年了，你是黄岗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楼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气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段斗争，历史就是阶段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如果想要证明毛泽东看不起多数人，看不起知识分子，这一幕是最好的证据。他把教育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然而如果以此为证，似乎又说不过去。因为从另一个立场上讲，又说不过去。因为他只是不赞成学校里庸长而死板的教育体制而已。用比较时髦的话讲，知识和能力是两回事。这些道理并不高深。可是也应该从这些并不高深的道理中看出毛泽东的缺陷。

这么说吧，如果是一般人说这些话，没有任何问题，说不定还能博得一番赞赏。如果是专家教授说这些话，也没有任何问题，还可以开讲座或上电视忽悠人赚钱。但是从一个国家领袖口中说这些话，不妥。

一个强大的社会体系，需要国民讲实干，有实干能力，没错。但是还需要精英。社会实践可以实践出焦裕禄、时传祥那样的模仿人物。但是像钱学森、邓稼先那样的人物，基本上走的都是精英教育路线。毛泽东的缺陷就在于没有看到精英教育的重要性，一股脑把年轻人全部赶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了。

然而即使到今天，中国似乎也还是不懂如何培养精英。因为在创新这一块，离期望值还很遥远，至少不能和咱们这个民族的智商和坚韧度相匹配。看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人在海外取得成功，很多人心中都会冒充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当年鼎鼎大名的李约瑟博士，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曾经问过一个类似的问题：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之谜”。它衍生出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为什么？？？？

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答案，比方说体制问题，比方说拜金主义，比方说教授水平不够，比方说学生吊儿郎当，要几火车皮都有。

也可以没有答案。因为在真正答案出现之前一直没有答案。等到答案出现之后，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从乐观务实的角度出发，不要钱大家把心思从赚钱中挪开，只要想着赚钱的时候不要老想着拉关系、开后门、皮条客那般无耻时，情况或许会稍微好一点。

正因为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毛泽东才更像一个“人”。当年那些人，所以会闹出大跃进和文革那些让整个国家疼痛的事，中央的一个原因就是不能纠正毛泽东的缺陷。毛泽东拥有缺陷的同时，也拥有巨大的有点。比方说对教育的看法，放在今天，即使是最满血愤青也没有他的观点毒辣吧。所以希望后来人，否定文革时，不要患搞文革的人同样的错误——一棍打死。别的不说，就教育这一块，确实问题多多。最让人难以接受的一个现象就是，小孩子（中学生）累死，大孩子（大学生）闲死；带着小孩子受累的那些人饿死，带着大孩子悠闲的那些人撑死。

**最痛**

红卫兵们去上山下乡了，离开了历史的舞台。经过两年多的折腾，他们可以说是史上最为暴力的一群知识分子。他们拥有的自由度超过任何时代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群体。

历史上，知识分子始终都是最活跃的群体。从春秋时代设计社会制度，到之后两千年修补社会制度，再到近代冲击社会制度，他们一直用自己的智慧或愚蠢在历史上留下足迹。

站在现代角度上看，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应该是春秋战国，那是一个发扬智慧和热心的时代，五四运动之后的知识分子也不错，不少人也有轰轰烈烈的一生。不论如何，他们拥有的自由度都是有限的。太远的就不说了，也就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混口饭吃。即使放眼今天世界，知识分子们也拥有的自由度还是不错的，闲着没事可以骂骂政府，对某项政策不满可以喷喷口水，如果人品不怎么样，还可以搞点谣言什么的。如果生活在欧美，为了表达自己的个性，可以往领导身上扔点鸡蛋或者高跟鞋什么的，也不错。

但也仅此而已。就算知识分子看某位领导再不爽，也没有机会把他抓过来捶一顿。就算对某项政策不满，更改决策的机会也不大。

除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两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可以像红卫兵一样肆无忌惮的冲击高干，可以对创建国家的功臣宿将们抄家、辱骂、开喷气式、体罚、侮辱。即使伟大的五四运动，也就是一帮年轻人砸了几个老官僚的家（还坐牢了），如此而已。但是在文革之中，身为知识分子的红卫兵们自由度趋向于无限。除了一小部分人不能批斗，一小部分人的家不能抄，一小部分机关单位不能冲击，那是爱咋折腾就咋折腾，想去搞谁就去搞谁。

正是这种趋向于无限的自由度带来了无穷的灾难。那些仅仅念过几年书，没有过任何实践经验的愣头青们，以自身那点狭隘的观点去结构现实社会，飞舞道德大棒去解决所谓社会矛盾，杀伤一大片，血流成河，惹得天怒人怨。他们把老一辈将帅名流搞差不多之后，又掉头对准自己的战友们，拉出枪炮，战斗不息。

之前已经描述过不少红卫兵破坏活动。比方说社会搞乱了，很多人搞死了，很多人死的很冤很可惜。整个社会都为此付出了代价。付出代价最大的恰好是红卫兵本身。

下面这一段也可能让很多人看了不舒服，这是从大一点角度讲的。

这么说吧，每一代人或者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都有自己的人生需要追求，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如愿。因为有很多原因阻碍大家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些拥有恒心和勇气、讲立场有原则的人更有机会成为成功者。

每一个成功者都是特殊的。不管是创作者还是革命者，他们都能干一些一般人干不了的事，在某些指标上超出一般人。文革就摧毁了那样子的一帮人，分成两类：即已经证明过自己的精英和没有证明精英。

被红卫兵打倒的那些人，那些政治家啊（如刘少奇、彭真、陶铸）、军人啊（如彭德怀、贺龙）、老一代知识分子（如老舍），这些都是为后人熟知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反思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他们进行的。要说文化大革命的不好，好像只需要把他们的遭遇摆出来就行了。确实，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但是从社会角度看，他们并不是文革最主要的牺牲品。为什么呢，还有其他牺牲者比刘少奇地位更高、比彭德怀贺龙战功更大、比老舍在社会上更有名气么，当然不是。他们的悲哀、痛苦后人基本可以理解。理解的前提是基于他们的生命能量已经得到充分释放，人生使命已经完成。

以刘少奇为例，文革时，已经六十八岁，生命已经接近终点。他的理论，他的斗争，他的治国策略都得到了展示。后人已经知道刘少奇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彭德怀贺龙也是一样，他们绚丽人生在战场上已经充分展示。同理也适用于老舍等人，思想感情已经融入了作品中。如果他们在二十岁遭受创伤，没有人知道他们将会有多少能量。

红卫兵恰好是一群人生没来得及展示的年轻人。他们的未来怎么样没有人知道。然后他们就遭难了。而且他们遭难的不是一个两个人的个人灾难，而是整整一代人。在每一个动乱的年代，年轻人骚动不安，会流很多血。不管如何动乱，不管流多少血，只是一部分人，总有另一部分人通过信念与能力去奋斗，在奋斗过程中成功展示自己，成为英雄。革命先烈都是这么过来的。然而红卫兵不一样，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人物，一部分死于武斗，一部分困死在北大荒。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武斗之中，冲在最前面死亡概率最大，叽叽喳喳卖弄嘴皮的懦弱之辈落在后面。是他们不知道危险么？当然不是。他们恰好是思想最为坚定、最为血性的人，为了某一个认定的目标不惜一切代价往前冲，看起来好像一根筋。换一个思考角度想想：如果他们在其它行业，在跑业务怎么样，肯定不会磨磨唧唧，唧唧歪歪找一大堆借口说不行的人；如果是创业，他们可能也是工作狂人级别，会不辞劳苦的干；如果是科研，会坚定的呆在实验室。一句话，其它行业，他们会成为那种埋头苦干或者拼命硬干的那类人。然而他们没有去跑业务，也没有去创业，更没有呆在实验室里，而是全部跑到大街上武斗。

上山下乡也是一样。那些年头，最为困惑的是谁？还是那些精英。他们在穷乡僻壤对着蓝天白云想啊想，怎么也想不清楚一切是咋回事：怎么革命变成了劳动呢？笨重的体力劳动真的能够磨练心智？工农兵再教育究竟得到了什么？他们想不到答案。不仅想不到答案，连谈恋爱的机会都没有了。为了娶妻生子、传宗接代这些人类最基本的行为需要，要么就苦等海枯石烂、黄瓜变烂菜，要么就随便找一个凑合一下。

那种郁闷、无奈、失落、愤恨实非文字能形容。当然他们有理由郁闷、无奈、失落、愤恨。他们本来应该进入各行各业想各种技术问题的，衣冠楚楚的光鲜形象出现在各个场合，而非蓬头垢面的浪费时光。而且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而且是好几年，而且是人生中最黄金的岁月，是知识积累，是思想成熟的最佳时候，就在郁结之中度过了。若干年之后，即使钢铁意志也被消磨了，当初的血性稀释为淡淡的冷水。生命虽然还在，生命中最珍贵的部分，诸如信念、理想、血性等等等都没有了，或者说很淡薄了。

如果不是发生文化大革命，像聂元梓那般讲原则的工作作风，像韩爱晶静坐的恒心，像王大宾数次勇闯地址部的勇气，像蒯大富那股不服输的折腾劲，都会有一番作为。而不是在监狱或者穷乡僻壤浪费时间。他们本来应该成为那一代人中豪杰，也具备成为豪杰的条件，然后就不明不白地掉入历史深渊，还得背上骂名。

等到文革结束，剩下的那部分人从农村出来、山上下来，再分配工作，再稳定下来，已经人到中年。从事科研的话，已经错过了人生中最黄金的时代（三十岁左右）。搞艺术创作，也错过了原始积累。正因如此，科研还是艺术创造领域，顶尖人物极为匮乏。而且他们的内心和头脑都深深地烙下政治烙印，干什么都政治挂帅。即使是经商，也是政治先行。

不是那一代人不行，而是那一代人浪费了太多青春，接受了那个年龄段不应该接受的东西。若干年之后，他们又因为自身遭遇而影响下一代人。因为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了他们生命中难以磨灭的印记，影响他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事风格。等到他们接过担子，掌控社会资源时，将不可避免的把某些不利因素掺杂进来。

所以说，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但文革造成的影响没有结束。

所以说，文化大革命，从国家角度上看，红卫兵的遭遇才是最痛。

所以说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远远不够，也不可能反思透彻。因为谁也说不清，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会怎么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文革是一场悲剧，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场悲剧。对老革命家，对年轻一代都是悲剧。

所以说这个国家不容易，这个不容易，既包含革命者建国之前抛头颅洒热血、建国之后各种政治运动，也包含大饥荒中的牺牲者和文革中的受难者。

如果说当年毛泽东强行推广三面红旗是他一生最大的错。第二件错事则是拿红卫兵去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举措相当于压上国家的未来。就伟大政治家而言，是一件极为不智的举动。毛泽东之所以会那么干，就是因为文革超出了他的预期吧。正如当年大跃进超出他的预期一样。

后来的从政者应该明白：除了生死存亡之关头（如抗战），都不应该压上年轻一代的前途于一件事上。假如错了，后果很严重。

**第二十三章 过渡性一章：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九大**

从延安整风之后，中央领导层基本稳定下来。建国之后，也就是高岗闹事之后，才把高岗和饶漱石踢出局。又过五年，庐山事件，彭德怀和张闻天离开了中央政治局。在文革之前，虽然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领导层还是稳固的。文革开始，领导层则出现天崩地裂一样的转变。转变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到九大结束。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号到十二号，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是在文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上刘少奇做了报告，对之前自己的报告归纳总结：自己承担责任。

在大会进程中，会场之外则是另外一个景象。八月二号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三天之后，也就是八月五号，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看到那张大字报，所有人都明白了毛泽东的决心。所有人都明白，毛泽东已经划出一条线，现的另一边是敌人。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必须站在线的另一边之外，其他人可以暂时选择站在哪一边。半个世纪的实践反复证明一件事：做毛泽东的敌人从来就不会有好下场。这个选择很容易做，所有人都做了当时看似正确选择，日后后悔不已的事。

于是两天之后，也就是八月七号，政治局成员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刘少奇的根基从此动摇，一步一步走向最后的深渊。

批判刘少奇的第二天，也就是八月八号，大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有了这个决定，文化大革命就变成了合理合法的中央行动。正是有了这个法理依据，此后所有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要接受教育。

大会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委；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李雪峰、谢富治、宋任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书记处书记；递补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候补中央委员；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杨尚昆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

这个名单最大的变化就是刘少奇从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林彪则从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从此之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布局完成。

会议结束之后第六天，毛泽东开始接见红卫兵，从此天下大乱。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刘少奇、邓小平、贺龙倒下。

二月逆流之中，徐向前、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受冲击。

朱德、陈云、董必武是不是挨批，已经靠边站。本来就靠边站的刘伯承病休。

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成了文化大革命铁三角。

毛泽东负责决策，如同大脑。

林彪作为左膀，一边高举小红本紧跟毛泽东，一边扩充实力，不知不觉中走到毛泽东的对立面，如同当年的刘少奇。最终采取了比刘少奇更为激烈的举动。

周恩来作为右臂，则是一边落实毛泽东的决策一边降低决策损失。

如果把文化大革命比喻成一堆火。毛泽东负责火怎么烧，柴禾怎么放。林彪则是靠着火堆取暖，想着，火堆由我掌控是不是更好呢。周恩来呢，在试着在火堆前构筑一个堤坝，试图不要控制那么多。其他人等，要么努力煽风（中央文革小组），要么被火烧得不行。

二月逆流之后，中央政治局基本上没人了，出来一个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分别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清一色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加周恩来。乍一看，是中央文革控制了实权，其实不然，这些人只是在党政部门折腾，还有另一个组成部分叫做军。军方的人马以林彪为首，但是林彪不参加，由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级别大致相当于之前中央候补委员。一看这格局就知道此后政策走向了。

在那个格局中，周恩来虽然孤身一人，确是老干部总代表。所有被批倒的、即将批倒的、不会批倒的老干部都站在周恩来周围。此时江青羽翼渐丰，中央文革就是她的翅膀，陈伯达和康生之外都是她的羽毛。陈伯达原本是中央文革小组长，在江青同志面前只是空架子，暗中投奔林彪。康生是个精于投机的老狐狸。江青嚣张的时候，他会想办法帮助江青嚣张。如果形式有所转变，他会毫不犹豫的背叛江青。

列席人物之中的，有两个人比较特殊，就是谢富治和汪东兴，一个公安部长，一个中南海警卫老大。严格意义上讲，谢富治和汪东兴并不是林彪的人。当然他们见了林彪要恭恭敬敬的，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之类的应承话。实际上他们是毛泽东的耳目，就是林彪和江青也得给三分面子的人物。

这些人之所以能以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方式取代中央政治局，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红卫兵造反。当红卫兵解散，成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文革的社会行动已经破产。没了红卫兵造反，中央文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中央文革碰头会也就成了一出无聊的戏台。接下来怎么办？局势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因为之前那个政府机构被打散了，负责政府机构的老干部也是死的死、伤的伤。未来怎么样也未可知。不管怎么样，首先要把已经混乱的局势稳一稳，把打乱的权利重新组合一下。

好吧，那就祭出老法宝，开会。

一九六九年四月，北京。

正常年头，中共都是五年开一次大会。中共九大，是一场迟来的会议，距离中共八大已经十三年了。如果不是政治斗争，早就应该召开了。

中共九大一共两个主题：一，肯定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正确的文化大革命还要继续进行下去，至于如何进行下去，后面再说。二，权力重新分配。

重新分配的权力之中，毛泽东还是毛泽东，还是至高无上的存在，还是一言九鼎，还是没什么约束。

林彪作为伟大领袖接班人写入了党章。其实林彪的地位也是相当于没变。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林彪成为二把手，九大之后还是二把手。接班人地位没有写入党章之前是二把手，写入党章之后还是二把手。林副主席还是林副主席，并没有把副字去掉。一字之差，天壤之别。仿佛看见了天堂，事实上咫尺和天涯之间也就一条鸿沟而已。

关键在于其他人。中央文革小组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正如延安整风事情的学习小组一样，是怪物。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存在一段时间是可以的，但不能长期存在。从长久角度打算，要想恢复平静，还是要重新回归中央政治局。于是重新有了中央政治局。

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

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

比起两年前的那份常委名单，精简了很多，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李富春、陈云不见了。这大概是建国之后中政治局精简最程度最严重的一次。

政治局委员，林彪的粉丝（如四大金刚）和江青的粉丝（张春桥、姚文元）统统加入，如同梁山好汉排座次一样，各归各位。

然而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共九大的两大主题是彼此矛盾的。也就是说权力的重新分配和文革的继续进行是不兼容的。

江青及其粉丝看来，权力重新分配之后，还要继续革命的。林彪及其林彪的粉丝则另有看法。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必须继续进行。

所以权力重新分配之日，也就是林彪及其粉丝和江青及其粉丝死磕之时。不是林彪想要和江青斗，或者江青想和林彪斗，是游戏规则决定的。江青和林彪置身其中，必须遵循游戏规则，要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死角**

要想描述文化大革命的死角，还是先要从红卫兵武斗说起。

红卫兵为啥要武斗呢。前面已经描述了不少，但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提出来，那就是红卫兵夺权过程中也夺了不少权利，为啥不去好好利用多到手的权柄？

按照现代人的思维看，很多事是不可思议的。从大规模夺权（一月上旬）开始到大规模武斗（七月下旬），中间至少有半年时间。那段时间是红卫兵夺权的黄金时代。只要是个红卫兵组织，都可以冲击政府机关，打砸抢搞批判之后宣布夺权成功。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红卫兵组织在半年时间里都夺得不少权力。

那些权力足够把造反派安顿下来。

牛叉一点的造反派头头可以省部级领导，身边战友可以组成领导班子。

次一级的造反派头头可以成为市委领导，然后组建市委领导班子。以此类推，他们可以去接管大学、工厂、医院、报社等等一大堆机构。小喽罗可以跑到街上当巡警啥的，保证牛鬼蛇神不敢出头。这也正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期望的，为什么就没有实现？为什么造反派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导致大规模的武斗呢。

武斗恰好暴露了文化大革命的死穴。

很多人眼中，有权力是很风光的一件事。打印拿在手，嗓子吼一吼，好事自己上，坏事下面上。想要干嘛就干嘛。当年红卫兵差不多就是这个路子。通过这个路子，按照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原则，把前辈老人家打倒在地，自己拿到了各种公章，宣传大权拿到手、天下归我有。

把红卫兵夺夺得的公章摆在一起，应该有一车吧。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运转，就是依靠掌权者对公章的使用。

公章使用的好，就能办好事。反之，亦反之。

红卫兵夺得那些公章之后却没有利用。于是，公章就成了一堆废物，就好比摆在博物馆里面那些古代皇帝的玉玺。如此太浪费了，不是么？

浪费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能力不行；另一个胆量不够。

权力那玩意需要经营的。啥意思呢，很简单，你是一个厂长，就要保证工厂正确运转；同理，市长、省长、部长也是一样，需要保证自己一亩三分地正常。所谓正常，也就是正常生产、销售、收支平衡、账目清晰啥的一大堆，都是实实在在的事。这些事看起来不风光，干起来可不容易，得了解很多人，要了解哪些人适合搞技术生产，还要了解哪些人适合搞销售耍嘴皮子，还要了解哪些人适合搞财政，这些都需要知人之明。这些能力不是与生俱来，都是后天实践的，需要足够多的生活经验和社会阅历才能慢慢积累。

夺权的学生或者工人虽然热情不缺，也许能力也不差，但实践经验就跟不上了。因为红卫兵虽然受过教育，有知识，但太年轻，担子挑不起来。工人年龄够大，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对于脑力劳动不在行。他们恰好是夺权的主力。权利夺到手之后傻眼了，不知道如何去经营。于是那一枚一枚象征权力的公章就成了破烂废铁。

能力只是夺权者没有经营权力的一个原因。没有能力可以培养嘛，就算从零开始学习也成啊。文化大革命搞了差不多十年。红卫兵也折腾了两三年，社会怎么就没有回归正常呢。参照新中国建立第一个十年，也是一帮没有掌权经验的人去掌权，从零开始，也搞得不错嘛。怎么在文革十年就不行了？

第二个原因：不敢。也就是说那些夺权者不敢尝试着去经营权利。这么说是不是很搞笑？造反夺权都敢，怎么就不敢去经营权权利？答案很简单：他们夺取的权利，就是从当初权利经营者手中夺取的，如果他们转头经营权利的话，立刻就会成为被夺权的对象。

红卫兵内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夺得权利的使用问题上各有一张嘴。

既然无法经营权力，如果继续夺权的话，何时是个头，那是遥遥无期啊！

红卫兵所以退出历史舞台，并不是因为他们冲击力不够，也不是因为夺权成果不够，而是因为进入了——权利经营——的死角。那个死角不仅仅困住了红卫兵，也把文化大革命拉入了困局，看不见结束的希望。

正因如此，才会导致第三次庐山会议上江青的粉丝和林彪粉丝的对战大戏，才会有是否设国家主席之争，才有接下来的九一三林彪事件，才会有周恩来失声痛哭，才会有毛泽东一夜之间衰老。

**劲敌**

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但是需要进入另一个章节了，因为事情进行到这里，必须要说说林彪。林彪的命运超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范畴，必须另辟一篇，将林彪的同时，继续讲文革。

细说林彪之前，再回顾一下中央文革小组的战绩。中央文革小组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份的十届三中全会正式诞生，到一九六九年四月份的九大完成使命，战绩相当可观。

中央文革存在的那段时间里，政府系统内部：第一代领导人中三大政治家之一的刘少奇坠入深渊，刘少奇的合作者邓小平跟着刘少奇坠入深渊，刘少奇的主要助手彭真、簿一波、陆定一等人坠入深渊，另有地方上调中央的陶铸等人坠入深渊，其它省部级高干还有一串长长的名单。军方系统内：共和国元帅贺龙坠入深渊，共和国大将罗瑞卿、许光达坠入深渊，上将中将还有一串长长的名单。

这些名单中，有些是中央文革的人干的，有的不是。但是打倒这些人之后，中央文革获利多多。中央文革小组一度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为共和国主要的权力机构。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组虽然解散了，但中央文革小组那些人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经过一番折腾，原本没有职位的第一妇人江青进入中央政治局，原本只是柯庆施秘书的张春桥进入中央政治局，只是文坛愤青的张春桥进入中央政治局。

一九六九年，新中国建国仅仅二十年，绝大多数在战争年代独当一面的人物还在。比方说十大元帅，只有罗荣桓去世了。比方说十大将军，只有陈赓去世了。除此之外，邓小平、彭真、陈云、薄一波等人还处在政治智慧完全成熟的时候。在那样的情况下，不管是江青张春桥还是叶群以及林彪的四大金刚资历或能力上都显得难以服人。

尽管中央文革小组不在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成员还在，而且还在新的和新权利机构——中央政治局——中继续干老本行，也就是继续进行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事业。为了伟大的文革事业，他们即将结成四人帮继续战斗。

要继续文化大革命，就需要要继续革命的对象。对象是谁呢？

九大之后，老干部基本上都打倒差不多了。虽然还有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等人在政治局，但该生病的生病、该靠边的靠边、该检讨的检讨。他们已经离开了权力核心。一个是失去了打倒的意义。第二个是毛泽东也不允许再去动他们。

只从延安整风之后，政坛已经形成一个稳定的铁三角，一个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个人形成的铁三角。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林彪取代了刘少奇。在江青等人看来，矛头当然要指向周恩来。然而他们已经努力了好几年，依然没能动得了周恩来。为啥呢？看看周恩来履历就知道了。

周恩来从一九二七年进入中央，中间起起伏伏，从没有淡出前五。即使中间有逼迫毛泽东下野的“历史包袱”，依然稳居中央。即使时不时检讨，依然摇摇晃晃而不倒。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有想过推倒周恩来，搞“伍豪事件”，没成功；在外交上制造事端，反而导致王、关、戚倒霉。

周恩来树大根深，远超中央文革那些嘴皮子的想象。周恩来的事，后面会细说。这里只需要指出一点，中央文革的灵魂人物，整人无数的康生白区时代在上海当特务时，就是周恩来手下的一员。文革期间，康生基本上针对过所有人。对周恩来也有过企图，但是用“伍豪事件”试探一下之后，收起了所有野心，临死之前还特意向周恩来揭发江青和张春桥自保。当然能让周恩来反复摇晃，证明中央文革还是成功的。

老干部都差不多了，周恩来推不倒。还有谁呢？只剩下一个目标，林彪。

理论家们也不会明目张胆去和林彪干。但是如果要继续战斗，那只能和权力新贵们作战。权利新贵基本上都是林彪的粉丝。林彪的粉丝主要集中在军方，按道理说双方是井水和河水的关系。井水也好，河水也罢，都在党的地盘，都是党的水。涉及到诸如国家主席这样重要职位时，斗争讲不可避免。

林彪的粉丝都是趁文化大革命之际爬上来的，比如军委办事组那些本不应该爬到那个位置的将军。四大金刚之中，除了黄永胜上将之外，其它都是中将、少将。在元帅和大将还在喝粥吃馒头的情况下，他们凭什么在那位置？凭他们是林彪的粉丝。

在文革之中，林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林彪的角色有多重要？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某位同学在现实中不爽，觉得领导没有给自己足够的冰淇淋吃，就带了一批人去找领导算账。

正常情况下，门前的保安会阻拦。当然保安人手有限。同学可以纠集足够多对现实不满、想吃冰淇淋而不得、对领导不满的同学一起搞定保安。

正常情况下，保安实力不够，可以叫人民警察。警察可以用手中的力量对同学们进行说服教育：领导很忙，想吃冰淇淋自己掏钱买嘛；没钱？回家找爹妈要嘛；什么，爹妈也没钱？那就好好念书，将来赚钱了再吃嘛；什么，不愿意？那么好吧，跟叔叔去局里仔细想想。听话啊，不然别怪叔叔动粗。叔叔这里有盾牌，有辣椒水，还有手铐，你们懂得。

正常情况下，只要人民警察愿意，想找领导要冰淇淋吃是很不容易的。但当时情况是同学不仅要吃冰淇淋，开可以把到手的冰淇淋扔到领导脑门上，搞一个大花脸。为啥会是如此呢？因为人民警察是谢富治管的，支持同学找领导讨要冰激凌。

谢富治是公安部长，负责全国公共安全。仅凭谢富治搞不定全国局势。警察只能维护表面治安。国家的基础建立在更为强劲的团队上，就是军队。如果谢富治敢胡来，军队可以直接灭了他。看看在七·二零事件中，谢富治在军队面前并不比王力同志强很多嘛。

军方的代言人恰好就是林彪。同学们找各位领导要冰淇淋吃，林彪代言的军队保持了沉默。有时候见同学们比较累了，还让军方鼓励鼓励大家不要泄气。

领导的家可能就在中南海，也可能在军区大院，没有军方点头，再多的同学们也不可能见到领导的。那么林彪怎么就那么牛，可以代言军方呢。平时生活中，代言一个广告都不容易啊，需要经纪人等一系列人物配合运作。

代言整个军方需要多少资源，需要多牛的人？好吧，就看看林彪凭什么牛。

